冯其庸先生为本书题字

千手拂雲
千眼觀虹

中石題

欧阳中石先生为本书题字

序言：文道独行必大侠

何建明

自古以来，成就大器者均有自己独到的优秀和优质之处，武道与文道皆如此。然而今天人们总在提及为什么少了大师这样的问题，这与当今文道、武道上缺了那些独行其是、独树一帜、独端品行的人才有关。

此处所曰的独者，并非是指脱离现实、远离公众、性情孤僻者，而是指在思想上、学术上和心理上、行动上具有自己独立意识、独立见解、独立思考、独立创造的，不去随便或简单地附和他人者。在今天，无论是文道还是武道或者其他什么的行当，浮躁者似乎居多，尽管有人不情愿主动地做这样的人，但种种诱惑下有时只得有意无意地堕落下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客观。

尤其是文人，在名与利面前最容易丧失个性和本性。卞毓方先生属于例外，而且是典型的例外者，因此他这些年来在我们视野里忽隐忽现证明了他的既生存又时常“消失”的现状，恰巧再一次证明了他的独行者的本性。卞毓方的散文写得好、写得比一般名家的好，是我作为一个出版人和当了二十多年文学大刊的主编在大量阅读当代诸多作品中所得出的一个结论。曾经在数年前我感叹过这样的一句话：看小说，要看李国文的作品；看散文，要看卞毓方的作品。这话后来被数家报刊转发，我曾担心会引起某些人的不满。可若干年过去了，竟然不仅没人出来指责，倒有不少人附和我的话。这令我安慰。

事实是：卞毓方的散文确实在当今中国散文界称得上是大家之作。这样的评价其实在季羡林先生生前也已有了，他评价卞毓方的散文是“常常有一种奇谲的光，与之相辅，艺术性强，文采葳蕤，颇有气韵、

底蕴”。现今的散文，通常看到的多数是写情或写景，作者围绕或事或景进行抒情、说理和实录、叙述。而卞毓方的散文作品我称之是“知性”散文，即在完成常态的写情写景之上的那种融入知识与智慧的文学。知性散文不易之处不仅在于一个作家的知识面，自然首先得有散文家的那种灵动的文采，擅长的景情叙述，更得有智慧的领提与捏拿和结构、章法上的考究。卞毓方在这方面是高手，甚至是哲学家和政治家的那种高手，故而他的散文可以博古说今、谈天说地，尤其是在论说政治和政治人物的文学中也变得丝毫不生硬、不胆怯、不回避，且能左右逢源、高瞻远瞩、入木三分。

卞毓方身上还有一个品质是许多当代文人所不具备的，即他从来不为一些肤浅的赞美和轻易赏出的名利所动。他极少在文人圈里活动，又很少参与文坛的诸多议论或纷争，然而他的作品一经抛出，即能轰轰烈烈，震耳欲聋。这就是卞毓方，这就是卞毓方的散文。

有人说卞毓方身上有一股气，即文气、生气和灵气，有时还有些霸气。我同意这些评价，只是我认为他的文章中还有一种锐气和孤气，尤其是锐气特别明显，其文情很少有随风摆动、跟风而行之感，总是会感觉他在远远的地方，或者在众人想不到的立足点上放射着不朽的思想光芒。故我也愿意总称卞毓方先生是文坛的独行者的缘故。

独行侠必成大侠，这是道上的古人之训。我们的学者和学界，需要卞毓方这样的独行者，这样中国的文事才能张显更加灿烂的光芒。

（注：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出版社社长）

自序：一代同龄大师的“比”与“兴”

这不是高论。

历史有各种各样的写法，譬如以朝代更替为框架，譬如以重大事件为核心，譬如以社会发展为经纬。我不是搞历史的，写不来那些“学”“术”并重的论著。我写散文，一般只对人物感兴趣，涂鸦之余，兴之所至，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人物的事迹，把他们从时间的深处请回来，组合排列，纵向展示，横向比较，在我看，亦不失为断代史的两三注释，三五补白。

这是2007年7月13日的事。那天，在位于京城西郊的301医院，笔者看望住院治疗的季羡林先生，趁兴谈道：“您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元老，在清华读书时就受吴宓的启发，把陶渊明和一位英国的浪漫诗人加以分析研究，我现在受您的启发，也想做一篇关于您那一代人的比较文章。”

季先生转过头来，寿眉上挑，目光似乎有点警惕：“我那一代，你怎么比?”

“您是1911年生的，”我说，“当初，为了写您的生日，我查了很多资料。对于您，1911年有两件大事，一，辛亥革命，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二，清华正式建校（之前是清华学堂）。1911年诞生了很多名人。”

“那范围太大了，你没法比。”季先生说。

“我只挑与清华有关的。”

“你都挑了谁?”

“第一个是王竹溪。”我说，“他是1911年6月7日生的，大您两个月。1929年进清华，高您一级，学的是物理。1933年毕业，入清华研究院，当周培源的研究生。1935年8月31日，王竹溪与您，还有乔冠华等六人一起去欧洲留学。您在《留德十年》中说，王竹溪是象棋高手，你们五个人，单独跟他下，不管下多少盘，总是输。输急了，五个人联合起来跟他较量，结果还是失败。哲学家乔冠华的哲学也帮不了忙，在车上的八九天中，你们就没有赢过他一局。”

“王竹溪这人很好，学问大大的有。他象棋厉害，但不是清华顶尖的，顶尖的是彭桓武，他只是老三。”季先生说，“前些年我碰到彭桓武，说起当年清华园的象棋比赛，彭桓武奇怪，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是王竹溪讲的。”

“当年六人同行，您去德国，王竹溪去英国，他比您先回，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是杨振宁、李政道的导师，”我说，“这事很出名。”

“当然啦，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季先生欲说还休，粲然一笑。

“我的所谓比，是比当事人一生的轨迹。”我说，“山不转水转，1952年院系调整，王竹溪转入北大物理系，又与您成为同事。‘文革’中他去了江西鄱阳湖鲤鱼洲‘五七’干校，在那儿患上了血吸虫病。”

“我没有去鲤鱼洲，不是不想去，是不够格，留下来，当批判的靶子。”季先生停顿，没有继续说下去。

“杨绛也是1911年的，生日是7月17，比您大半个月。”我说。

“她入清华时叫杨季康。”季先生记得清楚，“她是研究生，我是本科生。”

“杨绛1932年入清华，先是借读，第二年考上清华研究生。”我说，“她研究生没有念完，1935年陪钱锺书出国留学，杨绛和钱锺书去的是英国。”

稍等，我又说：“钱学森也是1911年出生，生日是12月11。他大学不是清华，是上海交大。1934年毕业，1935年去美国留学。”

“钱学森跟清华没关系吧？”季先生反问。

“有关系。”我讲，“他1934年从上海交大毕业，考取了清华当年留美公费生。2001年清华九十周年校庆，在历届学生中选出二十位知名学者，其中就有钱学森。”

“噢，你弄得很细。”季先生说，“你想比的，还有谁?”

“还有侯仁之。”我答。不待我说下去，季先生就讲：

“侯仁之我知道，比我小四个月。”

“您记得很准，”我笑了，“您生日是8月6号（公开的说法实际是8月2号），侯仁之是12月6号。”

“他不是清华的。”季先生说。

“侯先生是燕京大学历史系出身，念书时旁听过清华的地理课，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又兼过清华的《市镇地理基础》课。1952年转到北大。去年（2006）年底，侯先生和您，以及其他十位教授一起荣获北大首届‘蔡元培奖’。”我答。

“林庚去年10月走了，要是晚走俩月，‘蔡元培奖’应该有他。”季先生神情转为黯然。

冷场。双方都没有说话。我想到林庚，他是1910年出生的，1928年上清华，先学理科，后改文科，林庚个性鲜明，和季先生渊源很深，要是小一岁的话，倒是个理想的比较对象。

过了一会儿，季先生问：“还有吗?”

“陈省身，”我说，“他上学早，1930年就从南开大学毕业，然后到清华任助教，并读研究生。1934年研究生毕业，去德国留学。回国后，任清华教授。”

“我们见过，在南开大学。那一回，是出席范曾搞的一个活动，”季先生笑笑，“是为范曾撑腰，壮门面，碰上的。陈省身已经过世了吧。”

“是2004年。”我答。

鉴于讲话时间已长，我赶紧长话短说：“还有黄万里，黄炎培的儿子，清华水利系教授，右派；还有钱钟韩，钱锺书的堂弟，他考上清华，没上，念了上海交大；还有孙毓棠，清华历史系的，诗写得很好，在文学圈里相当活跃；还有董同龢，音韵学家，他1932年进清华中文系，担任过《清华周刊》编辑，以及中国文学会主席，后来去了台湾。不谈了，不谈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黄炎培我熟悉，黄万里不清楚，孙毓棠熟悉，钱钟韩、董同龢知道一点，不多，你点的这些人，都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我等着看你的文章。”季先生微笑颔首。

然而，2007 年下半年，外加整个 2008 年，我已移情语言文字探源，且在推出《季羡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之后，又完成了一本《季羡林图传》，同时趁热打铁，着手撰写《天意从来高难问——晚年季羡林》，因此，前面所说为季先生那一代同龄大师作比较文学的事，一直没能提上日程。其间，也曾把题目交给我的学生赵枫莲女士，她作了努力，写出部分初稿，后因故未能完成。2009 年岁初，我做美国之行，便中探访、游览了钱学森、陈省身、黄万里当年留学、工作之地，往事袭来，怦然心动，遂决定亲自动手，以上述与季羡林先生的谈话为契机，写一本比较文学的专书。

在 1911 年出生，而又与清华有关的名人中，我最终挑选了六位，分别是：季羡林、钱学森、陈省身、侯仁之、杨绛与黄万里。王竹溪其实是个好例子，才气好，人品也高，但在写了一半以后搁下，原因在于他去世太早，只活了七十一岁。七十一岁，拿“古尺”衡量，也是过了“古稀”，高寿了，但在今天，只能算中寿，和上述六位比，更是小来兮。本书最终确定的六位主人公，都活到九十岁以上，而且在笔者着手“比较”的时候，其中四人业已九十晋八，百岁在望——光凭这一大把年纪，就够“巍巍乎高哉”的了；按生日先后排列，分别是杨绛、季羡林、侯仁之和钱学森。以上六位大师，都是二十世纪漩涡湍流中的砥柱，在历史的花名册上，是要用粗犷的字体特别标示的优秀分子。他们都是与清华学校同庚，大学毕业后转向海外，而后又叶落归根，在各自的领域撞响黄钟大吕。鉴于出身不同，秉性迥别，机缘殊异，他们的人生曲线，既有交叉，重叠，更多的则是犬牙交错，参差不齐。所以阅读他们，就像从直升机上鸟瞰一场高水平的马拉松赛，道路的每一处转折、倾斜，选手的每一程战术、发挥，都看得一清二楚。

六位大师，每一位都是一部大书，把他们组合在一起写，工程未免庞大，我投机取巧，只挑他们关键时刻的典型表现——即便如此，有一些地方，也只是点到为止，有那个意思就行了。现在干什么事都讲究互动，我把更多的思考留给读者，我相信读者的眼力。

2009 年 2 月 5 日　北京

目　录

序言：文道独行必大侠/何建明 …… 1
自序：一代同龄大师的“比”与“兴” …… 3

上　篇

第一章　童年梦幻 …… 3
第二章　少年青春 …… 18
第三章　相交在清华园 …… 37
第四章　仗剑天涯 …… 59
第五章　人生的那一半 …… 80

中　篇

第六章　建国分水岭 …… 101
第七章　反右之劫 …… 124
第八章　“文革”悲欢 …… 152
第九章　人生七十 …… 176
第十章　笑傲八十 …… 195

下　篇

第十一章　巍巍九十 …… 225
第十二章　九五之尊 …… 249
第十三章　公元2007 …… 264
第十四章　公元2008 …… 281
第十五章　公元2009 …… 295
第十六章　公元2010 …… 313

不是尾声的尾声 …… 337

上篇



天接雲濤連曉霧
星河欲轉千帆舞
仿佛夢魂歸帝所
聞天語
殷勤問我歸何處
我報路長嗟日暮
學詩有驚人句
九萬里風鵬正舉
風休住
蓬舟吹取三山去

易安詞漁家傲
庚寅中秋前二日雨後
齊之藏力書於柳之清泉



第一章　童年梦幻

1. 泛　论

大师都是打童年走来，但是走着走着，相当一部分的大师却失去了童年。若问：大师的童年哪儿去了？一是遗忘，大师多半上了年纪，陈年旧月的事情他已记不清，说不明；二是故意隐瞒，因为大师的童年，也是光屁股，嘬指头，玩泥巴，和普通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大师（包括后世的“为尊者讳”者）害怕童年把他矮化、稚化，索性闭口不说。是以本文再现的六位同龄大师的童年，只是在遗忘和隐瞒之余幸存的“一鳞半爪”。即便这些“一鳞半爪”，也难免是经过精心筛选，乃至粉饰美化，这都是人性之常，人情之常。不过没关系，我们懂得如何把它复原，因为我们既掌握了时代的脉搏，又掌握了大师成长的轨迹乃至最后下落的姿态。

2.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人一生下来，就开始寻找自己的位置。
——无名氏

杨绛：伶俐乖巧，出手无声

杨绛从历史深处的无锡走来。这是一个书香门第，她的曾祖父和祖

父，都在西湖边做过小官，恰如白居易吟咏：“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父亲杨荫杭（1878～1945），“荫”是辈分，如杨绛的二姑母、三姑母，分别叫荫枌和荫榆，“杭”八成寓指杭州，有其字“补塘”为证。杨荫杭生于清光绪四年，值清王朝行将土崩瓦解之际，“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这是曹雪芹的喟叹，是借薄命的贾探春自喻的。但是对于叛逆者而言，末世又象征着变化，象征着机遇。杨荫杭是得风气之先的人物，曾先后考入北洋公学、南洋公学，而后又留学日本、美国。南洋、北洋、东洋、西洋，时人最羡慕的洋墨水都叫他喝了。学而优则仕，杨荫杭在日本和美国学的是法律，归国后，历任国民政府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他生性耿直，颇世颉俗，所以在官场就混不圆，终于在京师高等检察长任上丢了官。据杨绛回忆，那件事与扣押交通部总长许世英有关：

> ……许世英受贿被捕，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许世英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总长的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他决不会顺从国务会议的“宣告”，不会承认国务会议有判决权。我不知这个案子是如何了结的，可是我料想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秋，我父亲准是和北京的行政首脑在顶牛。一九一九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职照准。（《回忆我的父亲》）

谁能说，父亲的个性，没有在杨绛的身上留下烙印呢？

杨绛的母亲唐须嫈（1878～1937），与父亲杨荫杭同龄，娘家为无锡富商，曾就读于上海务本女中，与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以及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同学。杨绛印象最深的，不是母亲的知识，而是她和丈夫的关系。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说：“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

谈……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这当然是杨绛成人后，读了法国古典作家拉布吕耶尔的书才产生的联想。拉氏形容朋友间的默契，说：“一起幻想，同他们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同他们聊，想到他们，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只要是同他们呆在一起，这就足够了。”有夫有妻如此，无疑是人生的极佳状态，用古话讲，就叫“琴瑟和谐，鸾凤和鸣”。进入二十一世纪，吴学昭曾问杨绛：“您父母这种敞开心扉、互通衷曲、相知默契的关系，对你们姊妹有多大影响?”杨绛回答：“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

杨荫杭膝下有八个子女，杨绛排行老四，她上边有三个姐姐，下边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这就是她最早的地位。八个孩子，排头的有排头的优势，属于领导阶层，殿尾的有殿尾的好处，属于“最小偏怜”，动不动就撒娇耍赖，唯有排中间的，像杨绛，不上不下，两头的好处都不沾边。杨绛天资聪慧，善解人意，她上不和姐姐争权，下不和弟妹争宠，与父母相处，伶俐乖巧，温顺体贴。比方说，父亲饭后吃橘子，她主动帮助剥皮，父亲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她主动帮助脱壳去衣，果品不论干鲜，一经她手，管保收拾得干干净净。

父亲午饭后要休息，一帮小孩懂事，自动散去。父亲有一次叫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杨绛乖觉，她拿了一本书，坐在父亲房里，大气不出，静静地翻，遇到要上厕所，或拿什么东西，也是如小猫行地，寂然无声。父亲一觉醒来，看到小天使般的杨绛默默陪侍在侧，心头一个咯噔，瞬间的温暖，岂是俚俗的一件“小棉袄”所能比拟！从此午休，都要杨绛陪。冬天到了，父亲屋里生着通红通红的炉火，火苗要不时加煤，不然就会熄掉。杨绛即使干这种粗活、笨活，也是屏息敛气，出手无声。杨绛早慧，她小小年纪，就懂得把自己的脚放进父亲的鞋子里，进而从父亲的角度来考虑一切问题，这可是大大的能耐。童年是成年、老年的雏形，我们在日后将会不断看到，这正是杨绛之为杨绛的“独门武功”。

杨绛生在北京，未满百日，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四岁，随父母重返北京。这是中国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杨绛重返北京，起初住在东城，房东是满族，她因此见识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高底鞋的

满族妇女。她们的高底不是像上海人那样嵌在鞋后跟，而是位于鞋底正中，俗称“高底鞋”，或依其形状称“花盆底”鞋、“马蹄底”鞋。木底一般高五至十厘米，有的高达二十多厘米，但不会超过一尺，所以又称为“寸子”。满族女子穿上这种鞋，不仅身高陡增好多，而且走起路来，前倾后仰，婀娜多姿。父亲有一次问杨绛：“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杨绛认真思索了一会儿，答：“要!”

杨绛六岁，进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读书。她中午不回家，在学校包饭。一天，小学生们正在用午餐，适逢一批客人进来参观，主陪的不是别个，正是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她当时担任女高师的“学监”。贵客驾临，饭厅一片肃然，小学生们埋头吃饭，鸦雀无声。杨绛背对着门，没有看清形势，她吃得吧嗒吧嗒，面前掉了不少饭粒。三姑母见状，疾步走到她的跟前，附耳说了一句悄悄话，杨绛省悟，赶紧把饭粒捡起放进嘴里。旁边的小朋友看了，也照她的样子办。

钱学森：家世深厚，聪颖过人

钱学森的家世比杨绛深厚。通俗地讲，他有着贵族的背景。中国的贵族，因为频繁地改朝换代，不断地洗牌，“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寿命一般都很短。钱氏家族不然，他们从吴越国王钱镠（852～932）算起，一千多年以来，代有钟鸣鼎食之家，博学鸿识之徒。这要归功于钱镠的家训。据史书记载，钱镠临终留下“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勤俭为本，忠厚传家”等十条遗嘱，子孙恪守无违。因此，南宋以降，特别是明清两代，钱氏家族涌现出众多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杰出学者。即以当代而论，钱氏家族同样人才辈出，如钱玄同、钱穆、钱锺书、钱钟韩、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钱正英、钱其琛等等，皆是其中翘楚。最近又有一例：2008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就是钱学森的堂侄。

钱学森的祖父是钱镠的第三十二代子孙，和清末大商人胡雪岩同代，也是在杭州经商，以贩卖丝绸为业，手腕、魄力不及胡氏，家境还算宽裕。父亲钱均夫（1880～1969），英挺瘦削，温和坚毅，早年就读杭州求是书院，毕业后留学东洋，研修教育，其间，曾和钱玄同、朱希

祖、鲁迅、周作人等，追随在章太炎左右，归国，在上海成立“劝学堂”，以施展其“兴教救国”的抱负；1911年，也就是钱学森诞生的那一年，出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母亲章兰娟（1887～1935），为杭城富商之女，清逸温婉，知书识字，记忆力和计算能力超群，具有数学天资。这样的女子，在清末绝对是凤毛麟角。有人说，钱学森惊人的天赋，正是来自他母亲的遗传基因。

钱学森生于上海，落地不久便回到杭州。三岁时，父亲钱均夫到教育部任职，他也随父母迁居北京。六岁，进师大附小，与杨绛同年同校。钱学森是独子，个儿不高，生得面如冠玉，目若朗星，外表极像一个公子哥。客观说，钱学森具备公子哥的一切条件。但他家教严格，在母亲的培育下，两三岁，就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并学会用心算加减乘除。想当初，在客人面前表演背古诗，是小学森的拿手绝活。唐诗、宋词那玩艺儿，小孩儿未必懂，只能死记硬背，但她是中华文化的瑰宝，长大了自然能慢慢消化，融会贯通，达于心，达于骨髓。

钱府不是贾府，钱学森不是贾宝玉。他从小就有志气，据说五岁时，能读懂《水浒》。一天，钱学森问父亲：“《水浒》中的一百零八个英雄，原来是天上的一百零八颗星星下凡的。人间的大人物，做大事情的，是不是都是天上的星星变的呀?”父亲觉得这问题挺大，认真想了一下，回答：“《水浒》是人们编写的故事，其实，所有的英雄和大人物，像岳飞呀、诸葛亮呀，还有现在的孙中山呀，都不是天上的星星，他们原本都是普通的人，只是他们从小爱学习，有远大的志向，而且又有决心和毅力，不惧怕困难，所以就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情。”钱学森听罢，大受鼓舞，他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

钱学森聪颖过人，做事爱琢磨，爱动脑筋。上小学时，男孩子喜欢玩一种飞镖，它是用硬纸片折成，头部尖尖的，有一副向后斜掠的翅膀，掷出去能像燕子一样飞行，有时还能在空中回旋。钱学森是此道高手，他折的飞镖，飞得又稳又远，小伙伴谁也赶不上。有人不服气，拿过他的飞镖检查，看看里边是否搞了什么“鬼”。这事，恰巧被自然课老师撞着了。老师走过来，把钱学森的飞镖复原，让他重掷一次，果然飞得又远又稳。老师把学生召拢来，让钱学森讲解其中的奥秘。钱学森说：“我的飞镖没有什么秘密，我也是经过多次失败，一点儿一点儿改

进的。飞镖的头不能太重，重了就会往下扎；也不能太轻，头轻了，尾巴就沉，先是向上飞，然后就往下栽；翅膀太小，飞不平稳，太大，就飞不远，爱兜圈子。”钱学森的话，让小伙伴们大为折服：“鬼”原来不在飞镖，而在钱学森的心里——他就是“鬼点子”多嘛。钱学森的话，更让自然老师大为震惊：小小飞镖，里面有科学，钱学森无师自通，悟出了空气动力学的基本原理，这小同学不能小看，他很可能是一个大科学家的料！是的，自然老师的眼力不错，假如要给童年的钱学森定格，这无疑是最好的镜头，题目就叫：小小飞镖能飞多远。

陈省身：天钟数学，性爱自由

陈省身诞生于浙江嘉兴，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南邻杭州，北接上海，东临杭州湾，是刘禹锡、陆贽、沈钧儒、王国维、茅盾、徐志摩、巴金、金庸等古贤今士的故乡。市区有“轻烟拂渚，微风欲来”的南湖——这是不能不提的——1921 年 8 月，在湖上一艘画舫召开的共产党会议，关系到尔后中国的命运，自然包括陈省身。陈省身出生的时候，王国维已在京师图书馆供职，郁达夫刚刚离开嘉兴一中，而徐志摩仍旧在读。在当日，这几人和陈省身风马牛不相及，如今回过头来，不能不承认是地灵人杰——尽管这是一句老话，在王勃《滕王阁序》之后已堕落为陈词滥调。

没有必要提陈省身的祖父，他老人家去世很早，陈省身压根儿没见过面。陈省身的童年，是在祖母的慈荫下度过的。祖母陈唐氏，名字大概是没有的，颇通文墨，培养一子三女，也都读书认字，这是陈省身最早的文化氛围。父亲陈宝桢（1889～1967），是甲辰年（1904）的秀才，是年十五岁，一个甲子后他回忆此事：“六十年前此甲辰，蓝衫著体倍生春。一时佳话传鸳水，二八韶华席上珍。”此处鸳水，乃南湖的别称。父亲虽然是旧知识分子，难得的是思想活跃，紧跟形势，在陈省身出生之后，以弱冠之年，“幡然改计学申韩”，考入浙江法政学校，是一个勇于进取、追求时尚的人物。母亲韩梅（1887～1945），生于商人之家，识字无多，勤劳朴素，淡泊无华。陈省身的启蒙教育，全仗祖母与小姑姑抓紧。两位旧式女子，新学是不通的，能教他些什么呢？不外就是认

认字，读读书，再就是掰着指头识数。这里讲的书，无非《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课程不理想，方法更谈不上科学，要紧的是认了字，给了他眺望世界的窗口。儿童求知欲盛，记性强，祖母念经拜佛，陈省身也跟着学，久而久之，他能背出全部的《弥陀经》。

陈省身的童年时代，清王朝的梦魇已成了过去，民国的大旗并没能覆盖全国，南北军阀混战，神州大地简直无一刻安宁。陈省身静静地呆在嘉兴，似乎跟这一切关系不大，其实大有影响，外界的纷扰通过空气式的传播进入他的内心，参与营构、捏塑他原始的世界观。

让我们撩起历史的帷幔，从陈省身的童年攫取一两个镜头。省身的父亲打法政学校毕业，长年在省城工作，每年只是到了岁尾，才回嘉兴和家人团聚。有一次，父亲返家过春节，给小省身带了一套礼物，是当时流行于新式学堂的《笔算数学》，分上、中、下三册，是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和中国学者邹立文合编的。此书初版于 1892 年，陈宝桢购得的这套，是第 18 版，可见它在中国风靡的程度。陈宝桢把它送给小省身，意在让他接触新学，还家当日，他略略讲了阿拉伯数字和数学算法，觉得儿子还小，待其正式上学后再教不迟。谁知陈省身一听就爱上了，他一个人私下里慢慢啃，越啃越有兴趣，没过多少日子，居然把三册书啃完，并且做出了其中大部分的习题。这简直是奇迹，陈省身无意中闯进了数学的门槛——那里正通向他生命的殿堂，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祖母与姑姑更是无从窥探，他的这一天赋，长久被埋没。

儿童的日子过得快，转眼到了 1919 年，陈省身已经整整八岁，是上小学的时候了。清末嘉兴府辖嘉兴、秀水两县，陈省身的家在秀水，秀水城里最好的学堂，是县立小学，家人把他送了进去。陈省身第一天上学，犹如小鸟出笼，拍打着翅膀，瞧什么都激动，都新鲜。然而，意想不到的一件事发生了：课间休息，他看见老师把几个学生叫到一边，用戒尺挨个责打手心。不用说，这都是课间表现不好的。在 1919 年前后的中国，这种体罚仍很盛行。季羡林在他的《回忆新育小学》里，就记述过被先生用竹板戒尺罚打的情景。陈省身没有进过学前的私塾，少见多怪，大为惊骇，不明白老师何以如此野蛮？学生何以如此可怜？散学后，他把这一幕告诉家人，并且声明，这样的学校，他宁肯不上。小省身的态度十分坚定，笔者不知道用嘉兴话怎么表达，套用北方的俗语，则为：惹不起，躲得起。果然，第二天早晨，陈省身死活不肯去学

校。第三天也不去。第四天也不去。这是陈省身对外部世界做出的第一次激烈反应。陈省身如果有什么贯穿终生的信仰，那就是对专制压迫的痛恨，和对自由解放的渴望。西方人爱说“性格即命运”，中国人也有“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说法，看什么呢？当然是看性格。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人的一生的际遇，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性格为原点，一寸一尺地向四外扩展延伸。

这样一件大事，家人一定把它报告给陈省身的父亲。父亲是怎么表态的？现存资料没有显示，姑且忽略不计，但是结论很清楚：陈省身胜利了！作为一代数学宗师，他创造出只念一天初小就罢学的豪举。

黄万里：一是闹，二是傲

黄万里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家世。他祖籍为江苏省川沙县，老家的旧宅，是前清内阁中书、举人沈树镛的内史第。这是一座三进院落的大宅，占地一千五百平方米。黄家之所以能入住于此，是因为黄沈两家是亲戚，黄万里的曾祖父，娶了沈树镛的姐姐。除此之外，根据最新考证，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也在此宅出生成长，胡适也在此宅度过童年——光是这一项记录，就足以使黄府锦上添花，与有荣焉！何况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1878～1965），还是大清朝的举人、早期同盟会的革命党、转型时期的教育家。黄炎培曾先后创办和主持广明小学与师范讲习所、浦东中学，在爱国学社、城东女学等新教育团体和学堂中任教，并参与发起江苏学务总会。辛亥革命后，担任江苏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而后又出任江苏省教育司长。黄万里的母亲王纠思（1883～1940），为南汇县周浦镇一位读书人家之女，十七岁嫁入黄家，婚后就读于上海城东女学，学习师范与育蚕，课余哺育婴儿，料理家务。

黄万里生于上海。他母亲总共养有十二个孩子，存活九个，五个男孩，四个女孩。黄万里排行第三。鉴于祖父祖母早逝，父亲又长年在外，母亲独力照顾一个大家庭，实在顾不过来，这就导致孩子的成长，呈散漫的放羊状态。黄万里天性顽皮，愈是没有人管，愈是人来疯。小时候，黄万里的调皮捣蛋是出了名的，他的一个亲戚回忆：“小万里不

仅自己闹，想出各种花样在家里闹，还招来一群村野顽童一起闹，爬树钻洞，大呼小叫，奔走追逐，总之是闹。”有一例为证：黄万里有一个姑姑，年长未嫁，一天，姑姑与男朋友关起门来谈话，气氛十分神秘。黄万里预感有好事，事先躲在床底下偷听。当一对情侣敲定终身大事时，他突然从床底下钻出来，大喊：“噢，成功了！成功了！”

调皮之外，还加上骄傲。这大概也是儿童的天性，总想当第一，总要争英雄。父亲偶尔回家，考察黄万里的禀赋，看出他的毛病，一是闹；二是傲。对于前者，父亲给予谅解，淘气是儿童的专利。有时黄万里闹急了，父亲便轻轻指着他的脑瓜，笑嘻嘻地点上一句：“你总要闹出个名堂才好！”对于后者，父亲决不姑息，他经常告诫黄万里：“古人云‘虽有周公孔子之德之能而骄者，则其人决不能称贤’。戒骄必须从内心出发，仅在形态上不虚伪犹不足道也。”

父亲终归在家时少，母亲又疏于管教。2001 年 2 月 18 日，黄万里在一份自述中说：“十岁以前极其顽皮，为母亲所厌恶，长期寄宿于学校，寒暑假则托寄给至亲代管。”这基本上是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好处是随心所欲，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坏处是监管缺席，欲望泛滥，嬉玩过度——要知道，他毕竟还是孩子，纵然是一块良璞，也得有大匠运斤。

十岁以后，大匠出场了。大匠不是别人，乃是浦东中学附属小学校长王则行和班主任王夔钧。此事可作两种解释：一、浦东中学乃黄炎培手创，雇员对大老板的孩子当然要另眼相看。二、他们凭多年教学经验，确实看中了黄万里的率直、纯朴、元气淋漓、生龙活虎，深信眼前这位淘气的少年，只要引导得法，就能成为争气的少年。两位师长是怎么引导的？试看黄万里的《自述》，他说：“1921 年至 1924 年，为浦东中学附属小学校长王则行、班主任王夔钧先生看重，严加培养，课学加速进步，小学时以第一名毕业。”又据徐刚记述：“王则行与王夔钧先生在朝夕相处中，看中了这个顽皮学生的可爱之处，聪明、诚挚，有极强的记忆力，便让他多背古文，学写旧体诗，并告诉黄炎培：‘此子可造。’”

侯仁之：体弱多病，母爱无涯

侯仁之的家世，鲜为人知。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他自己不说，旁人也就无从知晓。笔者仅知道他父亲名天成，字佑忱，毕业于协和大学，那是所教会学校，他祖上或他父亲是如何与教会结缘的，不得而知。母亲刘毓兰，没有正式进过学堂，全凭自学，认得一些字，婚后跟丈夫学会珠算。人是极聪明的，据说，侯家与一所教会医院为邻，那家医院的护士，就常过来请刘毓兰帮她们算账。

侯仁之生于河北省枣强县肖张镇。这不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在山东省恩县（现已撤销——笔者）庞庄。侯仁之的父亲大学毕业后，到肖张镇的一所教会学校任教，顺便就把家安在了那里。吾国风习，男主外，女主内。这是父系社会的法则。侯仁之的父亲也与杨绛、钱学森、黄万里的父亲一样，整天在外忙碌，他的童年，大部分是与母亲一起度过。最新科学研究证明，母亲的素养和作为，直接影响孩子的资质。侯仁之幼时身体孱弱，也没大病，就是弱不禁风，碰一碰就倒的样子，难以坚持正常上学，总是读一阵，休学一阵，这对他是很大的打击。尤其复学之后，照例要留一级，对于幼小的心灵，更是雪上加霜。笔者读初中时，同样因为生病，还有贫穷，曾休学一年，那种落后于人的难堪与羞耻，至今想起，仍然刻骨铭心。这个时候，母亲的作用就充分显示出来了。母亲鼓励侯仁之，人生在世，经历这灾那难，是很寻常的，生病不要紧，你年轻，生命力强，经过治疗、休养，很快就会痊愈。又说，人生是一场长跑，一时的快慢无关紧要，关键是后劲。为了使侯仁之病中的心灵得到优质的滋养，母亲为他订阅了上海广学会的《福幼报》和其他少年读物，这在小小县城，是很奢侈的事。钱学森的启蒙读物是唐诗宋词，陈省身的是《笔算数学》。侯仁之的读物别开生面，是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的新潮报刊。侯仁之从报刊了解人生、世界，他苍白的童年也因之变得五彩斑斓，多姿多态。母亲信教，经常拿《圣经·旧约》中的小故事，启迪侯仁之的心智，务使他在疗养中保持健康向上的精神，坦然微笑地拥抱生活。

母亲生育侯仁之时，已年近四十，这是侯家的第一个孩子，父母喜

出望外，给他取名光临，学名仁之。两年后弟弟出生，取名重临，学名硕之。母亲着力培养孩子的自立意识和劳动习惯，兄弟俩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要求他们动手洗一些小件的衣服。母亲还让他们在院子里开出一块菜地，种瓜植豆，两个人各管几畦。院子里有两条甬道，母亲要求他俩各扫一条，看谁扫得又快又干净。母亲把两条甬道命名为“津浦路”、“京汉路”——这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两条铁路，有了这么个象征性的名字，哥儿俩觉得自己像个小火车头，扫得更加带劲。侯仁之的母亲是伟大的，同样是扫地，她只是给甬道一个新的命名，就使枯燥的劳动变成了浪漫的进军，耳旁交织着风声、车轮声、汽笛声，以及发自内心的“加油”。这只是一个细节，一个打时光的指缝偶然漏出的金色细节，一滴水看太阳，借此我们可以充分领略侯母的教育风范。把道路扫干净也是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我甚至觉得，侯仁之后来迷恋历史，继而又迷恋上历史地理，这种兴趣与倾向，早在他与弟弟争扫甬道时就已埋下了种子。

季羡林：穷乡僻壤的野小子

与以上五位相比，季羡林绝对是个异数。他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那是一个穷乡僻壤。据其自述：“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北方其他省份）穷。专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就是说，季羡林这一粒种子，不幸是像但丁形容的那样，“掉在了岩石缝里”。

季羡林的祖父，是个土里刨食的农民，生有三个儿子，因为日子艰难，养不起，把最小的老三送了人。季羡林出生的时候，祖父祖母都已去世，短命，想必和穷愁潦倒有关。祖父祖母死后，家里只剩下当时尚未成年的父亲和一个更小的叔叔，孤苦伶仃，相依为命。兄弟俩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那日子是什么滋味，概可想见。据说，兄弟俩缺衣少食，经常饿得头晕眼花，四肢无力，有次实在挨不过，偷偷溜去村南大户人家的枣林，捡落在地上的烂枣充饥。季羡林的母亲姓赵，俗称季赵氏，终生连个名字也没捞上，更甭说文化什么的了。

季羡林的童年，没有幼儿园，没有书香，没有父爱母教，对于城市、高楼、电灯、娱乐、英雄等等，缺乏起码的想像，唯独对于本能的口腹之欲，情有独钟。晚年季羡林作《我的童年》，他在文章中说：

“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子；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举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欢我。我三四岁的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腿就往村里跑（我们家在村外），跑到奶奶跟前，只见她把手一蜷，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递给我。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胆凤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这白面馒头是她的两个儿子（每家有几十亩地）特别孝敬她的。她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大概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每天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勤之余，可以捡到一小篮麦穗或者谷穗。晚上回家，把篮子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欢喜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了饭以后，我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

季羡林小时候，基本上是一个野孩子，野地里疯，野地里长。还有一件事，季羡林自己没说，各家传记也没交代，他小时候出过水痘，脸上留下淡而又淡的痘瘢，虽然不怎么显形，终归是个缺陷。季羡林四五岁时，由父亲张罗，跟一位姓马的先生认了一些字，这仅仅是第一步，接下去怎么办？既然家里穷得连书本也买不起，当然谈不上供他正规学习，小孩儿有一搭没一搭地晃荡个三年五载，很容易就错过开发的季节，撂荒了。这绝非危言耸听，季羡林有两个小伙伴，一个叫杨狗，另一个叫哑巴小，两人的前途可以参照。当年，三个小娃儿见天在一起玩，浮水、打枣、捉知了、摸虾，快活郎当，形影不离。后来怎么样了呢？杨狗终生务农，老实巴交，一字不识。哑巴小呢，落草当了山大王，练得蹿房越脊，如履平地，本领煞是了得，可惜那是一条不归路，

最后一个失手，叫官府捉住，砍了头。季羡林的出路，纵然成不了铤而走险的绿林好汉，也必然是像杨狗那样，当一辈子农民，整日价面朝黄土背朝天。

写到这儿，想起一个故事：科学家霍金发育迟，很晚才学会阅读，上学后，在班里的表现十分糟糕，老师觉得他是马尾巴串豆腐——提不起来，同学把他当成讽刺捉弄的对象。霍金十二岁时，班上有两个男孩公然用一袋糖果打赌，说他永远不会有出息。同样的道理，倘若当年有人就季羡林的命运打赌，肯定赌他不会成材。

3. 综合评点

六位主人公都出生在王纲瓦解、民国肇兴、军阀割据、新旧交锋的激烈时刻——在所有的背景中，这是最重要的一笔。他们的命运，自然也随时代而沉浮。

六人的祖籍，就中国的版图而言，都偏于东部，且集中在长江、黄河下游。如：钱学森——浙江杭州，陈省身——浙江秀水，杨绛——江苏无锡，黄万里——江苏川沙，侯仁之——山东恩县，季羡林——山东临清。这是符合当时的“文化板块”的。有道是“地灵人杰”，中国的好风水，基本上是向东南沿海倾斜。

六人的生日，就公历来说，都集中在下半年。如：杨绛——7月17日，季羡林——8月2日（俗误为8月6日），黄万里——8月20日，陈省身——10月28日，侯仁之——12月6日，钱学森——12月11日。这也很有趣。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什么节气、星座之类的奥妙？笔者没有研究，不敢妄言，姑且存疑。

六人的父亲，三位是职业教育家，即钱均夫、黄炎培、侯天忱，两位是官员加知识分子，即杨荫杭、陈宝桢。他们的孩子，得天独厚，比别人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唯有季羡林的父亲，是“汗滴禾下土”的农民，属于弱势群体。

儿童时期比什么？比智商？六位主人公，智商都属一流；比身体？除侯仁之外，其余均属健康；比家庭？一个明显的事实，教育是要拿钱铺路的，没有资本投入，就没有文化产出。

人有恒言：童年的幸福与否，系于天下的父母。

钱学森的童年近于理想化：渊深的家世背景，士林楷模的父亲，知书达理而又循循善诱的母亲，生地在上海，幼儿期在杭州，童年进北京，入北师大附小……所有这一切，交织成一个令人羡慕的文化氛围。钱学森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知识启蒙和高雅的文化旨趣，如果生在汉末，他会使孔融见绌，如果生在北宋，他会使司马光逊色；都说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钱学森的童年其实比黄金更贵，无价。在笔者看来，钱学森是唯美主义的结晶，他令造物产生的愉悦，绝不亚于世人感到的歆羡。

美中也有不足：钱学森是独生子女，加上父母基因的遗传，他的童年是孤单的，天性是内敛的，偶尔，还显得十分任性；但是我们在国内的出版物中，看不到任何这方面的描述——这就属于遗忘和忽略，需要我们在他今后的经历中小心挖掘。

父母就是儿童的领导，兄弟姐妹就是儿童的朋友和同事，儿童感受社会，不是用理论，而是用心。杨绛在童年时期就已充分感悟父母（领导）的气质，这是长大了读多少本书也抵不上的。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杨绛迅速适应了自己不上不下的地位，她用一颗纤细的心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应对从容，进退裕如，有若天启。

罢学事件，显露出陈省身的气质和人格。“不自由，毋宁死”，《马赛曲》的名句，陈省身未必听过，但这份渴望，却是人人生而具备，在陈省身的身上体现得更为强烈而已。

而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陈省身闭于家门之内，陷于孤独之境，这对他的健康成长颇为不利。虽说不是独子，他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小家庭还是热闹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他的领导才能），但是到了该上学的年龄而不上学，周围缺乏智力、兴趣相当的同伴，缺乏音乐美术体育的熏陶滋养，缺乏宽广的人际交流，他心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些方面很敏感，如数学，有些方面则很迟钝，如音乐和体育。陈省身晚年自曝：“我一向不迷恋于体育运动，听音乐则发现只是浪费时间。”斯言大谬！陈老先生喂！这一切都是您童年的闭锁造成的，是生之不幸，是成长的残缺，切不可当作经验炫耀鬻卖！

黄万里的童年是锅夹生饭，一方面，有玩耍嬉戏相随，他的天性是狂放的，生气是充盈的；另一方面，由于和家庭疏离，他的灵魂未免显

得粗糙。黄万里的母亲在重负之下忽略了他，他也因此无缘很好地认识母亲，这一点，终将在他日后的道路上投下阴影。

侯仁之的童年，一半阴郁，一半阳光，阴郁来自他的疾病，阳光来自他的母亲。《圣经·旧约》有言：“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疾病是侯仁之人生的第一堂课，母亲最终帮他跨越前进的障碍。母亲是儿童的上帝。母亲是帮助儿童驶向生活激流的舵。

季羡林的童年是平凡的，我们左看，右看，横看，竖看，都和大师的潜质相距甚远。但是他后来分明成了大师，响当当的！这说明观察存在缺陷。笔者转而想到卡耐基的名言：“人生所能得到的最好财富，就是出生在贫寒之家。”《孟子》亦有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以是观之，季羡林的童年并非一无可取，而是大有深度——当他一旦脱离混沌，懂得发奋而又努力抓住上进的机会，昔日的贫穷就会化为强劲而坚韧的动力。

时人爱把童年比作人生的起点，一个惯用的教育口号就是“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以侯仁之、季羡林的情况观之，我们宁愿相信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的快慢并不重要，关键是战术的合理安排以及充沛的体力，尤其是后劲。

第二章　少年青春

1. 泛　论

少年是童年的延伸。童年懵懂，少年渐转自觉。童年多偶然，少年多必然。童年无心插柳，少年有意栽花。童年摸爬滚打，少年腾挪变化。童年是蹒跚学步，少年是策马狂奔。梁启超先生说得好："少年人如朝阳，少年人如乳虎，少年人如侠，少年人如戏文，少年人如泼兰地酒，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少年人如春前之草，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要而言之，少年是人生多向出击、奠定基础的阶段，一株幼苗能长成多高的大树，一粒石子能激起多高的巨浪，在少年时期，已基本看出端倪。

2. 天生我才

春花不红不如草，少年不美不如老。

——袁枚

杨绛：天生一颗读书种子

杨绛八岁随父母南下，在无锡、上海读小学。十二岁，进入苏州振华女中。初中阶段，国文老师教授老子《道德经》选段，她背得滚瓜烂熟。有一天，父亲拿出《左传》，教她其中一篇，她不过瘾，私下通

读了全书。杨绛小学的后半期是在上海启明女校度过的，那是所教会学校，所以她英文功底较好。振华英文课本上有 Lvanhoe 的选段，她不满足，暑假找来原著，前半部生字较多，边查字典边啃，到得后半部，生字渐少，越读越顺，她尝到了读原著的乐趣。杨绛有时借病不去上课，在寝室偷读狄更斯的英文作品。假期加读中文典籍。父亲有一次问她："阿季（笔者注：杨绛小名），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说："一星期都白活了。"

高一时，国文课本上有李后主的词，杨绛一读之下，若有宿缘，爱不释手。课余，她找来大量李后主的词，以及其他诗人的作品来读。父亲评价杨绛，说她"喜欢词章之学"。其实，父亲自己也钟爱诗歌，尤其耽读杜甫的诗。杨绛记得，父亲过一阵就会对她说："老杜的诗，我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父亲读而不作，是纯观赏派。父亲每天晚上临睡前，总爱高声朗诵诗词，那时，杨绛就常常站在他的身边，看着他的书旁听。

高中国文老师在班上开讲诗词，也让学生试做，这正中杨绛的下怀，她调动腹笥，精心结构，完成的作业，常常高人一等，颇得老师赏识，有好几篇，被推荐在《振华校刊》发表。下面这首"五古"，就是其中之一：

斋居书怀

松风响飕飕，岑寂苦影独。破闷读古书，胸襟何卓荦。有时苦拘束，徘徊清涧曲。俯视溪中鱼，相彼鸟饮啄。豪谈仰高人，清兴动濠濮。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染丝泣杨朱，潸焉泪盈掬。今日有所怀，书此愁万斛。

老师给的批语是"仙童好静"。

杨绛上课，不光带了耳朵，还带了脑瓜和嘴。有次国文课上，一位姓马的先生讲胡适的《哲学史大纲》，说到古人公孙龙的一个命题，"白马，非马也。"杨绛立马顶牛："不通，就是不通。假如我说马先生，非人也，行吗?"杨绛这里显出了黠慧冲动的个性。马先生不以为忤，笑着反唇相讥："杨季康（笔者注：杨绛的本名），非人也；杨季康，非人也。"这一师一生，在课堂上玩起了文字游戏。此情此景，令

笔者想起当年陈衡哲与胡适的通信："你不先生我，我不先生你；你若先生我，我必先生你。"有同学见状，乘机起哄，说："喔！马先生原来不是人噢！"结果挨了马先生的臭骂（嘻嘻，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而始作俑的杨绛，却怡然观变，平安无事。

1928 年，杨绛十七岁，她用五年修完六年的中学课程，提前一年从振华毕业。杨绛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外文系，孰料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是年清华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杨绛不得已，转而报考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苏州东吴大学。金陵女大她考了第一名。东吴大学初试第一，复试第二，状元为孙令衔夺得；但是校方说，论真本事，状元仍应该是杨绛，因为孙令衔是东吴附中毕业的，复试的考题，他在中学曾经做过。

杨绛选择了东吴。这是根据家人和中学老师的意见，他们认为男女同校有利于广交朋友，健康发展。第一年不分文科理科，各门功课一起学。到了第二年，要分专业了，杨绛遇到了难题：她喜好文学，但是东吴的文科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杨绛选择法预科，她想的是父亲已经退出官场，从事律师行业，自己学了法律，将来可以当父亲的助手，再说，在法政部门做事，有机会接触社会上的方方面面，熟悉人间百态，有利于将来写小说。出乎杨绛的意料，父亲虽然干着律师，却不爱这个职业，坚决反对女儿步其后尘。杨绛在法预科读了一年，无奈，又改读政治。这是唯一的选择。

杨绛对法律兴趣不大，对政治更是索然寡味。尽管如此，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以自己超群的实力，奠定了才女的地位。杨绛是那种过目不忘、一点就通的学生，她不用头悬梁，锥刺股，从不开夜车。杨绛进校之初，童心未泯，课堂上还和同学玩吹球，她双手合成船式，小球可绕手指转十几转。大一大二，个别功课偶尔失手，降为二等。到了大学三年级，她的各门功课，包括"四肢发达"的体育，都夺得一等。像她这样的"纯一"，全校只有三个，四年级一名，她班上两名，另外一名，是学理科的徐献瑜。

杨绛中英文俱佳，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 1928 年英文级史、1929 年中文级史，都出自她的手。杨绛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于昆曲。大学期间，她还自修法文，径直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蛮地道的法语。

钱学森：科学和艺术双翼齐飞

钱学森比杨绛幸运，他在北京师大附小读到毕业，又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师大附中。这两所都是京城名校，一百多年来，一直是青少年学子的首选。教学质量自然是不用说的了，其他参数、指标，也都高高在上。比如说，1919年“五四”运动，八岁的钱学森手举小纸旗，走在游行的学生队伍里——这样的历史机遇，天下有几个小学生能碰上？又比如说，1920年秋天，年方十六、蓄势待发的女革命家邓颖超，她的人生第一站，就是到师大附小任教——这样的双向选择，天下又有几所小学能比肩？

说到师大附中，更为令人羡慕。钱学森读书的当口，校长林励儒（1889～197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是一位推陈出新、力主变革的教育家，林氏以附中为试验田，倡导一种“全人格”的教育。所谓“全人格”，就是全面发展。附中集合了一批卓越的教员，据钱学森回忆：教几何的傅钟荪老师用古汉语自编讲义，把道理讲得很透，常说，“公式公理，定义定理，是根据科学、根据逻辑推断出来的，在课堂如此，到外面如此；中国如此，全世界如此，即使到火星上也如此！”这使钱学森“第一次得知什么是严谨的科学”。矿物硬度分十等，博物老师把它编成歌诀：“滑、膏、方、莹、磷、长、石英、黄玉、刚、金刚。”合辙押韵，十分好记，钱学森晚年还能脱口而出。化学实验室随时开放，只要跟实验室管理老师说一声，不受课程科目的限制，进出自由。教生物的于君实老师，常带领同学去野外采集标本，教他们解剖蜻蜓、蚯蚓和青蛙。学校组织各种课外小组，并开设多门选修课，如非欧几里得几何、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工业化学以及中国的诗词、音乐、伦理学等等。有些课程全部用英文教授，高二开设第二外语；钱学森选修的是德语。那时，学校的考试风气与今天截然不同：没有人临阵磨枪，临时抱佛脚，加班加点，开夜车，因为“大家重在理解不在记忆。不论什么时候考，怎么考，都能得七八十分。”

钱学森最早爱上科学，是在初中。一次课余聊天，有位同学说：“你们知不知道二十世纪有两位伟人，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列宁？”

众人闻所未闻，面面相觑。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信息相当滞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虽然问世十多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也已过去了五六年，他俩的大名和事迹还没有广泛进入中学校园。见状，那个同学禁不住神采飞扬，侃侃而谈，他说，爱因斯坦是位科学巨匠……列宁是位革命巨匠……学校图书馆有关于他俩的书……。钱学森听得心痒，就从图书馆借了一本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内容似懂非懂，心扉却轰然洞开，他看到了身外有宇宙，宇宙有无穷奥秘。科学，就是开启宇宙奥秘的钥匙。正是从那时起，他思想的飞镖，开始试探太空的广阔与自由。

钱学森具有数学天赋，这样的天赋是不多见的，陈省身算一个，陈省身的天赋他本人浑然不觉，旁人也浑然不觉，躺在那儿睡大觉，一睡就是好多年，钱学森的天赋一开始就被他的母亲激发，尔后又得到小学老师、中学老师的精心培养；高中毕业前，几何老师傅钟荪就特意叮嘱他：记住考数学系，你一定大有前途！

钱学森同时具有文学天分，他的古文基础相当扎实，写得一手漂亮的政论和小品。国文老师董鲁安曾预言：钱学森有望成为一个大作家！

钱学森的丹青造诣也是一流。初三那年暑假，美术老师高希舜举办绘画训练班，教习西洋油画，钱学森报名参加。他买不起油画颜料，就用水彩代替。高希舜（1895～1982）乃湖南人士，长沙一师毕业，与青年毛泽东交好，他主攻国画，当时在美术界已算得是个人物。受高先生的影响，钱学森一度也对绘画入迷，他作过两幅史前动物生态水墨画挂图，被老师视为精品，长期保留。1930 年，钱学森在上海交大读二年级，因患伤寒，休学一年。其间，他专门拜师学习国画。钱学森如此描述他的心得：“每当观察事物，运笔作画，那景物就融汇在我的心里，彼时，什么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心里清爽极了。”

钱学森也是音乐迷。他学过钢琴、提琴、小号，嗓子也不错。在上海交大，他是乐队的圆号手。众所周知，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是一位狂热的音乐发烧友，他有一把名贵的小提琴，总是随身携带，每当夜幕降临，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他便拿起心爱的小提琴，演奏一首莫扎特的小夜曲，让自己陶醉在优美的旋律中，放松紧绷一天的神经。爱因斯坦说：“有一点我确信不疑：真正的艺术应该产生于创造力丰富的艺术家心中的一股不可遏制的激情。”爱氏就曾把创造相对论的灵感，归之于

音乐。此中三昧，钱学森尽能得之。交大毕业前夕，钱学森在《浙江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音乐和音乐的内容》，讲的就是如何“使音乐成为浙江青年所了解、所爱好的一种艺术”。

钱学森对艺术的酷爱终生不变，他相信美术、音乐、科学之间，自有联系。若干年后，他曾向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同事表示：根据定义，一则数学难题的解答，具体呈现就是美。

陈省身：崇尚独立与“玩”

陈省身不爱音乐，不爱体育，这是千真万确。倘若据此认为陈省身不爱玩，不会玩，那就错了，大错而特错。陈省身爱玩，更会玩，他的玩，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向的，他是同知识玩，同自己的心智玩。

自打念了一天初小，坚决退学之后，陈省身就在家中自修。一年后，直接考入秀州中学附属高小。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你也许讨厌教会的传道背景，却不能不承认它在培养人才方面的功效。陈省身有个姑夫在那儿任教，一切都是他搭的桥。陈省身凭着这一机遇，一下子跳了几级，他“三级跳”式的生涯从此开始。十一岁，也就是1922年，父亲陈宝桢转去天津法院任职，举家跟随北上。次年初，陈省身考入扶轮中学，插班读初一下。扶轮是交通部办的学校，师资力量强大，校长顾赞廷亲自教几何，“教得很凶”，这正对陈省身的心路。他因为数学成绩好，考试总名列前茅，深得校长的青睐。

不过，说到其他的功课，陈省身却平平常常，不是他缺乏能力，而是没有兴趣，不屑多花工夫。还记得爱因斯坦学生时代取笑历史的事吗？说他从来不需要知道这么多。陈省身是爱因斯坦的同道，他觉得一般的功课，只要知其然就可以了，用不着刨根究底，穷追不舍。这其实是天才的一种要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天才多半是偏才，全副心神只专注于一个方面，其余则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陈省身不在其他功课上用力，那么，多出来时间干什么？跑图书馆，看书。自由自在地翻，天马行空，不拘一格，像什么历史啦、文学啦、掌故啦，他的态度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陈省身意志坚定，藐视软弱、动摇和依傍。中学毕业前夕，他在校

刊发表了一首新诗，题目是《纸鸢》，其中写道：

纸鸢啊纸鸢!!
我羡你高举空中，
可是你为什么东吹西荡地不自在??
莫非是上受微风的吹动，
下受麻线的牵扯，
所以不能干青云而直上，
向平阳而落下。
但是可怜的你!!
为什么这样的不自由呢?
原来你没有自动的能力，
才落得这样的苦恼。

强调“自动的能力”，不为外力所左右，志在“干青云而直上”，不向“平阳而落下”。这正是他的文化人格。

即使对于心爱的数学，陈省身也决不死用功，他的态度一以贯之：“玩”。数学能玩吗？能！同样是在中学校刊，陈省身发表过一篇《一几何定理之十六种证法》，讲的是弦切角定理的多种证明方法。所谓弦切角定理，是指“弦切角等于它所夹的弧所对的圆周角”，这是古希腊人早就解决的老问题，陈省身旧调重弹，拿它作多种证明，当然不是创新，它唯一的价值，就是“玩”。在同一篇文章中，陈省身写道：

数学是学校中重要功课之一，这是大家所公认的。几何学在数学中占了极重要的位置，非但有志于研究科学的人，应当注意它，就是普通的中学生也应该拿它当做应有的常识。然而研究几何的人，常常觉得它枯窘无味，所以不肯用功。本来叫一个人，使他对于素所不喜欢的功课去用功，是一件不近人情的事。那么，增加学生对于几何的兴趣，更是一件不可或缓的事。我认为在一个几何习题中，去寻找它的种种证法，很可以引起研究几何的兴趣，并且又可以养成有系统的脑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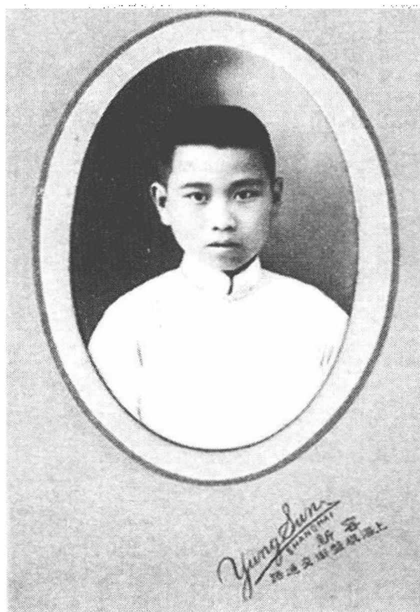
陈省身还“玩”化学，“玩”植物学，“玩”一切他喜欢的功课。陈省身摒弃虚荣心的诱惑，从不争分数，争名次，因此，他与第一名无缘。据笔者经验，这其实是心智的大释放。人间悠悠万事，无不带有游戏的一面，陈省身的“玩”，不是玩世不恭，玩物丧志，玩岁愒日，而是深得学问与人生之真谛。

陈省身视体育为畏途，中学时，百米在二十秒开外。不过，他也有一项体育喜好——围棋。小时候，父亲和朋友在家中对弈，他站在旁边看，看着看着就学会了。他记忆力非常棒，一盘棋下来，复盘不必重摆棋子，脑子里记得清清楚楚。陈省身对围棋爱之入迷，甚至有过当一名职业棋手的念头。不用说，他对围棋的态度，也是“玩”。

扶轮中学是旧制，初中加高中，总共四个年级，比起六年制的新式中学，少了两年——陈省身等于又跳了两级。1926 年，陈省身十五岁，从扶轮毕业。当时的天津，只有两所大学：北洋大学和南开大学，北洋规定四年制的扶轮毕业生只能考预科，南开则规定可以考本科，但它是按照六年制中学的标准命题，这中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譬如说解析几何，陈省身就没有学过，另外，物理、化学知识也不够。时间剩下不到一个月，家里适逢祖母去世，忙得一团糟，怎么办？是考北洋的预科，还是考南开的本科？陈省身决定两校都考。他向别人借来六年制中学的有关书籍，突击了三个礼拜，考试结果，同为北洋、南开录取；在南开的排行榜上，他的数学是第二名。既然能念本科，当然就不会去读预科，陈省身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南开。

黄万里：全面发展，多才多艺

黄万里十三岁小学毕业，比杨绛、钱学森晚一年，并且他进的不是中学，而是无锡实业学校——这无疑是他父亲黄炎培的主张。黄炎培在中国首倡职业教育，1917 年，在上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接着创办第一所中华职业学校（相当于现在的职高），设土木科、机构科、商科。中华职校大旗一展，各地纷纷仿效。无锡实业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该校设高中课程并有土木专业。黄万里在那里学习了三年，门门功课名列榜首。毕业时，年方十六，就业嫌早，继续深造，又不知学什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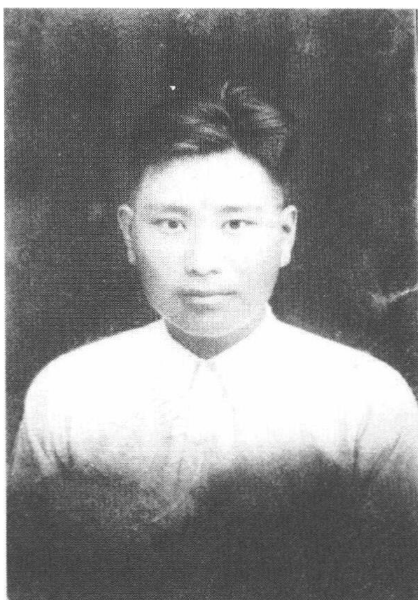
1924 年黄万里考入无锡实业学校学习。

黄炎培有一个熟人，叫刘恩湛，沪江大学校长，留美博士，专攻教育，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从孩子在学习中最有兴趣的科目，考察其日后应长期从事的专业》。黄炎培于是找到刘博士，请他把自己的学说，实施在小万里身上，帮他选定未来的职业。刘博士经过一番考察，发觉黄万里知识渊博，文思敏捷，感情丰沛，断定他适宜于从文。刘博士的结论，黄炎培认为有理，但他没有照办，为什么？当然还是与他的教育理念有关。此时的黄炎培，已经被视为中华职业教育的鼻祖，而他的大儿子方刚，学的是哲学，二儿子竞武，学的是经济，都与他本身提倡的有距离，于是，黄炎培就和刘博士商定，让小万里学习桥梁工程。

1927 年，黄万里从无锡实业学校毕业后，以同等学力考取了唐山交大预科。那时的唐山交大，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工科名校，它有官费撑腰，学习条件一流，毕业后工作去向也是一流，职业收入、社会地位都比较高，是报考工科学子的竞争目标，录取的分数常常在清华之上。据 1934 年进清华的何炳棣回忆，以数学而言，一般认为唐山交大、上海交大的入学试题都比清华繁难。门槛高，培养出的学生质量也高。举例说，像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旅美科学家林同炎、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维等，当初，都是从唐山交大走出的。

1928 年至 1932 年，黄万里在唐山交大本科学习四年，其间的事迹，今已湮没无闻。1948 年 6 月 14 日，黄万里在兰州中学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我怎样训练自己》。其中部分内容，可作为他大学生活的参照。黄万里在报告中说："有秩序的生活：看重时间，我下午四点半到六点必运动，十一点后必卧。在大学时，从不牺牲十五分钟。连续坐板凳毫无意义。休息与用功配合，以求集中思力。午睡重要。活泼我精

神——切勿呆样——音乐、跳舞、骑马、游泳、开车都要会，少作无聊谈天。理解书无需读两遍——求一遍读透彻。文学书明义后应朗诵。下意识助人思考。政治意识未清楚前，少做政治活动，专家可勿加入党派。”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特点，一、勤奋，惜时如金；二、重视生活规律，热爱体育运动，讲究劳逸结合；三、拒绝平庸，多才多艺，活力四射。在这一点上，与钱学森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四、读书重在理解，做事头脑清晰，行路脚步坚定。黄万里若不是天才，至少也是一个大才。他是为一个理想的社会而预备的。此外还有一件事，可以作为有力的佐证：毕业前夕，黄万里三篇用英文写作的论文，即《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应力设计法》、《铆钉接头中各铆钉应力推算法》和《混凝土砂石配合最大容重决定强度论》，由他的前辈，其时名望正如日中天的茅以升作序，推荐出版。茅以升（1896～1989），是唐山交大1916年的毕业生（时名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留美博士，1919年底归国，历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唐山交大）教授、校长，东南大学工科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等职，黄万里的论文得着这样一位大家的青睐，足证他在大学校园的影响和地位。


1932年黄万里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

侯仁之：跑出人生新气象

侯仁之的童年是灰色的，据他的长女馥兴提供，仅在初一这个台阶，就读读停停地“蹲”了两年。第三年，还读初一。这样的环境，即使身体完全康复，也是不宜再待下去的了。侯仁之有个堂兄，叫侯成之，东吴大学体育系毕业，在山东德州博文中学执教。因是之故，1926年秋，父亲让侯仁之离开家乡中学（伤心之地），跟堂兄到博文就读。

博文是一所教会学校，体育风气浓厚，各种项目之中，篮球尤为大家喜爱。班班有篮球队，经常举行班际比赛。侯仁之受堂兄的鼓舞，也想上场一试身手。一天，他壮着胆子找到本班的篮球队长，说出了自己的心愿。队长看看他，矮而且瘦，而且黄，一副病恹恹的神态，岂能硬碰硬地打篮球？摇头，断然拒绝。其实，不要说班代表队，就是本班同学玩球，大伙分成两拨，哪一拨也都不要他。侯仁之被孤立在篮球运动之外。他感到绝望，由绝望中又生发出豪气：既然玩不了球，我就练跑步——跑步，是不要别人恩准的。从此，每天下了晚自习，他就围着操场，一圈又一圈地跑。坚持了整整一个冬天，风雪无阻。转过年来，学校举行春季运动会，体育委员找到他，说："侯仁之，你参加1500米吧，怎么样？"侯仁之感到突然，他说："我可是从来没有参加过比赛呀。"体育委员说："你行，你肯定行，我看见你天天晚上练来着。"侯仁之于是就硬着头皮报了1500米。比赛开始，发令枪一响，侯仁之就拼命往前冲，跑过一圈，又一圈，转弯的时候挺纳闷：怎么旁边一个人都没有？回头一看，哈，所有的人都被他甩得老远！侯仁之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冠军。（2009年春，笔者在侯仁之先生的影集中看到他当时冲刺的身影，落在他身后五六米的一位选手，从动作看，不像是第二名，极有可能是被他甩下整整一圈的。）



1938年10月在辅仁大学举办的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对抗赛5000米跑中获第一名。

侯仁之应该感谢博文，感谢这年的春季运动会，经此一赛，他就像换了一个人，变得开朗而活泼。侯仁之的灵魂苏醒了，生活真正像新潮报刊一样在他面前摊开。从那时起，侯仁之除了跑步，又踢起足球。他跑得快，跑不死，这就是他的资本。在篮球上失落的，从足球上捞回来，侯仁之一路踢到校队队长。侯仁之还演过话剧，剧名《山河泪》，反映朝鲜的沦陷和抗争。你们不是觉得我矮而且瘦吗？嘻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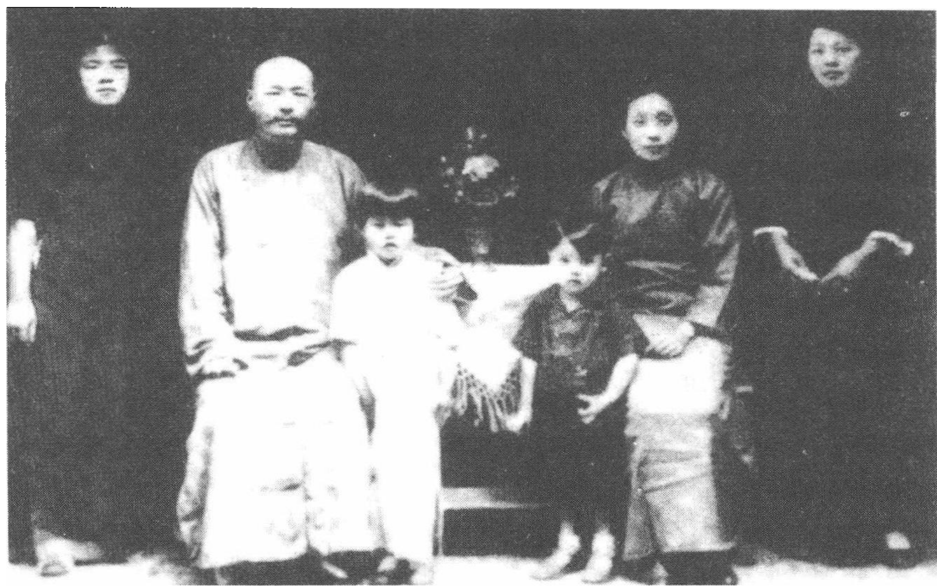
那就演个女孩给你们看看。结果，空前的轰动，哗哗的鼓掌。侯仁之还参加全校演讲比赛，夺得头名。喜讯报告给母亲，母亲感到无比欣慰。母亲希望侯仁之将来成为一名教员，她在回信中说："等到有那么一天，我能坐在最后一排位置上听你讲课，该是多么高兴啊！"遗憾的是母亲不久病逝，她没有能等到那一天。在丧母的大悲痛里，侯仁之动手写作剧本《基甸救国》，说的是以色列人争取自由解放的历程。这是悲情的一次大宣泄，大释放。写好后，有人帮他把稿子拿到济南，发表在齐鲁大学的《鲁铎》杂志。

高中最后一年——1931年至1932年——侯仁之转到河北通县潞河中学。这是他父亲读过的协和大学的旧址。父亲希望他将来成为一名医生。大概因为儿童时期久困于病，他自己也是那么想。后来，出于对时局的关注，对燕京大学历史学家顾颉刚的仰慕，以及弟弟侯硕之的激励，遂决定选择历史；硕之是这样对他说的："我主张你学历史。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以给社会治病。"并举出鲁迅、郭沫若先学医，后从文的例子作参考。侯仁之听从弟弟的主张，报考了燕京大学历史系。

侯仁之进了燕大，仍然坚持长跑，从本科生一路跑到研究生，跑到留校当教师。他名下的5000米校纪录，一直保持了十多年，直到1954年，才为北京大学的后生打破（1952年燕大并入北大）。侯仁之先生的影集，保留有在燕大长跑时的雄姿，其中一幅注明是"终点冲刺"，画面上的他赤膊上阵，精神抖擞，一马当先。艺术家黄宗江回忆："师兄侯仁之……我初上燕京大学时他已经是研究生。我们曾一同参加越野赛，从西校门跑至颐和园再折回未名湖。他获冠军，我居第五名。在我前的三名均是外籍学生，乃有人戏称我为中国学生之亚军，亦殊荣也。"有资料显示，侯仁之那一次越野赛的成绩是17分45秒，他战胜的外籍学生中，包括一名英国长跑高手。

季羡林：高中"六连冠"

季羡林是幸运的，当年父母一个万般无奈的，然而也是断然的举措，帮他逃过了贫困的魔爪：1917年元旦过后，他才六岁多一点，父亲把他扶上毛驴，送往济南，投奔叔叔，迎来人生第一大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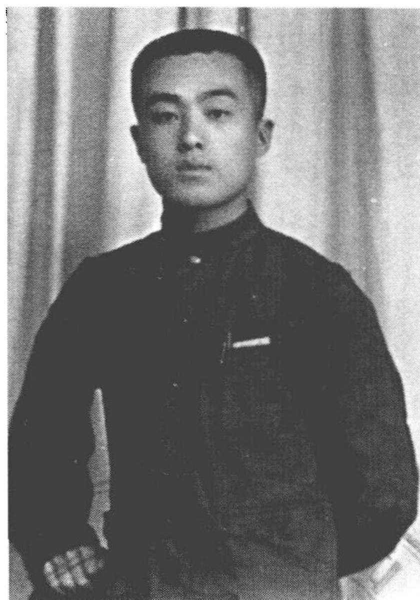


从左起季羡林的二妹、叔叔、女儿婉如、儿子季承、婶婶、夫人。

这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清平县官庄的老季家，是一个大家族，在季羡林父亲的那一辈，有兄弟十一个，堪谓人丁兴旺，后继有人。但是，由于家道中落，这十一个兄弟中，有六个闯了关东，而且一去杳然，下落不明；一个送了人，易了姓；剩下的四个兄弟，四户人家，总共生得两个男孩，其中之一，不幸被土匪绑票，丢了命；仅存的一个，就是季羡林。这样一棵单根独苗，不啻是全家全族的希望，无论如何得好好培养。培养需要条件，季羡林的父亲不争气，指望他培养儿子，没辙。而季羡林的叔叔，经过在济南城多年的打拼，已经在黄河河务局谋得差事，有一份稳定的薪水，这是物质基础；加之叔叔特别看重亲情，视兄嫂如父母，视喜子（季羡林的小名）如己出，把季羡林交给他培养，不仅经济上能够承受，感情上也易于融洽。因此，兄弟俩一合计，就这么决定了——由是，揭开了季羡林人生途中新的一幕。

1917 年春，至 1930 年夏，满打满算，季羡林在叔父家寄身十三载有半，先私塾，后小学，后初中，后高中。对于一代学术宗师，这是夯地基的阶段。季羡林自谓“幼无大志”、“少无大志”，小学、初中，完全仗天分，任环境推着走，凭兴趣发挥，也努力，也虚荣，成绩止于中上，不算拔尖。季羡林自述：“我当时并不喜欢念书。我对课堂和老师

的重视远远比不上我对蛤蟆和虾的兴趣。”直到初中毕业，季羡林给笔者的印象只是个普通生，像他这种成绩，济南城有的是，更不用说山东省和全国。到了高中，情况发生变化。高一上学期终考，他拿了个甲等第一，平均分超过95，这是他第一次显山露水，出人头地。高一下再考，平均分又超过95，蝉联甲等第一。人生就是不断攀爬金字塔，这甲等第一，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金字塔尖。一之不易，再之更难。消息传开，众口腾誉。这时，山东教育厅长兼山大校长、曾在另一场大考——晚清科举考试，攀至金字塔尖的状元公王寿彭（1875～1929），爱才心切，特馈赠季羡林一副对联，并一个扇面。联曰：“才华舒展临风锦；意气昂藏出岫云。”题头是“羡林老弟雅督（音察）”，落款是王寿彭的签名。扇面录的是清人厉鹗的七言诗：“净几单床月上初，主人对客似僧庐。春来预作看花约，贫去宜求种树书。隔巷旧游成结托，十年豪气早消除。依然不坠风流处，五亩园开手翦蔬。”扇面末端题写：“录《樊榭山房诗》，丁卯（1927年——笔者注）夏五，羡林老弟正，王寿彭。”小状元意外得着大状元的嘉奖，眼前荣誉得以和长远目标挂钩，季羡林有了成就感、方向感，愈加在学习上用功，高二高三期考，又连夺四次甲等第一，为威名赫赫的“六连冠”。



1930年19岁的季羡林从济南高级中学毕业。

3. 回眸一瞥

仍旧先谈背景，这是共性。六位主人公少年时期最重要的背景就是“五四”运动。“五四”开启天门，从天外吹来思想解放的罡风，横扫六合，涤荡九垓，同时为国人送上了空前绝后的“纵坐标”和“横坐

标”。所谓“纵坐标”，即中华悠久的文化传统；所谓“横坐标”，即世界各国的文明菁华。这就犹如天宇同时出现两道彩虹，“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历史的大机遇出现了。谁能抓住它，谁就必然成为文化科学方面的一代大师。而“五四”之前与之后，我们看到，这两道彩虹，或曰两道坐标，总是一长一短。之前是受闭关锁国、闭目塞听之苦，拒绝接受异方新鲜活泼的文化；之后则因矫枉过正、数典忘祖，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反而每况愈下，不甚了了起来。

拿这两个坐标检验“五四”时期的文化风云人物，譬如说胡适、鲁迅、郭沫若、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郁达夫、冰心、徐志摩，等等等等，他们都有两个特征，即传统基础好，又善于吸收外来的新东西。以当时最时髦的清华学校为例，它是专门培养留美学生的，但是学生中的杰出人才，都符合两个条件：外文好，中文也好。

本文六位主人公，“五四”时期都在上小学，有幸直接参与其事的，只有钱学森一人，他当时八岁，在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小就读。“五四”运动爆发，京师高校的学生首当其冲。钱学森也手举小纸旗，走在游行的学生队伍里。这对于他的一生，是十分珍贵的回忆。另外五人，分别在济南、无锡、嘉兴、上海、河北读书。不管他们身处何地，“五四”运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譬如说季羡林，他当时从农村投奔济南城的叔叔，读小学。叔叔是一个老古板，连小学课本中的“骆驼讲话”都不能忍受，强迫季羡林转学。但他也做了现在看来是正确的决策，一、努力学习白话文，同时不放弃传统，让季羡林课余跟一位老先生学习古典范文，打下了扎扎实实的中文底子。二、也是课余，让季羡林学习英文。季羡林日后考上清华，靠的就是这两门“武功”。

杨绛、陈省身、侯仁之进的都是教会小学，洋人办的，读洋文。难得的是教会并不偏废，也强调学中文，所以他们从小就是“两条腿”走路。黄万里进的是浦东中学附小，这是当时中国非常有名的学校，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都曾在浦东中学学习，黄万里在附小也获得了很好的中西基础知识训练。

若干年之后，这六位都成了文化科学大师。文科的季羡林、杨绛和侯仁之，中文、外文水平没的说。火箭专家钱学森，数学家陈省身，水利专家黄万里，也莫不是中西兼通，无论外文、中文，文章都写得呱呱叫。

其次作具体分析。杨绛的青春是阳光的，她是北京、上海、苏州三合一的结晶。民国才女自不待言，如果不看她的自述，你很难想象，她还是东吴大学女子排球队的选手！1991年，杨绛在一篇名为《小吹牛》的随笔里说："我刚进东吴大学，女生不多，排球队里我也得充当一员。我们队第一次赛球是和邻校的球队，场地选用我母校的操场。大群男同学跟去助威。母校球场上看赛的都是我的老朋友。轮到我发球。我用尽力气，握着拳头击过一球，大是出人意料。全场欢呼，又是'啦啦'，又是拍手，又是嬉笑叫喊，那个球乘着一股子狂喊乱叫的声势，竟威力无穷，砰一下落地不起，我得了一分（当然别想再有第二分）。当时两队正打个平局，增一分，而且带着那么热烈的威势，对方气馁，那场球赛竟是我们胜了。至今我看到电视荧屏上的排球赛，想到我打过网去的一个球，忍不住悄悄儿吹牛说：'我也得过一分！'"哈，尽管只是"一分"，却是关键的一分，杨绛是胜利的功臣，且看她笔下稚气盎然的笑靥，散发出青春的无限欢乐。

这篇《小吹牛》我曾经反复读过多遍，一遍又一遍地体会杨绛的大力搏杀，难怪她的生命那么强劲，她是有体育功底的。同样有功底的还有季羡林，他少年时代练过武术。此外还应注意，杨绛在东吴大学选读的是法律和政治，这是她知识大厦的底座，虽然从研究生起改行钻研文学，那早期的专业影响永远不会消失。

钱学森天性害羞，沉默寡言，喜欢独处，耽于音乐和沉思。这一点是必须强调的，因为你在流行的报道中，很难看到他性格的这一面——看不到这一面，你又如何把握他今后的发展呢？毕竟，性格决定命运，起码是影响命运。

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曾为早年的钱学森留下极具个性的一笔，她写道：在上海交大读书期间，"同学逐渐都注意到这个沉默寡言、北京来的小个子成绩特别优异。有位同学后来说：'当时就听说钱学森是最好的学生，他总考第一名。'即使以交大的标准，他也是个怪人。他不爱讲话，不跟别人一块儿做功课，大学生的活动也不特别吸引他。他最感兴趣的似乎就是独处和沉默——静静在一隅思考，做自己的事，好像一个人的时候他最快乐。……上课时间他也照样读书。同学张煦说，周遭的人忙着抄笔记，唯恐漏掉一个字，钱学森却坐在教室后面读他的外文期刊。'他就是不一样，别人只担心考试不及格，他却任何科目都难

不倒，所以精神都放在钻研他感兴趣的题材上。'”这就相当于清华园的钱锺书，大才总是有共同之处。

中学时代，陈省身的人格已经基本塑造完成。一是独立自主。换句话说，就是不服管。这不服管，不是指的不听话，乱来。陈省身是规矩的学生，生活上从不出格。但在学习方面，他有着强烈的个性。譬如说算术作业，他不像钱学森，永远那么工工整整，一丝不苟，几十年后拿出来，还可以当“艺术品”展览，不，他的笔迹是潦草的，思维是跳跃的，乍看上去，很不规范，很不舒服，唯有一点：答案正确无误。陈省身晚年有言：“顶有出息的小孩，很少是父母管出来的。”二、特别入迷于数学。陈省身觉得“数学好玩”，“因为数学会产生许多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数学问题，而研究这些问题时会让你觉得其乐无穷。”他还用下棋打比方，如果你棋力达到某一阶段，你就会看到下一步棋，下下一步棋，最后会下得对方一点办法也没有，自然乐不可支。若是单纯为了考试，为了争第一，陈省身就提不起精神——人一为欲望支配，心态就会走火入魔，这恰恰是应试教育的致命伤。

你注意到吗？陈省身善于走直线，三步两步，就走到别人的前面。这一半应归功于数学天赋；剩下的一半，则应归功于直觉——是的，我认为就是直觉，这品质与生俱来，旁人纵然想学也无从学起。希腊人爱说“认识你自己”，陈省身清楚自己是谁，懂得在关键时刻如何迈步。

杨绛入东吴大学，第一年不分科，她各门功课平均发展，看不出哪样特别优秀。到了第二年，要分科了，杨绛问父亲，“我该学什么?”父亲答：“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杨绛心里不踏实：“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开导她：“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可惜东吴的文科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没有文学。）而比较起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就不够开明，他一心只从自己的理想考虑，完全漠视孩子的性之所近，因此在选择专业一事上，未免显出越俎代庖。1996年，八十五岁的黄万里回忆父亲，说：“我孩提时很怕他，连我大哥大我十岁半，也很怕他，称他真是严父。他一生气，全家震动。”这样的严父有失分寸。黄炎培九泉下相逢刘恩湛，不知是否会对自己当初的“强制选择”作出检讨?

至于黄万里本人，倒的确是一棵好苗子。他使我想起了李贺的诗：

"少年心事当拏云。"黄万里遵照一种科学的方法武装自己，训练自己，他如果遇到适宜的环境，是能做出一番事业来的。

体弱多病和长跑健将，这两者很难令人产生联想，但是，侯仁之把它串联在一起了。起初是出于无奈，跑着跑着，事情就起了质的变化。跑步不仅使侯仁之告别羸弱，赢得健康，而且成了他生活的动力，奋发的标志，人格的象征。

侯仁之考取燕大，他说要感谢冰心（1900～1999）。这与冰心有什么关系呢？1990年，侯仁之撰文揭秘，那还是上初一的时候，他偶然看到冰心的小说《超人》，感觉像是触了电，《超人》把他从旧文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让他看到了新文学的五光十色，丰富多彩。从此，他开始了新文学的狂热阅读，无论是郑振铎等人的文学研究会，还是郭沫若的创造社、蒋光慈的太阳社，举凡他们的出版物，只要能到手的，都来者不拒，尽兴饱餐。侯仁之的作文能力大大增强，他自己怎么也意料不到，正是这种作文能力，帮他架起了高考的云梯。

事情经过如下：侯仁之高三就读于潞河中学，这是所教会学校，该校的毕业生，成绩达到优秀标准的，可以参加燕京大学的提前招生考试，只考国文和英文。侯仁之得着这个机会，和其他几位同学到了燕大校园。当日，主考国文的是一位女老师，她在黑板上写下两篇作文题目，啥也没说，就离场了。侯仁之事后得知，命题的就是冰心。两篇作文题目，一篇是《雪夜》，规定用语体文写。另一篇是《论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规定用文言文写。侯仁之看了题目，自觉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很快完了卷。英文考试则平平，他的英文能力原本不突出，属于中上。结果，当侯仁之被燕大录取，并获得四年的全程奖学金，他确信是作文立了大功。而这个作文成绩，自然是冰心老师嘉许的——侯仁之由是心许冰心为自己的引路明灯和伯乐。

季羡林六岁过继（正式名义应是兼祧）给叔叔，这对他的命运，是一次重铸。笔者提请读者注意，凡过继的孩子，对人生的感悟要比正常的孩子更为深刻（吾乡俗谚：抱养的孩子聪明）。举几个名人的例子，政治家周恩来、朱德，文学家钱锺书，都有被过继的身世背景。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正是这段离开父母、投奔叔叔的生活，改变了季羡林的人生走向。

季羡林有一个公式：天资＋勤奋＋机遇＝成功。在这个公式中，天

资是前提，勤奋是基石，机遇是点金术。因此，季羡林特别感谢机遇。他曾说：“我十分强调机遇。我是从机遇缝里钻出来的。”“我对张铁嘴、王半仙之流的讲运气的话，一向不信。但是，运气，同缘分一样，却是不能不信的。说白了是运气，说文了就是机遇。”在季羡林漫长的一生，每逢关键时刻，总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就是他上述观点最生动的注脚。

最后说一个细节：身高。六个人，如果让他们排成一队，由矮到高，杨绛绝对打头，她生得娇小玲珑，也就一米五几吧？（笔者曾向杨绛先生打听，她认为这问题无关弘旨，未予见告。）侯仁之排第二，一米六七。钱学森排第三，一米六八。黄万里排第四，他身材魁梧，笔者先前根据他和父母兄弟的合影估计，当在一米七五上下，其长女而后告知，仅有一米六八，原因是老一辈人普遍较矮，黄万里因此而显得挺拔。这话是有道理的，清末民初出生的那一代人，平均比现代人要矮好几厘米，以名人为例，如蔡元培，一米六六，谁也不会觉得他们矮，毛泽东，一米七二，就已经是“巍巍乎高哉”的了。季羡林排第五，恰好一米七二，与毛泽东同，笔者读过梁实秋女儿梁文蔷的《李长之与我的纪念册》一文，其中写道，四十年代末在北平，“他和季羡林先生常来我家闲聊，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印象。他和季先生两人，一高一矮……”这里的高者，指的就是季羡林。陈省身排最后，他是有名的大个子，有一本传记说，初上扶轮中学，全班数他瘦小，三年后，竟蹿至全班最高。另据身高一米七六，且和陈省身交往密切的数学家杨乐目测，应是在一米七七、一米七八。

第三章　相交在清华园

1. 泛　论

西山苍苍　东海茫茫　吾校庄严　巍然中央
东西文化　荟萃一堂　大同爰跻　祖国以光
莘莘学子来远方　莘莘学子来远方
春风化雨乐未央　行健不息　须自强
自强自强　行健不息须自强。
自强自强　行健不息须自强。

左图右史　邺架巍巍　致知穷理　学古探微
新旧合冶　殊途同归　肴核仁义　闻道日肥
服膺守善心无违　服膺守善心无违
海能就下众水归　学问笃实生光辉
光辉　光辉　学问笃实生光辉
光辉　光辉　学问笃实生光辉

器识其先　文艺其从　立德立言　无问西东
孰介绍是吾校之功　同仁一视泱泱大风
水木清华众秀钟　水木清华众秀钟
万悃如一矢以忠　赫赫吾校名无穷
无穷　无穷　赫赫吾校名无穷
无穷　无穷　赫赫吾校名无穷

这是由汪鸾翔作词、张惠珍谱曲的清华老校歌。

清华园是一个站。她一开始就屹立在中国文化的前列。本书六位主人公都与清华同庚（公元1911），这是一奇；六位主人公的生活轨迹，也都在不同的阶段与清华园相交，这更是奇上加奇。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让我们来看看，奇迹，或者说缘分，是怎么发生的？

清华园对他们又意味着什么？

2. 水木清华，殊途同归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

季羡林：三导师与“四剑客”

1930年夏，季羡林高中毕业，进京赶考，故都高校林立，他独钟北大与清华，结果吉星高照，连中双元，一举把北大、清华同时收入囊中。这是大好事，也是大难题。北大、清华，只能选其一；鱼与熊掌，孰取孰弃？客观说，北大资格较老，名头响亮，思想激进，师资优越，而清华属后起之秀，奋起直追，至三十年代初，无论师资、设备，还是名望、生源，均堪与北大媲美；更有一条，清华前身为“留美预备学堂”，出国留学一途，尤为便捷。季羡林从中学起，就向往留洋镀金，好回来挣一个铁饭碗——穷人家的孩子什么最重要？当然是吃饭，求学都为稻粱谋。因此，权衡来，权衡去，季羡林锁定了清华，进的是西洋文学系。

四年清华，季羡林有幸遇到了陈寅恪（1890～1969）。陈寅恪是历史系的教授，讲“佛经翻译文学”，季羡林前往旁听，纯粹是机缘。与冰心先生就无缘，同样是旁听，结果被她礼貌而坚决地从课堂赶出。季羡林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两件事，缘分种种，看似偶然，实则包含了命运。



1934年季羡林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时留影。

季羡林曾说：专就我个人而论，专从学术研究发轫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在清华四年，有两门课对我影响最大：一门是旁听而又因时间冲突没能听全的历史系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一门是中文系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是一门选修课。这两门不属于西洋文学系的课程，我可万没有想到会对我终生产生了深刻而悠久的影响，绝非本系的任何课程所能相比于万一。陈先生上课时让每个学生都买一本《六祖坛经》。我曾到今天的美术馆后面的某一座大寺庙里去购买此书。先生上课时，任何废话都不说，先在黑板上抄写资料，把黑板抄得满满的，然后再根据所抄的资料进行讲解分析；对一般人都不注意的地方提出崭新的见解，令人顿生石破天惊之感，仿佛酷暑饮冰，凉意遍体，茅塞顿开。听他讲课，简直是最高最纯的享受。这同他写文章的做法如出一辙。当时我对他的学术论文已经读了一些，比如《四声三问》等等。每每还同几个同学到原物理楼南边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前，共同阅读寅恪先生撰写的碑文，觉得文体与流俗不同，我们戏说这是“同光体”。有时在路上碰到先生腋下夹着一个黄布书包，走到什么地方去上课，步履稳重，目不斜视，学生们都投以极其尊重的目光。

清华的教授中，对季羡林影响较大的，第二位就是朱光潜（1897～1986，笔名孟实）。朱光潜是北大的教授，在清华兼课。季羡林说：当

时他才从欧洲学成归来。他讲“文艺心理学”，其实也就是美学。他的著作《文艺心理学》还没有出版，也没有讲义，他只是口讲，我们笔记。孟实先生的口才并不好，他不属于能言善辩一流，而且还似乎有点怕学生，讲课时眼睛总是往上翻，看着天花板上的某一个地方，不敢瞪着眼睛看学生。可他一句废话也不说，慢条斯理，操着安徽乡音很重的蓝青官话，讲着并不太容易理解的深奥玄虚的美学道理，句句仿佛都能钻入学生心中。他显然同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一类，在外国把老子或庄子写成论文让洋人吓了一跳，回国后却偏又讲康德、黑格尔的教授，完全不可相提并论。他深通西方哲学和当时在西方流行的美学流派，而对中国旧的诗词又极娴熟。所以在课堂上引东证西或引西证东，触类旁通，头头是道，毫无扞格牵强之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比较文学，比较诗学。这样的本领，在当时是凤毛麟角，到了今天，也不多见。他讲的许多理论，我终生难忘，比如 Lipps 的“感情移入说”，到现在我还认为是真理，不能更动。

陈、朱两位老师的课，使季羡林终生受用不尽。虽然他当时还没有敢梦想当什么学者，然而这两门课的内容和精神却已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他的内心深处。如果说季羡林的所谓“学术研究”真有一个待“发”的“轫”的话，那个“轫”就隐藏在这两门课里面。

除却陈、朱二位先生的课，季羡林属意的，还有吴宓（1894～1978）的“中西诗之比较”，及“英国浪漫诗人”。季羡林认为，吴宓的“中西诗之比较”，即今日之比较文学，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山人之一。因其影响，季羡林曾试着把陶渊明和英国的一位浪漫诗人加以比照，情形有点生拉硬扯，类似一出现代版的“拉郎配”。对象选择的精当与否，是学生的事，与老师无涉，季羡林打心眼里认为，在西洋文学系，讲融汇中西，真才实学，吴宓当之无愧。

季羡林与本班本系的同学交情不深，究其根本，因为不是一个圈子里的。那时候的清华学生，多数都属于有钱人家的子女，像他这般穷困的，不是唯一，也是非常罕见。贫富异趣，古今皆然。举两件小事：食堂开饭，大伙儿一窝蜂地拥去，有啥好菜买啥好菜，引朋呼类，大吃大喝。季羡林能行吗？他总是要等别人吃完，才悄悄进去，捡便宜的，随便买点果腹。《清华园日记》记述有人请他的客，也只是让他灌了一肚子的豆浆。此其一也。其二，他琴棋书画，演说体育，一无所长，自然

难得和别人搞到一块。

季羡林在系内同气难求，在系外却有三位莫逆：李长之、吴组缃、林庚。三位都是文学高手，李长之擅于评论，吴组缃擅于小说，林庚擅于诗。李长之大季羡林一岁，低季羡林一级，读的是生物，而后改为哲学。李长之是季羡林的山东老乡，兼小学同学，双方过从甚密。吴组缃大季羡林三岁，高两级，安徽人，念的是经济，后转为中文，毕业后进入清华研究院。吴组缃少负文才，中学即崭露头角，清华园时期，是他创作的高峰，他的写实小说《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已享誉文坛。林庚原籍福建，生于北京，长季羡林一岁，高一级，先读物理，后改中文，毕业后留校，任朱自清先生的助教。季羡林和李长之、吴组缃、林庚，当时正值二十上下，还是四个愣头青，他们凑到一起，指点文坛，揄扬人物，放言高论，无话不谈；兼之，人人都夸自己的文章好，不是梦笔生花，就是如有神助。一日，林庚晨醒，见风吹帐动，忽有所悟，得两句白话："破晓时天旁的水声，深林中老虎的眼睛。"他极为得意，当日就袖去向三人炫耀。茅盾《子夜》出版，是文坛的大事，四人又不约而同地聚到工字厅，大谈感想，意见分为两派，季羡林为反方，觉得茅盾行文死板、机械，没有鲁迅的那种灵气，吴组缃为正方，认为《子夜》结构闳大，气象万千，不容小觑。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少年意气，挥斥方遒，末了哈哈一笑，散伙走人。

季羡林梦寐以求的是出国镀金，大学四年，他深切感到文科生，像他这样，既没背景又没金钱的，出国之难，难过骆驼钻针眼。季羡林不死心，1934 年 6 月 13 日，大学即将毕业之际，他在日记中写道："最近我一心想去德国，现在去当然不可能。我想做几年事积几千块钱，非去一趟住三年四年不成。我今自誓：倘今生不能到德国去，死不瞑目。"

1935 年，机会之神终于来敲季羡林的门：清华与德国确立交换研究生。季羡林在西洋文学系专修的是德文方向，德文方向坚持到最后的就他一个人，成绩又是四年全优——这名额，简直就是冲他来的。因此，一经报名，无须考核，即获通过。是年 8 月 31 日，季羡林与乔冠华、王竹溪等五位清华校友，在前门火车站结伴登车，踏上了万里迢迢的留学之旅。

陈省身：与华罗庚构成“双子星座”

南开四年，陈省身由一个数学顽童（姑且这么说）成长为数学青年。1930 年夏，十九岁的陈省身与十九岁的季羡林同时报考清华，不同的是，季羡林考的是本科，他考的是研究院。

陈省身为什么要报考清华？动机与季羡林如出一辙：为的是日后放洋深造。据其老来的自述：“十九世纪的时候，数学最好的国家是德国，德国的中心是哥廷根，法国一直都很好，所以巴黎也是一个中心。……我就觉得，要念数学的话，一定要留学，在中国不能够学我所需要的东西。可是留学呢，我家里没钱的，我父亲是个公务员，所以我一定要考取奖学金。因此在南开毕业之后，我就考清华研究院。这个研究院有个规定，成绩好的学生可以派出国。这是出国的一个机会。”

陈省身如愿以偿，和同班同学吴大任（1908 ~ 1997）双双考取清华。1930 年，清华数学系招收两名硕士生，这两人都来自南开，而且是同窗好友，本来是学苑佳话，奈何吴大任父亲失业，家庭困顿，交不起学费，申请保留学籍一年，去广州的中山大学当了助教。剩下陈省身孤零零的一个学子，系里觉得人数太少，干脆也让陈省身当一年助教，待吴大任回来，再开研究生班。

陈省身摇身一变，从学员升格为熊庆来教授的助手。既是教员，就要开课，系里为陈省身安排了一门“高等数学”，内容是解析几何，这是他的长项。陈省身年未弱冠，就站上巍巍的讲坛，过了一把“为人师表”的瘾。设若论资排辈，季羡林、杨绛、钱学森、侯仁之，只能算是他的学生，或准学生。一年后，吴大任回来了，研究生班如期开课。但是吴大任不久又选择离去，他的角色为另一人代替，那就是华罗庚（1910 ~ 1985）。华罗庚是江南的一个业余数学爱好者，初中毕业，曾在黄炎培创办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念过一年会计。一年前，他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叫《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引起清华数学系的注意。据陈省身回忆：

“罗庚只是初中毕业的学生，他的数学论文引起大家的注意。清华是很例外的，不但找他到清华来，并且给他一个职位，这在当时大学里

是很少有的一件事。因为他的学历的关系，刚来时名义是助理员。那时数学系叫算学系，后来改为数学系。一年以前，我是算学系的助教。算学系的办公室就在工字厅走道的地方，两边各有两间房间，一共四间房间，是算学系的办公室。有一边是熊庆来先生，他是主任，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有个桌子，是他的助教。外头一间有两个桌子，是周鸿经先生和唐培经先生的办公桌。罗庚到清华的时候就呆在我的办公桌，因为1931年我改为研究生，是学生了，他就做助理员，用这个桌子，所以我们的关系是一个先后的关系。

“罗庚是一个很好的数学家，所以他不需要一般的数学训练。他很快就跟所有的人，所有的研究生，甚至于教员，可以在同一个阶段讨论数学的问题。他虽然名义是助理员，等于是个研究生，我也是研究生，我们时常来往，上同样的课，那是很愉快的一段学生生活。”

陈省身是数学天才，华罗庚也是数学天才，两人年龄相仿，既是同仁，又是对手——这是智者最好的磨刀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数学系群星璀璨，他们两人构成炫目的“双子星座”。

1932年清华本科招生，陈省身被拽出来当了一回“数学阅卷老师”。数学题出得再好，答得再好，难以形成佳话，不像国文题，那么八面来风，流布久远。事情过去了几十年，陈省身还记得题目是陈寅恪出的：“一、试对下列之对子：（甲）少小离家老大回；（乙）孙行者。二、梦游清华园记。”其中，关于“孙行者”一联，有人对了“胡适之”，获得高分，这是有名的公案。作为“数学阅卷老师”，陈省身管不了国文的事，但他觉得，如果学生懂得一点中国数学史，对“祖冲之”则更为贴切。

三十年代，北大、清华经常聘请国外著名数学家讲学，这是陈省身的幸运。1932年至1934年，陈省身借此人未离境而耳目离境的短暂留学，不，“留听”，天机乍窥，思路大开。就中，最使他“胜读十年书”的，是德国汉堡大学布拉施克（Blaschke 1885～1962）在北大开的系列讲座。布氏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当时已负盛名。那时，北大坐落城中，清华僻在西郊，布拉施克在北大布道，陈省身每次都前往旁听，情形犹如一次微型长征。布拉施克牌上挂的是“微分几何中的拓扑学”，卖的则是“网几何”。不怪布拉施克，这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一个崭新的课题，正名的事，还有待将来。布拉施克在数学的天宇挂起

了一道彩虹，陈省身高举双手努力向彩虹飞去。

同期使陈省身思路大开的，还有德国哥尼斯堡大学施佩纳（Sperner 1905～1980）的演讲。施氏严格证明了“若当曲线将平面分成两部分的拓扑定理”，这对于认识几何学中拓扑学的作用，大有裨益。陈省身晚年讲到这事，又有一重感慨：那时请外国教授来华讲学，和现在不一样，他们不光是来开个会，吃吃饭，拿几张透明胶片展示一下，就万事大吉。不行，他们得在清华园住下来，住上个一年，拿出全副本事，系统地讲解。因此，学生如果认真学，必然获益匪浅。

清华数学系教授中，陈省身最仰慕的是孙光远（1900～1979），当初报考研究生，就是冲着他而来。孙光远是有限的几位海归派数学博士之一，而且是唯一坚持研究，并屡屡在国外发表论文的大家——这正是陈省身理想中的导师。开初，陈省身得到了孙光远的指导。后来，出于人事纠葛，孙先生退出了导师行列，陈省身只好独自摸索前进。研究生三年，他完成了三篇论文，一篇发表在《清华大学理科报告》，另外两篇（包括一篇硕士论文），飞出国门，发表在日本的《东北数学》杂志。1934 年夏，陈省身“功德圆满”，从清华研究院毕业，11 门主课，10 门获得“超等”；毕业论文，也是“超等”。他是名副其实的“超一流”。

杨绛：从借读到研究生

杨绛初入清华，是 1932 年孟春。她的身份，既不同于季羡林，也不同于陈省身，她是客居，借读。

此事说来话长。杨绛高中毕业错过清华，那感情就像失恋，一直恹恹不乐。进了东吴，大学都读完两年，心仍惦着清华。这就成心病了。若要医治，途径还是有的：转学。在苏州不能办这事，要办得到上海，经过清华指定的考试，合格，才能给予转。1930 年暑假，杨绛颠颠地跑到上海，交了费，领了准考证。节骨眼上，久患肺结核的大弟，突然并发急性结核性脑膜炎，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家里人心惶惶，手忙脚乱。杨绛自然无心赴考，机会又错过去了。也是在那一年，杨绛还有另外一个机会：鉴于她在振华女中的杰出表现，校方为她申请到美国韦

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杨绛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不到黄河心不死，冥冥中，她已听到清华园在召唤。（这时候钱锺书已经徜徉在清华园，难道冥冥中真有一根红线在相牵吗？）

1932年初，杨绛本该读大四下了，东吴大学却因学潮而停课。为了完成学业，杨绛邀了好友四人北上京华，预备借读同属教会的燕京大学。到了北平，那四人都按计划通过了燕大的入学考试，注册就读，唯独杨绛临时变卦，改成借读清华。

杨绛长吐一口气，终于圆了清华园之梦。杨绛在东吴读的是政治，作为主课，她选了蒋廷黻的《西洋政治史》、浦薛凤的《政治经济史》、史实禄的《人类学》；出于兴趣，又选了朱自清的《散文》、温源宁的《英国浪漫诗人》。

杨绛入清华，最遂心快意的一件事，是结识了钱锺书[①]（1910～1998）。这是三生石上的旧姻缘，暂且按下不表；其次，便要数图书馆，那印象长期不衰，历久而弥新。2001年春，杨绛是这样回眸的："1932年春季，我借读清华大学。我的中学旧友蒋恩钿不无卖弄地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书库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她带我出了古月堂，曲曲弯弯走到图书馆。她说：'看见了吗？这是意大利的大理石。'我点头赞赏。她拉开沉重的铜门，我跟她走入图书馆。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我真想摸摸软木有多软，可是怕人笑话：捺下心伺得机会，乘人不见，蹲下去摸摸地板，轻轻用指甲掐掐，原来是掐不动的木头，不是做瓶塞的软木。据说，用软木铺地，人来人往，没有脚步声。我跟她上楼，楼梯是什么样儿，我全忘了，只记得我上楼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后来一想，一排排的书架子该多沉呀，我光着脚走也无妨。我放心跟她转了几个来回。下楼临走，她说：'还带你去看个厕所。'厕所是不登大雅的，可是清华图书馆的女厕所却不同一般。我们走进一间屋子，四壁是大理石，隔出两个小间的矮墙是整块的大理

---

① "钱锺书"的"锺"，简化后作"钟"，故应称"钱钟书"，但锺，是"集聚"的意思，由此引申出"感情专注"之义，如"锺情"，"锺爱"等。钱锺书周岁抓周时，一手抓住了书，父母认为孩子爱书，便取名"锺书"，意思是"锺爱读书"。锺字简化后与钟——古代打击乐器——意义混淆，根据钱锺书本人生前意愿，故仍作"锺"。

石，洗手池前壁上，横悬一面椭圆形的大镜子，镶着一圈精致而简单的边，忘了什么颜色，什么质料，镜子里可照见全身。室内洁净明亮，无垢无尘无臭，高贵朴质，不显豪华，称得上一个‘雅’字。”

光阴忽忽，一学期弹指而过。1932 年 7 月，杨绛结束在清华的借读，领到东吴大学的毕业文凭，并荣获金钥匙奖。

杨绛至此已离不开清华，命中注定，也已离不开钱锺书。怎么办？钱锺书怂恿杨绛报考清华研究院，研修外国文学，钱锺书本人即将跨入大四，杨绛一旦考上，两人正好可以再携手并肩一年校园。这主意是高明的；人在恋爱时，智商常常得到大幅度提升，何况钱锺书本来就聪明绝顶。但是杨绛心怯，她担忧自己实力不济。如是蹉跎了半年，迈入1934，杨绛毅然埋头补习，鼓勇应考，结果居然——中了！这里有一则让人啼笑皆非的花絮：清华事先公布，考外国文学专业的，增加第三外语。杨绛是教会学校出身，娴熟英文；自学，粗通法文；临时，又恶补德文，补到勉强可读施托姆的《茵梦湖》。到了考试那天，清华却宣布只考第一、第二外语，第三外语免试。杨绛白白在德文上浪费了许多光阴，还因此荒疏了法文，好在考试过关，无怨无悔。

杨绛此番进清华研究院，犹如人生中了头彩。选读的科目，都是她心仪的，包括翟孟生的《欧洲文学史》、梁宗岱的《法国文学》、吴宓的《中西诗比较》、吴可读的《英国小说》，以及朱自清的《散文》。梁宗岱先生（1903～1983）的《法国文学》班，有同学二三十人，并非全部是研究生，其中一位王岷源，当时正在读大四，和季羡林同班。上课时，女生坐在前排，头一堂练听写，梁先生看完试卷，头一扬，喊道：“杨季康！”杨绛以为试卷出错，赶紧起立，准备恭听教诲。哪知梁先生笑嘻嘻地说：“你的答卷很好，都做对了。”接着又问：“你的法文是哪里学的？”杨绛回答：“我是自学的。”她说的是实话，老师是一位比利时夫人。梁先生很高兴，他说：“我也是自学的。”杨绛发音纯正，思路清晰，功底厚实，上课提问，每当旁的同学卡壳，梁先生总是叫她作答。

朱自清先生（1898～1948）的《散文》课，要交习作。写得好的，会让作者当堂朗读。一次散课，朱先生叫住杨绛，说：“你这篇《收脚印》，写得不错，可以发表，我给你拿去投稿。”杨绛高兴极了。她盼呀盼，盼呀盼，过了一月又一月，未见下文。一天，她看见几个女生聚

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读《大公报》，走过去一瞧，读的正是她的文章。狂喜朝杨绛袭来，心弦产生快活的颤抖："哦，我当作家了！"

这是杨绛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让我们看一看她的功力：

听说人死了，魂灵儿得把生前的脚印，都给收回去。为了这句话，不知流过多少冷汗。半夜梦醒，想到有鬼在窗外徘徊，汗毛都站起来，其实有什么可怕呢？怕一个孤独的幽魂？

假如收脚印，像拣鞋底那样，一只一只拣起来了，放在口袋里，揹着回去，那么，匆忙的赶完工作，鬼魂就会离开人间。不过，怕不是那样容易。

每当夕阳西下，黄昏星闪闪发亮的时候；西山一抹浅绛，渐渐变成橘红，晕成淡黄，晕成浅湖色……风是凉了，地上的影儿也淡了。幽僻处，树下，墙阴，影儿綽綽儿的，这就是鬼魂收脚印的时候了。

守着一颗颗星，先后睁开倦眼。看一弯淡月，浸透黄昏，流散着水银的光。听着草里虫声，凄凉的叫破了夜的岑寂。人静了，远近的窗里，闪着一星星灯火——于是，乘着晚风，悠悠荡荡在横的、直的、曲折的道路上，徘徊着，从错杂的脚印中，辨认着自己的遗迹。

这小径，曾和谁谈笑着并肩来往过？草还是一样的软，树阴还是幽深的遮盖着，也许树根小砖下，还压着往日襟边的残花。轻笑低语，难道还在草里回绕着么？弯下腰，凑上耳朵——只听得草虫声声的叫，露珠在月光下冷冷地闪烁，风是这样的冷。飘摇不定的转上小桥，淡月一梳，在水里瑟瑟地抖。水草懒懒的歇在岸旁，水底的星影像失眠的眼睛，无精打采地闭上又张开。树影阴森的倒映水面，只有一两只水虫的跳跃，点破水面，静静的晃荡出一两个圆纹。

层层叠叠的脚印，刻画着多少不同的心情。可是捉不住的已往，比星，比月亮都远，只能在水底见到些儿模糊的倒影，好像是很近很近的，可是又这样远啊！

远处飞来几声笑语。一抬头，那边窗里灯光下，晃荡着人影，啊！就这暗淡的几缕光线，隔绝着两个世界么？避着灯光，随着晚

风，飘荡着移过重重脚印，风吹草动，沙沙地响，疑是自己的脚声，站定了细细一听，才凄惶地惊悟到自己不会再有脚声了。惆怅地回身四看，周围是夜的黑影，浓淡的黑影。风是冷的，星是冷的，月亮也是冷的，虫声更震抖着凄凉的调子。现在是暗夜里伶仃的孤魂，在衰草冷露间搜集往日的脚印。凄惶啊！惆怅啊！光亮的地方，是闪烁着人生的幻梦么？

灯灭了，人更静了，悄悄地滑过窗下，偷眼看看床，换了位置了么？桌上的陈设，变了么？照相架里有自己的影儿么？没有……到处都没有自己的份儿了。就是朋友心里的印象，也淡到快要不可辨认了罢？端详着月光下安静的睡脸，守着，守着……希望她梦里记起自己，叫唤一声。

星儿稀了，月儿斜了。晨曦里，孤寂的幽灵带着他所收集的脚印，幽幽地消失了去。

第二天黄昏后，第三天黄昏后，一夜夜，一夜夜：朦胧的月夜，繁星的月夜，雨丝风片的夜，乌云乱叠、狂风怒吼的夜……那没声的脚步，一次次涂抹着生前的脚印。直到那足迹渐渐的模糊，渐渐的暗淡、消失。于是在晨光未上的一个清早，风带着露水的潮润，在瞌睡着的草丛落叶间，低低催唤。这时候，我们这幽魂，已经抹下了末几个脚印，停在路口，撇下他末一次的回顾。远近纵横的大路小路上，还有留剩的脚印么？还有依恋不舍的什么吗？这种依恋的心境，已经没有归着。以前为了留恋着的脚印，夜夜在星月下彷徨，现在只剩下无可流连的空虚，无所归着的忆念。

记起的只是一点儿忆念。忆念着的什么，已经轻烟一般地消散了。悄悄长叹一声，好，脚印收完了，上阎王处注册罢。

笔者琢磨，这篇短文，怎么看都像杨绛一生的缩影。

回到原来的话题。吴宓先生教《中西诗比较》，对好学生实行特殊待遇，他告诉杨绛：你不必堂堂课来，一星期交两篇诗作就行。尽管如此，杨绛还是每堂必到。吴先生是性情中人，杨绛喜欢听他讲自己的《落花诗》、《忏情诗》、《空轩诗》，听同学们跟他开玩笑。

第二学期，杨绛拜温德（1887～1987）为导师，选了他的《法国文学》。温德是罗曼语系的文学专家，法语带有一股浓重的美国腔。梁先

生的《法国文学》，还是要上，这回是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杨绛一下子就入迷了，她还找了法国其他作家的作品，配合着看。这要感谢清华图书馆。杨绛说，她“在许多学校上过学，最爱的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她把读书比作“串门儿”，借书，是到某一家“串门儿”，站在书库的书架前任意翻阅，就好比走房穿户，任意出入。杨绛当初借读，即享有这般自由。如今规矩改了，一般学生不准入书库，但教师和研究生例外，只是要经过一间有人看守的屋子，实行“空手进出”。

钱学森：借道清华，志在凌云

钱学森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学的是理科，最终却和清华擦肩而过，奇怪吗？不。清华出类，缘于整体拔萃，说到具体专业，则要作具体分析。钱学森看中的是火车制造，在这个领域，他选择上海交大也是得其所哉。

1934 年7 月，钱学森从上海交大毕业，再一次面临职业的抉择。他当初学习火车制造，想的是将来为祖国设计、制造出大批机车，纵横南北，驰骋东西；那曳着长长黑烟的、风驰电掣的怪物，在少年人的想像中，原是比哪吒的风火轮更神奇更威武的“科学”。大学四年，他眼界大开，观念大变。那是一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时代，也是美利坚合众国取替英法、睥睨自雄的时代。美国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傲视全球，一个重大的飞跃，就是它的电力技术革命。而在美国电气化的进程中，汽车、飞机和无线电，扮演了开路先锋的角色。钱学森隔岸巡礼，由飞机而想到火车：飞机是在天上，火车是在地下；飞机追风逐日，瞬息千里，山高难挡，海阔无碍，火车只能在轨道内规矩运行；飞机的战略前景广阔无比，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分，火车的作用，则远远不可与之匹敌。“向北望星提剑立，一生长为国家忧。”钱学森考虑再三，决定放弃落后的火车制造，投身方兴未艾的航空工业。

1934 年暑季，也就是季羡林从清华本科毕业，陈省身从清华研究院毕业，杨绛完成研究生第一学年之际，钱学森报考清华大学的公费留美，专业确定为飞机设计。

此专业只有一个名额，这唯一的名额毫无悬念地落到了钱学森的囊中，没有人阻止得了他（一如钱锺书之报考英国文学），只要他参与竞争，便非他莫属。

那一届公费留美，清华总共录取二十人。为了降低留学成本，提高专业基础，校方为每人指定导师，先在国内进行一年实习。

负责指导钱学森的导师，有两位，一是王助（1893～1965），一是王士倬（1905～1991）。两人皆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王助曾任美国波音飞机公司首任总工程师，被称为“波音之父”，1918年归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规飞机制造厂——福建马尾海军飞机工程处，设计并制造了中国第一代飞机；王士倬是清华教授，作为中国航空发展的标志性人物，他主持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风洞。两位先生为钱学森补习航空基本知识，并向他全面介绍了我国科技发展史话。从两位先生的讲课中，钱学森第一次了解到：

火箭并不神秘。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发明，东汉三国赤壁之战（公元208年），诸葛亮借东风，周瑜火烧曹营战船，使用的那种弩箭——在箭杆前部绑上易燃物——就是火箭的前身。公元十世纪，唐末宋初，携带火药的火箭正式登场，方法是在弩箭的头部绑上火药筒，内装木炭、硫黄、砒霜、铁漆、磁片等爆炸混合体，其原理，与现代的火焰喷射器极为相似。元明时代，我国发明了依靠喷气推进的火箭，以固体黑火药为助推剂，借助于直接反作用力将长箭发射出去，完全符合流体力学。明代初期，我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万虎，利用火箭进行飞行试验。他制作了两只大风筝，将一把椅子，固定在两只风筝之间的构架，然后在构架绑上47支特大的火箭。一切就绪，万虎坐上椅子，令手下人同时点燃47支火箭，但听轰隆一声巨响，现场喷发出一股强大的火焰和气浪，待烟雾散开，万虎却不见了，他已被炸得血肉横飞。万虎的试验失败了，他为科学而捐躯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称赞。国际公认万虎是试图利用火箭作航空运载工具的第一人，他的名字已被命名为月球表面的某一地区。明代，中国人发明了被称之为现代直升机的始祖——竹蜻蜓。总而言之，热气球、滑翔机、直升机、火箭等航空器的雏形，都在我国历史上出现过，时间远比欧美各国为早。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公元前三世纪以后的一千多年中，在科学的发现、技术的发明方面，中国往往遥遥领先，而让西方望尘莫及。”

上面这番话，今人读来，颇有点阿Q遗风。啥玩艺儿不如人，就说“祖宗早就有了”。譬如足球，怎么踢都踢不上去，嘿，有人说了，那玩艺儿有什么稀奇？足球是我们祖宗发明的，早先的名字叫蹴鞠。机器人在国外登场，大行其道，有人就说，那也是我们祖宗发明的，三国时就有木牛流马。——且慢！凡事都有个时代背景，客观环境。我们理解王助和王士倬的苦心，就要弄清三十年代的国际大背景，那是列强称霸，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这是一；二、曾有人问中国两所最高的学府，北大和清华，差别何在？有智者答：一个是半封建，一个是半殖民地。盖因北大是由京师大学堂转化而来，官场意识浓厚；清华是由庚子赔款派生而来，洋奴气息十足。值此大背景，又值钱学森即将赴美留学之际，两位先生向他灌输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信和对祖国文化的热爱，期望之殷，寄托之诚，不是良有以也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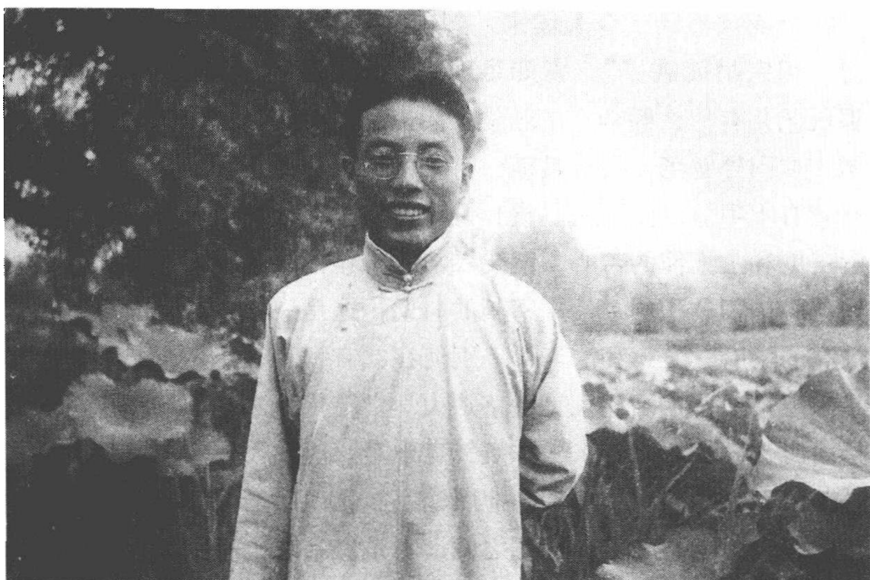
在清华进修的后期，钱学森曾到杭州笕桥机场实习，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落在地上的飞机，那是两架从法国购买的“布莱盖”。随后，他又到南京、南昌的两家国民党空军飞机修理厂见习，在那里，他总共接触六架美国制造的“寇蒂斯”，很老很落后的玩艺儿了，据说，还是当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美洲总部，用募集的款项购得的。这八架“布莱盖”和“寇蒂斯”，成了钱学森研究飞机的最早“标本”。

侯仁之：从旁听到兼职教授

侯仁之大学进的是燕京，研究生读的是燕京，留学回来当教授也是在燕京，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转入北大，然后就一直未动。他似乎与清华无缘。

其实不然。我们先看侯仁之的一篇文章：《喜在华荫下，情结日益深——应〈清华大学建筑系系庆五十周年专刊〉征稿，略抒所感》，文章说：

> 1932年9月，我作为一年级的新生进入燕京大学。转年9月，我唯一的弟弟硕之又考入清华大学工学院。及至1937年7月7日，日寇扩大侵华战争进占北平城，清华大学南迁昆明，硕之随行。在



燕京大学时的侯仁之。

此以前的四年间，我和弟弟经常来往于燕京清华两校之间，而我之受益于清华者独多。在这里姑举三件事，都是我永远难忘的。

第一件事：硕之热衷于水力发电工程，我对历史上黄河与运河的治导也很感兴趣。有一次，大约是 1936 年春天，硕之约我同到清华大学的同方部讲堂去听著名水利学家李协（仪祉）先生作关于治理黄河的报告，我们两人都深受感动。现在同方部的房子火后照原样重建，大体仍是旧观，可是当时听讲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第二件事：我因阅读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爱不释手，有一天，硕之跑来告诉我说，斯文赫定已来到北平，还要在清华大学礼堂作公开讲演，约我同去听讲。我记得斯文赫定身材较小，还特别为他加高了在讲台上所站的地方。他用英文所讲的，仅限于在新疆境内开辟公路的事，我未免有些失望；但是仍然把他所讲的记下来，译为中文，题作《新疆公路视察记》，刊登在《禹贡》半月刊上。

第三件事：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天下午，硕之特别带我到清华大学图书馆阅览室，借来一大本英文的苏联画报，记得画报的题目是“U. S. S. R. in Construction”。他为我翻出一页，有

大幅照片，介绍的是苏联兴建第聂伯河大型水电站的情况。跟着他为我详加解释说：列宁曾经讲过，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苏联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正在大力进行电气化工程建设。我国要进行建设，只靠像在定县进行的开展农村平民教育是不行的，有朝一日一定要在长江大河上兴建大规模的水电站提供动力进行建设，方有可能。当时他说这些话，只是一个心怀祖国未来的青年人的梦想。他决心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攻读水电工程才来到清华，确是事实。1937 年夏，他随清华大学转移到昆明进入联合大学。在联合大学毕业后，又在当地的耀龙电力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只身长途跋涉，辗转北上，最后竟在陕西凤翔的国民党统治区，惨遭杀害。当时我在沦陷后的北平，因为燕京大学被日寇查封，我遭逮捕。1942 年夏被日寇军事法庭处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没有迁居旅行自由。此后不久，弟弟被害的消息辗转传来，我闻讯后，痛不欲生。幸得我一位老师的开导，才得心回意转，此不多叙。及待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留学英国，还是在留英期间，我才听到清华一位校友说，硕之被害的当时，清华大学校友曾为他起诉到国民党统治下的法庭，自是徒然。可是这件事却大大加深了我对清华大学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结”，直到今天。

此外，笔者手头亦有三则资料，可以佐证。

一、1932 年，侯仁之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师从早年留学美国的洪业先生。洪业（1893～1980），号煨莲，是最先研究燕大校园的历史、研究勺园的。勺园的图非常宝贵，是明代书法家米万钟修建它时亲手所绘。洪业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听说燕大买下的这个地方，正是原先的勺园，他很感兴趣，归国就着手研究勺园，结果功夫不负苦心人，居然让他找到了《勺园修禊图》。起先仅仅根据记载，知道历史上有这个图，下落何在，几百年来一直无人知晓。洪业多次前往琉璃厂的书店寻觅，终于得知这幅画一直被收藏在天津，于是尾随而去，花重金买下。通过研究《勺园修禊图》，洪业写出了《勺园图录考》。

《勺园图录考》出版于1932 年，正逢侯仁之进校。洪业的著书



侯仁之在燕京大学研究生宿舍内。

经历，以及他对于文物的搜罗、钻研，给了侯仁之莫大的震撼。侯仁之认真拜读了洪业的著作，然后手捧着书，去实地一一对照。一开始，他就表现出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彻底精神。侯仁之的实地考察，从校园扩大到校外，他沿着圆明园的流水溯源而上，直至西山。在那里，他发现了废弃的清代引水工程。燕大没有地理课，为了进行深入的探讨，侯仁之便经常去清华地学系旁听。

二、侯仁之研究生毕业，留在燕大当历史学助教，他听说洪业老师的弟弟从法国回来，在清华教地理学，就想转去清华学习地理。洪业不同意，他看出侯仁之的兴趣已经转到历史地理，就对他说：“你不必去清华，我让他来给你讲课……”洪业说到做到，他果然让他的弟弟来燕大，辅导侯仁之学习地理。

三、1950 年，侯仁之应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梁思成邀请，担任该系兼职教授，开设一门崭新的课程——《市镇地理基础》，专门介绍有关城市的起源和发展、城址的选择和迁移，以及城市的地理环境等等。

旁听是缘，拜师是缘，及至到清华兼职，那就更不用说了，已经成

了一家人。

黄万里：道是无缘终有缘

黄万里的两个哥哥，黄方刚与黄竞武，以及堂兄黄自，那位著名的音乐家，都是清华出身。唯他不是，高考，他选择了分数常常高于清华的唐山交大。然而，山不转水转，1953 年 1 月，因为高校院系调整，黄万里被调到了清华水利系。

世事如棋，造化弄人。清华出身的季羡林，最终落在了北大，清华出身的陈省身，最终落在了南开，清华出身的杨绛，最终落在了社科院，清华出身的钱学森，最终落在了国防战线，与清华有旁听、兼职之缘的侯仁之，最终落在了燕园，而唐山交大出身的黄万里，却落在了水木清华，一呆就是半个世纪，直至耄耋，直至魂归道山。

这是后话，暂且撇开。

3. 从清华精神说开去

六位主人公都与清华结缘，是偶然，也有其必然——清华在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清华缘于庚子赔款的“退还”政策，它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新的组成部分。美国“退款”的真正目的，当然以美国自身利益为准，正如一位美国大学校长所说：“我们现在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A. H. Smith：China and America Today，1909 年美国版）但是中国人的精神底线不是那么好摧垮的，清华的兴建，考其结果，反倒是培养出许多爱国的热血学子，孕育出崭新的清华精神。且看闻一多 1922 年在《美国化的清华》一文中发出的呐喊：“美国化呀！够了！够了！物质文明！我怕你了，厌你了，请你离开我吧！东方

文明啊！支那的国魂啊！‘盍归乎来’！让我还是做我东方的‘老憨’吧！”

那么，什么是清华精神呢？朱自清教授曾以此为题，撰文说：

> 这半年来同事们和同学们常常谈到“清华精神”。自己虽然不是清华人，但是在校服务多年，对这个问题也感到很大的兴趣。有一回和一位同学谈话，曾经假定清华精神是“服务”。后来和钱伟长先生谈起，他似乎觉得清华精神是“独立的、批评的”，例如清华人到一个机关服务，往往喜欢表示自己的意见，不甘心苟同。我承认钱先生的看法，连带着他的例子，是有理由的。但是关于“服务”，我还请申说一下。
>
> 提到“服务”，很容易想到青年会。青年会的服务精神有它的好处和缺点，这里不想讨论。我所假定的清华的服务精神，跟青年会的不同。为清楚起见，我现在想改为“实干”。清华毕业生不论旧制新制，在社会的各部门里做中级干部的最多。顾樵先生十多年前说过这样的话，现在看来大体似乎还是如此。顾先生说这些中级干部是平实的工作者，他们的贡献虽然是点滴的，然而总起来看也够重大的。钱先生的看法是指出他们的不重世故。这正是为了重事，要实干，要认真的干。青年人讨厌世故，重实干，虽然程度不同，原是一般的趋向。不过清华跟都市隔得远些，旧制生出洋五年，更跟中国隔得远些，加上清华学生入学时一般年岁也许小些，因此这种现象就特别显著。有些人谈清华精神，强调在学时期的爱清洁守秩序等。乍看这些似乎是小事，可是实在是跟毕业后服务时期的按部就班的实干精神密切的联系着的。
>
> 有人也许觉得这种实干的精神固然很好，不过太强调了这种精神，有时会使人只见树而不见林。然而这是春秋责备贤者的话，能够一棵树一棵树的修整着，究竟是对林子有帮助的。

朱自清1925年到清华任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他眼里所见的，是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清华精神。

1981年，季羡林作《清华颂》，劈头说：“清华园，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回忆起清华园，就像回忆我的母亲。”季羡林过早失去了母爱，

这是他刻骨铭心的痛。所幸还有补偿——还有母亲般温暖博大的清华园。在同一篇文章中，季羡林说："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愉快的四年。在那时候，我们国家民族正处在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清华园也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但是园子内的生活始终是生气勃勃的，充满了活力的。民主的气氛，科学的传统，始终占着主导的地位。我同广大的清华校友一样，现在所以有一点点知识，难道不就是在清华园中打下的基础吗？离开清华以后，我当然也学习了不少的新知识，但是在每一个阶段，只要我感觉到学习有所收获，我立刻想到清华园，没有在那里打下的基础，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因为研究院推迟一年开课，陈省身在清华总共待了四年，身份变成助教加研究生，又因为导师孙光远中途退出了指导行列，他的研究主要靠自学。陈省身日后回眸清华，心神一凛的不是导师的眈眈锐目，而是同事兼对手华罗庚的谦谦笑靥。华罗庚是失学青年，又有残疾，能够仅凭一篇论文，闯进堂堂的清华大学，这是流芳百载的佳话。陈省身与华罗庚一世瑜亮，惺惺相惜，他曾满怀感情地回忆，华罗庚"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用非凡的努力来弥补先天的不足。"华罗庚患有腿疾，又没有学历，要超过别人，谈何容易。记得1935年华罗庚在德国《数学年鉴》发表了一篇论文，那时中国很少人能做到这一点。华罗庚当时站在清华科学馆逢人告诉这一喜讯，在他一生的传奇故事上又添加了新的一笔。"

陈省身在清华本来还有一个对手，那就是南开同窗吴大任。吴大任祖籍广东，和堂兄吴大业、吴大猷都在南开上学。吴大业读商科，吴大猷在物理系。理学院每年仅有的一个奖学金名额，一连四年都被吴氏两兄弟包了。第一年是大猷，次年是大任，第三年又归大猷，第四年复归大任。倘论数学才华，吴大任同陈省身不相上下，论起全面发展，比陈省身更高一筹。可惜吴大任在清华两次离去，第一次，陈省身等他一年，然后共同读研究生。第二次，就没法相陪了。吴大任的离去，自有他自己的原因，但从相互激励、相互切磋的角度来说，这损失是难以弥补的。

杨绛在中学时，就想进清华，一波三折，终于如愿，这就像命。杨绛注定要在清华园撒落很多很多的脚印，让她暮年一一收拾。

钱学森大学一年级暑假，因患伤寒，被迫休学一年。在这其间，他

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据王文华编著的《钱学森实录》："在这一年里，钱学森读了一位匈牙利社会学家以唯物史观论述的《艺术史》，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唯物论》等，他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社会主义，对这一理论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他还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下册始终没有出版）。开始接触到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参加过多次小型讨论会，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央苏区的一些情况。"

钱学森的大学校友罗沛霖回忆，1931 年"九一八"事变前后，钱学森已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钱学森曾对罗沛霖说，读书救不了中国，只有政治活动才能解决政治问题。钱学森说的政治活动就是革命斗争。

钱学森在清华为期甚短，只有一年，多半时间是在外面巡回实习，以致坊间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与清华的渊源。但是钱学森不会忘记，中国科技史不会忘记，因为就在这一年，他的人生动力由火车头换成了航空发动机，视线由地面移向高空。

学生时代，侯仁之与清华的关系仅仅是旁听，是借住，那也是缘。有这一点跟没这一点大不一样。大学之高，首要高在导师，而学子从导师那里的索取，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又不如听讲，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正是一代又一代学人的经验总结。侯仁之能够经常去清华旁听，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跨进清华的门槛。季羡林尝言，他在清华四年，本系的学科收获平平，其间振聋发聩之学，全在于旁听。

学生时代，黄万里是六人中与清华缘分最浅的，中年而后，他却成了六人中唯一的清华教授——遗憾的是，黄万里没能借清华腾飞，反而在那里狠狠摔倒，摔倒在反右的疾风暴雨中。这不怪清华，以当年的时代背景，以黄万里的个性，他在新中国的范围之内，到哪儿也逃不了右派的厄运。

写罢这一章，笔者深为三十年代的大学击节。你看，旁听，借读，转系，转校，改向，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而在笔者读书的六十年代，这一切绝对是梦想。方知从成才的角度来说，教育在某些方面曾一度倒退而不是前进！

第四章　仗剑天涯

1. 泛　论

晚清以降，国门乍启，国人睁眼看世界，神州大地掀起了一股留学潮，有志青年竞先前往。留学这玩艺儿，站在积极的角度看，它的确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二十世纪初叶各界许多闪光的名字，如鲁迅、郭沫若、梅贻琦、张子高、金邦正、胡刚复、胡适、竺可桢、赵元任、姜立夫等等，都是出自这个阵营；但是另一面，它又包含了蚀骨的悲酸，且不说留学欧美的主渠道——庚子赔款，就是建立在丧权辱国的痛苦之上，留学生到了国外，也是处处寄人篱下，忍气吞声。为此，留学生的先驱胡适曾撰《非留学篇》，陈述个中苦辛。他说："吾欲正告吾父老伯叔昆弟姐妹曰：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胡适是过来人，是留学政策的既得利益者，由他嘴里说出这番话，是很值得国人深思的。胡适说这话时是1914年，从那时到现在，将近一百年的日子过去了，世道有变，世道大变，然而争先恐后的留学热没有变；随着国门开放引爆的出国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愈演愈烈。

言归正传。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本书的六位主人公大学毕业之后，不约而同都走上了留学的道路。考其时间顺序，黄万里、陈省身动身最早，为1934年，黄万里赴美，陈省身赴德；杨绛、钱学森、季羡林跟随其后，为1935年，杨绛赴英，钱学森赴美，季羡林赴德；侯仁之启程最晚，原拟1938年赴英，由于二战阻隔，1946年才得以成行。

至此，六位青年才俊都乘上了留学欧美的班车。

2. 在异邦的星空下

出国去，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一处处的浪卷涛涌，奔腾浩瀚……

——周恩来

黄万里：位卑未敢忘忧国

黄万里1932年从唐山交大毕业，次年考取公费留美，在六位主人公中，是最早的。1934年元旦，黄万里从上海乘船出发。此处须加一注：本书六位主人公，除季羡林取道横贯亚欧的铁路，赴德留学，其余五位，或去欧，或赴美，一律是乘海轮。这是当时主要的跨洋工具。既乘海轮，李白的豪言便免不了响彻耳边："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黄万里这一代留学青年，生于忧患，当此步出国门之际，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取经回来，报效邦国，而不是争名争权争利。正如钱学森在国内学的是铁道，日后赴美改学航空，黄万里在国内学的是铁路桥梁，此番赴美，也毅然改学水利。这一转变，源起于内忧：1931年长江、汉水泛滥，水淹武汉三镇，殃及周遭数百万百姓；1933年黄河多处缺口，沿河若干地区一片汪洋。"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黄万里饱受刺激。其父黄炎培多次对他讲："中国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农民对不起统治者，只有统治者对不起农民。"希望他将来好好报效农民。面对江河泛滥带给广大农民的灾难，黄万里忧从中来，决心"改学水利，以拯农为己志"。

1934年2月，黄万里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读研。这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是美国东北部八所常春藤名校之一，位于纽约市附近的小镇绮色佳。在他之前，留学生的前辈如胡适、茅以升、赵元任、任鸿隽、杨杏佛等等，都曾在此负笈。黄万里深以为豪的，是茅以升在此留下的佳

话。1916 年，茅以升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唐山交大前身）毕业，考取官费留美，选择的就是康奈尔大学。校方彼时只知中国有清华，不知唐山工专是何等水准，因此，不承认茅以升的大学学历，出题对他进行重考。首考大学课程，茅以升的成绩是“特优”，继考研究生入学试题，茅以升又是“特优”。这一来，校方对唐山工专刮目相看，他们本着西方人的豪爽，做出一个大气的决定：今后凡遇唐山工专的毕业生来校读研，一律予以免试。黄万里就是挟茅氏的余威进入康奈尔，他选择的是土木工程。按照黄万里当时的认识，洪水既然是由暴雨产生，那么，学习水文首先就应该掌握气象，所以他以气象学为副科，论文题目是《暴雨统计》。岂不闻“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黄万里夙兴夜寐，努力向学，仅用了一年，就获得硕士学位。在校方的眼里，不啻就是茅以升第二！下一步怎么走？黄万里听从导师西雷教授的建议，前往爱荷华大学深造水利。再下一步，则到伊利诺斯大学攻读水利工程博士。此番，他是以地理学为第一副科，数学为第二副科，论文题目为《瞬间流率时程线学说》。黄万里在博士论文中，独创从暴雨推算洪水流量的半经验半理论方法，数十年后，还为同行津津乐道。

黄万里热情奔放，豪气如虹，留美三载，他曾驱车行驶四万五千英里，遍访美国各大水利工程。这段时间，是黄万里一生风头最劲的岁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是岳武穆的自况。黄万里其时方交二十四五，离三十而立还差一大截，轮下驶过何止八千里，八万里也打不住！话说 1936 年，密西西比河暴发特大洪灾，黄万里赶去查看水情，他乘船至出海口，面对滚滚滔滔的浊流，想到故国的黄河和长江。一个激灵，黄万里突然悟到：以前学的土木工程，强调的是水来土掩，其实，“抽刀断水水更流”，水啊水，哪里是能掩得住的呢！何况，任何一种依河修建的工程，都将改变水与沙的动态，促使



1935 年于美国留学时的黄万里。

河床潜移默化、千变万化。因此，治水必须综合考虑，而不能孤立地以沙论沙，以水论水，以工程论工程。这瞬间的觉悟，影响了黄万里终生。

而在刻苦攻读之余，在四处访师、八方见习之余，黄万里还高歌长吟，写下了大量诗文。“少时气岸凌牛斗，万卷披来空自负，曾未学为如此文，兴酣摇笔龙蛇走。”半个世纪后，黄万里如此回顾。这一大笔精神的财富，恐怕早随逝波白白流失了。个中原因，留待后文再探讨。赵诚编著的《追寻黄万里》一书，仅仅透露了一句：“留美期间，他还不忘在就读的大学内演讲中国诗文的精湛。”这是他的根，他的魂。他是带根的取经客。

陈省身：追随伟大的人物

1934 年 7 月，紧随在黄万里之后，陈省身远涉重洋，前往德国留学。当是时也，世界数学的中心在欧洲，欧洲数学的重镇分别是法国的巴黎和德国的哥廷根。按道理，陈省身既然负笈德国，就应该选择哥廷根，数学史上众多光芒万丈的人物，如高斯、黎曼、克莱因、希尔伯特、闵可夫斯基……都曾在那里学习与执教。光是呼吸呼吸哥廷根的空气，就会使后世的学子神清脑健，底气大增。而陈省身选择的却是汉堡；具体说，是汉堡大学。陈省身是冲着另外一个大家：曾在北大办过数学讲座的布拉施克。

一位天才的学生与一位杰出的导师碰撞，场面是带有戏剧性的。1934 年 10 月，陈省身与布拉施克在汉堡大学见面，对方给的见面礼，就是递上一叠自己最新的论文，让他学习借鉴。陈省身认真拜读，居然让他发现其中有一篇证明不全，这是布拉施克的漏洞，也是陈省身的机会，他花了几个礼拜补上了这个漏洞，一下子拉近和布拉施克的距离（倘换在中国，说不定就会驳了导师的“面子”，让对方下不了台，自己也没好果子吃。中西异趣，此其一也）。英国数学家哈代说过：“要知道自己是不是有数学能力，就要看你是不是比老师好。”六十多年后，有记者据此向陈省身发问：“您的数学比老师好吗？”陈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哦，当然了！”说罢，哈哈大笑。

布拉施克很忙，经常外出旅行讲学。陈省身在汉堡，日常主要跟随布拉施克的助教凯勒（1906～2000）。凯勒年轻，但很有眼光，他崇拜法国大数学家埃利·嘉当（Elie Joseph Cardan，1869～1951），有意运用其学说，写了一本《微分方程组理论导引》。嘉当的理论超前，阐述深奥，天下鲜有人懂，因此，凯勒的这本追随嘉当之作，也成了天书一样的东西，曲高而和寡，周围乏有知音。幸亏陈省身来了，他不仅看出该书的价值，更看出嘉当举世罕见的天才。陈省身认真向凯勒学习，并通过他，间接学到了很多嘉当的东西。陈省身的博士论文：《2r 维空间中 r 维流形的三重网的不变理论》，就是运用嘉当的方法完成的。

陈省身的留学期限是两年，以后又延长为三年，但是，他只用一年半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剩下的一年半怎么办？布拉施克提供了两种选择：留在汉堡大学，跟阿廷研究数论；或到巴黎，跟嘉当研究微分几何。陈省身选择了后者。从数学史的观点看，陈省身的这一选择，是“微分几何得益，代数数论受损”。时隔几十年后，美国数学名家卡普兰斯基对此做出评论，他说：“如果陈省身选择了代数数论，二十世纪数学的历史将会有重大改观。结果是数论失去了一位大师，而几何学则迎来幸运。”

1936 年 9 月，陈省身来到巴黎，谒见嘉当。嘉当德高望重，名声远播，公务私务都十分繁忙，他每星期只在周四下午会见学生，届时，办公室门口总是排着长龙。话说陈省身与嘉当第一次会面，对方给的见面礼，也是一道数学题，与网几何有关。这一回，陈省身没有在汉堡幸运，任他怎么“玩”，也“玩”不出答案。陈省身觉得第一道题就做不出，太丢人，从此不好意思再去见嘉当。过了一段日子，陈省身与嘉当在数学所的楼梯上偶然相遇。嘉当问：“怎么好久没有见你？”陈省身如实相告。嘉当笑了，他说：“没关系，那是道难题，慢慢做。”又说：“你今后尽管来。”陈省身这才按期去见嘉当。

随着接触增多，双方愈来愈了解。一天，嘉当告诉陈省身：“你今后每两星期到我家里去一次，交谈时间为一小时。”这是开小灶了。交谈用的是法文，围绕课业和学术问题，开门见山，任意引申，不拘一格。嘉当知识宏富，思路敏捷而深邃，当场提问，当场解答。到了第二天，陈省身还经常接到嘉当的信，诸如“在你离开后，关于你说的问题，我又想了很多……”、“那个问题其实还有另外的解法，你不妨一

试……”之类。两人有时在街道上相遇，嘉当脑里火花一闪，随即从兜里掏出一只旧信封或纸片，记下最新的思考，交给陈省身。据陈省身回忆：“他的理论当时大家都不懂，很难。但是他的理论后来成为几何上最要紧的东西。你要学一个东西，不能只做大问题，小问题也要做，你要是大师傅，不一定只会烧个鱼翅，炒个肉丝也要炒得好。所以我跟嘉当学了很多。”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陈省身随着嘉当的知识转。在这其间，他完成了三篇论文。他学到的知识，则远远超出了论文的范畴。嘉当当初给的第一道难题，陈省身后来也解决了，那就是1938年发表的论文：《关于两个仿射联络》。

陈省身晚年传授经验，说：“年轻人做学问应该去找这方面最好的人。”

这使我想起了陈寅恪。对季羡林来说，陈寅恪就是他求知路上最好的老师。陈寅恪开大课，季羡林前去旁听，因为寅恪师不务陈言，不蹈旧路，每次讲学，凡前人讲过的，他一律不述，近人讲过的，也尽力回避，自己讲过的，更不予以重复，他只讲崭新的独特见解，所以季羡林一听之下，豁然贯通，终生受用无穷。

仍回到陈省身。如今，在国际数学界，有一首诗广为流传：“天衣岂无缝，匠心剪接成。浑然归一体，广邃妙绝伦。造化爱几何，四力纤维能。千古存心事，欧高黎嘉陈。”此诗是杨振宁题赠陈省身的，时间是1975年。诗中，杨振宁把陈省身和数学史上的四位大师——欧几里得、高斯、黎曼、嘉当——并列，称之为数学史上的第五个里程碑。这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同。陈省身之所以能如此高步云衢，不同凡响，追根溯源，应归功于他的巴黎之行，在一个伟大的地方追随了一位伟大的人物。

并非题外话

写到这儿，不禁又想起了吴大任。1931年，吴大任半途离开清华，回到南开当助教。1933年，考取英国庚款公费留学，去伦敦大学攻读几何学博士，期限规定为三年。但是，伦敦大学在几何学上没有杰出的导师，吴大任空等了一年，连博士论文的题目都没有定下。这时，陈省身致信吴大任，让他来德国汉堡，说这儿的条件更适合他发展。于是，

吴大任就将读博改为读硕，在伦敦大学匆匆拿了个硕士学位，1935 年秋，到汉堡和陈省身会聚。

这是陈省身和吴大任继南开、清华之后，在汉堡第三次同学。吴大任将留学期限，从三年延长到四年。陈省身劝他申请读博，但读博需修一年半的副课课程，吴大任不肯，他觉得："这样做论文的时间就少啦，我只要学会做研究，有没有学位没关系！"

吴大任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汉堡大学听课，在布拉施克的指导下，他发表了两篇论文，文中有好几个漂亮的公式。布拉施克称赞道："你几乎把一切都做完了。"又问："你论文都有了，为什么不拿学位?"吴大任回答："我在德国只剩两三个月，时间不够了。"

布拉施克深为吴大任惋惜。其实事在人为，有布拉施克出面帮忙，一切都还能补救。吴大任志不在此，他淡泊学位，急于按时回国，所以用陈省身的话说，他是把"'博士'藏在囊中了"。

顺便说一说华罗庚。1936 年秋天，华罗庚获得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的机会。途经德国，曾和陈省身会晤，一同观看柏林奥运会。华罗庚去剑桥，遇到的第一命题，就是"选择"。有一位纪实文学作者说：

> 大数学家哈代（Hardy 1877～1947）愿意帮助华罗庚在两年内获得博士学位。一般这都需要三年，可见哈代对华罗庚的确是另眼看待。因为他早就听说过这位有志向、有成就的自学者。博士学位，留学生谁不渴求它呢？可是为了取得博士学位往往不能进入更广博的数学空间自由驰骋，而被学位论文束缚在一两门学科之内。这对惜时如金的华罗庚来说，是不能适应的。于是他客气地托人转告哈代先生，到贵国来主要是求学问，而不是为了学位，只要能有机会在贵校的图书馆看书，参加听课，就很满足了。
>
> 十九世纪数学之王华林提出的命题，二十世纪初希尔伯特走上第一个阶梯，后来哈代和李特伍德登上了另一高层，华罗庚一跃而上，占领了新的制高点。
>
> 当时哈代已经完成了让人叹为观止的巨著《数论导引》，他看见了"它利问题"的"华氏定理"之后，高兴地说："好啊，我的著作又得修改了！"
>
> 华罗庚的《论高斯的完整三角合估计问题》及其他十几篇论

文，对当时数学领域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连连取得突破。权威、学者们都惊叹地说：“这是剑桥的光荣。”

华罗庚留学期间，虽然从未正式申请授予令人羡慕的博士学位，但他却以实实在在的数学成就和独特的治学精神为祖国争得了光荣，在此他加入了世界数论的先进行列，那个跛着残腿的高大身躯赢得了各国人士钦佩和赞叹的目光。

吴大任和华罗庚都注重实学，看淡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这种以我为主的品性，是值得称颂的。

对于华罗庚的剑桥之行，陈省身却另有看法。若干年后，陈省身说，哈代固然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可惜那一年不在剑桥，哈代不在，你还能指望从他那里获得多大帮助呢？选择华林问题进行研究，不是不可以，问题是解析数论已经过了它的鼎盛期，而从希乐伯特开始的代数数论正在蓬勃发展，以华罗庚的能力，如果能够到汉堡大学，追随 E·阿廷（Emil Artin，1898～1962）研究代数数论，一定也能获得巨大的成就。假如真是那样，中国数学的历史也许要改写了。

陈省身无疑是在为华罗庚惋惜，但是一切都成了无法挽回的过去，陈省身的假设，永远无解，只是在思考的层次上，给后人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杨绛：要的是真才实学，不是文凭

杨绛 1933 年入清华研究院，学制三年，她没有念完，只上了两年就半途而废。为什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大事？嗯，事情的确非常重大：1935 年初夏，未婚夫钱锺书考上了公费留英。这是钱锺书生活的拐点，也是杨绛生活的拐点。杨绛的几个姐夫，如堂姐保康的丈夫沈履是留美出身，时为清华教授，三姐闰康的丈夫何德奎也是留美出身，时为上海工部局会办，钱锺书英文再好，还没有洋功名，要知道，在帝制崩溃、科举取消之后，出洋留学已成了晋身上流社会的最佳阶梯。因此，杨绛不用权衡，她毫不犹豫地中断学业，回老家与钱锺书结婚，然后，水一程，陆一程，陪夫君迢迢远征。

此处征一史料，据旅美历史学家何炳棣考证：钱锺书参加第三届中英庚款留学考试，总平均分为87.95！是当届第一，也是历届第一。要知道这成绩是如何出色，需作比较，如何炳棣自述，他是第六届考生中的“状元”，总平均成绩仅为78.5，落后钱锺书将近10分。

钱锺书到了牛津城，进入牛津大学下属的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杨绛的任务是陪读，陪读则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牺牲。俗谚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有一个为之做出牺牲的女人。喏，杨绛就是。牺牲一开始就发生了：杨绛本来想进女子学院，研修文学，她慢了一步，报名时，文学名额已满，唯历史尚余空缺，杨绛不愿学历史，亦如当初在东吴不愿学政治，学政治那是别无选择，不学历史这回却可以自己做主，于是，杨绛干脆放弃报名，改为旁听——当然是旁听文学。

旁听不在册，没有学籍，没有文凭。但是，旁听也有旁听的好处，不需要做作业，不需要写论文，不需要参加考试，课外时间统统归自己支配。空前的解放，浑身的轻松。杨绛一下子从积久成习的课业重压下抬起头来，像婴儿一样，用喜悦的目光重新打量世界。

继清华之后，杨绛很快又爱上了牛津大学的图书馆。这个馆远比清华要大，藏书远比清华为多。据说，早在莎士比亚在世的1611年，英国书业公司就承担了把各种新书（包括重印书）免费赠送给它一本的义务。杨绛从前在东吴，课余常在图书馆寻寻觅觅，想入文学殿堂而不得其门。跨进清华外文系，虽然圆了文学的梦，却因从前欠债太多，来不及补习。这回迈入牛津大学图书馆，真正是如鱼得水。图书馆的书不外借，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杨绛占据了一张，自己直接从架上取书，读不完就留在桌上，旁人不会动，下次来接着看。国内此时正动荡不安，难得在牛津有这么一张书桌，有这么一幢图书馆，简直就是属于她的，似乎是天主特意安排，纵然不信教，想想，也要在胸前画个十字。

坐拥书城，杨绛着手制定一份自学课程表，并严格遵照执行。大体情况是：英国文学，以文学史为纲，经典作家，一个一个往下读，主要作品，一部一部仔细读；代表作而外，也读相关的评论。法国文学，也是以文学史为序。莫里哀的戏剧，她差不多全部涉猎；司汤达的《红与黑》，也啃了，但味同嚼蜡，索然无趣；偶尔读一些二三流的作家，如拉康特、梅里美；卢梭的自传《忏悔录》，名声很大，她几番打开，都读不进去，嫌脏；巴尔扎克一读再读，百读不厌；也读了左拉。此外，

还浏览了很多英国剧作家的作品。

馆藏的经典作品，以十八世纪为界，再靠近，就没有了。馆方认为，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那叫糙，够不上优秀。因此，十九世纪以来大家的作品，杨绛就得从牛津市图书馆转借，一般是借到什么读什么，不再拘泥文学史的先后。

杨绛尝到了自学的甜头。白天，有课听课，无课，泡图书馆。充耳，盈目，莫非英文、法文，间或也有德文。晚间回到租借的寓所，改读中文。中文书是从国内带来，满满的一箱。兴之所至，也练书法，笔、墨、砚台、字帖，一律是自备，跟着她漂洋过海而来。宣纸则无，拿餐巾纸代替。在异邦的灯座下用毛笔写龙飞凤舞的汉字，也是人生一乐。

杨绛和钱锺书展开读书竞赛，比比谁读的书多。1935 年年终统计，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换个角度看，杨绛还是输给了钱锺书：杨绛读的多是小册子，钱锺书读的多是大部头；杨绛把中文书也计算在内，钱锺书只计算外文书；杨绛除开诗词，一般不重读，钱锺书有的书要看上几遍，他的体会是："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杨绛很少做读书笔记，钱锺书不仅做，还做得十分详细。杨绛在比赛结果的统计上，显然耍了一点无赖，自作聪明、无伤大雅的赖。

1937 年夏，钱锺书通过论文答辩，取得牛津大学文学学士文凭。总结两年的得失，他觉得为学位而读，错过了许多想看的书，读了许多不必看的书，实在不划算。钱锺书引用一位英国学者的话自嘲："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因此，夫妇俩秋季从牛津大学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就学乖了，虽然注了册，交了费，并不积极上课，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按自己规定的课程自学。此举说明，钱锺书无意洋功名，当然更不把归国后的利禄放在心上。钱锺书注重的是学问，他阅读面极广，仅就语种来说，除中文外，又有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杨绛因为女儿圆圆出世，要带孩子，精力不够，重点只放在法文。到巴黎初期，杨绛和钱锺书共同读过一本法文小说：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杨绛法文基础优于钱锺书，生字比他少，但是一年后，钱锺书的法文水平就远远超过了杨绛。杨绛后来自我解嘲，说她的法文知识就像钱锺书《围城》里的某太太，"生小孩儿都忘了"。

杨绛就这样一路旁听，一路自修。“心同野鹤与尘远，诗似冰壶彻底清。”（唐·韦应物语）难得有这样一份清明。难得有这样一处幽静。杨绛在清华没能拿到硕士学位，在牛津和巴黎也没有攻读任何学位；她要的是真才实学，不是文凭。

为杨绛一辩

杨绛在英伦陪读，首要任务，是照顾好钱锺书。以前在国内，钱锺书常自叹“笨手拙脚”，杨绛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并不了解其他方面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到了牛津才晓得，钱锺书除了读书，其他什么都不会。杨绛生孩子住院，才几天工夫，钱锺书就苦着个脸，到医院说：“我做坏事了。”原来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杨绛安慰他：“不要紧，我会洗。”钱锺书仍然不放心：“那是墨水呀!”杨绛说：“墨水也能洗。”钱锺书这才放心回去。下次来，又苦着个脸：“我把台灯砸了。”杨绛问明是怎样的灯，说：“不要紧，我会修。”再下一次，他又满面忧愁，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杨绛又安慰他：“不要紧，我会修。”杨绛 2003 年在《我们仨》中透露，钱锺书 1972 年才“生平第一次划火柴”，由这个细节可以想像，他在生活方面是如何的低能，而杨绛的任务，又是如何的繁重。

赶巧他们的女儿圆圆在牛津出生。杨绛一个人，要照顾一个大男孩（钱锺书），又要照顾一个小女婴。学习，焉能不大打折扣。

天生为人妻，为人母，女性注定要为男子作出更大的牺牲。

钱学森：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1935 年 8 月，钱学森抵达美国。他进的是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钱学森在麻省有一句名言，背后牵扯着一个看似简单却又影响深远的故事——

麻省是美国世界级的理工名校，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剑桥，与哈佛大学隔河相望而又并肩驰名。不言而喻，凡是进入麻省的，都不是等闲之辈（笔者注：钱学森的同班同学中，就包括美国七十年代末的国防部长

哈罗尔德·布朗)。而就在这批天之骄子中，突然冒出了一个中国小伙子，和他们平起平坐，分享“世界顶级”的荣光，有几位盎格鲁撒克逊族的后裔就看不惯了，一天，他们当着钱学森的面，故意大谈中国是如何如何落后，中国人又是如何如何愚昧。这是公然挑衅了。钱学森怒从心头起，他直视那几位碧眼黄发的主儿，大声说：“中国现在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咱们人比人，你们谁敢和我比试?”

谁敢？钱学森话一出口，周围空气立马上升了几度，那几位自命不凡的美国同学，额上禁不住渗出粒粒细汗——毕竟是从千百人中挑出的尖子，自大而又不乏敏感，他们从钱学森郑重其事的叫板中，瞬间掂出了他的吨位。

不用说，那结果，自然是钱学森大获全胜。他在航空系待了不到一年，就完成硕士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闪电般的速度，优异的成绩，令班上所有的同学都大吃一惊!

纵然钱学森大学的本科是航空工程，他的表现已足够出色，何况纯粹是半路出家，非凡的天赋展露无遗。一次，有位教授出了一道动力学难题，复杂至极，谁也算不出来。一位中国留学生，叫叶玄的，跑去请教钱学森。钱学森作了一个巧妙的转换，将复杂的运算变为简单的代数，问题便迎刃而解。叶玄佩服得不得了。叶玄后来留在美国科研部门，1989 年，他回国时见到钱学森，忍不住旧事重提，问道：“那么复杂的运算，怎么到您手里就变得那么简单?”钱学森淡然一笑，说：“那算不得什么，小技巧而已。”另一次，有位教授出了一份很难的考卷，班上大部分人不及格。这事引起普遍的不满，认为教授是有意刁难。一部分人集议，决定找教授说理。当他们来到教授门外，看到门上贴了一份试卷，是钱学森的，卷面工工整整，答题完美无缺。学生们一下傻了眼，再也不敢敲门找教授评理了。

1936 年 8 月，钱学森研究生毕业，按理说，他应该留在麻省继续读博，这时出现了障碍，缘于种族歧视，美国的飞机制造厂不许钱学森去实习。学飞机制造而不能去飞机制造厂实习，这就意味着他难以继续深造。经过慎重抉择，他决定改投另一所世界名校——加州理工学院。那里有他敬重的冯·卡门（Karman Theodore Von，1881～1963）。

冯·卡门是谁？一位匈牙利裔的犹太人，驰名世界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主任。这里有一个故事，加州理工学院初创航

空系，曾在世界范围内物色领军人物，考虑的人选，包括冯·卡门，以及冯·卡门的老师，德国物理学家，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的普朗特，最后桂冠落到冯·卡门的头上，原因之一，就是他比普朗特年轻。笔者提请读者注意，美国是以拓荒精神为背景的竞争社会，年轻意味着勇往直前，年轻意味着创造革新，老年人是不受欢迎的。这种情况，和我们中国恰恰相反，因此，我们在后面还要反复提到。

言归正传，钱学森和陈省身一样，深知拜师要拜名师。他要读博，就应拜冯·卡门。但是，钱学森与冯·卡门素不相识，又无人可从中作伐，怎么办？钱学森有他自己的办法：毛遂自荐。

天才是不需要转弯抹角的，自信就是最好的通行证。1936 年 10 月，钱学森与冯·卡门在加州理工会面。钱学森作自我介绍，他讲的是航空，航天，仿佛他不是来拜师，而是来向冯·卡门描绘共同奋斗的前景。是的，这就是他对未来航空航天的认识，超人一等而又精辟绝伦，他看上了冯·卡门的理论力、领袖力，愿意投在他的门下驰驱。冯·卡门开怀大笑了，这是伯乐的笑，统帅的笑。冯·卡门为钱学森的远见、渊博和果敢打动，当场破格录取他为博士研究生。

冯·卡门的高明，高就高在他的出手，他一上来就交给钱学森两大难题：

1. 当飞机的飞行速度提高到亚音速时，气体的可压缩性对飞行器的性能到底产生什么影响，它们之间的定量关系如何？

2. 如果将飞机的飞行速度进一步提高到超音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理论指导和技术设计？

这是当时航空技术的焦点，飞机的飞行速度和高度，决定了空军的实力，美国正面临世界多元的挑战，迫不及待地要从航空技术取得突破。

钱学森知难而上，全力以赴。他从加州理工图书馆借得大批有关空气动力学的书籍，日夜苦读，与之同时，潜心研究现代数学、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相对论、分子结构、量子化学等基础理论。五十年代，钱学森回忆起那一段攻关生活，说："我不是讲大话，我在做空气动力学的时候，关于空气动力学方面的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意大利文的文献我全都念过。为了要把它做好，我得这么念，而且还进行了分析。"钱学森的方法，就是竭泽而渔。

1939年6月，钱学森完成了《高速气体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四篇博士论文，获得航空和数学的双博士学位。钱学森在博士论文中，完成了飞机在高速飞行时，所受空气摩擦阻力和热效应重要影响的精确数据与结论，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另外，钱学森创立了一种关于计算高速飞行中的机翼表面压力分布情况的科学方法，被命名为“卡门——钱学森公式”。

钱学森的一位同事回忆：“钱学森等于是冯·卡门的左右手，为冯·卡门执行各式各样的计划与概念，比冯·卡门亲自动手更彻底，更有效率。他工作不分日夜，手稿与计算结果都做得既快又出色。他成了冯·卡门的贴身助手，把冯·卡门构思的程式写成白纸黑字。他头脑好、速度又快，这样的人才真是千载难逢。”

冯·卡门对钱学森取得的成就，十分欣慰，他在私下里坦言：“钱学森的天资是极为罕见的。”“人们都说，是我发现了钱学森，其实，是钱学森发现了我。”

钱学森和冯·卡门都很有个性，举两件事，略窥他俩的风采：一、有一次钱学森作报告，描述航空航天远景，台下一位老人举手发言，对他的某些观点进行驳斥，钱学森坚持己见，两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老人走后，一直在旁默默观战的冯·卡门，这时走上前来，对钱学森说：“你知道刚才那位老人是谁吗？”钱学森摇头。冯·卡门说：“他就是冯·米赛斯啊。”冯·米赛斯？钱学森显出一脸惊讶，原来他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力学权威！冯·卡门面露诡谲的笑，问：“如果你知道他是谁，还敢和他辩论吗？”“怎么不能？”钱学森回答：“在学术问题前面人人平等，这是您一贯教导我的嘛。”二、一天，钱学森写了一篇东西，拿给冯·卡门看，冯·卡门认为他的观点是错的，钱学森就和冯·卡门辩论，辩到后来，冯·卡门大发雷霆，他把钱学森的文稿扔到地上，拂袖而去。然而，第二天凌晨，钱家的门铃骤然响起，钱学森感到奇怪，谁这么早登门？打开一看，啊，是冯·卡门！但见他紫涨着脸，迫不及待地声明：我想了一夜，终于搞明白了，昨天你是正确的，而我错了。说罢，深深地给钱学森鞠了一躬。这一躬，让我们知道钱学森有多了不起！这一躬，更让我们领略冯·卡门有多伟大！

在加州理工学院读博期间，钱学森参加了一个业余的“火箭俱乐

部”，因为研究肇始，风险极大，所以又叫做“自杀俱乐部”。正是这段充满艰险的、不可思议的研究生涯，圆了他儿时纸镖飞行的梦，同时也把他迅速推进到火箭研制开创者的前台。

1940年，钱学森独立完成了《关于薄壳体稳定性的研究》一文。这是钱学森的出师之作。以此为标志，他从冯·卡门的麾下脱颖而出，进入国际知名学者的行列。

钱学森为他的这篇成名作，耗费的精力是巨大的。1962年，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力学会议上，钱学森如是回忆：“我过去发表过一篇重要的论文，关于薄壳方面的论文，只有几十页。可是，我反复推敲演算，仅报废的草稿便有七百多页。要拿出一个可看得见的成果，仅仅像一座宝塔上的塔尖。”

季羡林：十年磨一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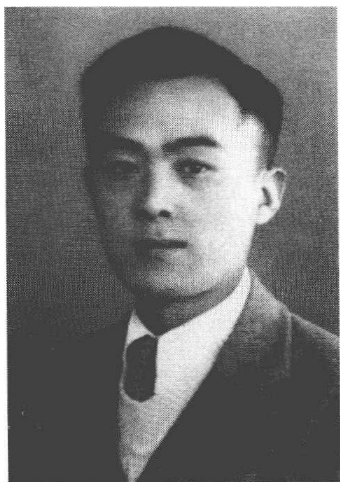
1935年9月14日，季羡林乘火车抵达柏林。彼时，他只有一个老老实实的想法：认真读点书，将来回去好挣一个饭碗。

季羡林选择了哥廷根大学，选择了梵文。导师是瓦尔德施米特（Waldschmidt 1897～1985），印度佛教史专家，精通梵文、巴利文，也擅长汉文、藏文，年纪四十不到，看上去则更年轻。当时报梵文的，仅季羡林一人。第一堂课，教授照例念字母，梵文字母啰嗦得要命，是英文、德文不可类比，但再啰嗦，也只是字母而已，13个元音，33个辅音，季羡林鹦鹉学舌，跟着导师念，并未感到多大障碍。以为就这样按部就班，循序渐进，按照《梵文基础读本》，字母下面应该讲词法与语法，谁知到了第二堂课，瓦尔德施米特撇开词法、语法，直接跳到书后的例句。梵文是印度的古代语言，属于死文字，那些练习例句，都是摘自梵文典籍，季羡林才上一堂课，46个字母还没记全，文法更是一窍不通，如今上来就念，并且要把它翻成德文——他又不是梵界的神仙！结果，读得结结巴巴，译得稀里糊涂，急得七窍生烟。过后思量，这就是瓦尔德施米特的教学法。这也是流行于德国的外语教学法。野蛮，霸道，不通人情。季羡林想起一则掌故：德国一位前辈学者如是说，教学生学外语，拿游泳作比方，就是把他们带到游泳池旁，冷不丁推下水，

倘不淹死，就算学会；而淹死的事儿，绝无仅有，甚至根本不可能。得，季羡林现在就是被瓦尔德施米特推下了水，要想活命，只有拼命扑腾——拼命预习。那真是蚂蚁啃骨头，往往耗费一个时辰，才能弄懂一个例句，花上两天时光，才能准备一堂正课。就这样，始于无奈，达于发狠，臻于自如，仅仅用了五周，便把读本后边的例句全部拿下，一整套复杂至极的梵文文法，也闹了个大概其。季羡林事后回想，觉得像有神助。

初到哥廷根那阵，季羡林曾经举棋不定，在主系的选择上，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待到后来确定梵文，两年交换期限，已过去了四分之一。尽管如此，他还是惦着拿博士学位。按照德国规定，考博士必须读三个系，一个主系，两个副系。如今，主系选定梵文、巴利文（即印度学）；两个副系，分别是德国语言学和英国语言学，到第三学期，他又放弃德国语言学，改为阿拉伯语言学。想想都令人咋舌，日月双丸一掷梭，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在以德语为背景的环境下，他要把梵文、巴利文、英文、阿拉伯文，统统织成知识的网，织成文化的锦！

那是集聚全身力量的冲刺：每天，季羡林遵循两点一线，从寄宿的住处到梵文研究所，再从研究所回住处，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读书读书读书。然而，任凭季羡林有三头六臂，两年的交换期内（1935 年 9 月至 1937 年 9 月），他决计拿不到印度学的博士学位，拿不到就是拿不到，此事非关天才天资天赋或头悬梁锥刺股，是由他的根基和学业量决定的；倘若当初主攻德国语言学或英国语言学，又另当别论。而与他同在德国的乔冠华，则用一年半就完成了博士论文：《庄子的哲学阐释》。鲁迅曾嘲讽说，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取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回国后却大讲康德、黑格尔，又令国人大吃一惊。乔冠华不在乎这个，他在乎的是时间。



1941 年季羡林在德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因此，到得 1937 年夏，眼看期限迫近，季羡林开始收拾行囊，准备踏上归程之际，这时，一件天大的坏事——日寇侵

华，济南沦陷——却从反面成全了他。因为这番变故，他变得有国难回，有家难奔；又因为这番变故，哥大汉学所雪中送炭，主动聘他为讲师。如此一来，他既解决了生计，又得以继续师从瓦尔德施米特，攻读梵文。

1938 年夏学期确定博士论文，题目为《〈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与之同时，进入瓦尔德施米特的高级讨论班，研读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1939 年 9 月，德国进攻波兰，二战爆发，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从军，退隐多年的西克教授重出江湖，再执教鞭。西克教授堪称季羡林年龄和学业意义上的双重祖父，老马嘶风，英姿未减，输肝剖胆，竭诚相教，在代课的三个学期中，他把自己的硕学——印度古代诗歌集《梨俱吠陀》与印度古典语法《大疏》以及长篇小说《十王子传》，连带绝学——吐火罗文，悉数传给了这位东方古国的青年学子。

如是又过了一年，季羡林终于完成博士论文，1940 年 12 月和来年 2 月，分别通过梵文、斯拉夫文和英文的口试。博士学位到手，季羡林首先想到的是，“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我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了。”接下来，就是筹备还乡。六年了，整整六年！“山川信美非吾土，漂泊天涯胡不归?”1942 年 10 月，他辞别哥廷根，抵达柏林，打算从那儿取道瑞士，辗转回国。孰料大战方殷，炮火连天，所有的归路都被切断，“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无奈，只得重返哥城，再续书缘。他在《留德十年》中记述：

> 我又恢复了七年来的刻板单调的生活。每天在家里吃过早点，就到高斯－韦伯楼梵文研究所去，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中午。午饭照例在外面饭馆子里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我继续钻研佛教混合梵语，沿着我的博士论文所开辟的道路前进。除了肚子饿和间或有的空袭外，生活极有规律，极为平静。……因此，我的写作成果是极为可观的。在博士后的五年内，我写了几篇相当长的论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自谓每一篇都有新的创见；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还不断有人引用。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侯仁之：塞翁失马，大器晚成

因为体弱多病，侯仁之的小学晚了几拍。结果，一步晚，步步晚，到得侯仁之研究生毕业，已经是1940年，时年二十九岁。1938年本来有留英的机会，又因二次大战的烽烟而阻隔。如此蹉跎复蹉跎，直到1946年8月，在落后前五位十一二年之后，才重续前缘，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深造。

利物浦大学不是名校，但是，没关系，侯仁之在燕大的导师是洪业，洪业的观点是“择校不如择师，择师要投名师”。根据这一师训，侯仁之此番留学，原来打算投奔的是利物浦大学的地理系主任、著名学者罗式培（Roxby）。然而，因为二战耽搁，待到侯仁之出发时，罗式培业已退休，不在岗位上了。

侯仁之是幸运的。罗式培固然优秀，罗式培的继任达比（Darby，也译为“德贝”）比他更为出色，后者开创了一门历史地理学，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方兴未艾，大有用武之地。

侯仁之决定投在达比门下攻读博士。

侯仁之似乎缺乏钱学森的那种大才，他没能用一席之辞令达比折服。作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导师，达比爱惜羽毛，对侯仁之还要放一放，看一看。换个角度考虑，侯仁之人到中年，经过在国内抗日战争的锻炼和多年摔打，他已退去火气，趋向成熟。侯仁之不急于用三言两语证明什么。达比要看，他就敞开来让他看。侯仁之每天与地理系的本科生一起听课，其余时间，则根据达比的要求，选读有关历史地理学的学术专著，提交学习心得。达比注重实地考察，他把野外作业比作散步，他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历史地理学的材料是历史的，而研究的方法是地理的，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就是重建过去的地理。正像现代地理学研究的是现代时段的地理一样，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的地理。”他又说：“理想的地理学家，应当对他的田间散步——或是城市中的散步——饶有兴趣。”达比的这种教学方法，不仅把案头的理论与田野的考察紧密结合，还使原本枯燥乏味的学术研究变得趣味盎然，生动活泼。当年在国内，在顾颉刚、洪业等老师的引

领下，侯仁之的历史学已经入门，如今再跟随达比向历史地理学的纵深开掘，他深切地感到了创新的兴奋。

一年后，侯仁之开始撰写博士论文，题目是《北平的历史地理》，材料，是在国内早就准备好的。绪论既毕，呈交达比“斧正”。达比一读之下，大为欣赏。达比看出侯仁之绝对是可造之才，而且他的论文，仅仅从绪论就可把握，对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将会有很大的贡献。达比见才心喜，这才决定担任侯仁之的导师。

两年，七百多个日日夜夜，侯仁之稳扎稳打，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那是厚厚的三大巨册，用英文打字机亲手打印，配有大量手绘的彩色插图。《北平的历史地理》是侯仁之第一部历史地理学专著，奠定了他一生学术研究的方向。

在利物浦期间，另一件事，也值得一提：侯仁之出任留英中国学生会副主席，兼利物浦分会主席，这是对他既往经历的认可——在日寇占领北平期间，他曾以“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掩护大批进步学生逃出沦陷区，奔向自由，奔向革命；也是对他热情而稳重的作风的肯定。

利物浦三年，侯仁之养成了一个习惯，一有机会，就到城里或郊外游览——用达比的话说，那是一个地理学家必不可少的“散步”。侯仁之的目光渐渐具有了双重功能，既能看到表面（地理的），又能看到纵深（历史的）。任何景物，他只消溜一眼，就能迅速演绎出它的来龙去脉。甚至闭眼不看，也能确知它的来龙去脉。这种“第二视觉”，助他在现实与历史中自在穿行。于此，《侯仁之传》的作者陈光中有一段形象的描绘：

> 不过，侯仁之并不是一个观光客，他已经开始习惯于以一个历史地理学家的目光审视周围的事物和环境，他所看到的东西显然与别人不同。有时，当他独自徘徊在国教大教堂的台阶上，俯瞰下面那座美丽的城市，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象，它在从前那些漫长的岁月中曾经是个什么模样。在凝思遐想之中，那些绿树成荫的街道、形态各异的房屋会渐渐褪色逝去，因时光的倒流而慢慢返回到一千多年前沦为丹麦海盗帝国占领地的时代、差不多两千年前被罗马人统治的时代，以至公元前地中海的伊比利亚人、比克人和凯尔特人贸

然登陆的时代。再往前去就是荒蛮的远古了，那时这里是什么样子呢？自己脚下这座不大的山丘，当时是否还只是淹没在海浪下的一块小小礁石呢？

这是一种多么有趣的遐想！

唐代陈陶的诗句：“今人地藏古人骨，古人花为今人发。”正是他此刻的写照。散步在地理之上，散步在历史之上，在过往烟云前尘息影中巡礼，一步一朵莲花，一步一个意境。

3. 剑拔沉埋

历史不能重演。

想想真是遗憾。1918 年，毛泽东也曾有意加入留学大军的行列，他已从长沙到了北京，目标是法兰西，方式是勤工俭学。到了北京，毛泽东却不走了，不走的原因，有人说是在语言，他不懂法文，有人说是在经济，他债台高筑，有人说是在私生活，他正在和杨开慧恋爱，有人说是在留学本身，他看出许多放洋回来的人“仍然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并且正好读到了胡适的《非留学篇》……不管是哪一种，反正毛泽东的思想起了变化，他到北京大学当了一阵子图书管理员，参加了北大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接触了胡适、李大钊等先觉分子，思想有了更大改观……转而掉头南下……投入到创建中国共产党和武装革命斗争的道路上去了。

假设——写文章的人有时免不了假设——毛泽东当年为留学大潮裹挟，义无反顾地走出国门，走到法兰西了呢？当他接触到欧洲文明——也是正统的西方文明——之后，对他重铸中华、再造神州的伟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积极影响呢？呵呵，这倒是一个发人遐想的命题。

本书的六位主人公都是二十世纪的玄奘，仿佛事先协商好了似的，两位赴美，两位赴德，两位赴英。探讨他们在国外求学的经历，笔者觉得，同是出国取经，拜名师与不拜名师大不一样。钱学森、陈省身、季羡林、侯仁之，无一不是冲着名师而去；黄万里自述求学经验，也是“遍访名师，勿泥于一校”；这就叫“取法乎上”，尽量“站到巨人的肩

膀上”，此乃迎头赶上，再求超越的终南捷径。杨绛是唯一没有拜名师的，不是不想，是没有条件。在这件事上，她明显吃了亏。不过也有补偿，她有钱锺书一路为伴，钱锺书对她的指点，堪比世间任何名师（只是没有正式的名分）。

再一层，同是海归，有学位跟没学位不一样，有博士学位跟没博士学位更不一样。六位主人公，五位载得博士头衔归。唯杨绛空空如也，啥洋功名也没有。这一点她注定要吃大亏，至少在当初，那时。杨绛，我们今天可以称她为大师，但是在当日，她不是胡适，不是陈寅恪，甚至也无法和钱锺书相埒，他俩站在一起，杨绛绝对要比钱锺书矮一截。因此，若是挣得一顶博士帽回来，肯定有助于她在俗世周旋——君不见那位未等博士学位到手，就急急返国出任北大教授的胡适，不也在自己的头上加了一顶预支的博士高帽么（从2010年夏因唐骏而爆出的“学历门”看，博士高帽的外延功用有增无减——笔者）！那玩艺儿终归是可以提气壮胆的。世人看到，1937年春，黄万里博士回到国内，席不暇暖，就接到浙江大学、北洋大学、东北大学的任教聘请，浙大校长竺可桢还亲自登门并宴请，邀他出任水利系主任；1937年7月，陈省身博士刚刚从巴黎动身返华，人尚在途中，就被清华聘为数学教授；1946年5月，季羡林博士从欧洲回到上海，稍后，即被北大聘为副教授，秋冬之际到任，仅一个礼拜，又被转为正教授，兼东语系主任；1949年9月底，侯仁之博士从利物浦返回燕大，担任副教授，未久，便转为正教授；钱学森博士留美未归，1947年2月，年仅三十六岁的他就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同年夏天他回国探亲，交通大学和北京大学都曾许他以要职。而杨绛女士1938年夏天回到上海，尽管也是学成归来，尽管也是装了一肚皮的学问，但是在一个高度功利化的社会，她很长时间只能靠打杂谋生：筹办母校振华中学分校，帮阔小姐补习高中课程，担任工部局半日小学的代课教师等等；建国后，和钱锺书一起进了清华，又一起转到……中国社科院，职称，最终落在了三级研究员。

这个三级，杨绛不在乎，历史更不在乎，唯有一人在乎，钱锺书。1956年，钱锺书升为一级研究员，他曾万分无奈地点着杨绛的手说：“从此你就永远是三级了！”可不是，杨绛的待遇永远定格，直至退休仍为三级。

卒章论定，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如果说六位中有谁可以被称作“大材”、“天才”，钱学森和陈省身当之无愧！

第五章　人生的那一半

1. 泛　论

恋爱是男女各自寻找人生的那一半，婚姻是合二而一，这是上帝老人家定下的规矩，换成世俗的说法，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本书六位主人公都循正常的途径发展，没有谁抱独身主义，更没有谁搞同性恋。其中，季羡林完婚最早，为 1929 年，十八岁；杨绛是 1935 年，二十四岁；黄万里是 1937 年，二十六岁；陈省身与侯仁之都是 1939 年，二十八岁；钱学森结婚最晚，是 1947 年，斯时已三十有六。

2. 婚恋面面观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列夫·托尔斯泰

季羡林：包办婚姻，一杯苦酒

季羡林六岁到了济南，住进叔父家的四合院。院子后面还有一院，两院相通，共从一个大门出入。前院住的是季家，后院住的是彭家。两家大人是同事，交情笃厚。两家小孩日常在一起玩耍，过从甚密。彭家人口众多，男孩女孩八九个，个个相貌出色，其中又以二女儿，季羡林称作“小姐姐”的，天生丽质，貌若天仙。季羡林晚年作《病榻杂

忆》，记述自己的初恋，他说：时隔八十多年，现在一闭眼，犹能看到小姐姐不同凡俗的标致形象。中国旧时代赞扬女性美有许多词句，什么沉鱼落雁，什么闭月羞花，这些陈词滥调，用到小姐姐身上，都不恰当，都有点可笑，倒是宋词里面有一些丽词秀句，可供参考。他接着举了几个例子，全部取自他熟悉的苏词，依次是："腻红匀脸衬檀唇，晚妆新，暗伤春。手捻花枝，谁会两眉颦?""嫩脸羞蛾，因甚化作行云，却返巫阳。""美人如月，乍见掩暮云，更增妍绝。算应无恨，安用阴晴圆缺。""罗带双垂画不成，殢人娇态最轻盈。酥胸斜抱天边月，玉手轻弹水面冰。无限事，许多情。四弦丝竹苦丁宁。饶君拨尽相思调，待听梧桐叶落声。"

季羡林说："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一些来，我不再列举了。我的意思无非是想说，小姐姐秀色天成。用平常的陈词滥调来赞誉，反而适得其反。倘若把宋词描绘美人的一些词句，拿来用到小姐姐身上，将更能凸显她的风采。我在这里想补充几句：宋人那一些词句描绘的多半是虚无缥缈的美人。而小姐姐却是活灵活现，真实存在的人物。倘若宋代词人眼前真有一个小姐姐，他们的词句将会更丰满，更灵透，更有感染力。"

如此美人，简直是千古难逢，绝代尤物，想必这就是少年季羡林的心中人了。然而，不，季羡林接着绕了一个大弯子，从小学、中学、大学、留洋，一路说到返国、出任北大教授兼东语系主任，阔别十二年，1947 年才有机会再次会晤小姐姐……正当读者把全副心神都锁定在小姐姐身上，等着看一番动人场面时，他老人家却把包袱一抖，亮出了真正的主角。他说，为了和心中人见面，特意想了个办法，大宴宾客，且请的全部是女性，群雌。第一个，小姐姐必须请，这是不用说的。第二个呢，则是小姐姐的亲妹妹，彭家四姑娘，平常叫她"荷姐"的。季羡林深情回忆：

> 这个人比漂亮，虽然比不上她姐姐的花容月貌；但也似乎沾了一点美的基因，看上去赏心悦目，伶俐，灵活，颇有一些耐看的地方。我们住在佛山街柴火市前后院的时候，仍然处于丑小鸭阶段；但是四姐和我的关系就非常好。她常到我住的前院北屋同我闲聊，互相开点玩笑。说心里话，她就是我心想望的理想夫人。但是，阻

于她母亲的短见，西湖月老祠的那两句话没有能实现在我们俩身上。现在，隔了十几二十年了，我们又会面了。她知道，我有几个博士学位，便嬉皮笑脸地开起了玩笑。左一声“季大博士”，右一声“季大博士”。听多了，我蓦地感到有一点凄凉之感发自她的内心。胡为乎来哉！难道她又想到了二十年前那一段未能成功的姻缘吗？我这个人什么都不迷信，只迷信缘分二字，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我们俩之间的关系难道还不是为缘分所左右的吗？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谜底揭开，原来季羡林看上的是彭家的四姑娘，但是命运作梗，结果他娶到手的却是彭家的三姑娘，也就是他后来的夫人彭德华。小姐姐（二姑娘）固然天生丽质，可惜岁数大了一些，约莫年长五六岁吧，所以季羡林的爱慕只及于姐弟情分。四姑娘呢，岁数也大，但只年长两岁，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本是一桩好姻缘，奈何月下老人系错了红绳，让他娶了老三（比他年长四岁），“多情自古空余恨”。错、错、错！莫、莫、莫！这篇拐弯抹角的《病榻杂忆》，令人油然想起陆游悼念表妹唐婉的《沈园》：“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2006 年4 月8 日，季羡林在301 医院还写了一篇短文《忆念荷姐》，此篇生前没有发表，去世后被收录外研社出版的《季羡林全集》，文章可以和《病榻杂忆》对照着看。譬如以下部分：

如果统领宇宙的造物主愿意展示他那宏大无比的法力的话，愿他让我那在济南的荷姐仍然活着，她只比我大两岁。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经常想到荷姐。一转眼，她的面影就在我眼前晃动，莞尔而笑。在仪态上，她虽然比不了自己的胞姐小姐姐的花容月貌；但是光艳动人，她还是当之无愧的。

话头一开，就要回到七八十年前去。当时我们家同荷姐家同住一个大院，她住后院，我们住前院。我当时是一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子，语不惊人，貌不逮众，寄人篱下，宛如一只小癞蛤蟆，没有几个人愿意同我交谈的。只有两个人算是例外。一个是小姐姐，一个就是荷姐。这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

到了1929年，我十八岁了。叔父母为了传宗接代，忙活着给我找个媳妇。谈到媳妇，我有我的选择。我的第一选择对象就是荷姐。她是一个难得的好媳妇：漂亮、聪明、伶俐、温柔。但是，西湖月老祠对联的原一联是：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我同荷姐的事情大概是前生没有注定，终于错过了姻缘。

……

这一年和下一年——1947年，我都在北大教书。一直到1948年（应为1947年——笔者注），我才得到一个机会，搭乘飞机，飞回济南。我已经离家十三年（应为十二年——笔者注）了。这一次回来，也可以说是一享家人父子之乐吧。

荷姐当然见到了。她漂亮如故，调皮有加。一见我，先是高声呼叫"季大博士"。这我并不奇怪，我们从小互相开玩笑惯了。但是，她接着左一个"季大博士"，右一个"季大博士"，说个不停。这就引起了我的疑心。我悚然听之，我猛然发现，在她的内心深处蕴藏着一点凄凉，一点寂寞，一点幽怨，还有一点悔不当初。一谈到悔不当初，我就必须说，这是我们自己酿成的一杯苦酒，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品尝。在这里，主要当事人是荷姐本人，我一点责任都没有。

从此以后，就同荷姐失去了联系，到现在已经快六十年了。其间，我曾由李玉洁陪伴回济南一次，目的是参加山大校庆。来去匆匆，没有时间去探寻荷姐的行踪。到了今天，又已经过去了几年。看来，要想见到荷姐，只有梦中团圆了。

客观说，彭德华长得倒也端正，秉性尤其敦厚，但不及四姑娘活泼，文化水平也低。在季家，这事是由叔父拍板，季羡林有口难言，发言权一般和独立权成正比，他寄食篱下，仰人鼻息，发言权等于零。于是，1929年，季羡林十八岁，还在上高三的当口，就奉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彭德华成婚。

婚后的日子，苦闷多于欢乐。且看季羡林在《清华园日记》中的披露：

家庭，理论上应该是很甜蜜，然而我的家庭，不甜蜜也罢，却

只是我的负担。物质上，当然了，灵魂上的负担却受不了。(1933.3.3)

说实话，家庭实在没有念念的必要与可能，但心里总仿佛要丢什么东西似的，惘惘地，有醉意。(1933.8.9)

家庭对我总是没缘的，我一看到它就讨厌。(1934.4.18)

非走不行了——我希望能永远离开家庭，永远不回来。(1934.4.19)

……想到将来……前途仍然渺茫，而且有那样一个家庭，一生还有什么幸福可说呢？(1934.5.6)

"……使我最不能忘的（永远不能忘的）是我的H（即彭德华——笔者注）。竟然（经过种种甜蜜的阶段）使我得到der Schmerz（痛苦）的真味。我现在想起来仍然心里突突地跳——虽然不成的东西，也终于成了东西了。"（自序，1932年9月13日晚记）

季羡林的包办婚姻，令人想起鲁迅，鲁迅在痛苦中选择与发妻朱安"分居"，媳妇是母亲娶的，就让她跟母亲过；又令人想起胡适，胡适对江冬秀选择了默认，他的名言是"先结婚后恋爱"，偶有外遇，也是"有贼心，没贼胆"。季羡林呢，恪于对叔父的敬畏和传统礼教，表面上始终勉强维持，但其内心，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极为痛苦的。

这一杯苦酒，酿下了诸多后患，季羡林晚年的若干疑云、风波，认真追究起来，莫不与婚姻的缺陷有关。

杨绛：佳人才子，珠联璧合

杨绛的爱情，可遇而不可求。

杨绛在东吴念书，坊间传闻追求她的男同学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杨绛后来在小说《洗澡》中，也用了孔门弟子这个典故，可见斯说由来有自，绝非空穴来风。然而，若干又若干年后，当吴学昭问她："您在东吴是不是收到许多情书？"杨绛断然摇头，她说："从没有人给我写过情书，因为我很一本正经。我也常收到男同学的信，信上

只嘱我‘你还小，当读书，不要交朋友’，以示关心。有一次，一个男同学假装喝醉了，塞给我一封信。我说，‘你喝酒了，醉了？———信还给你，省得你明天后悔。’这人第二天见了我，向我赔礼，谢谢我。”

1932年春，自重自爱的杨绛进入清华，借读大四最后一个学期。那时清华女生很少，像她这般才貌双全的，自然如林妹妹入大观园，牵动八方视线。杨绛进清华不久，经人介绍，结识了大才子钱锺书。有人说他俩是一见钟情，杨绛否认，她晚年回忆：

> 1932年3月，在清华古月堂门口，第一次和锺书见面，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在这之前，有人告诉我钱锺书已与叶恭绰的女儿叶崇范订婚。我曾听姐姐们说，这位叶小姐皮肤不白，相貌不错，生性大胆淘气，食量颇大，绰号“饭桶”（“崇范”二字倒过来），是以觉得钱锺书和这位淘气的“饭桶”不配，仅此而已。

在钱锺书，绝对是一见倾心。钱锺书随后给杨绛写信，约她在工字厅见面。杨绛应约而去，这就迈出了第一步。当日，两人坐在一张大桌子边上，斜对面。钱锺书急不可耐地澄清一个事实：外面有人说我已和叶崇范订婚，这不是事实。杨绛也趁机申明：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第一次约会，两人如此快速地撇清自己，说明丘比特的金箭，已经在暗中把他俩瞄准了。

从此开始了频繁交往，除了约会，就是通信，钱锺书的信写得很勤，往往一天一封。清华园才有多大？约会之外，还用得着天天写信？这你就老外了。情话是诉诸耳朵，情书是诉诸心灵；当面时不方便出口的，可以借助笔尖流淌，哗哗地，而且是用英文，既高雅，又时髦，半是展示，半带炫耀。

杨绛犹豫，这进度是不是太快了点？嗯，说快其实也不快，她是以在东吴的荒废为代价；杨绛在东吴目不斜视，峻拒了多少献殷勤的白马王子，岂不是就等的这一天！

杨绛的好友吹冷风，说钱锺书怎么狂，怎么傻，长相又是怎么怎么不好。说都白说，杨绛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是自我感觉，这就像写文章，关键在于灵感是否敲门；杨绛感到脸颊无故发烫，心旌无风自摇，

爱情的玫瑰花，已在暗中羞答答地绽放。

转眼学期终了，杨绛的借读宣告结束。钱锺书给她出主意，要她留校补习，然后报考清华研究院，一旦考上，两人就可以再同学一年，那有多好！杨绛缺乏勇气，清华本科四年的文学课，一两个月怎能补齐？她回去了，先回苏州，后到上海，找了一家小学教书。钱锺书尝到了失恋的滋味，肝肠寸断，他写了许多哀怨的诗，寄给杨绛。比如：

著甚来由又黯然？灯昏茶冷绪相牵；
春阳歌曲秋声赋，光景无多复一年。

海客谈瀛路渺漫，罡风弱水到应难；
巫山已似神山远，青鸟辛勤枉探看。

颜色依稀寤寐通，久伤沟水各西东；
屋梁落月犹惊起，见纵分明梦总空。

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风声恻恻寒；
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
苦雨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峥嵘万象付雕搜，呕出心肝方教休；
春有春愁秋有病，等闲白了少年头。

这是害了相思病了。

换个角度看，这是更具威力的进攻。

大爱在前，真爱在前，杨绛还有什么好犹豫？她只有束手就降——世界上最心甘情愿，而又虽输犹赢的投降！

1933年初，清华放寒假，钱锺书到苏州看望杨绛。杨绛把钱锺书介绍给爸爸杨荫杭，这是把问题挑明了。杨老先生同钱锺书单独谈了一次，结论是："人是高明的。"

钱锺书从杨绛那儿得悉她爸爸的表态，知道老人认可自己，不等与杨绛商量，就拉了自己的父亲钱基博，到苏州拜访杨绛的爸爸杨荫杭，并挽出杨荫杭先生的好友二人，做男女双方的媒人。杨荫杭对钱家父子登门求亲毫无思想准备，他以为是杨绛本人同意了的，只得尊重女儿自己的选择。

1934 年暑假，钱锺书大学毕业，钱家要求举行订婚礼。杨家倒也痛快，只是因为杨荫杭先生身体欠佳，诸事从简。钱基博夫妇由儿子锺书和他的三弟以及侄女陪同，从无锡赶到苏州，在一家饭馆摆酒宴请两家的亲朋好友。杨绛这方面前来祝贺的，有清华同室好友赵萝蕤，以及她的未婚夫陈梦家。

从此，杨绛就是钱锺书的未婚妻了。

与此同时，杨绛在钱锺书的辅导下，顺利通过清华研究院的入学考试，成为清华外国语言文学部的研究生。

杨钱之恋，有一支插曲脍炙人口。说的是未订婚之前，杨绛与钱锺书通信，有一封，落在了钱基博老先生（1887～1957）手里。血忽然往上涌，好奇心让老夫子变成间谍，他悄悄拆开一看，禁不住眉飞色舞。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老先生击节赞叹："此诚聪明人语！"在钱老先生看来，杨绛思路周密，遇事能为各方面考虑，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再好不过的内助。钱老先生兴从中来，顾不上征求儿子的意见，提笔便给尚未见过面的杨绛写了一封信，夸奖之余，更郑重其事地把儿子"托付"给她。

既是自由恋爱，又循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杨钱两家，真正是"皆大欢喜"。

黄万里：五百年修得同船渡

黄万里的爱神迟迟没有来敲门，大学时没有，留学时也没有。1937 年春天，黄万里结束留美生涯，乘海轮返回祖国，途中经过日本，在横滨停留两天。从横滨上来了一批女孩子，中国人，学校放春假，结伴返家。她们打黄万里身边一旋而过，嘁嘁喳喳，目中无人；她们哪里会注

意黄万里呢。黄万里的心却急速抖动了几下，这是丘比特在弯弓搭箭了。他看到其中的一位女孩，宛然他的梦中情人，一颦一笑，都使他身似浮云，心生彩翼。船中接触两日，黄万里确信自己爱上了她。恋爱中的人是勇敢的，黄万里不仅打听到她的名字，叫丁玉隽，家在南京，还要到了她家的地址。船泊上海，黄万里下船前，对丁小姐说："我要去南京看你。"

黄万里说去就去了。几天后，他便提着旅行箱，敲响了丁小姐的家门。丁小姐觉得这人挺有意思，说来就真的来了，免不了款以香茶，留他侃了一会儿大山。黄万里得寸进尺，隔天又去敲门。这天机缘不巧，恰逢丁小姐的爸爸在家。老人家一看来了一个陌生的男青年，赶忙把女儿叫到一旁，问她这人是谁，女儿说是在船上新认识的，老人家又问他是哪里的人，女儿答说上海人。老人一听，马上拉下脸："哎哟，上海人是靠不住的，你怎么随随便便就让他到家里来?"说罢，不等女儿反应，就走到客厅，向黄万里下达了逐客令："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

丁小姐的爸爸不是一般角色，他叫丁惟汾（1874～1954），祖籍山东，同盟会创始人之一，辛亥革命元老，时任民国政府监察院副院长。丁老先生不喜欢上海人，这是由来已久的。据丁玉隽后来解释："我父亲跑的地方很多。那时不少上海人歧视外地人，对他曾有过不友好的对待。所以，他对上海人印象很不好。"

黄万里不会就此却步，他居然设法结识了丁小姐的姐夫，请他帮忙做工作。丁老先生依然不同意，理由只有一条：上海人滑头滑脑，靠不住。黄万里转而向也是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中坚的父亲黄炎培求助。黄炎培问明情况，知道是丁惟汾的女儿，儿子既然看上，老子就得鼎力相助。黄炎培懂得堡垒要从内部攻破，他于是找了丁惟汾的秘书陈希豪，这个人既是丁惟汾的心腹，也是黄炎培的深交，请他出面疏通。陈希豪摸准丁惟汾的脉搏，找机会向老人家进言，这个黄万里，不是您印象中的那种上海人，他诚信笃学，绝对可靠，再说，他是黄炎培的公子，您还不相信黄先生的家教么。丁惟汾觉得有理，答应和黄万里面谈一次。这就是松口了。黄万里得着"面试"机会，自然精心准备。谈话结果，丁惟汾觉得黄万里"挺老实"，"不像滑头滑脑的上海人，倒很像我们山东人"。这就是完全认可了。

同年7月，抗战爆发，上海开战，南京政府准备撤退，丁玉隽从日



1937 年新婚的黄万里夫妇在武汉到重庆的轮船上。

本返国，随全家上了庐山。不久，黄炎培也因公事上了庐山。两家老人在庐山见了面。用今人眼光看，两位老爷子其实是局外人，但在那个时代，他们还拥有一言九鼎的“父母之命”。因此，在庐山，两位老人投下庄严的一票：认同儿女亲事；鉴于时局紧张，兵荒马乱，干脆让黄万里和丁玉隽尽快完婚。

据丁玉隽回忆：“当时黄万里已经在四川水利局找到工作，要去四川。他开着他父亲的破吉普车来庐山与我结婚。由于是在战乱，婚礼很简单。当时黄老先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已从南京迁到武汉。婚礼后，我们也要路过武汉去四川。本来那是一辆破汽车，可黄老先生舍不得，就让他把车开到武汉。然后他开着车，过了九江，但车开到长沙坏了，没法再修，就把车丢在了长沙。之后我们从长沙坐火车到武汉。”

这就是一对年轻人在兵荒马乱中的蜜月。

陈省身：平淡开头，美满结局

数学家怎么恋爱，想必不是畅销书的题目，君不见世人炒这星那

星，这家那家，有几人炒数学家？网上关于数学家的爱情，也是说他们把女友的雀斑当成小数点，这完全是一派挖苦。有一篇甚至说：“研究数学是一件冒险的事，古往今来，多半数学家得不到美满的婚姻，终生未娶的不乏其人……”

那么陈省身呢？

陈省身在南开没有坠入情网，谢天谢地，那时他还小。陈省身在清华仍旧没有涉足爱河，这时他才华横溢，相貌堂堂，本来正是时候；清华并不是没有女生追他，按女生的绝对人数计算，还不老少。但是陈省身心里没有女子，只有算学。代数是他耳鬓厮磨、窃窃私语的密友，几何是他废寝忘食、神魂颠倒的情人。

陈省身所在的清华研究院数学系，有四位教授，他们是：熊庆来、杨武之、孙光远和郑桐荪。作为晚辈后学，陈省身免不了常去串门，串门又免不了引出故事。前面三位暂且不表，这里单说郑桐荪。郑教授是江苏吴江人，夫人曹纯如是浙江南浔人，这么说你可能印象不深，莫如加一句，著名南社诗人柳亚子，是他的妹夫，他本人也是诗词专家，年轻时，经常和苏曼殊、柳亚子等唱和。郑桐荪有一个女儿，名士宁，1915 年生，读中学，继而考进燕大，读生物。陈省身去的次数多了，郑家的小妹妹总是见到的，但是若问他印象如何，他只记得是个小姑娘，小多少，相貌如何，性情如何，绝对是一问三不知。

陈省身没有往心里去，郑家却是看上了陈省身，有意招为东床。说话到了 1934 年，陈省身负笈汉堡。一天，云外飘来一封信，发信人是杨武之，谈的不是几何，不是代数，而是郑桐荪教授的女儿郑士宁。杨先生说：“人么，你原来是认识的，现在，她父亲有意让你和她发展关系，你是否愿意先通通信？”哈，杨先生这是当红娘了。杨武之即为后来诺奖得主杨振宁的父亲，时任清华研究院数学系代理主任，陈省身此番到德国留学，从推荐到办手续，全仗杨先生鼎力协助。因此，面对恩公的美意，陈省身爽快地回复：“通信当然可以。”

杨先生的这根红线，就算搭起来了。

都说诗人的情书是 1 + 1 = 3，那么数学家的情书呢，笔者没有见到，不好说，反正不是 = 2。人在恋爱时不需要数学，相思一夜情多少，谁能计算得出，人品、人格、才华的分量几许，魅力又几许，唯意会而不能言传。1937 年夏，陈省身怀揣博士文凭回国，被聘为清华数学系

教授，这就和郑桐荪、杨武之诸位师长成了同事。陈省身抵达国内，适逢“七七事变”，清华举校南迁，在湖南长沙设立临时大学。陈省身赶到长沙，和郑桐荪全家相见。这时，他和士宁之间，已经是“你有情我亦有意”，只差捅破一层窗户纸了。杨武之看在眼里，索性好事做到底，他主动出任介绍人，并拉了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加盟，就在长沙临时大学，为陈省身和郑士宁证婚。

临时大学的环境极端简陋，可这不妨碍陈省身和郑士宁的证婚隆重举行。多年之后，许多人依然记得这则佳话。徐贤修曾经写道：“郑桐荪先生治家甚严，女公子士宁，在清华园有淑女之称。婿陈省身先生在清华为第一届研究生时即才华照人，为一出类拔萃之数学家。1937 年归国后任清华教授。郑先生选为东床，固深知陈先生必为举世皆知之数学大师。”

1939 年 7 月，陈省身和郑士宁在昆明完婚。新房设在西南联大附近的一座小楼，楼下住着数学教授姜立夫，楼上原来住的是物理教授饶毓泰，恰巧饶毓泰去上海探亲，便让出一间厢房给陈省身夫妇。他们就此安定下来，生活虽然拮据，却也过得有声有色。

婚后，陈省身继续他的教学和研究，郑士宁则当起了贤内助。郑士宁学的是生物，为了照顾丈夫，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和许多个人爱好。无论陈省身要做什么事，她都承担起后勤的重任。有时，陈省身要在家里款待同事与学生，她都会精心安排好烹饪的一切事宜，虽然在战时，一切从简，但她都尽心尽力地照顾好每位客人，让大家满意。这样，陈省身根本不用花任何时间考虑日常琐事，可以全身心地思考他的数学问题。

对于婚姻，陈省身没有刻意追求，一切都在平淡的状态下完成，结局却是十分美满，他晚年回忆这一幕往事，不无感激地说：“武之先生促成我的婚姻，使我有一幸福的家庭。”

侯仁之：跑和跳的故事

侯仁之的长跑在燕大所向披靡，谁和他一起比赛，谁就成为他速度的反衬。但是换一个项目，比如说跳，他就未必能称雄。这里说的是另

一种跳，跳级。侯仁之跑得快，敌不住有人比他跳得快，谁？张玮瑛。

张玮瑛1915年生于天津，小侯仁之四岁，父亲是位名医，曾留学法兰西和德意志，母亲是位知识妇女，担任过天津广东中学董事，女青年会干事。张玮瑛天性聪慧，她读书早，加之跳级，三跳两跳，十六岁，就跳进了燕京大学中文系。读得好好的，又要跳，不，改。第二年，她转到了历史系。

“是否因为侯先生在历史系，您才和他转到一起的呢？”这是任何人都会涌起的疑问。2009年2月12日，笔者曾当面向张玮瑛老人请教。“哪里，”老人说，“我是1931级，转到历史系读二年级，侯先生是1932级，读一年级，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我那么做，纯粹是出于喜欢。”

同在历史系，一个是小“师姐”，一个是大“师弟”。燕大历史系有一位名师：洪业。洪业先生开讲座，关于史学方法，地点在现今北大的俄文楼，当时叫适楼，教室在一层。上课时，张玮瑛人小，个子矮，喜欢坐一排。侯仁之总是坐二排，紧挨在张玮瑛的身后。头一掉，就认识了。两句话一搭，就熟悉了。张玮瑛虽然是“师姐”，因为刚从中文系转过来，历史知识，并不比侯仁之强，偶尔还要请教。侯仁之虽然是“师弟”，因为爱好文学，和张玮瑛也有得一谈。这就是缘。张玮瑛深情地回忆：“共同的课业和志趣使我们逐渐接近起来，课余有时在适楼南门外会面，而最常去的地方自然是图书馆。从图书馆出来，仁之总是先送我回到女生二院，再返回未名湖北岸的男生宿舍。”

1935年，张玮瑛本科毕业，继续读研究生。1936年，侯仁之本科毕业，留校给系主任顾颉刚当助教，协助开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课。做法是，每隔两个星期，周六，带学生到天坛、长城、西山等处实地考察。张玮瑛和侯仁之都是成员。每次出发前，侯仁之总要根据参考资料，把目的地一带的景观、建筑、历史沿革等等，整理清楚，油印出来，发给大家。顾先生很是欣赏。张玮瑛和侯仁之也在实地考察的过程中，加深了理解和友谊。

至于两人究竟在何时何地走到一起？张玮瑛老人说：“那是很长很长的啦。”其间有段小花絮：张玮瑛有个姐姐，也在燕大读书，她姐姐的男朋友，正跟她父亲学医，一次到燕大，听说侯仁之，就想当面见见。谁知侯仁之躲起来了，玮瑛到处找，愣是找不着，急得哭鼻子。侯

仁之自觉是个穷学生，在准岳父的弟子，也是准姐夫前露怯，在张玮瑛面前可是勇敢十分。总而言之，爱情是不问年龄、年级的，侯仁之这位大“师弟”，通过课外接触，看上了张玮瑛这位小“师姐”，于是就拿出长跑冠军的劲头，拼命追。过程都被当事人密锁在心底，他们的爱情博物馆没有对公众开放，世人如今知道的，只是确凿无疑的结果："跳”得快的张玮瑛，最终还是被“跑”得快的侯仁之“追”上了——1939年8月7日，两人在燕大临湖轩喜结良缘。鉴于国难当头，一切从简，证婚人是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嘉宾只有导师洪业夫妇和李荣芳夫妇。

2009年2月12日，在北大燕南园61号，侯仁之先生家的客厅，张玮瑛女士还向笔者透露了一个细节：有家出版社要出版侯老的博士论文，那是1949年，在利物浦大学用英文写的，这些天，她正在帮助整理，主要是从文字上把把关。笔者禁不住心头一震，两位老人携手走过了七十载，如今到了望百之秋，犹在心心相印，相濡以沫，这样的好姻缘，岂不是胜过神仙。

钱学森：神奇姻缘，天作地合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和蒋英的父亲蒋百里（1882～1938），同时就读于杭州求是学堂，然后又同往日本留学，归国后又同赴北京，在北洋军阀袁世凯手下做事，前者在教育部，后者在总统府军事处，人说人生有此一“同”，就是前世的缘分，两位有此三“同”，自是缘上加缘。

钱蒋两家通好，亲如兄弟。钱家自始至终就一个儿子——钱学森，一枝独秀。蒋家接二连三生了五个女儿，五朵金花，分别是蒋昭、蒋雍、蒋英、蒋华、蒋和。钱学森十多岁的时候，一天，钱家对蒋家说："你们家太热闹，我们家太冷清，干脆把你们的女儿分一个给我们，怎么样?”蒋家不假思索，回答道：“可以呀，你们要谁，随便挑。”钱家于是挑了1919年出生的老三，就是蒋英。

这不是开玩笑，双方都动了真格，有证人，有仪式，连名字也给改了，蒋英改成钱学英。鉴于英子年幼，不能独立生活，蒋家索性让保姆跟她一起入住钱家。

然而，过了一段日子，蒋百里夫妇醒过闷来，家中陡然少了一个孩子，一块心头肉，越想越不是滋味。蒋家转而向钱家要人，钱家说："人可以让你们领回去，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们这个老三，现在是我们干女儿，将来要给我们钱家当儿媳妇。"

这不过是说说罢了。英子还小，将来的事，且待将来再说。蒋英这就又回到了父母身边。钱学森彼时正在读中学，读完中学又到上海读大学，读罢大学又要去美国深造。那时两家都迁到了上海。钱学森出国前夕，蒋家为他送行。蒋英也来了，她弹得一手好琴，唱得一嗓子好歌，该表演的，都表演了，该说的，却是一句没出口。她年方十六，人生大事若明若暗，她还有的是考虑的时间。

钱学森远走美国。蒋英不久也踏上了留学之途，她去的是德国，学的是音乐。同是在异邦，同是在求学，何时学成归来？儿时双方大人的许诺能否兑现？终归还是一个谜。

留学期间，钱学森和蒋英并无联系。有联系的只是两家大人。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当年颇得鲁迅（1881～1936）的欣赏。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是民国最负盛名的军事战略家，陆军上将；他在1937年发表的"国防论"中，提出完备的对日持久战计划，比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早了整整一年。钱均夫和蒋百里同居沪上，又同存了儿女姻缘的心思，日常交往频繁。1936年，蒋百里夫妇前往欧美考察军事，特意前往加州理工学院，看望在那里读博的钱学森，并送他一帧蒋英的玉照。

爱情是不计千山万水的无线电。爱情注定是两人共用一台电脑一个软件一只鼠标（原谅我这儿用今日的物象作喻——笔者）。1946年，蒋英结束在欧洲的学习，回到上海。又一年，旅美十二载的钱学森回沪探亲。"山中桂树自有枝，心中方寸自相知。"你想呀，钱学森这时三十有六，蒋英这时二十有八，都早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如果没有一根红线在暗中维系，两人能坚持这么久的单身吗？

但是，据蒋英回忆，一开始双方并没有把事情捅破，钱学森只是常去她们家玩，有人建议，让她们为钱学森介绍对象，蒋家姐妹存了心，真的给他介绍了一个，钱学森看也不看，只是一个劲地往她们家跑，说是看蒋伯母（蒋百里已经去世），看老三。嘁，老三下面明明还有老四、老五，钱学森的眼里就只有老三。蒋英看得出来，钱学森是个书呆

子，没有一点与女孩子打交道的经验。他不懂得女人要追，孔雀开屏貌似吸引其实是追逐。也不懂得向女人献花，献香献色其实献的是心。

摊牌的时刻终于到了。一天，钱学森鼓起勇气对蒋英讲："你跟我去美国吧！"就这一句，再无下文。蒋英当然明白钱学森的意思，明白了又怎么样，总不能立刻就说"好吧"，她镇静心神，故作迟疑，说："我为什么要跟你去美国？我还要一个人呆一阵，咱们还是先通通信吧。"钱学森急了："不行！不行！现在就走！"这句话，他翻来覆去地说了好几遍。嗨，遇着这样的"宝"哥哥，你让人怎么办？蒋英没辙，只好红着脸答应："好吧。"

事情就这样"水落石出"，不，水到渠成。1947年8月30日，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沙逊大厦结为伉俪。按照主持人的吩咐，首先由新郎、新娘宣读誓词。

钱学森宣读的是：

> 我钱学森，真诚地爱慕蒋英女士的品格及其才华，我愿娶她为妻。我将尊重蒋英女士的独立人格，并平等地对待她。在我有生之年，我将与蒋英女士同甘共苦。这就是我对蒋英女士发出的神圣誓言。

接下去由蒋英宣读：

> 我蒋英，愿意选择钱学森先生做我的丈夫。今天在家长及众位亲友面前，我庄严承诺——不管将来我们的生活遇到什么样的曲折，我给钱学森先生的爱情将永无改变。我永远是他的好妻子。

这场面有点像教徒在上帝面前宣誓，恋爱中的人心头都有上帝，恋爱中的人自己也都是神，如果有谁把他俩的誓词抄下来，供后来的、后代的恋人们使用，绝对是圣经宝典。

3. 生命长河的堤岸

钱锺书曾用一句话，概括自己和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杨绛认为，这是来自实际生活的一种切身体会。妻子、情人、朋友，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杨绛举例，有一位英国作家谈及自己的美满婚姻，说：1.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2. 我娶了她几十年来，从未后悔娶她；3. 也从未想要娶别的女人。杨绛曾把这段话读给钱锺书听，钱锺书回答："我和他一样。"杨绛说："我也一样。"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杨绛与钱锺书是天设地造的绝配。胡河清有一番妙喻："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锋刃。"

与杨绛、钱锺书不相上下的，是钱学森与蒋英伉俪。一是青梅竹马，二是在各自的领域都出类拔萃，三是共同爱好音乐，四是性格互补。钱学森内向，沉默寡言，埋头工作，不喜运动，不善交际，蒋英开朗活泼，热爱运动，善于人际沟通，她的到来，为钱学森的生活带来了明媚的阳光。据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采访，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加州理工学院优秀的男性全都对她着迷不已。钱学森的一个朋友，在给冯·卡门的一封信里甚至夸张地写道：'我们全都爱上了钱太太！'"数十年后，曾有记者问及钱学森的婚姻："钱伯伯，如果要给您和蒋伯母的爱情取个名字，应该叫什么好呢?"钱学森想了想，笑道："科学与艺术在爱情上最完美的结合。"

黄万里的恋爱是一出戏剧，一见钟情，一波三折，柳暗花明。陈省身的恋爱是一篇散文，顺其自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侯仁之的恋爱似霏霏春雨，润物细无声，悄悄地濡湿你的发鬓，你的衣角，直达你的心田。婚姻的质量，就是生活的质量。美满的婚姻给了他们生命无穷的活力，即使在阴霾的时日，心头也有阳光照耀。

季羡林有过初恋，不，仅仅是暗恋，结婚之前，他既没有女朋友，更没有写过情书，结婚之后，也是分居多于聚首，孤寂压倒温馨，这样的人生是有缺憾的。妻子的忠诚、淳朴、勤劳，自然没的说，无奈一个读书人向往的红袖添香、举案齐眉，俱成画饼，自由恋爱的罗曼蒂克，更是不落一毫一分。难怪季羡林晚年为《新民晚报》写“人生漫谈”，写了三十多篇还没有碰爱情这个题目，后来实在越不过去，写了三篇短文交差——行文空洞，思路晦涩，说来说去总不得要领。

如果要给六人的婚姻打分，杨绛、钱学森可得满分，陈省身、黄万里、侯仁之都在95分以上。季羡林呢，那就难说了，当他心绪恶劣的时候——观之他在《清华园日记》中透露的苦闷——简直不及格；而当他心绪“阴转晴”的时候，得分就要高得多，比如当妻子去世，一切都成了怀念之后，距离拉远，视觉、心态就大变，1995年，他在《我的妻子》一文中表白：

德华天资不是太高，只念过小学，大概能认千八百字。当我念小学的时候，我曾偷偷地看过许多旧小说，什么《西游记》、《封神演义》、《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七侠五义》、《小五义》等等都看过。当时这些书对我来说是“禁书”，叔叔称之为“闲书”。看“闲书”是大罪状，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不但我，连叔父的女儿秋妹都偷偷地看过不少。她把小说中常见的词儿“飞檐走壁”念成“飞腾走壁”，一时传为笑柄。可是，德华一辈子也没有看过任何一部小说，别的书更谈不上了。她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她根本拿不起笔来。到了晚年，连早年能认的千八百字也都大半还给了老师，剩下的不太多了。因此，她对我一辈子搞的这一套玩意儿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她似乎从来也没有想知道过。在这方面，我们俩毫无共同的语言。

在文化方面，她就是这个样子。然而，在道德方面，她却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上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她对待任何人都是忠厚诚恳，从来没有说过半句闲话。她不会撒谎，我敢保证，她一辈子没有说过半句谎话。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

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

这最后一句：“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张柯先生认为，“这是地地道道的‘封建标准’，属于季羡林的幽默与调侃，千万不能当真。”（见济南出版社《济南走出个季羡林》）笔者深以为然。

谁个鞋子的合适程度，谁的脚最知道，别人只能大略估计。综合前因后果，并参照胡适的婚姻给季羡林打分，应是在 80 分上下。

中篇



落日鎔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
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
許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第豈
無風雨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
朋詩侶 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
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捻金雪
柳簇帶爭濟楚如今憔悴風鬟
霜鬢怕見夜間出去不如向簾
兒底下聽人笑語

易安詞永遇樂
千古名作 庚寅秋月
[illegible]書於京華



第六章　建国分水岭

1. 泛　论

六位主人公都是诞生在宣统三年（1911），正宗的大清国子民；因此，季羡林常常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那一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是以陈省身又别号“辛生”。辛亥革命标志着改朝换代：清王朝至此寿终正寝，转年（1912），中华民国肇始。六位的小学、中学、大学、留洋……都是在民国的天空下完成的——不管他们承认不承认，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民国的印记。民国的创始人为孙中山，执政的是国民党。1925 年孙中山逝世，蒋介石逐步篡夺党政大权。蒋介石建立的是一个独裁、腐败的政府，在和以毛泽东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中，无可挽回地走向败落。1949 年 4 月 2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宣告蒋家王朝在大陆的覆灭（蒋氏率残部窜守台湾）。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是新的一轮改朝换代，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为“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一件大事。每个人，包括六位主人公，都将在它的面前接受严峻的考验。

2. 历史的转折关头

生活的难处就在于选择。

——穆尔《折枝》

侯仁之：一滴浪花跃入大海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北平沦陷，北大、清华等高校纷纷南迁，有一所高校原地未动，这就是燕京大学。燕大坚守北平，曾引起爱国师生的指责，但由于它是教会学校，有美国做背景，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做校长，在门口悬挂美国国旗，阻止日军入内——无形中，倒成了北平城自由的“孤岛”，华北地下抗日运动的一个堡垒。

司徒雷登这个人，由于他的美国国籍，更由于毛泽东1949年发表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仿佛成了反派人物。其实他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大学校长。闻一多先生曾如此评价：“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也就在1937年，侯仁之由顾颉刚教授的研究生，转至洪业教授名下。1938年，洪业安排他去英国深造，因为二次大战的阻隔，未能成行。1940年，侯仁之研究生毕业，留校任助教，为校长司徒雷登看中，任命他为“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主席是夏仁德（Randolph Sailer，1891～1981），一位美国人，心理学教授，此公一贯支持中国学生的爱国行动，支持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举例来说，他开列的心理学参考书，居然包括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

就在燕大这个民间组织的副主席任上，侯仁之利用“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为掩护，和北平的中共地下党人密切配合，先后帮助三批爱国学生秘密离校，前往大后方和解放区。这是侯仁之生命中极光彩的一笔，正如他后来所说：“他们离校后的经历虽然各不相同，但每个人都在抗日救亡以及新中国的建设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宣战，燕大被日军封杀。侯仁之为日本宪兵队逮捕，一度和孙以亮（即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关在一起。

1942年，侯仁之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罪名是“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稍后，司徒雷登和夏仁德也遭日军逮捕，抗战胜利后方获自由。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侯仁之受司徒雷登邀请，参与燕大复校工作，是五人委员会成员之一，另外四人是陆志韦、洪业、林嘉通和蔡一谔。1946年8月，侯仁之赴英国留学。

侯仁之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倾向革命，追求进步，在英国读博期间，一直和中共党人保持联系。他担任副主席的留英中国学生会，主席曹日昌，就是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9月初，侯仁之学成返国，持的就是中共旅英党组织的介绍信。按照信上的地址，侯仁之到香港下船，乘车至九龙，找新华社驻港机构接头，然后由他们安排乘船北上。当时国民政府溃退台湾，残余队伍仍盘踞在沿海岛屿，船过台湾海峡，进入人民解放军控制的范围，侯仁之按捺不住满腔的激动，在甲板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欢呼胜利回到祖国的怀抱。笔者在侯先生的影集看到两张照片，摄的就是当时的情景。画面上，侯仁之身着毛衣、西装短裤，手持讲稿，面对同样心潮澎湃的乘客，慷慨激昂，振臂高呼。

1949年9月27日，侯仁之几乎是踏着建国大典的鼓点，返回北京——也就从那一天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并更名为北京。三天后的10月1日，侯仁之偕夏仁德教授，作为燕京大学的代表，出席了天安门广场的开国大典。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政治待遇，是新生的共和国对他的接纳和肯定。当天晚上，侯仁之和夏仁德返回燕园，立刻被欢呼的群众簇拥进了大礼堂。侯仁之回忆说：

> ……燕京大学的人非要叫我做报告不可。在大礼堂，灯全都灭了，只有一个电灯照着我，叫我一个人站在台上讲。那么多群众出来，那么多！你看过去受压迫，受迫害，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大家多么高兴！新中国刚刚成立我就回来了，我激动极了！那天把我的感想在大礼堂讲了，大家和我一样激动啊！

重新回到燕园，风光依旧，人事面目全非。建国初期，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著名的，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土地改革等等。具体到燕大，根据教会的特殊背景，则以“控诉美帝文化侵略，肃清亲美、崇

美、恐美思想”为主。人人洗心革面，个个脱胎换骨。紧接着，又展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别其名曰“洗澡”。杨绛1987年出版的中篇小说《洗澡》，描绘的就是那场运动。侯仁之在燕大，属于“可以信赖”的知识分子，他与雷××、翁××，率先在全校大会作示范性的检查，顺利过关。而校长陆志韦、哲学教授张东荪，则被视为顽固不化的典型，屡次检讨都不予通过。

侯仁之重返教学岗位，被聘为副教授，未几，擢升为教授。燕大没有地理系，仍在历史系供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燕大与北大合并（等于撤销），他被任命为北大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

侯仁之努力追求进步，表现有目共睹。也有不遂心的地方：他的入党申请，迟迟得不到批准。这事颇令人纳闷。近来，据知情者回忆，和一桩“社会关系”有关：初中一年级时，侯仁之与一位同学要好，那位同学后来被打成托派，组织上让侯仁之交代揭发，包括如何秘密联络，发展成员等等。侯仁之说不清楚，因此，就作为“疑点”保存了下来。直到文化大革命，还有人旧事重提，企图从政治上把他击垮。后来闹明白了，那位同学的托派问题，本身就是莫须有，是三推六问，屈打成招，侯仁之当然说不清楚。

季羡林：与时代同行

季羡林有别于侯仁之，他是恂恂儒者，白面书生，建国前，和共产党人毫无往来；对于这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他基本上是被形势推着走。1946年初夏，季羡林从欧洲回到上海，秋冬之际，抵达北平，出任北大东语系主任。1948年12月，解放大军包围北平，南京国民政府启动“抢运京都学人”计划，季羡林的许多师长、同事、朋友，如胡适、陈寅恪、朱光潜等，都名列其中。甚至他的小学兼大学同学，此时担任北师大副教授的李长之，也有人为之买好了去台湾的飞机票。季羡林资历尚浅，不在“抢运”之列。即使名列其中，相信也不会走。历史上，他与国民党没有任何瓜葛。国民党之腐败、腐朽，早就使他彻底失望。因此，季羡林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新政权充满了向往。

江山易帜，百废俱兴。季羡林敞开双臂，热情拥抱新政权。起初有

点不习惯，开会喊什么什么人“万岁”，居然张不开嘴，连脱去长袍大褂，换上中山装，也感到别扭。然而，形势比人强，陌生的，很快熟悉，不惯的，转眼自然。开会再呼“万岁”，音调之高亢，音质之饱满，感情之丰沛，不输于任何人。中山装穿上，就脱不下，直至终生。

这里是不是有点矫枉过正？且不管它。季羡林的感情是真诚的，他急于跟上时代，跟上历史疾转的车轮。他说，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说：当时，“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

这的确是一件可耻的事，在当日那种政治气氛中。即使季羡林心存蒙昧，也会有革命同志帮他洗心革面。既然他自己主动亮丑，那就说明他弃旧图新，勇于改造，大有希望。他的确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他说：“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说法。在好多好多年，这种‘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中。”

是的，这决不止他一个人。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很多。罪孽感种下了，终有一天要发芽，长成光怪陆离的树，结出酸甜苦辣的果。且看季羡林继续挖掘：“我当时时发奇想，我希望时间之轮倒拨回去，拨回到战争年代，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立功赎罪。我一定会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为了革命，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疯狂的幻想：如果我们的领袖遇到生死危机，我一定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鲜血与性命来保卫领袖。”

这是见诸公开文字的，流于口头的活思想更多。比如他向党总支书记贺剑城汇报，则幻想：“假设有特务向大饭厅扔炸弹，而我恰好在一侧，我一定奋不顾身地把炸弹捡起，再扔到没人的地方。”

季羡林是急了，他说：“我处处自惭形秽。我当时最羡慕、最崇拜

的是三种人：老干部、解放军和工人阶级。对我来说，他们的形象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是我终生学习也无法赶上的人。

“就这样，我背着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随时准备……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真正树立无产阶级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解放初期最早掀起的政治运动，是三反、五反与思想改造。季羡林实心任事，廉隅清正，三反、五反与他无缘，思想改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有精彩记叙：“在北大，在奉行极‘左’路线的年代，思想改造，教授几乎是人人过关。自我检查，群众评议。这种自我检查，俗名叫‘洗澡’。‘洗澡’有‘大盆’、‘中盆’、‘小盆’之别。校一级领导，以及少数同国民党关系比较亲密的教授们，自然必然是‘大盆’。换言之，就是召开全校大会，向全校师生做自我检查。检查得深刻才能过关。深刻与否，全由群众决定。一次过不了关，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一直检查到声泪俱下，打动了群众的心，这个‘澡’才算洗完。有一位就在自己的检查稿上加上旁注：‘哭！再哭！’成为一时的‘美谈’。”

在群众的眼里，季羡林的罪孽不算深重，凑合着洗了一个‘中盆’。他的罪行，主要有两条：一、解放前，他从对国民党的观察中，得出一个结论，政治这玩意儿，肮脏，污浊，最好躲得远远的；二、他认为，外蒙是被苏联抢走的，中共是受苏共左右的。为此，他检查了一次，没通过，再认识，再上纲，再提高，再检查。他回忆：虽然是中盆，那水也是够烫的。大家发言异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他生平第一次经历这阵势，句句都像利箭，射向他的灵魂。他没倒下，因为他已变成了基督教徒，怀着虔敬的“原罪”感，仿佛批判越激烈，他就越舒服。他浑身燥热，大汗淋漓，犹如洗了一场土耳其蒸汽浴。当大会最后宣布，准予过关，他检查时没哭，也哭不出来，这时倒刷刷流下了泪，热泪。他感到浑身轻健，通体舒泰，资产阶级思想仿佛一涤而光。

杨绛：甘居卑微，绵里藏针

杨绛是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典型。

1938年，杨绛和钱锺书留学法国，当时国内正值抗战初起，北平、苏州俱已沦于敌手，杨绛他们若要不回来，有一千个理由，但他们毅然选择回国，理由只有一个，用钱锺书的话说，就是："每个人的遭遇，终究是和自己的同胞结连在一起的。"

祖国山河大片沦陷，上海因为有英、美、法等中立国的租界，而成为被日军包围的"孤岛"。杨绛回到上海，很长一段日子，是为谋生挣扎，她帮苏州振华母校筹办过上海分校，当过家庭教员，当过小学代课老师……1942年底，杨绛受清华前辈系友，也是戏剧家的陈麟瑞、李健吾鼓励，动手创作话剧《称心如意》。说起来，清华外文系跟戏剧大有渊源。系主任王文显（1886～1968），是从小在英国受教育的戏剧名家，他开设的课程，包括《外国戏剧》、《戏剧专题研究》、《戏剧概要》、《莎士比亚研读》、《近代戏剧》等等，本人亦从事戏剧创作，先后写过《委曲求全》、《皮货店》、《北京政变》。缘是之故，清华外文系涌现出一批话剧人才，如洪深、陈铨、石华父（即陈麟瑞）、李健吾、曹禺和张骏祥。杨绛早先曾想："假如我上清华外文系本科，假如我选修了戏剧课，说不定我也能写出一个小剧本来，说不定系主任会把我做培养对象呢。但是我的兴趣不在戏剧而在小说。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得造化弄人，只觉得很不服气。"现在机会来了，杨绛得着证明自己的可能。她一边在小学代课，一边调动全部的积累，抓紧创作。《称心如意》很快就写了出来。那时，陈麟瑞、李健吾正主持上海职业剧团，迫切需要剧本，杨绛的习作，经二位润饰，迅速推上舞台，李健吾也粉墨登场，在剧中扮演一个角色。

顺便说一说，杨绛本名杨季康，因为剧本需要，她就按"季康"的吴语切音，起了个笔名"杨绛"。杨绛出手不凡，《称心如意》一鸣惊人。复旦大学赵景深在《文坛忆旧》一书中写道："杨绛女士……第一个剧本《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李健吾也上台演老翁，林彬演小孤女，我曾去看过，觉得此剧刻画世故人情入微，非女性写不

出，而又写得那样细腻周至，不禁大为称赞。”

随着《称心如意》的走红，杨绛又一鼓作气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悲剧《风絮》。有评论者指出：“延续的是英式戏剧的传统，幽默与讽刺并存，讽刺的是人性的弱点，幽默的是人生的悲欢。”杨绛的剧作，每一部都受到观众的热捧，尤其是《弄真成假》，李健吾甚至认为：“假如中国有喜剧，真正的风俗喜剧，从现代中国生活提炼出来的道地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是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文学里面《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里程碑。有人一定嫌我过甚其词，我们不妨过些年回头了看，是否我的偏见具有正确的预感。第一道里程碑属丁西林，人所共识，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女作家，如果用颜色来代表，我想冰心是白色的，萧红是灰色的，杨绛属于紫色。”这是香港女作家舒非的感喟。

杨绛的蹿红，使大才子钱锺书坐不住了。一天，他跟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大为高兴，她让钱锺书减少大学的授课时间，为了维持生活，连女佣也辞了，家里的杂活自己全包。钱锺书放开手来一搏，历时两年，完成了《围城》。钱锺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说话就到了1949年4月，解放大军兵临长江，蒋家王朝风雨飘摇。一些和国民党有牵连的，或对共产党不信任的文化人，纷纷逃往海外。2003年，杨绛在《我们仨》中剖析自己当时的情感，她说：“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杨绛吐的是肺腑之言，他们如要走，不是没有旁例，据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杨绛的三姐夫、曾任国民政府上海市副市长的何德奎，就随一批民族资本家逃去香港。杨绛既然不走，就是打定主意为

新政权服务。2004年，杨绛向一位来访者说及当时的活思想："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当时我们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国吧。"这一次，杨绛把年龄夸大了，1949年她才三十八，老钱也只有三十九，"不惑"尚且不足，遑论"年近半百"。

北方先于南方解放。1949年夏，战争还没有结束，杨绛和钱锺书应母校清华的聘请，于8月24日携带女儿，乘车北上，26日抵达清华园，开始在新中国工作。

钱锺书担任教授，负责指导研究生。杨绛是兼任教授，因为按照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同在一校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钟点计酬，钱很少。杨绛自称打"散工"。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杨绛当专任，她却宁愿做"散工"。杨绛自觉未经改造，难以适应形势，是以借"散工"之名，行逃会之实。比方说，妇女会组织学习，杨绛不参加——她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杨绛不参加——她没有专职。杨绛曾应系里的需要，增添所教的课程，倘若加起来，也够专任的份了，但她为了逃避开会，仍坚持自己是"散工"。——从这事看出杨绛的精细，开初是出于被动，渐渐地，她就顺水推舟，化被动为主动。世人看到，政治学出身的杨绛，与政治始终总保持一定的距离。

杨绛和钱锺书初到清华，"行客拜坐客"，去胜因院拜访费孝通夫妇。费孝通（1910～2005），是杨绛东吴的老同学，时任清华副教务长。后来又进城看望沈从文夫妇——锺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杨绛觉得应该主动捐弃前嫌，重新修好。建国初期，女同胞衣着多半不讲究，土里土气，杨绛显得洋气多了，旗袍是上海裁缝做的，合身得体，穿在身上，就和群众有了隔阂。钱锺书的族弟钱伟长（1912～），也是清华副教务长，他责怪杨绛不学习政治，跟不上时代潮流，当着杨绛的面对费孝通说："咱们来改造她！"费孝通知道杨绛不肯，连连摆手："勿要！勿要！"

杨绛在清华教课，很长时间未去系里开会，有点心虚。尔后钱锺书借调到毛选翻译委员会，进了城，她不去开会，情况更加隔膜。听说思想改造时有人提出，杨季康怎么不来开会？杨绛心里想的是"因是'兼任'，怕没资格"，既然点名要去，从此每会必到，随众学习周总理报告，到北大、北师大看大字报，旁听各系所做示范报告、各系"洗

澡”者检讨。陈岱孙、费孝通做了全校性的“示范报告”，杨绛没听。袁震（吴晗夫人）告诉她，费孝通检讨他“向上爬”的思想，最初是“因为他的女朋友看不起他”。袁震之所以要转达这句话，是因为坊间传说，费孝通的初恋女友就是杨绛。

1951 年秋天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杨绛和侯仁之、季羡林有别，她没担当任何领导职务，连个教授还是兼职，目标小，对立面就少，她只检讨了一番“无主人翁思想”、“一心想做贤妻良母”等等，结果一次通过。

检讨通过的晚上，杨绛怀着轻松的心情，参加在大礼堂召开的大会：由学生控诉教师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会议中间，忽然有个不认识的女孩登台，她不是杨绛班上的学生，可是她咬牙切齿、挥手顿足地控诉杨绛：

“杨季康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

“杨季康先生甚至于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听众很气愤，这简直太不像话了！主持大会的费孝通料想杨绛不可能这么说，递了张纸条给那女孩，请她简短点。女孩正在兴头上，索性略去旁的教师不提，专门控诉杨绛。

散场了，群众拥挤着走出礼堂大门，杨绛周围却出现一圈空白，借用半个世纪后的医学用语，仿佛她就是一个“非典”患者。杨绛听到空白之外的纷纷议论，声调里带着鄙夷。有一位女同胞（大概是家庭妇女）慨叹：“唉，还不如我们无才无能的呢！”杨绛听了感到很冷，彻骨的冷。

谢天谢地，折腾许久，运动终于过去。一个星期日，一位党员女同事，也是党代表的，公开接待清华的老师，她学老解放区来的干部，大衣不是穿着，而是披在身上，很有派头的样子。当杨绛和钱锺书排队来到她的面前，她一边伸出手相握，一边说：“党信任你。”

杨绛松了一口气。在那之后，她不断问自己：我们洗干净了吗？她始终认为，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炼自己。人需要改造自己，但必须自觉自愿。

弹指三十多年过去，1987 年，杨绛把这一幕写成了长篇小说《洗澡》。——这简直就像拾脚印，嵌在历史缝隙的脚印。出生于上半叶的大批知识分子，都曾经打那个满地是“脚印”的时代过来，然而，嗣后又有几人将之一一捡拾？唯有她做到了，杨绛。

黄万里：不谙政治，四处碰壁

与杨绛相比，黄万里就书生得多了。

1937 年初，黄万里学成归国。那时，国内水利博士很少，仅有的几个，不是当官，就是进高校当教授。黄万里却去了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担任技正，长期在外从事测量和设计施工。这是他的务实。稍后，因为日寇大举侵犯，南京沦陷在即，黄万里去了大后方的四川水利局。抗战八年，他就在四川干了八年，积累了实干经验和人脉基础。1947 年 3 月，黄万里转战甘肃，出任省水利局长。

1949 年春夏之际，国共双方胜负已定，这时，黄万里完全可以随蒋介石撤走台湾——他当的是国民政府的官；岳父丁惟汾一家已经定居台北。黄万里也有理由选择不走——其父黄炎培，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已经从香港到了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筹建新中国大计；其兄黄竞武，1949 年 5 月在上海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在这正反两面的理由之上，起决定作用的，当然还是他本人的政治态度。黄万里不是国民党员，对民国政府的腐败早已深恶痛绝，“良禽择木而栖”，他决定留下来为新政权服务。

1949 年 3 月底，黄万里赴香港办事，在那里结识了共产党人潘汉年。潘汉年向他晓以民族大义，并让他回到甘肃，做省主席郭寄峤的工作，希望郭能率部起义。黄万里回到兰州，把潘汉年的话转告给郭寄峤，郭听后哈哈大笑，说：“要论关系，我以前就与朱德等人相识……不过，”郭寄峤沉下脸，直视黄万里，“你怎么敢回来跟我说这个话？这罪是要杀头的，我现在把你抓起来，看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算了，你不是搞政治的，赶快走吧！”

黄万里就此离开了甘肃。当时全中国的形势，是东北三省先一步解放，政局较为稳定。1949 年 8 月 15 日，黄万里应东北人民政府之聘，

前去水利总局报到。黄万里不是一个人去的，除了合家老小，还带了在四川、甘肃的一批旧部，共有十七人之多。黄万里的心意是好的，东北刚刚解放，缺乏科技人才，他这是急政府之所急。另外，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的号召力。黄万里为人仗义，朋友们都愿意跟他一起干。谁知效果适得其反：他也不想想，你这不是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么！一个阵脚未稳的工农政权，岂能容你一个旧职员、旧知识分子如此抱团?!所以接收部门把他的人马全部打散，分插到不同的单位，他自己也只捞到一个顾问的空衔。

此时此刻，换了杨绛，正好落得一个清闲自在。把重心放得低一点，再低，再低，这样，碰到任何情况，你都会想得开。然而，黄万里不是闲得住的人，他到东北的目的，就是要卷起袖子，大干一场。尤其是他的学识，他的经验，在东北水利总局，可以说是无人能敌，他怎么能看得惯外行指手画脚?!又怎么能听凭外行指手画脚?!

日子一久，矛盾就会产生，看不惯也得看，痛苦的只能是自己。黄万里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教诲，就是要“喷出热血地”爱人，爱国家，爱社会。他不甘心无所事事，而东北又偏偏没他的事，怎么办？想来想去，他想到还是去教书。黄万里与母校唐山交大联系，对方表示欢迎，于是，1950年6月，黄万里辞别东北到了唐山。

黄万里在唐山教了两年书，也经受了两年政治运动的冲击。建国前，胡适走了，去了美国，他的小儿子思杜未走，留在唐山交大，教政治。胡思杜啊胡思杜，光凭你这名字：思杜，就是十足的洋奴！你老爸让你思的绝不是唐朝大诗人杜甫，而是那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何况你老爸又跑到了美国，你留着不走想干什么？是想混入人民内部，当间谍，好里应外合，等待蒋介石反攻大陆？哎呀呀，胡思杜是无论如何也说不清，他眼前只有一条路：公开揭发胡适，批判胡适，与老爸一刀两断。胡思杜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校内也是逢会必表态，站稳立场，大义灭亲。黄万里对此不能苟同，他认为这不符合传统的伦理规范。这个愚夫子，这个书呆子，他还想讲封建的伦理规范！果然不久，大火就烧到他的头上，黄万里被当做“崇美、亲美”的典型，全校共讨之。她女儿黄且圆回忆：“当时学校的高音喇叭声嘶力竭：‘黄万里，你要脱下裤子，割掉尾巴！’我一听，吓得要命。”交大领导还到黄且圆读书的中学，让她学习



1953年春黄万里全家于清华园。

胡思杜，大义灭亲，揭发批判黄万里（类似的情节，在杨绛的《洗澡》里也有反映，可见是统一的“攻心术”）。且圆虽然借故推脱，心里却是紧张万分。

还好，这场运动，只是杀一杀黄万里的火气，并没有伤他的筋，动他的骨。黄万里继续在课堂上谈笑风生，据他的学生赵文源回忆：“黄先生讲课生动活泼，没有教授架子。有一次讲课中，引用了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故事。他弯下身子，模拟倒拔垂杨的过程，比喻力学中的某些道理，非常深刻而有趣。”学校办舞会，黄万里仍是积极分子，偕夫人在乐池中翩翩起舞，悠然自得。

陈省身：选择数学，远走高飞

与以上四位截然相反，陈省身选择的是远走高飞。

让我们从西南联大说起。1938年初，陈省身到达昆明，在西南联

大任教，与江泽涵、杨武之、姜立夫、华罗庚等忝为同事。抗战时期，日子是艰难的，物资匮乏不说，信息尤为闭塞。在此极端恶劣的情况下，陈省身没有停止研究，联大六年，他完成十多篇论文，其中三篇，发表在美国《数学纪事》，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荣誉。陈省身的论文引起美国同行的高度重视，1943 年，由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数学纪事》的主办方）出面，邀请陈省身前往作学术访问。是年 8 月，陈省身抵达普林斯顿。在那儿，他会见了许多慕名已久的前辈和同行，最值得一提的，当然是爱因斯坦（Einstein，1879 ~ 1955）。陈省身有如下回忆：

> 因为同在一个研究所，研究所也不大，所以常常看见他。彼此打招呼，也聊天。他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每天步行来到研究所，上午待在那里，中午回家。许多人看见他，都想和他照相，但他只跟小孩照相，不跟大人照。
>
> 爱因斯坦是历史伟人。他建立的相对论，用到四维的黎曼几何，与数学的关系很密切，所以我们也常常谈到当时的物理学和数学。但是爱因斯坦那时已经老了，工作已经不那么重要。一个科学家真正做重要工作的时间不很长。做学问要年轻。
>
> 爱因斯坦到过中国，时间很短。他很同情中国。我多次到他家里，自然会谈到中国。我注意到爱因斯坦家里的书架上放着老子的《道德经》，当然是德文译本。西方有思想的科学家，大多喜欢老庄哲学，崇尚道法自然。

普林斯顿是陈省身的福地，下榻不足百日，他就撰写出平生最得意的一篇论文——《关于闭黎曼流形高斯——博内公式的一个简单证明》。这是他的成名作，文章发表，用得上“轰动”两字形容。陈省身自述：“那时候，几乎天天晚上都会有人请你参加活动，喝酒，谈话。认识的半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大家在一起。”一个人的学术成果得到社会如此公认，其乐何如之，快何如之！两年后，陈省身又完成了另一篇重要论文——《埃尔米特流形的示性类》。这是他的巅峰之作。如果说，这之前的陈省身还属于新锐，那么，这之后的陈省身，则坐上了国际微分几何界领军人物的交椅。

1945 年 12 月，陈省身回到祖国，仍在清华执教，同时参与中央研究院数学所的筹备。1947 年，数学所正式成立，姜立夫为所长，陈省身为代理所长。鉴于姜立夫一直没有到任，陈省身实际负责全盘工作。次年，陈省身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时当选的，还有他的南开好友吴大猷。

1948 年 10 月，大洋彼岸飞来一份电报，发信人是奥本海默（Oppenheimer，1904～1967），此公乃主持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制的物理学家，时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所长，电报说："如果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方便你来美，请告知。"陈省身很惊诧，不明白此事从何说起。陈省身是一个简单的人，简单到只知数学，不知其他。接奥本海默的电报，他赶忙去看报纸，国民政府的新闻不值得信任，他就找国外的看，看了方才大吃一惊，原来，国民政府败局已定，准备撤退台湾，中央研究院也要跟随迁移。陈省身这才明白，他又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

这事，搁在别人头上，肯定要千回百转，反复盘算，譬如从政治，从地位，从人事，从环境，等等。陈省身不是那样的人，他的思维从来都像他的计算一样简捷，当此之时，陈省身考虑的是：选择数学。而选择数学，放眼宇内，去普林斯顿，他曾经的福地，无疑是最佳选择。

陈省身随即给奥本海默复电，告诉他准备赴美，同时告知："我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这次需要携家眷同行，全家四口一起去美国。"

——陈省身 1943 年去普林斯顿，是单身独行。话说 1940 年，郑士宁从昆明回上海父母家分娩，生下儿子"伯龙"，随后"珍珠港事件"爆发，交通中断，与丈夫一直隔绝，直到抗战胜利后的 1946 年春天，夫妻才会面，当时，儿子已经六岁了。别后重逢，面对家人悲喜交集的泪水，陈省身许诺："从今以后一家人永不分离！"

对方答应得非常爽快，同意一切全包——不用说，这是看中了陈省身罕见的才华。天才是不多见的，此时此刻，谁都明白，一个陈省身对美利坚意味着什么。

1948 年岁尾，陈省身全家乘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离开上海，次日，也就是 1949 年元旦，抵达旧金山。陈省身此去，第一站是普林斯顿，那只是过渡，数月后，正式落脚在芝加哥。陈省身在芝加哥大学待了整整十年，他在那其间做出的非凡贡献，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复兴了美国的微分几何，形成了美国的微分几何学派。陈省身对此也直言不讳，他

说：“对于美国数学的发展，我是有贡献的，我到美国，不是去学，是去教他们。美国在这行里的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学生，都受我的影响。”坊间甚至流传：对许多人而言，陈省身本身就是现代微分几何。

钱学森：冲破阻挠，返国报效

钱学森在建国前后的经历，是一出大戏。

钱学森 1935 年赴美，一去十二载；他由一株青葱的幼苗长成干云蔽日的大树。1947 年，钱学森回国探亲，与青梅竹马的蒋英喜结连理，然后携妻子同去美国。在沪逗留期间，《申报》刊出新闻，说教育部决定聘请钱学森出任交通大学校长，北京大学胡适校长亦邀请钱学森出任工学院院长。这两件事，俱为钱学森婉辞。

钱学森继续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从事科研，1948 年，他完成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核火箭的论文，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钱学森已被公认为力学和应用数学的权威、流体力学的开路人之一、卓越的空气动力学家，尤其被誉为现代航空科学与火箭技术的先驱。

1949 年 10 月，神州易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钱学森动了莼鲈之思，家国之念，他着手筹备返国事宜。正在这时，美国冒出了“麦卡锡主义”，核心就是反共，他们认定钱学森早期在加州参加的一个沙龙，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怀疑钱学森是共产党人，吊销了他的“国家安全许可证”，禁止接触机密。钱学森是从事国防高端技术研究的，不准接触机密，就等于中止了他的科研生命。钱学森愤怒了。他想自己来美十多年，为这个国家的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居然落得这样一个下场！钱学森决定一刻也不多待，立刻返回祖国。然而，当钱学森买好机票，行李也都装上海轮，美国政府突然拘捕了他。公开的理由是：“凡是在美国受过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一律不准离境，因为他们的才能，有可能被利用来对付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私下的说法则是：五角大楼一位高官宣称，“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 3—5 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共产党中国。”

钱学森受到关押、软禁，剥夺行动自由。消息传到国内，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给他写信，勉励道："吾儿对人生知之甚多，在此不必赘述。吾所嘱者：人生难免波折，岁月蹉跎，全赖坚强意志。目的既定，便锲而不舍地去追求；即使弯路重重，也要始终抱定自己的崇高理想。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的忠诚，对故国的忠诚；也相信吾儿那中国人的灵魂永远是觉醒的……"

钱学森具有高贵而高傲的灵魂。在被软禁的日子里，他不能搞科研，就转而埋头著述。1954 年，钱学森完成了《工程控制论》，交希尔图书公司出版。这是一门崭新的技术科学，领先世界足足五年，钱学森因此也成了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

钱学森的学术和处境，引起了中国高层领导的重视。1955 年春，毛泽东曾向周恩来询问："在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我们的人才如何？"

周恩来答道："我们有这方面的人才优势，钱三强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夫人同在一起工作过，杨承宗和彭桓武是从法国、英国回来的著名放射物理学家，另一位在美国'火箭之父'冯·卡门博士门下工作过的导弹专家钱学森教授，我们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争取他早日归国……"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有所松动。1955 年 4 月，美方取消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但是，钱学森仍被当做例外，严加监视控制。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对外宣布，是钱学森博士自己不愿返华。

1955 年 6 月 15 日，钱学森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那一天，他和夫人蒋英以及两个孩子佯装逛街，巧妙地甩脱联邦特工人员的跟踪，让蒋英隐进商场，把事先写好的一封信，扔进邮筒。信是寄往侨居在比利时的蒋英的妹妹蒋华，托她通过在上海的父亲，转寄给北京的陈叔通先生。信上说：

叔通太老师先生：

自一九四七年九月拜别后久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解决，学森等个人们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惟以在

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

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从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Prof. Yong - huai Kuo，Cornell University，lthaca，N. Y.），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附上纽约时报旧闻一节，为学森五年来在美之处境。

在无限期望中祝您

康健

钱学森谨上

1955 年 6 月 15 日

陈叔通（1876～1966）乃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老师，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接到从上海转来的钱学森的信，随即将之呈交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批示外交部，就钱学森返国被阻一事，同美国进行严正交涉。

1955 年 8 月 4 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会上，谈到我国留美学生返国事宜，美方代表约翰逊信誓旦旦地保证：美国政府完全遵照留学生本人的志愿，凡是要求返华的，一律予以放行。中方代表王炳南按照周恩来的授意，抛出钱学森的问题，并出示钱学森的亲笔信作证。在铁的事实面前，约翰逊无法狡赖，承认疏忽。

第二天，也就是 1955 年 8 月 5 日，美国移民归化局通知钱学森：你可以离境了。

自由了！钱学森前往导师冯·卡门的寓所，向恩重如山的老人告别。冯·卡门接过钱学森递上的《工程控制论》和一本《物理力学讲义》，由衷地说："我为你骄傲，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1955 年 9 月 17 日，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起航前，钱学森当着众多记者的面发誓，再也不踏上美国的土地。

3. 坐看云起时

历史的转折关头，最能掂出一个人的分量。

侯仁之是革命的追随者，全身心拥抱新政权。政治上，从抗日战争起，他就一步一步地向共产党靠拢；业务上，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北京（北平）的历史地理，恰好北京被定为新中国的首都，顿使他成了热门人物，1950年，梁思成邀请他在清华讲授“市镇地理基础”，政务院任命他为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性格上，他耿直，单纯，群众关系好。侯仁之如果走仕途，将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但他是传统型的知识分子，恪守古人的经世致用，认定学术可以安身立命。他的女儿馥兴向笔者提供过一个细节：一次填表，侯仁之先填“北大教授”，然后填“副教务长、地质地理系主任”，女儿问为什么不倒过来填，侯先生答：教书是本职，其他都是临时的。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季羡林作为特邀代表，登上观礼台。这事颇出乎意料，在笔者看来，当日能登上观礼台的，肯定是对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士，像季羡林这种不问政治的普通教授，能加入天安门前的群众队伍，接受新中国领导人的检阅，就算是特殊待遇，又怎么会获得此种殊荣呢？但这事是季先生亲口对笔者说的，不由得不信，老人还强调，他身旁的区域，站的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整个过程，日记里有记载。我向曾经看过季先生日记的李玉洁求证，她说确有这么一回事。那么，笔者就只能猜想了，或许这份殊荣与他的清华老同学胡乔木有关，胡此时担任毛泽东的大秘书、新华社社长，应该有这个权力。此属姑妄言之，不足为凭。有案可稽的是，1956年，季羡林加入共产党，是北大教授中的第一批（也是六位主人公中的第一个）。据当年东语系党总支书记，也是季羡林的入党介绍人贺剑城回忆，此事和胡乔木的背景有关，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对此极为重视，亲自出马力挺。

季羡林出身穷苦，在清华求学时期，常常为一些富家儿瞧不起，在建国后的北大，这反成了他的资本，苦大仇深，根红苗正。季羡林骨子里有农民的因子，表现出来的则是衣必中山装，履必土布鞋，站到工农堆里，分不出彼此，因而易于和工农政权融合。

杨绛自认是边缘人，犹如披作“隐身衣”，隐身衣的料子是“卑微”，身处卑微的人，人家就视而不见，见而无睹。杨绛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我国古人说：“彼人也，予亦人也。”西方人也有类似的话，这不过是勉人努力向上，勿自暴自弃。西班牙谚云：“干什么事，成什么人。”人的尊卑，不靠地位，不由出身，只看你自己的成就。我们不妨再加上一句：“是什么料，充什么用。”假如是一个萝卜，就力求做个水多肉脆的好萝卜；假如是棵白菜，就力求做一棵瓷瓷实实的包心好白菜。萝卜白菜是家常食用的菜蔬，不求做庙堂上供设的珍果。杨绛家乡的童谣有“三月三，荠菜开花赛牡丹”的话，荠菜花怎赛得牡丹花呢！她曾见草丛里一种细小的青花，常猜测那是否西方称为“勿忘我”的草花，因为它太渺小，人家不容易看见。不过她想，野草野菜开一朵小花报答阳光雨露之恩，并不求人“勿忘我”，所谓“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杨绛的《我们仨》中有一段介绍：抗战胜利，钱锺书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早车去，晚上老晚才回到上海家里。一次，他老早就回来了，杨绛喜出望外。钱锺书告知：“今天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来了。”就日瞻云之际，钱锺书却选择脚底抹油——开溜，怕的是灼伤自己的羽毛。此事颇见风骨，令人想起陈寅恪的“看花愁近最高楼”。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像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总归是凤毛麟角。

黄万里是典型的“不识时务”者。他的贵族家庭、留美背景、绅士作风、名士派头、文人习性，在在和新政权格格不入。父亲黄炎培一再告诫他“谦虚谨慎，靠近群众”——他总是当耳边风。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三反’是旧知识分子第一次受到的改造运动，对我们是‘触及灵魂的’。我们闭塞顽固，以为‘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人都变了。就连‘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程度的变：有的是变不透，有的要变又变不过来，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偷偷儿不变。”黄万里不愿变成机器人，“随着按钮统一行动”，他有自己的意志，他坚持做一个大写的人，这本来是他的骨气，是他的优点，但是在年轻的共和国，在一个矫枉过正

的年代，却成了他致命的阿客琉斯之踵。[1]

台湾的命理学家柯俊良给陈省身算过命，大意是：

> 出生在1911，岁在辛亥；生日九月初七，是为辛巳；这里有两个“辛”，命理谓“日月二德喜相逢”，难得的好命。

陈省身一生运气的确不错。且说这回，他选择了赴美，实践一家人永不分离的诺言，带妻子、儿女一起上路。在那之前，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的弟弟陈家麟，已被国民政府派去台湾接收高雄铝厂，父亲不久也跟了去（母亲已逝世）。

一路写来，你会发现，陈省身的动作常常跟别人不一致。这使我想起一个故事，陈省身的南开师妹，后来成了吴大任夫人的陈受鸟回忆：“有一次男生在操场上练习开步走，我们女生在一旁观看。我发现，队伍中一个十六七岁的男生和同队人的脚步总不合拍。当他自己发现时，就倒一下左右脚。一圈走下来，时时倒脚，我看了十分好笑。旁边的同学告诉我：别看他不会开步走，他小小年纪已经是数学系三年级的高才生，他叫陈省身。”怎么样？这故事不妨放大了看。陈省身不习惯统一的“开步走”，操场上是这样，生活中也是这样。正是这不合拍的步伐造就了天才，倘若他也像别人一样“中规中矩”，这辈子很难走到今天。

“如果你1948年没有去美国，一直留在国内，情况将会怎样？”很多人向陈省身作如是问。陈省身拒绝回答，他说这问题没有实际意义，他从不去想。

“从不去想”是不可能的，只是这中间有好多事，对理解的人，不用说，对隔膜的人，说也说不清楚。针对同一项提问，陈省身还说过：“这问题不容易回答……最好别想它，人生应该求快乐，拿得起，放得下。”

既然当事人讳莫如深，我们也就不用“哪壶不开提哪壶”了。

在公开场合，陈省身还有过两次“露怯”：一、1946年，陈省身从普林斯顿回到上海，邻家一个孩子慕名拿了一道中学的几何题，向他讨教，陈省身看后，不知从何着手，老实说：“我不会做。”二、陈省身

---

[1] 阿客琉斯之踵，源出古希腊神话，喻指致命的弱点，要害。

最后几年定居于南开大学，当他在校园散步，常被一些中学生拦截，向他请教奥数习题，陈省身总是告诉这些孩子："我不会做。"

也许这两个小故事，有助于世人更好地理解大师之为大师。

陈省身当年选择了数学，从而也选择了世界。站在美国的角度看，固然是他们的幸运。但是，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也未尝不是中国的幸运。

钱学森返国，曲折而又传奇，堪称二十世纪的经典篇章。"我是大唐的后代，我的一腔热血，只图报国。我的根在中国。"面对审讯他的特工，钱学森如是回答。祖国高于一切，这是人类普遍的情感。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但是，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就是这一件事情，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是有价值的。

与此同期，美国国际合众社也作过如下的述评：

> 1950 年，在钱被捕前不久，他曾打算离开美国。然而，在到达檀香山后（笔者注：此说不确），他被捕了，并在这以后被拘禁了五年，直到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他脱离国防事业已久，不再对美国构成凶险……
>
> ……1955 年，钱获准回国。与此同时，中国方面释放了它在朝鲜战争期间俘获的十一名美国飞行员。美国国务院官员一直否认这是某种交换……"

无论是五角大楼，还是国际合众社，显然都小看了钱学森博士，他对于中国的价值，岂止抵得上五个师?！又岂是区区十一名美国飞行员可比?！

而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则在她关于钱学森的传记中写道："在驱逐钱学森后，美国究竟有何损失？根据我对认识钱学森的科学家所作的调查，他们认为，美国失去了一位在应用数学、高速流体动力学、结构学和喷射推进学上的第一把交椅的科学家，他对这几个领域的专精，还可延伸到其他领域，统整出难以数计的科技成就。而他更可能在国防武器上研发出更先进的突破，而这在其后的《喷射推进》和《迎向新视野》丛刊也得到证明。我们或许无法断言他留在加州理工学院究竟能

获致怎样的成就，但很可能在登陆月球、喷射推进实验室进行的飞弹研发计划，及其他太空飞行计划中，钱学森都能有杰出的贡献。他过去的同事和学生几年后，都在政府的太空研究计划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例如史都华，后来主持有关地球人造卫星的一个重要国防委员会；布其特，后来成为休斯飞机公司的总经理；查里克则成为空军总部的副部长以及通讯卫星公司的董事长。

“古柏将此事形容得更具戏剧性：‘政府同意让这位天才，这位科学天才，被送回共产中国去发展他的智力，是这个世纪的悲剧之一。’”



第七章　反右之劫

1. 泛　论

历朝历代，知识分子问题，都是当政者的重中之重。

五十年代初，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是一个天震地骇的宇宙，电闪雷鸣，滂沱大雨，人人都在雨中淋个不亦乐乎。可是，待云开雨歇之后，这世界又是如何一番景象呢？杨绛2003年在《洗澡》一书的新版前言中说：“本书第一部写新中国不拘一格收罗的人才，人物一一出场。第二部写这些人确实需要‘洗澡’。第三部写运动中这群人各自不同的表现。‘洗澡’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原因是谁都没有自觉自愿。”

杨绛这里说得明白：知识分子确实需要“洗澡”，那么多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才，难免泥沙混杂，鱼龙俱下，不经过一番改造，又怎能使他们悉数为新社会所用呢。但是如何改造，得讲究方法，一味靠群众运动，急风暴雨，雷霆万钧，威赫则威赫，淋漓则淋漓，可惜欲速不达，制造的多是随风转舵，口是心非。人毕竟是有灵性的，有其长期形成、相对封闭的内宇宙，它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你要了解它，得先进入它，而要进入它，又得先袒裎自家的内宇宙。——当然这是后话，年轻的共和国，还顾不上这些，或者压根儿就没有把这一点考虑在内。

如是到了1957年，党号召整风，开展大鸣大放。据罗平汉在《1958～1962年的中国知识界》一书中概括：“‘大鸣大放’的结果，既放出了大量中肯的意见，也放出了一些不好的意见，甚至个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群情颇为激烈，声势颇为惊人。如此一来，上边的态度就变化了，他们断定右派要翻天，决定停止整风，全力反击，这就爆

发了反右运动。

运动中，毛泽东主席指出："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毛泽东的这番话，与其说是承认事先策划，引蛇出洞，一网打尽，毋宁说是在转变策略之后的一次强硬亮相。(《〈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反右的结果，不但将数十万知识分子错划为右派分子，更重要的是，它使中国社会对知识和知识分子重要性的认识发生了偏差。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宣布：中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

2. 在反右激流中

危险激发伟大的心智。

——查普曼《布西·德·昂布阿》

季羡林：得逍遥时且逍遥

反右运动，北京大学是重灾区，据有关统计，当时全校学生人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约总人数的7%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其中，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比例高于学生，接近10%。

季羡林创造了一个奇迹，他既没有挨整，也没有整人，轻轻松松，清清白白，这是什么缘故呢?

首先，从客观情况来说，季羡林没有鸣放的心理基础。他是新社会的宠儿，教育上，他是一级教授，当时全国的一级教授，仅有五十六人，他是其一，十分难得的了，学术上，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后来的院士，每月享有特殊津贴，政治上，他是北大教授中第一批入党的，又是全国政协委员，当时一个知识分子所能追求的最高荣誉，都叫

他收入囊中。季羡林走在校园，常有人在背后指点说“一级……”、“一级……”唐人韩愈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季羡林扪心自问，早已喜出望外，他还有什么好鸣的呢！

其次，即使季羡林心里有牢骚，有愤懑，他也不会当众倾囊而出，大鸣大放。季羡林口紧，紧得出奇，不该说的，决不说。这是从小在叔父家养成的，那时寄人篱下，逆来顺受，佯作天真，一切牢骚意见都深埋心底。大学毕业后到济南教中学，校长宋还吾看出他的特点，下的评语是“羡林很安静”，这个“安静”，就包括了“深藏勿露”。建国后，季羡林多年养成的习惯派上了大用场，不管是批胡适，批陈寅恪，他都三缄其口。乡谚有云：“十八个不开口，神仙难下手。”旁人纵然心有芥蒂，也对之莫可奈何。

再其次，还得加上运气。1957年，恰好是1957年，季羡林所在的东语系掀起了转学风潮，起因是供需失调，部分学生毕业找不到单位，一些对专业不满的学生也卷入其中。据东语系当时的党总支书记贺剑城回忆：“我们系从‘鸣放’一开始，同学们就提出过去毕业分配不结合业务，招生过多，要求转学转系，多数学生被卷进去了，领导也被卷进去了。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找系主任和总支书记，我们有一种被围攻的感觉，教育部也来人听取意见。一天召开全系学生大会，有些学生言辞激烈，要求立即解决转学转系问题；另一些学生则不同意那种过激言论，双方发生了争论。……在外文楼103教室还召开过一次会议，由系主任季羡林教授主持，有人提出，要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不要系领导和党的领导参加，系主任说，不经过系里任何问题也甭想解决，后来没有人再提这类问题了。……我们赶快去教育部查看计划，按以前计划确定的招生数目，确有不实之处。例如某个部原计划要1005人，后来削减到5人。经系主任向教育部请示，教育部同意一部分同学转学转系。”（贺剑城：《亲历北大六十年》）教育部对这项工作极为重视，派了一位副部长和一位司长到北大，与季羡林一起，组成三人小组，专门抓这件事。结果，这边厢转学风潮处理完毕（笔者按：九十年代末出任北大副校长的何芳川，就是当年从缅甸语专业转去历史系的），那边厢反右运动也已接近尾声。

季羡林回忆反右时期的那段经历，说：主观上，我是认为“这场运动，同以前的运动一样，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我怀着根深蒂固的‘原

罪'感，衷心拥护这一场运动。”客观上，“我成了‘逍遥派’，既不被批，也不批别人，逍遥自在，为所欲为。现在全校到处摆满了反击右派分子的战场，办公楼礼堂是最大的一个。此处离东语系最近，我有时候就坐在办公楼前的台阶上，听大礼堂中批右派分子的发言，其声清越，震动楼瓦。听腻了，便也念点书，也写点文章。”

杨绛：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1952 年秋天，在高校院系调整的浪潮中，杨绛和钱锺书从清华调到北大，单位是文学研究所，搞外国文学研究。尔后，钱锺书被借调到中国古代文学组。1956 年 1 月，文学所改归中国科学院，地点撤出燕园，搬到不远处的中关村。1957 年 5 月，杨绛的一个外甥女来玩，告诉说北大的学生贴出大字报来了。杨绛和钱锺书好奇，晚上溜去看大字报，真的满墙都是。他俩读后，感到很惊讶，原来以为“三反”之后，人性都变了，谁知一点没变，他俩平时有一些想法，自以为很激进，和大字报一比，根本算不了什么。杨绛和钱锺书既惊且喜，心头大为舒畅，几年来的压抑，这回得到了抚慰，想，人终归还是人。

上头接着号召鸣放，钱锺书有一次去中南海，亲耳听到毛主席鼓励鸣放的讲话，觉得是真心诚意。文学所内也动起来了。杨绛和钱锺书认为凡事经了号召，就成了政治运动，他俩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比方说，三反之后曾批判俞平伯，然后又是肃反，又是反胡风，反这反那，再然后呢，俞平伯竟然被提升为一级研究员，高级知识分子又普遍享受优待，出行有高级车，医疗有高级医院，再然后就是现在了，上头又号召大鸣大放。

风和日暖，鸟鸣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杨绛和钱锺书就警惕了。自从到北大看了大字报，觉得有些话，别人已经代说了，而且说得比他们更深刻，那就不用再说了。上面只管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地引诱催促。杨绛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向极端，她对钱锺书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钱锺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他俩于是既不鸣，也不放。有人问她：“你不觉得工作不自由吗?”杨绛答：“不觉得。”她说的是

真话。想想解放前，上海沦陷期间，不论什么工作，哪怕是小学代课，只要是正当的，就做，哪有选择的自由。有熟悉的记者劝她鸣放。杨绛老实说："对不起，我不爱'起哄'。"杨绛尤其看不惯那种人：平时"唯上是从"，"鸣放"中却把共产党说得一无是处。有一次，萧乾在冯友兰家召集开会，一位同事提出"文学研究所还在'找爸爸'"（意即文学所无人领导）。会后，杨绛打电话给做记录的冯宗璞，让她把这句话删了，因为不符合事实。

据罗银胜的《杨绛传》：五七年春天，不少人动员杨绛和钱锺书投入大鸣大放。杨绛记得，登门劝说的，有吴晗、萧乾、浦熙修、姚芳藻等。然而，他们不愿"奉旨鸣放"，始终坚持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反右结束，劝他们夫妇发言的人，大都被划为"右派"。比如萧乾，他是《文艺报》的极右，浦熙修，是《文汇报》的极右。杨绛在清华的两个老乡，费孝通和钱伟长，也都在劫难逃，成了毛泽东钦点的大右派。费孝通的右派名作，叫《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刊登于《人民日报》，刻画了知识分子在1957年初春那种"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心态；钱伟长的罪名，是主张"教授治校"。事后，冯宗璞问杨绛："杨先生你为什么那么正确，那么有先见之明？"

杨绛说："我毫无先见之明，只是不喜欢跟着起哄而已。"

事情当然不会是这样简单，其实，从杨绛在东吴大学的门门全优，争得"纯一等"的心劲来看，她是不甘平庸落后的，从其在课堂上和老师斗嘴的顽皮来看，她是心快舌快、单纯活泼的，再从她平时的一贯表现看，她的总体特征是个急性子；钱锺书小时候更是眼高于天，口无遮拦——按照他父亲钱基博的评价，是"才辩纵横，神采飞扬，而沈潜不足"，是以给他取字"默存"，希望他"为诸葛、陶渊明"，不希望他成为"胡适之、徐志摩"。然而，自从留学归来，尤其是1949年以后，这两人彻底敛去锋芒。你是否还记得杨绛日后在《隐身衣》中所说："我爱读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企慕庄子所谓'陆沉'。社会可以比作'蛇阱'，但'蛇阱'之上，天空还有飞鸟；'蛇阱'之旁，池沼里也有游鱼。古往今来，自有人避开'蛇阱'而'藏身'或'陆沉'。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一

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试看钱锺书1957年“大鸣大放”高潮中写下的《赴鄂道中》：“弈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尽，夜来无梦过邯郸。”你看，夜里途经“一枕黄粱”的发源地邯郸，却连轻梦也不做一个，他对现实的洞察是何等清醒！

侯仁之：一桩永远的抱歉

面对大鸣大放，侯仁之的心态和季羡林类似，他是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全国青联常委，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人大代表，日子是向上的，情绪是饱满的，虽然没能在1956年加入共产党，但那是迟早的事，只要努力争取，接受组织的考验。侯仁之对共产党满怀信心，满怀忠诚，一些民主党派，比如雷洁琼领导的民进，邀他加盟，他婉辞了；侯仁之一心一念要加入共产党。

1957年的反右运动，对侯仁之而言也是鸭子过河——不沾水。笔者在《侯仁之年谱简编》上查到，1957年夏天，也就是反右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他被教育部派往南斯拉夫，出席“今日的大学”国际讨论会。这是一个旁证，说明他没有被卷入漩涡。

待侯仁之从国外回来，反右已告一段落，他在燕大的一些老熟人，比如费孝通、吴文藻、赵承信，都被扣上了右派帽子。他们三位都是搞社会学的，这是五七年的重灾区，有人统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社会学家被划成了右派。相比之下，季羡林的梵文、巴利文，侯仁之的历史地理，虽然属于冷门，不热闹，不吃香，但冷门也有冷门的好处，它不涉及意识形态斗争，风险相对小得多。赵承信是侯仁之在燕大的同事，教社会学，抗日战争时期，他俩曾同时为日本宪兵队逮捕，并曾关押在同一间囚室，结下了生死不渝的友情。1952年，赵承信调到人民大学任教，划成右派之后，有一次，他给侯仁之家打电话，说想见一见老朋友。电话是张玮瑛接的，时间大概在1959年。侯仁之得信，赶紧去人民大学探望。学校大门封锁，来客都要登记，听说是找赵承信，立刻峻拒，说：他是右派，不准见客！侯仁之无奈，只好怏怏返回。心里想着待风头过去，再前往探望，聊叙衷情。谁知赵承信不久就去世了——他

当年在日本人的牢监里染下肺病，身体一直不好，这回遭此打击，健康急转直下，终于抱恨归天。赵承信临去，他那脱离躯体的魂魄是否还在回望燕园，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侯仁之得着噩耗，心上就像遭到一把铁锤重重一击。他为此感到终生懊悔、内疚。2008 年，侯仁之九十七岁，风烛残年，去日无多，想起这事，心情仍沉重不安，他特意让女儿馥兴捎话给赵承信的后人，说明当时的困境和对故人永远的抱歉。

侯仁之晚年经常对家人说起的，还有彭子冈。彭子冈（1914～1988年），建国前是《大公报》的名记者，与杨刚、浦熙修同称为新闻界的“三剑客”。她有一篇《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四十年代曾轰动一时。我们试看下列片段：

“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

……

记者像追着看新嫁娘似的追进了张公馆，郭沫若夫妇也到了。毛先生敞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

1954 年，彭子冈主编《旅行家》，经常约侯仁之写稿。侯仁之对她印象很深。然而，这位早在 1938 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名记者，五七年却被打成右派。罪名么，前面举的《毛泽东先生到重庆》，是老账，属于“恶毒诬蔑伟大领袖”。新账呢，1957 年 5 月，子冈发表一篇文章，主张让菜农自己进城卖菜，其中有这么一段：

事情是明摆着的，蔬菜是娇嫩货，经不起折腾，时间上也经不起拖延，坏了没救。能不能不要什么公司层层集中又层层下放呢？能否让郊区的蔬菜合作社里的菜农或是自留地里的菜农自己来卖呢？不说别的，北京胡同里卖菜的清脆悦耳的吆喝声，也尽够叫人惦记！一吆唤一连串，充满了自豪的感情，可惜如今只能从相声

“改行”里听到了。这也许只是我不足为训的小资产阶级旧情调，真正受到实惠的是万万千千、每条胡同里短不了的家庭妇女们，她们一转身子，菜到手了。

这就是新账。属于主张资本主义复辟之类。无论老账新账，侯仁之都是想不通的。他认为彭子冈有才华，有魄力，是好人。但这种话，他只能闷在心里，待到“文革”结束，才敢于和家人交流。

钱学森：特殊人才，特殊待遇

钱学森是“天外来客”。他没有经历过战争烽火的考验，没有经历过“思想改造”的洗礼，鉴于他在航空技术领域的杰出成就，以及冲破千难万阻返国报效的忠诚，从打1955年10月8日上午踏上罗湖口岸那一刻起，他就成了共和国的英雄。10月29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宴请钱学森夫妇，见面即说“欢迎你归来，我们的国家太需要你了！”接风席间，周恩来又告诉钱学森：准备让他在科学院担任力学研究所所长。你有什么想法现在可以讲，今后可以随时到我这里来，也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我。我还设想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将来我们还要在国防部设置一个专门负责火箭运载工具的开发和研制的研究院。这些都得请你负责搞起来。1956年2月1日，毛泽东主席设宴招待政协委员（钱学森已增补进政协），特意安排钱学森在自己身边就座，席间勉励他多培养青年人才。

1956年颁发的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钱学森以《工程控制论》一书，成为三个一等奖得主之一，另外两人是华罗庚和吴文俊。

1956年5月，在冯·卡门七十五岁诞辰的日子里，钱学森寄去一封意味深长的贺信，从中可以看出他心境的变化。贺信说：

冯·卡门先生：值此您七十五岁寿辰之际，用什么样的语言向您致意呢？要我说在帕萨迪纳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愉快日子吗？还是说一说您在帕萨迪纳的家呢？不，那是不适当的，因为我不仅是您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您的学生。要我说您对航空工程学做出的巨大

贡献，祝愿您今后做出更大的贡献吗？不，那不过是表面上复述一遍举世皆知的称赞和内容相同的生日致词。因为您是我尊敬的老师——我想再说一些话，使人应该认真思考的几句话。

我原以为每个纯粹的科学家的目的，只是在于为人类社会做出永久的贡献。这一点，冯·卡门先生，您可能没有感到您对科学技术的贡献所应享有的骄傲。可是，正是您那么多的劳动成果被用来制造毁灭性的武器，而几乎没有用来造福于人民。这不正是应该值得您深思一下的问题吗？自从我回到我的祖国之后，感到这里的世界同美国的世界截然不同。因为这里现在生活着六亿人民，超过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科学技术真正被用来建设幸福生活。在这里，每个人都为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他们知道只有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尽快地实现他们的目标。在这个世界上，冯·卡门先生，您创造的财富使您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我希望，通过科学家的贡献，促进人类生活的幸福、和平和美好。这个声明作为我在您七十五岁寿辰的致词。

回到祖国，钱学森仿佛重新换了一个人。让我们再看两个细节。一、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从香港进入罗湖口岸，刚到海关，一帮记者就围了上来。其中一个香港记者用英语问了一个问题，钱学森就说："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讲中国话。"记者解释说他只会讲广东话和英语。钱学森说："我想普通话在中国用得很普遍，而你是中国人，应该学会讲普通话！"

二、钱学森在美国执教期间，是以严厉到不近人情著称的。钱学森在麻省理工的一个学生回忆："他几乎总在上课铃响两分钟后，准时悄无声息地走进教室，从教室前方的黑板左端开始，咕哝一句：'我们从……开始。'就用清晰坚定的笔迹，写下一个程式。然后，瞄一眼自己的笔记，在下方添一行，再一行，再一行，直到黑板的底端。我们当然看不见他写些什么，因为字迹都被他挡住了。他开始写下一块黑板时，我们开始抄露出的部分，就这样绕着教室一周。第二轮开始时，他会把黑板逐一擦干净。他偶尔会给一点提示，让我们知道究竟在做什么。他会说：'积分。'或'微分。'我抄到那部分，就会设法把这些注脚附加上去，但我从来没搞清楚过，他指的是他刚抄完的方程式，或正

要开始抄的那条。这样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他会退后几步，端详一下黑板，说：‘这中间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可是他从来不解释。大家还没有会过意来，他又开始抄写了，直到下课铃响为止。他随即一言不发走出教室，丢下我们继续把笔记抄完。”回到祖国后，他严格、严厉未改，但教学风格却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举一例以说明，据钱学森当时的一个弟子戴汝为回忆：“他给我们讲工程控制论的课，有一点大家非常吃惊，他讲的完全是地道的北京话，没有一句英文。……我知道他在语言上是花了很大功夫的。他多次问别人某一个英文在汉语中究竟是什么意思。比如说‘random’这个词，另外一个人就告诉他‘random’在国内叫‘随机’，他为这个单词问了好些人。最后他讲课的时候一个英文也没有，令大家都很感动。当时在中关村周围有北大、清华、科学院的一些人，我在北大、清华也听过不少有名的教授的课，听过他的课的人都发现这位新来的所长确实有独到之处。北大的青年教师和同学说从来没有听过讲得那么好的课，这位科学家真不简单。他讲课的时候，能够引人入胜，从具体的讲起，又概括，又提高。而且，他讲课就是拿着支粉笔，不带书，粉笔字写得也非常清晰、规范。”

种种迹象表明，钱学森注定要和反右运动擦肩而过。

当然，钱学森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据王文华的《钱学森实录》，在1957年部分，有三条信息，与当时的政治运动有关。

一：4月5日，应邀出席民盟中央《争鸣》月刊杂志社举办的科学家座谈会。会议由千家驹和曾昭抡主持。这个座谈会是在“百家争鸣”方针所展现的学术自由前景的感召下举行的。

二：4月30日，出席中科院科学家的座谈会，座谈科学工作中存在的矛盾。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会上发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使我国学术界呈现了一片“东风到处百花开”的壮丽景色。到会的科学家们在畅所欲言的气氛中，指出了科学院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并提出了不少积极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

三：7月14日、16日、22日，出席中国科学院先后三次召集的在京科学家座谈会。批判章伯钧等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临时小组名义提出和发表的《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认为它

是资产阶级右派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一些科学家，如曾昭抡（1899～1967）、钱伟长等被当做右派分子批判。

关于这其间的细节，当事人守口如瓶，媒体讳莫如深，局外人无从得知。前面提到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经过多方采访，也仅仅得悉：“在谴责钱伟长（笔者注：原加州喷射推进实验室同事，时任科学院力学所副所长）的会议中，人们发现他未出一言（其后钱学森告诉秘书，那是因为他被整件事搞迷糊了）。”张纯如感慨系之，她说：“有谁比钱学森更懂得被冠上‘间谍’或‘叛徒’的伤痛与无助?”

钱学森不可能永远保持沉默——过来人都知道，1957，共和国没有沉默的自由——于是，在接下来的批判会中，他自然而然地参加了“合唱”。钱学森的发言，被摘要发表在1957年7月17日的《人民日报》。摘要说，“钱学森在会上驳斥了右派分子的科学研究要完全自由，不要计划不要组织的说法。钱学森说，现在已经不是科学研究的手工业时代，科学研究必须要有计划地进行。如果说不要计划能进行现代科学研究，那完全是不可能的。……”

《钱氏家训》有言：“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方见手段。风狂雨骤时立得定，才是脚跟。”我们且从积极的方面理解吧：在激烈的政治风雨中，钱学森总算立定了脚跟。当年9月，钱学森参加中国政府赴苏高级军事代表团。11月，钱学森出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院长。

陈省身：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六人中，陈省身因远走高飞而享受学术上的宁静，这是他的机缘。1949年之前，神州大地曾因战乱而搁不下一张书桌；1949年之后，复因政治运动频仍，单纯的学术依旧受到严重的干扰。陈省身跳出了浩劫外，他唯一献身的激情是数学，数学在哪里召唤，他就奔向哪里。据张奠宙、王善平的《陈省身传》记载：

1953年，陈省身担任瑞士苏黎世大学访问教授。这年夏天，重访德国汉堡，看望恩师布拉施克（笔者注：同是返回德国看望恩师，季羡

林却要等到 1980 年，年近古稀之后）。

1956 年，代数拓扑国际研讨会在墨西哥大学召开，陈省身的演讲题目是《复射影空间中子流形的几何学》。会议期间，陈省身和法国著名的几何拓扑学家塞尔（Serre，1926 ~），德国数学家希策布鲁赫（Hirzebruch，1927 ~）进行了亲密交流。自古英雄出少年，塞尔和希策布鲁赫都是后起的新锐，二十来岁就已做出了很大的成绩。陈省身和他们研究纤维化的流形的指标 I，能够满足 I（XY）=I（X）I（Y），并为此联合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 1957 年的《美国数学会进展》上。三位数学大家的联袂之作，引起同行的极大兴趣和重视。

继 1950 年在国际数学家会议作大会报告之后，1958 年，陈省身又应邀在第十三届国际数学家会议作分组讲演，题目是“微分几何与积分几何”。在国际数学家会议作分组报告，是一种荣誉，作大会报告，则是一种崇高的荣誉，连续受到邀请，则是一份罕有的荣誉。

芝加哥十年，陈省身先后到哈佛大学（1952）、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1954）、麻省理工学院（MIT）（1957）任访问教授。

若问，陈省身在沉浸学术之余，是否也会偶尔抬起头来，关注一下故国的政治运动呢？我想，不能说没有，他对局势是关心的，因为他是中国人，他的根在中国。有时他看着方程式，那 x 就像扭结在一起的长江和黄河，那 y 就像吊着他的年轮和乡愁的金钩。

还好，反右运动中，数学家的遭遇相对好一些，陈省身留在大陆的亲友，如岳父郑桐荪，师辈姜立夫、江泽涵、杨武之，挚友华罗庚、吴大任，高足吴文俊等，都有惊无险。譬如说华罗庚，1957 年 6 月 9 日，他和曾昭抡、千家驹、童第周、钱伟长联名，在《光明日报》发表《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一文。这篇文章，后来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曾昭抡、钱伟长成了右派，华罗庚与千家驹、童第周都是一再检讨，才勉强过关。

尽管过了关，华罗庚不得不考虑数学怎么与工农业生产结合，于是就有了他后来大力推广的统筹法、优选法……若干年后，有记者采访陈省身，问他对华罗庚道路的看法，陈省身说：“华罗庚是另外一个时代，因为中国的数学跟国际差得很远。那时候文章杂志进来，看不懂啊！谁都看不懂，学生看不懂，教授也看不懂。那么华罗庚能够看懂了，把它推广。这个是很不得了的工作，这是华罗庚做的工作，他真正创造性的

不多。"

另据陈省身、华罗庚在西南联大的弟子徐利治回忆："……陈先生也是入世派；他做学问爱抓大问题，不主张多写文章。1949 年我在英国留学时，陈先生在信中特别对我提出期望：'盼注意大问题，少涉细节，亦不必多写论文。你作风已有此趋向，不必多言也。'"

陈省身在清华的晚辈、国际公认的力学和应用数学权威林家翘说得好："要紧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作第二等的题目。"陈省身"取法乎上"，眼珠紧紧盯着第一等，盯多了，盯久了，眼界自然就高。

黄万里：因《花丛小语》罹难

黄万里的厄运来了。

1957 年 4 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同月，中国水利部召集学者和水利工程师七十多人，就已开工的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进行讨论。这工程是上面青睐的。这规划是苏联专家制订的。专家们纷纷从政治出发，大颂"圣人出"而"黄河清"，力主上马。唯有黄万里（时任清华水利系教授）从科学出发，阐述该工程不符合黄河实际，硬要上马，结局必然是一场灾难。"从政治"的专家与"从科学"的黄万里在会上进行了七天辩论。无奈政治只认事功，不认科学，结果可想而知："从政治"的专家大获全胜。

因为这场寡不敌众的辩论，三门峡工程引发的灾难要到库成之日



1956 年黄万里在清华新林院五号书房内。

（1960年9月）才现端倪，黄万里个人的灾难却是立竿见影。

也就是在这年春天，上面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黄万里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写出了短篇小说《花丛小语》，发表在清华校刊。这篇小说，是他后来沦于右派的主要罪证。“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让我们看一看，这篇小说究竟“毒”在什么地方。

花丛小语

黄万里

这还是三月里桃花含苞未放的时节，田方生编完了一章讲义，推开房门，背着手在小花园里闲步。他低着头，轻轻吟着他昨夜刚填好的词——《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

> 绿尽枝头蘖，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盼处士，杳无消息。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静悄悄，微言绝。忽来司命护花节，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翻潋滟，芬香洋溢。好鸟百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心自在，任翔逸。

正在边走边吟之际，脚声惊破了他后半段词句里的意境，抬头一看，前面来了老友甄无忌，只见他满头汗如珍珠泉那样涌出，气喘不止。方生迎前一步，惊问何故？只听得他满口抱怨地嚷着：“我老远特从城里来拜访，岂知三十一路车只开到石油学院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这条西郊公路是哪位宝贝工程师修的？”

噢！原来如此。方生未及回答，前面又有人向他招手，连忙向前迎接，一齐过来。无忌一看是贾有道，把头似点未点地照呼了一下，三人商定，泡了一壶茶，就在园里坐下。

“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别多，入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载重后就被压碎。”方生作了技术性的解释。

“这是一个土力学的理论问题吧？还是水力学，水文学的？”

有道接口就问。

“这些科学对于这类问题都有解释，但路面下须先铺上为了排水和散布载重力的路床，则是工程习惯或常识，并不一定要懂土力学才能得出这种结论。”方生这样回答。

“照你说，这是工程设计的错误。王八蛋！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无忌可真动了肝火，肆无忌惮地破口大骂。

“老兄走累了，喝些茶，擦把脸吧！这些我们可以反映到上级考虑的。”方生把湿手巾投给无忌，安慰了几句。

“刚才你一个人低着头叽里咕噜些什么？那张纸给我们看看。”两人接过方生的词摇头念了一遍。

“很好很好，方生兄潇洒一如往昔。”有道恭维了两句。

“不通不通，献丑献丑！”

“我看前半段还能反映实际，后半段，简直是歌德派诗意，反映文人的无耻！”无忌把刚才的怒气转移到主人身上。

“老兄知道我是不大看小说的，我连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都没看过，怎会受到他的影响，未免太抬举我了！”

“我说你这书呆子太迂，思想不开朗。所谓歌德派是指专事歌颂功德的那派‘学者’。你看！怎见得护花使节就会到来？即使他来后，怎见得能使‘宇清如激，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什么‘心自在，任翔逸’，还不是为了歌德而填词？”无忌接着又发挥了一顿。

“这是我的信心，至少有这样的愿望，至于你说的歌德派诗人实未敢攀援！”方生答辩了几句。

“对我们自己的政府歌德一番亦无不可，怎见得就算无耻？”有道正襟危坐，说得很正经的模样。

“歌德原是该的，专门歌德，样样歌德，就有问题了。还有一种‘但丁’派诗人，但知盯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稳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歌德——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当然不

是指你老田。”无忌说。

“老甄此话倒有道理的，对的地方我们应该竭力拥护，错的地方就该提出意见，一味歌德——但丁固然不可，一味谩骂企图否定一切亦非所当。”方生说。

“话虽如此说，不过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们却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坯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与错误，竟不需人民的监督的。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治的特点。”无忌说。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党提出揭发人民内部矛盾呀！以前阶级对立为主要矛盾，现在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了。”有道插嘴说。

“不错！但是以前的内部矛盾早不由人民来揭发，单靠领导来处理，也未必合理。例如东安市场的避孕套解放以来据统计曾经过过无—— 一有—— 一无—— 一特多等反复步骤，实际上是反映着领导对于人口问题的认识的改变，我看不出客观条件有什么改变。尽管马寅老懂得这些，他也不可能起作用。十分之九以上的人被当作阿斗，十分之一以下的人的脑袋被认为是灵的，而应起主宰的作用。这就是现政治的特点。我夫妇生了六个孩子，个个自小健康，从未住过医院。我妻被公认为一个善于抚育子女的好母亲。子女多，为社会多尽了一些责，脸很光彩。但从目前提倡节育的观点看来，子女多为社会添了困难，还是国家的罪人呢！”方生说。

“这真叫‘假作真的真亦假，有还无……’”无忌诵起红楼梦里的诗句来了。

“我想领导的本意是在揭发起群众的智慧，鼓励起他们的积极性，使人尽其才：绝不是只叫人听着话埋头去做。”方生说。

“尽管说得好听，目前只有歌德——但丁派学者是红的，因为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己认识到的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才被称为政治性强。论这些学者们的真实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当年闷声不响，虔诚地学习孟德尔遗传学。一当什么所见，不免在上任以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学说不大时髦，于是又发表了‘我的认识的三部曲’。近来赫鲁晓夫又把李森科称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样说法。”无忌说。

“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腆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方生也激动了。

“这方面渐渐的大家都会看清楚的，我们的党和政府是在不断的纠正缺点；和错误中进步的。”有道说。

“很好！让我们先帮助政府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我们把意见提给区人民代表请转达罢。他们也该睡醒了呢！”无忌说。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点：（1）这次马路损坏究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2）重修花了多少人民的冤枉钱？公共汽车损失多少？（3）谁应负责？应怎样处理？请求逐条解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请把解答在《北京日报》上发表。

全文到此为止。黄万里后来还写了一个续篇，也在校刊发表。据当时在水利系任教的赵文源回忆：“1957 年春，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动员各界人士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改正缺点和错误。黄先生积极响应号召，在校刊《新清华》上连续发表了《花丛小语》，提出了他的某些看法，不想因此被认定为货真价实的右派，甚至在后来平反时，还被认定为货真价实的右派，迟迟不肯平反。当时号召大鸣大放，每期《新清华》出刊，我们青年教师都热烈地传读、议论，很感兴趣。现在，回想起来，黄先生在文中提出了当时知识分子中的一种现象，即只盯住领导的一句话，就机械执行（文中名之为‘但丁’派）。另一种现象为只评功摆好，明知不对，不说为佳，不肯讲实话，明哲保身（文中称为‘歌德’派）。文中举有实例，只是真人姓名用明显的隐喻代替了（如敢讲真话的人隐改为‘金大朗’，人们稍加分析就可知道是钱伟长先生）。这实际是对某些不肯讲真话的老教授的一种善意的批评（或许微带辛

辣)。《花丛小语》文中还指责了道路连年翻浆，通车不便，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为了这些，还为黄先生指出了苏联专家在黄河三门峡枢纽设计中的不足……他被错划为右派。”

校领导自然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从《花丛小语》中嗅出了什么什么的“动向”，旋即把它汇报上去，一直呈送到最高领袖的案头。黄万里199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有一次，毛泽东遇见我父亲黄炎培，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后的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长江文艺出版社《长河孤旅》116页）

这里需要补叙一段。黄炎培是一位大教育家，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曾创建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中的两个，民盟和民建，并任首届主席。黄炎培年轻时立志不出仕，民国初期的袁世凯，和后来的黎元洪政府都请他去北京任全国的教育总长，他一一辞绝，还参加了倒袁运动。袁世凯万分无奈，斥其为“江苏人最不好搞，与官不做，遇事生非”。蒋介石也几次封官许愿，他一概婉言谢绝。直到遇到毛泽东，黄炎培为毛泽东的理想和人格折服，以七十四岁高龄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是毛泽东的老朋友。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他和毛泽东关于周期率的谈话，流布久远，广为人知。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

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建国后，黄炎培在教育、经济、政治方面都担负重任，与毛泽东常有交往；他的哲嗣黄方毅先生告诉笔者，手里迄今保留有毛泽东写给父亲的一百多封信函。但是，友谊是友谊，政治是政治，毛泽东这里明确指出黄炎培家里分左、中、右，就是给黄万里定性了。《人民日报》随即刊发了《花丛小语》，并以“什么话”为题，展开对黄万里的批判。

黄炎培一家，岂但黄万里在劫难逃，黄万里的两个弟弟黄大能、黄必信，两个妹妹黄路、黄素回，也都被定性为右派。内中，黄路 1957 年鸣放期间一言未发，竟被定为“腹诽”。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如是我闻：1958 年，当清华党委向黄万里宣布划为右派分子的决定，你猜黄万里怎么回答？他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

3. 痛定思痛

1957 年 3 月 29 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说：“全国知识分子大约 500 万。”而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主要成分是知识分子），官方的说法，是 55 万。

二十年后的 1979，中共中央承认“反右扩大化”，决定对除少数“大右派”以外的所有右派分子予以“改正”。这一行动，无疑是勇敢而正确的。那少数大右派的名单，起初是 96 人，而后逐渐缩小，最后剩下 6 人，分别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林希翎。

六位主人公，有谁曾为反右运动“立此存照”？

杨绛在《我们仨》中有一段掠影，她写道：

> 锺书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时，已感到将有风暴来临。果然，不久就发动了反右运动，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
>
> 运动开始，领导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内部矛盾终归难免的，不足为奇。但运动结束，我们方知右派问题的严重。我们始

终保持正确，运动总结时，很正确也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但我们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也就逃过了厄运。

钱锺书年初就感到风暴将临，这是他的敏锐，足见不是书呆子。运动过后总结，承认“对右派言论有共鸣”，这是还自己为“人”，不是“神仙”。但又“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这就是高。杨绛这里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涵括了处世的要言妙旨。

李洪岩的《钱锺书与近代学人》一书提到，五十年代，钱锺书参与翻译毛泽东诗词，与袁水拍、乔冠华、叶君健等人组成毛诗英译定稿小组。“忽然有一天，上级传达有重要任务，要大家做好准备。书生们纷纷猜测，感到十有八九是伟大领袖要接见大伙儿，不禁生出无限激动。而恰在此时，钱锺书却声称自己病了，自然，结果就像后人说的，他硬是没去。”

在中国，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与权力紧密相扣。何况施恩的又是伟大领袖。钱锺书却“病”而避之，他活得清爽，活得尊严。我猜想这事无人识透，是以也就无人告密。因为一万根“会思想的芦苇”中，很难找出一根有钱锺书这等腰杆。

黄万里惯于吟诗填词，1957 年，他因一阕《调寄贺新郎》触了大霉（笔者猜想他早年的诗词，或为抄家扫荡，或因惧祸焚于一炬），然而积习难改，身处逆境，仍然动不动就舞文弄墨。晚年，他以诗文记叙了自己在反右前后的思想历程，且看：

1955 年苏联专家为治理黄河拟具了一个轮廓，水利部召集一些人去提意见。我提出了不同的见解。1957 年 4 月，一面已在改建峡州为三门峡市，工地筹建施工设备，一面却召开扩大会议，征求对修建三门峡大坝的意见。我出席争辩了七天，详情载于《中国水利》1957 年第 8 期，另一期（第 9 期）专门批判我的论点。这之前，我发表了《花丛小语》短文，文内也攻击一些老“治河专家”一味捧场，不发表相反意见。6 月，我已被定为右派。我当时预言黄河潼关以上将大淤，并不断向上游发展，今日黄河下游的灾情将移到中游，特别是渭河，那里人民也将修起生产堤。总之，这坝是修不得的。最后我提出，一定要修，请将河底六个施工泄水洞勿堵

死，这点大家同意了。但是最后苏联专家仍坚持按原计划堵死。近年这六洞又重新以每洞约一千万元的代价打开。

1960年起，潼关以上黄、渭河大淤，淹没损失是原来考虑到的，但是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倒坍冲了农田八十万亩，一个县城被迫搬走，一切像我预报的那样出现。我写了《念黄河》长诗。1963年听说水利部集会，各家提出了改造三门峡坝工程的意见，仍未能纠正此坝修建时的错误观点，又写了《哀黄河》长诗。

念黄河

一九六二年八月

闻黄河中游淤塞，三门峡水库不能蓄水，一如当年愚言。怅惘之余，诠次为七言长句。

有水有水号黄河，荡荡奔放挟沙多。蛟龙千里长堤束，坼岸潦原在一呵。有父为君身毁灭，其子称王息洪波。千古英雄淘既尽，犹怀磊块欲如何？念君气度亦爽飒，清渭浊泾兼引纳。肯吐琼浆淤万顷，千年斯土民践踏。人间浅识一何多，斩断沙流三门阖。更在东平潴漾漾，丰功伟利云综合。诏谓君氛从此靖，颂请不乏鲍参军。奇祥异瑞争来送，胜利冲来头易昏。樗散书生不晓机，竟然抗疏犯龙鳞。紫芝盛世岂应唱，肠热鲁连理必伸。源头水土应保恤，沙入河槽须纵逸。洼道轮流潦可泄，立农建土赖洪积。而今坝蓄复堤塞，清水顶冲长告急。行见渭滨仓廪实，翻为云梦鱼虾没！廷争面折迄无成，既阖三门见水清。终应愚言难蓄水，可怜血汗付沧溟。徙薪曲突非求泽，烂额焦头自上鬟，肠断秦川陇水咽，艳阳遗照此精诚。

哀黄河

一九六三年八月

癸卯伏雨，闭户披览各家改建三门峡坝工程意见。顿起无穷之虑，怅望禹功，泪垂无已。

昏昏八表停云里，风雨凄凄满地水。闷煞书生不得出，闭门重讨治河技。百家宏论亦纷纷，造坝节流曾一是。留洞排沙谋不用，枉教民徙无常止。曾参岂是杀人者？郑国莫非怀鬼士？尽说河清定可期，长堤千里顶冲涘？可怜血汗付东流，留得空库仰谷底。五载尔来管葛多，改持开洞排沙旨；纷纷献计泄库藏，但恨水高壅远沚。噫吁嘻！异哉奇计！摆脱秦灾复能几？郑渠垂就木成舟，应尽水库功用起；兴利除灾指顾间，巧谋犹待细研揣。凡今谁是出群雄？翡翠兰苕千手指。谁掣鲸鱼碧海中？百年难遇风流子！莫教碧眼笑千秋，莫使禹功坠如此！雨打窗声催转急，愿闻扫却杞忧矣。

黄万里的命运是屈原式的，他已被革命的风暴卷落在荒原，仍一路苦苦悲吟他的黄河，他的三门峡。爱因斯坦说："方程式对我更重要，因为政治只看眼前，而方程式是永恒的。"这话在中国大陆不适用，因为政治包罗万象，囊括一切，方程式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现行体制需要的是标准型号的"螺丝钉"，不是异型的"大部件"，等待黄万里的，只能是淘汰。

可怜的黄炎培，面对一门五右派的残酷事实，他得一个个地做工作。他对黄万里说："你为什么划成右派？你不要老钻牛角尖，光想着自己在水利问题上的见解是对的。在水利问题上，你的见解可能是对的，但是放到一个国家的大范围来说，你可能就不对了，可能是影响了国家的事情。如果这样来考虑问题，你可能就想通了。"

反右运动，没有伤着季羡林一根毫毛。不对，伤还是伤了的：他的心。季羡林眼看那么多人被划成右派，内中不乏与他交深谊厚、性情相投的，岂能无动于衷！比如说，李长之和张天麟。李是他小学、中学、大学三连贯的同学，清华园"四剑客"之一，张是他的初中同班。这两人都在北师大。李长之倒霉就倒霉在他的《鲁迅批判》。按，李长之撰写该书是 1935 年，当时的"批判"一词，等同于后来的"评论"，所谓"鲁迅批判"，其实就是"鲁迅评论"或"鲁迅介绍"。该文起先是在报纸上连载，得到鲁迅本人的认可，鲁迅还给李长之寄去一帧肖像照，供出书时印在封面。五十年代的革命闯将毋须咬文嚼字或刨根究底，他们只要知道，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批判鲁迅，就是批判新

文化运动，就是反革命，即行。最愚昧的也最实用。李长之吃不了兜着走，五七年只有老老实实地认领他的“右派”（鲁迅是早生了——不，早死了——几十年，无以亲见这一幕闹剧，否则……）。张天麟的罪名，不甚了了，在季羡林的印象中，他为人活跃，经历复杂，建国后历次运动，都少不了挨整，反右一来，更是过不了关。李长之升“右”后，剥夺教职，贬在图书室搞资料，成了一个“不可接触者”。季羡林的身上缺乏侠气，他做不到为朋友两肋插刀，李长之陷入深渊，他没有前去看望，这使他良心受到谴责，结果仍然没去，良心越发不安。这里彰显的是当时人们的一种普遍心态：尽量离右派远一点，再远一点。今人可能会责怪他们：为什么如此无情？其实，更应该责怪的是政治本身：为什么如此冷酷？直到“四人帮”垮台，长之“摘帽”，两人才碰头。是长之主动来的，见面第一句就说：“我以前真不敢来呀！”跟着伸出了右手——我的天，那是一只什么手？五指弯曲，僵硬如鸡爪。季羡林明白，这弯曲的背后是什么况味。长之不就去世了。呜呼！长才未展，命途多舛。赍恨以终，死不瞑目。长之的悲剧，让季羡林一颗敏感的心不得安宁，他的老境愈是顺遂，愈发觉得愧对亡友，直到 2001 年写出《追忆李长之》，才对自己的良心算是有了个交代。

至于张天麟，季羡林曾去北师大探视，还送了钱。具体时间不详。可怜的天麟，他活着的唯一价值，似乎就是供人们批斗。七斗八斗，终于斗出了病。说不出名字的怪病：全身抽筋。这是不是一种象征：右派分子的筋都是被抽了的。这种病的特点，就是痛。据说发作时，天麟彻夜嚎叫，声震屋瓦，连三楼的住户都听得胆战心惊。家人把他送进北京一家大医院，大夫琢磨很久，开出了一种名贵的药，很贵很贵，常人难得一用。有位法制观念极强的医务人员问天麟：“你是几级教授?”答曰“四级”。对方立刻拉长脸：“这药你没资格用。”天麟无奈，只得转院，北京找不着适合的，就转去了上海。从此一去不复返，就这么走了，永远永远。

季羡林经历“文革”的磨难，苦尽甘来，顺顺当当地来到世纪末，算起来，他已年跻耄耋。人生到了这个岁数，还有什么想不开，摆不脱？他需要让神经松弛，让灵魂安顿。于是，回顾当年那场扼杀、肢解人性的反右，回顾李长之、张天麟两位亡友，兼回复天下所有良知者的质疑（尽管无声，但当事者无时不在倾听），1999 年，季羡林写下了

《记张岱年先生》一文，袒露自己的心结，他说，他特别强调地说："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但是，我绝不是说，凡没有被划者都不是好人，好人没有被划者遍天下，只是没有得到被划的'幸福'而已。至于我自己，我蹲过牛棚，说明我还不是坏人，是我毕生的骄傲。独有没有被划为右派，说明我还不够好，我认为这是一生憾事，永远再没有机会来补课了。"这末一句，看似轻松调皮，实则包含他多年的反思、无尽的歉疚，以及无穷的悲愤。

2009年3月1日下午，笔者去301医院探望季羡林先生，交谈中，我把话题引到王竹溪。有资料说，1957年，北大物理系揪出了一大批右派学生。作为系主任，王竹溪认为，这批学生入学时不是右派，读了几年书就成了右派，学校和老师应当承担责任。这是很个性，也是很有人性的说法。因此，王竹溪坚持对他们以教育为主，尽量不作处罚，即使处罚，也要从轻。这说法显然不合时宜，不会得到采纳，王竹溪于是买了三只鸭子，到未名湖边当鸭倌去了。——这事是很见风骨的。我向季先生询问故事的真实性。老人默了一默，说，你就这么写吧，王竹溪这人值得纪念。

本书第六章提到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他留在唐山交大，季羡林说，建国初期，两人时有来往。1957年，胡思杜右派加冕，走投无路，跳楼自杀。

由胡思杜又想起他的哥哥胡祖望，他是跟胡适去了美国，以后就泥牛入海，再无消息。直到2005年3月15日，笔者才从网络觅到他的讣闻，是中新社发的。全文如下：

胡适长子胡祖望病逝美国　曾表示愿葬在父母墓旁

据《中国时报》报道，胡适长子胡祖望于华盛顿当地时间12日晨因老年痴呆症及肺炎、中风等并发症病逝，享年八十六岁。

记者在位于台北"中央研究院"附近的胡适公园看到，胡适夫妇合葬墓的东南侧的一棵椰子树已于3月9日由工人砍倒。这棵树旁，有一块胡祖望为其弟胡思杜而置的约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纪念碑。胞兄祖望泐石。"这块石碑旁的草地已清理完毕。

有消息说，胡祖望生前曾表示，愿死后葬在父母的墓旁，并与弟弟相伴。

1919年出生的胡祖望，是近代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知名人士胡适的长子。

胡祖望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机械工程。毕业后服务于美国斯都德贝克汽车厂，后担任中华航空公司的工程师、台湾驻美国机构“经济参事”等职。1980年胡氏退休。

胡祖望遗有妻子曾淑昭女士和独子胡复。胡适、胡祖望、胡复祖孙三代均毕业于康奈尔大学。(耿军　曾嘉)

进入互联网时代，钱学森在“大跃进”岁月写的三篇关于“亩产万斤”的文章，饱受诟病。第一篇发表在《人民日报》，时间是1958年4月29日。请注意这个时间，它比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还要早将近一个月。文章的题目是：《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其中谈到“科学的跃进要乘风破浪，这是完全可能的……既如此，我们就应该把眼光放远些……最近我算过这么一个粗浅的账，就是地球上一个单位面积上，受太阳的能有多少。假设我们说，一天太阳光照在地面上，只照八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小时太阳光照上去，如果我们只计算1%的能用来转变为植物有效利用的能，这个能把水和二氧化碳转变为淀粉，那么就可以在一亩面积上年产约八千市斤的淀粉。”

两个月后的6月16日，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又发表了一篇短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文章说：

“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6月12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斤以后，又有2亩9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3530斤小麦。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

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160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160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这篇短文影响巨大，据李锐在《反思大跃进》中披露，大约是在同年底，田家英曾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

《钱学森实录》没有回避这桩公案，在1958年10月27日的条目下写道：

上午10时，毛泽东主席来到北京中关村生物研究所，在钱学森、张劲夫、赵九章的陪同下参观了中科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

在毛泽东与钱学森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谈到不久前钱学森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论证农业产量的科普文章。文章认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能。若把每年射到每亩地上的太阳能的30%作为植物的利用部分，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转化为可吃的粮食，那稻麦的产量不仅是现在的亩产二三千斤，而是二千多斤的20倍。钱学森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有错误。"毛泽东笑着回答说："原

来你也是冒叫了一声。”又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是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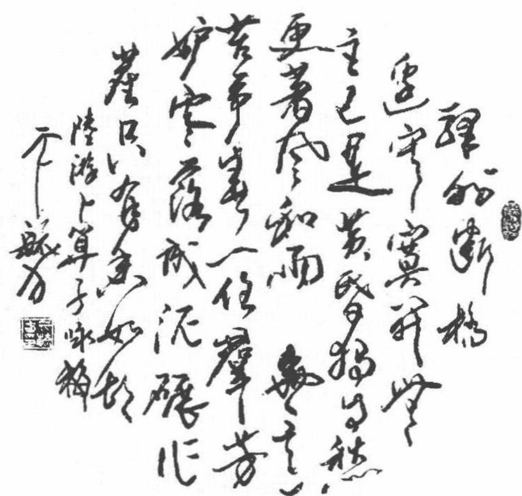
于是，世人看到，1959 年 9 月，在以“反右倾”为标志的庐山会议刚刚结束之际，钱学森又以新近入党的新党员的身份（钱学森加入共产党时间是 1959 年 8 月，排季羡林之后，列六位主人公中的第二位），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发表了《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一文，对前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产量问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证：

> 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 94 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 94 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 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 15.6 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 7.8 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 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 5.85 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 2/3 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 3.9 万斤了。
>
> ……同样的计算也可以用来估计快速丰产林木的数字。这里相当于粮食的是蓄材量，也就是每年每亩地上的积累的木材重量。如果是常绿树，全年都长，每亩地的积累的木材重量是 5.85 万斤；如果是落叶树，就是 3.9 万斤。倘若木材属于轻质的，重量按每立方米 900 斤计算。那么全年都长的常绿树，每亩每年可以积累木材 63 立方米，而落叶树每亩每年可以积累木材 43 立方米。

这篇文章，《钱学森实录》同样没有回避（可见它是严谨的），但是只轻轻点了一句：“文章通过太阳能估算了粮食和木材等的单位面积年产理想极限量。”

怎样评价钱学森的“想像”呢？1958 年，笔者刚刚升读初二，对国事懵里懵懂，但是那种举国狂热的气氛，还记忆犹新。譬如说，班级与班级打擂台，争放体育卫星。我们班宣布当年年底全部达到少年劳卫

制标准，并有十人达到三级运动员标准，五人达到二级运动员标准。这已经是很大的牛皮了。但是高中部的一个班说，到年底，他们班全部成为运动健将。结果，这个班击败其他班级，荣获放卫星冠军。我是喜爱体育运动的，当时怎么也想不通，运动健将？全校、全县也出不了一个，怎么可能一个班个个都达标呢?！后来听老师传达上级精神，说结果是次要的，可能性是次要的，关键是要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瞧，这就是当日的时代背景。把钱学森的文章置于这个大背景下，我再一次阅读体会，我要说，我宁愿相信钱学森是真诚的，在主观上，他的确认为只要条件充足，粮食、林木的产量就可以达到那样的结果。至于文章的后果，当然啦，这是就事后而言，它极大损害了钱学森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



第八章 “文革”悲欢

1. 泛 论

假如要用一个词给二十世纪的中国定性，那就是革命。毛泽东有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场暴动。”这话搁在1949年之前，是天经地义。但如搁到1949年之后，而且翻来覆去，无休无止，整天价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就未免错估敌情，自乱阵脚。

话说1966年的中国，在迭经反右、反右倾、社教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革命运动之后，又爆发了一场更为激烈的文化革命。革命的对象名为文化，实则是人，而且圈定有文化的人。文化革命是在上层酝酿的。官方的公开的说法，是在“文化”之后、“革命”之前，插入一个“大”字，即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大”，既象征它的来头，又概括它的威势，以及不绝如缕的余响。

2. 天堂与地狱

古代史无法写，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而近代史也不可能写，因为我们掌握太多的资料。

——贝玑《克丽娥》

钱学森：在另一条战线

在神州大地，钱学森的名字是和“两弹一星”联系在一起的。自打他1955年底从大洋彼岸返回，就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对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王文华的《钱学森实录》，对钱学森的经历有着详尽到月到日的记载，本文且以年度为单位，看看他在“文革”期间的大事记：

1966年：“两弹”腾空，震惊世界。一杯水酒庆胜利。

1967年：全面负责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工作。击落台湾U－2飞机的正是钱学森主持研制的地空导弹。

1968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别人狂呼“造反有理”，钱学森强调“卫星上天”。

1969年：当选党的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受命危难之际，力排派性干扰。

1970年：卫星上天，举世沸腾。荣任国防科委副主任。

1971年：年轻专家一觉醒来，看到的是钱学森依然坚守在指挥岗位上。“实践一号”卫星又胜利升空。

1972年：组织领导运载火箭和洲际导弹研制工作。“四人帮”捣蛋，叶帅怒斥：此时不造，更更待何时！

1973年：当选党的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提出建立导弹卫星测控网的概念。

1974年：任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远洋测量船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抵制“四人帮”的空头政治，潜心致力于航空航天事业。

1975年：成功组织发射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叶帅、小平眉飞色舞。

1976年：总理去世，泪如泉涌。“四人帮”倒台，活力焕发。又成功组织发射了一颗返回式卫星。

王文华回顾：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钱学森协助周恩来总理，为领导人造卫星研制计划的正常进行，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由于“文化大革命”，“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试车无法进行，1969 年 7 月 17 日、18 日、19 日和 25 日，周恩来总理连续四次召开会议，解决二级和三级地面试车问题，委派钱学森协同七机部军管会副主任杨国宇全权处理有关试车事宜。从而得以在 8 月 22 日取得试车成功。1970 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戚发轫等在酒泉卫星发射场组织实施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工作。1970 年 4 月 24 日，质量为 173 公斤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钱学森和发射基地的领导人及试验队的代表在现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等参加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研制的代表。这颗卫星向全世界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宣告了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钱学森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在当时是严格保密的，不仅一般人不知情，连他们的家人也被蒙在鼓里。然而他们作出的成就，却令举国腾欢，环球共仰。一位海外专栏作家有过如下的评述：

> 1960 年到 1977 年，是中国大陆发展飞弹的黄金年代，曾靠着众多人口和传统兵力作战的中国军队，短短二十年内，居然有了最先进的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对于这样的转变，凡是介入钱学森事件的美国官员，都知道这是钱学森所带动的。

钱学森的工作，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到特殊的保护。早在 1966 年 8 月 30 日，周恩来总理亲自列了一个免受冲击者的名单，其中就有钱学森。《实录》在 1969 年部分，还提供了如下一个细节：

> 8 月。周恩来对七机部的军管会领导人杨国宇说：“钱学森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惟你是问。”杨国宇拿了这个“令箭”，开列了一张需要有卫兵保护的专家名单，呈报周恩来。周恩来很快就批准了，表扬了这种做法，还说：“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你的任务就是要想尽一

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

笔者查阅有关资料，1966年国庆节，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六十名科学家代表上天安门观礼，其中就有钱学森。

1968年，钱学森曾给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友人寄去一张圣诞贺卡，上面是画有一枝梅花的国画，钱学森在梅花旁边用英文写道：“这是在逆境中盛开的花儿。”至于周总理的恩德，钱学森更是没齿不忘，他曾多次回顾：“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是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陈省身：在另一个国度

陈省身隔岸如隔世，“命”字有八画，他最宝贵的一画是越过了汪洋无际的劫波。人说“渡尽劫波”，他不是渡尽，是一飞而过。陈省身得以集中精力，在数学的大海里畅游。张奠宙、王善平的《陈省身传》，为我们勾勒了他在六七十年代的大致剪影。

一：1960年，陈省身由芝加哥大学转往伯克利的加州大学，在那儿整整工作了20年，这是他的收获季节。陈省身回忆说：“几年的努力，确使加大成为一个几何和拓扑的中心。我的学生很多，其中完成博士学位的有31人。”在芝加哥时期，他培养了10名博士，在伯克利，又培养出31名，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

打开伯克利加州大学数学系的网页，其中写道：“伯克利的数学系，已经被公认为世界上学科门类最全、最有活力、最杰出的数学系之一……按照美国教育委员会的排名，伯克利的数学师资水准，1924年位居全国第十一位，1957年位居第四位，1964年位居第二位，1970年达到第一位”。这与陈省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二：鉴于陈省身的学术声誉如日中天，1961年，美国科学院有意推选陈省身为院士，这是美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但是，入选美国科学院必须是美国公民，直到这时，陈省身才想到，只有中国国籍确有许多不便的地方。他回忆说：“我的美国公民资格虽已通

过，但迟迟未去宣誓。当选有些征兆，所以赶紧去宣誓，两者相距不到一个月。”这样，陈省身成为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第一位华裔数学家。

请注意这儿的“华裔”一词，至此，陈省身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不管什么理由，什么动机，加入了美国籍就是美国人。再请注意这儿的“宣誓”，宣誓就是向美国政府效忠，早也好，迟也好，这都是必须的。

1975 年，陈省身名正言顺地荣获美国国家科学奖，这是在美国科学、数学、工程方面的最高成就奖。

六七十年代，陈省身作为一个美国数学家，已经是世界顶级的大腕，如果说钱学森是中国航空航天工业的领军人物，那么，陈省身则是美国数学界的领军人物。

杨绛：在另一种维度

杨绛由于家庭出身、教育背景，以及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她不管如何披“隐身衣”，也逃不脱文化革命的冲击。

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披露：杨绛平常显得很文弱，但在关键时刻，又豁得出去，比谁都坚强。且看：

1966 年 8 月 27 日，被杨先生认为是她非常不幸的一天。白天在办公室，她被迫交出《堂·吉诃德》全部翻译稿（第一部已全译完，第二部已译毕四分之三），那可是她的誊清稿，未留底稿。晚上在宿舍大院陪斗，被剃光了半个头，成了“阴阳头”。

钱锺书比她还着急：明天怎么出门啊？那时，“牛鬼蛇神”是不准请假的，得天天在“牛棚”等候挨斗。杨绛却不惊慌，只冥思苦想，上楼回家时灵机一动，有了主意。她记起阿圆几年前剪下两条大辫子放在柜里，就找出一个掉了耳朵的小锅当楦头，用锺书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足足费了一夜工夫，做成一顶假发。第二天早晨，她就戴着这顶假发出门。

杨绛是 1966 年 8 月 7 日被“揪出来”的，对她的劳动惩罚是

收拾办公楼的两间女厕所。杨绛自己置办了小刀、小铲子等工具，还用毛竹筷和布条扎了个小拖把，带上肥皂、去污粉、毛巾和大小脸盆放到厕所，就埋头认真打扫，细细擦洗。不出十天，原先污秽不堪的厕所被她收拾得焕然一新。斑驳陆离的瓷坑及垢污重重的洗手盆，铲刮掉多年积垢，擦洗得雪白锃亮。门窗板壁擦得干干净净，连水箱的拉链都没有一点灰尘。定期开窗，流通空气，没有一点异味儿。进来如厕的女同志见了都不免大吃一惊，对杨绛顿生敬重之心。

杨先生自称在"牛鬼蛇神"一伙儿里，无论年龄、资格、地位，她都最小，"揪出"也最晚。可谁也没想到她竟会成为一次专场批斗会的主角。起源是"清理阶级队伍"时，文学所的革命群众贴了一张钱锺书的大字报，把文学所已经查清了的黑材料又给捅了出来。杨绛闻讯，当晚和钱锺书赶到学部大院，在这张大字报下边贴了一张小字报辩诬。外文所的革命群众起初并不知情，他们以为钱锺书真有如黑材料揭发的那么反动，而身为"牛鬼蛇神"的杨绛，竟敢在揭发钱锺书的大字报上贴小字报申辩，真是胆大包天，反了！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

群众想压服她低头认罪，不料她却气焰嚣张。

问她："给钱锺书通风报信的是谁?"

答："是我。"

又问："打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

答："是我。提供线索，让同志们调查澄清。"

台下一片厉声呵斥："谁是你的同志?"杨绛不客气，干脆就称"你们"。她竟和革命群众顶嘴了，还跺脚说："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 ……"

革命群众被惹恼了，递给她一面铜锣、一根棒槌，命她打锣。她正在气头上，没处发泄，下死劲狠敲猛打。这下可闹翻了天，群众驱她到学部大院去游街！

杨绛头戴尖顶高帽，颈上挂着被水泡得发霉的一块脏兮兮滑腻腻的木板，举着铜锣，被押到人众稠密的食堂绕行一圈，又到院内各条大道上去"游街"。走几步，打两下锣，叫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背后跟着一串"牛鬼蛇神"。

杨绛的同事叶廷芳，若干年后撰《杨绛先生印象记》，说，杨绛最初给他的印象，“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又是个‘文弱书生’”。在那次批斗大会上，所有的“牛鬼蛇神”都低着头，“出乎人们意料，偏偏杨绛拒绝服从，她满面怒容地昂着头！人们斥问她为什么如此顽固？她怒不可遏地跺着脚吼道：‘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那形象真像一头愤怒的猛狮。杨绛的这一大无畏之举，使在座的‘革命群众’中的许多年长和年轻的同事心中引起共鸣或灵魂震撼。从此我对她刮目相看，觉得在她柔弱的外表之内，蕴含着刚直不阿的精神情操和对丈夫真挚、深厚的爱。”

杨绛本人，则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中留下了漫画式的一笔。她说：“聪明的夫妇彼此间总留些空隙，以便划清界限，免得互相牵累。我却一口担保，钱锺书的事我都知道。当时群情激愤——包括我自己。有人递来一面铜锣和一个槌子，命我打锣。我正是火气冲天，没个发泄处；当下接过铜锣和槌子，下死劲大敲几下，聊以泄怒。这来可翻了天了。台下闹成一片，要驱我到学部大院去游街。一位中年老干部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被污水浸霉发黑的木板，络上绳子，叫我挂在颈上。木板是滑腻腻的，挂在脖子上很沉。我戴着高帽，举着铜锣，给群众押着先到稠人广众的食堂去绕一周，然后又在院内各条大道上‘游街’。他们命我走几步就打两下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想这有何难，就难倒了我？况且知识分子不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叫又何妨！我暂时充当了《小癞子》（笔者注：杨绛翻译的西班牙小说）里‘叫喊消息的报子’；不同的是，我既是罪人，又自报消息。当时虽然没人照相摄入镜头，我却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中，观看自己那副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七长八短一队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那场闹剧实在是精彩极了，至今回忆，想象中还能见到那个滑稽的队伍，而我是那个队伍的首领！”杨绛的这一面，显现了她隐藏得很深的士大夫风骨。

侯仁之：在另一门历史地理

侯仁之是当权派：副教务长、系主任。文化大革命一来，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黑帮：北京大学黑党委的帮凶，北京市黑市委的爪牙；还是“三家村”黑干将，邓拓他们在《北京晚报》开辟“燕山夜话”，他在北大校刊开辟“校园史话”；还是反共老手：当年在燕大向解放区输送爱国学生，被说成是派遣特务；还是托派余孽：初中一位好友被打成托派，他一直抗拒交代；还是……总而言之，按照那些罗列的罪名，他是十恶不赦，死有余辜。

鞭痕易褪，心伤难消。侯仁之沉痛地回忆：“头一次批斗我，是在大礼堂。记得有我、周一良，好像还有季羡林。校长是陪斗的。我和周一良最厉害。挂着牌子。上面写着‘侯仁之’，还写了什么，我忘记了，总之和吴晗有关系。大礼堂是头一次，大操场，大饭厅，游街。戴着高帽子，出大南门到海淀街，往西走，从西南门再进来。”

那段凌辱不堪的岁月，日后被他人记录在案：“‘文革’中，一次偶然路过地质地理系所在的‘地学楼’，看见侯仁之一个人站在大门前的台阶上，头上戴着一顶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写有他名字并打着红叉的牌子，背上贴着一大张白纸，用黑墨写着‘大王八’。周围并没看见监视他的人——时值中午，大概‘革命小将’吃饭去了。在正午阳光长时间的照射下，侯仁之实在坚持不住，慢慢蹲了下去，人们对示众的‘牛鬼蛇神’已是司空见惯，往来匆匆，没人注意。”（见于陈光中《侯仁之传》）

艰难的岁月，才凸现亲人之亲。“有一天，是夜里，快睡觉了，造反派叫我去，到地学楼。”侯仁之回忆，“张玮瑛说天冷了，你穿个厚裤子，棉裤。她说，要打你的！果然打我了。——我进去以后，他们叫我认罪，但我不服，我也不说话。打我也不说话！”

经过情况是：那天，时间已经很晚了，“造反派”突然闯来。“革命小将”传讯，那是丝毫耽误不得的。侯仁之刚要穿上外衣往外走，张玮瑛说：“天冷了，今天你还是多穿一条棉裤吧！”侯仁之不解其意，张玮瑛低声说：“要打你的！”

侯仁之平时脾气极为随和，但犟起来比谁都厉害。“造反派”让他交代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他抵死不承认，职是之故，几乎每次传讯，都要挨打。一般传讯开始，总是先让他摘下眼镜。侯仁之近视，离了眼镜，就谁都认不出来了——这着高，“造反派”先生原来是怕曝光的——然后让他低头弯腰，成九十度直角，坦白交代“罪行”，稍不服从，一旁抡圆的皮带、棍棒，就会狠狠抽向他的脊背。张玮瑛熟知老侯的脾气，但爱莫能助，只得特地准备了一条棉裤。那是条老式的“缅裆裤”，裤裆深，腰身高，几乎可以提到胸部。这样可以保护后腰，不致在挨打的时候伤了内脏。那天果然打得非常厉害，幸亏有那条棉裤抵挡，侯仁之居然挺过来了。

“文革”中，最让侯仁之“触及灵魂”，而又心有余悸的，还不是批斗，而是另一档事。让我们看看侯仁之在燕大时的老朋友张世龙的回忆：

> “文革”开始，本来无侯仁之甚事，但不忿当时聂元梓领导的所谓“公社派”的横行霸道，于是和周一良教授（他燕大的同学，后继翦伯赞为北大历史系主任）等人静坐抗议。被公社派捉去，关押并严刑拷打。直至“军宣队”进校，才被“解放”。随之而来的江青黑手通过军宣队的领导深入北大、清华。为了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网罗了一批黑秀才组成“梁效”（两校之谐音）写作班子。为了壮声势，拉拢人心，还特聘几位名教授为“顾问”，三朝元老冯友兰自是首选。魏建功、林庚等名教授不得不奉命给江青讲点文学典故（吴小如教授也曾奉命陪江青看几出传统老戏，回来后对我自嘲是“文学侍臣”，这是皇帝弄臣之雅号而已!）。这一方面是出于无奈。另一方面也是避灾。或更重要者，很多知识分子还信赖毛主席、共产党，以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文革”大方向是正确的。江青到北大多次讲话，一开头总是：“我代表毛主席……”并且她的权力与日俱增，就是周总理也要让她几分。人们尽管十分不满她那骄横跋扈、颐指气使的态度，又不懂装懂、假充内行地装腔作势，（例如她在读别人给她准备的“批儒”稿中提到汉初的叔孙通，却自作聪明，以为是误笔，硬改为姓孙名叔通，闹出大笑话!）又不得不相信她就是代表毛主席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

充当“旗手”！所以虽不心甘情愿，却也只能“听指挥”。在“批儒”中，不知怎的刮起一股批判早被遗忘的古时儿童启蒙小书——《三字经》、《千字文》——的大风。有谄谀辈献上一部《子弟规》，江青看了大喜。这部罕见的三家店腐儒之作，只有作者姓名，并无出处，于是江青传令诸教授查询。侯仁之先生搞历史地理，熟悉“地方志”，很快从一部山西的县志中查出作者和写作情况，很得江青重视。恰好江青又不知拨动哪根弦，要去天津小靳庄搞“全民写诗”运动，下令周一良、侯仁之陪同。并要求严格“保密”（那时什么屁事都“保密”），不过侯先生回来后还是和我谈了他这一趟古怪的旅行。当时我就意识到此事不妙，搞下去很可能就坠入“梁效”的顾问班子难以自拔。翁独健是侯仁之最敬佩的师兄，于是立即邀侯先生共同访问翁先生，听取他的意见。果然，翁先生一听就表明反对江青倒行逆施的立场，并且明确说不可与他们沆瀣一气。怎么办？唯有躲开。躲到哪里？最后侯先生自己想出了一个主意，几年前西北有机关邀请北大地理系考察沙漠问题，就此，组织了几位教师和学生去西北实践。因为江青行事例不通知基层党组织，所以北大当时虽有党委，只知江青颇重视侯仁之教授，却不知给什么“任务”。这样北大领导就稀里糊涂同意侯先生去西北。这趟出行不但躲过了江青这一劫，并且还开启了侯仁之教授另一重要研究方向——西北沙漠之历史地理。周一良教授就没那么幸运，虽然与“四人帮”无实质瓜葛，仅是奉命找点资料的“文学侍臣”，可是“四人帮”倒台后，仍被隔离审查了好一段时间。

翁独健是侯仁之燕大时的同门师兄，“文革”前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他贡献的锦囊妙计就一句话：“三十六计，走为上！”这句话点化了侯仁之，赶紧脚底抹油，准备开溜。溜到哪儿去？张世龙说是去西北，侯仁之的女儿馥兴予以纠正，说是去了河北。起因是邯郸地区在“深挖洞”中挖出了战国遗址，侯仁之便以“开门办学”之名，带一批学生去实地考察。侯仁之这一去，就不敢回北京，生怕江青们再来找他出山，他一直在下面转，邯郸结束去了山东淄博，淄博结束又去了河北承德，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大地震，侯仁之就是在承德度过的。他这一转，倒转出了一门新的学科：城市历史地理，也可以说是因祸得福。

回到“梁效”，北大在它身上栽倒的不仅是周一良，还有冯友兰、魏建功和林庚。据说，季羡林只要稍微跳一跳，也就够着了“梁效”的门槛，他没跳，说明还是有一点政治头脑的。

季羡林：在另一幕人生

季羡林“文革”初期的处境，和侯仁之相似，尽管被冠以“走资派”、“反动权威”等罪名，但那都不是实质性的，只要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很快就会等到“解放”的那一天。偏偏他有正义感，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居然加入了一派群众组织“井冈山”。这一来，就把自己置于另一派群众组织、实际掌握北大权力的“新北大公社”的对立面。贺剑城的《亲历北大六十年》收录了他当时的一张大字报（笔者注：只是大概内容，并非一字不差），十分稀罕难得，让我们欣赏一下大教授是如何“造反”的。贺先生的文章披露：

> 某一天，我看到“地派”出版的小报《红干报》上，有季老的文章，由此我知道，他已倾向于一派了。后来我又在学生区看到一张讽刺“新北大公社”的大字报，通篇大字报上只画了一张《新北大公社入社申请表》，表上的栏目有：姓名　王张氏、性别　女、年龄　95 岁、职业　家庭妇女、嗜好　骂街。当时我不知它出自哪位高手，后来“井冈山”的一位朋友告诉我，那是季老的原稿，他抄写成大字报贴出去的。不久我听说季老正式加入了“井冈山兵团”，并且当了九纵的勤务员。

如此高调亮相，这就把自己置于风口浪尖，新北大公社当然不会放过他。首先是抄家，公社派出师大捷，一举抄出三样罪证。哪三样呢？第一，是一只竹篮子，里面装着烧了一半的信件。季羡林解释是因为腾出两间房子，让别人住（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嘛），积存信件太多，没地方放，只好烧掉一些（也说得通）。他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处理的（可见心里无鬼），被一个革命小将看到，说了一通这是难得的历史文化资料，烧掉可惜之类的话，季羡林认为有理，又不烧了，把剩下的装在一只竹

篮中。（要烧就烧彻底，教训！）这样的话，怎么能取信革命造反派呢！他们说那些烧掉的，肯定包含重大机密，你这是灭迹毁证。第二，是一把菜刀，是从季羡林婶母枕头下搜出的。文化大革命兴起，社会上一些坏人浑水摸鱼，入室抢劫之类时有所闻，一般进门先奔厨房，搜出切菜用的刀具，借以胁迫主人。老人家胆小，每夜都把菜刀藏在自己的枕头下，以免届时被坏人搜到。小将们不这么说，他们一口咬定是从你季羡林的枕下搜出的，你是心存杀机，妄想杀咱们红卫兵。第三，是一张石印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这是留德期间，一个有国民党背景的留学生送给他的。季羡林对蒋介石，历来没有好感，他认为蒋是一个流氓、坏蛋，恶贯满盈，终于被人民赶去海岛，所谓反攻大陆云云，不过是痴人说梦。可是，他有一个坏毛病（文人，尤其是大文人的通病），别人给他的信件，甚至片纸只字，都要保留起来（李敖更为典型，幸亏他不在大陆）。结果，这一张照片给他惹来了大祸。小将们断定，他保留这张合影，意在国民党卷土重来后邀赏。季羡林试图解释，小将们斥责他态度顽劣；简单一句：不许狡辩！呜呼，三大罪证高悬，此时此刻，季羡林纵有一百张嘴，也是说不清楚的了。

季羡林走投无路，曾经想到自杀，并且付诸实行，关键时刻，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批斗打断，这等于是救了他一条命。季羡林在迭经批斗之后，被投入“牛棚”（对关押“牛鬼蛇神”之地的俗称），这是他的炼狱。若干年后，他把亲身经历写成一部《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且摘录其中的若干镜头，敬飨读者：

> **太平庄记爬** 长期的批斗，季羡林的身心备受摧残，在发配太平庄劳改的日子里，一天，他的疝气发作，睾丸肿成个皮球，腿站不直，并不拢，更不用说走路了。路不能走，活还得干。干什么？满院的残砖碎石，让他爬着，一块一块地捡，然后扔——不是扔到垃圾箱，而是扔到院外。人家不说折磨，而说这是法外开恩，特别照顾。夫子无言。夫子还能有什么话说？他爬啊，爬啊，爬……此时，大队人马都上山干活了，院子里只剩下他一个，孤独，悲怆，激愤，但是不能“交响”，无论在内宇宙，还是在外宇宙。孤到极处，悲到极处，至多抬起头来，仰望浮云过顶，“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爬了两天，肿胀未见消退，牢头禁子也有人性一闪的时候，他们特批季羡林出外就医。只是追加一条：见了医生，首先要声明自己是“黑帮”。医院说来不远，仅数里地，对于常人，抬腿可及，但对于匍匐爬行者，则是邈乎其远的长征。季羡林拖着双腿，在村路上蜗行龟步，半道遇见推车的难友，主动提出载他一程，他哪儿有那胆，谢过，继续往前爬。共和国的史册真该好好记下这一笔：斯文岂仅扫地！爬啰，爬，爬……终于诊所在望……这不是村里的，乡里的，是当地驻军的，季羡林远远看到鲜红的领章，然后才是快步迎上来的人，才是救苦救难的军医……领章鲜红，鲜红代表庄严，代表光明，代表希望……他长舒一口气，极力挤出一丝笑，他不想吓坏亲人，他想说：“我还行。”结果，蹦出口的却是：“报告！我是黑帮！”这下坏了，领章的主人迅速撤回伸出的双手，脸上须臾“由晴转阴”，连“多云”——这个必要的过渡——也没有。领章说：“这里不是你看病的地方。你走吧，走吧！……”季羡林咂咂双唇，还想恳求几句，领章已经掉转身，只留给他冰山般的脊背。希望破灭，领章失色。临末了，鲜红的只是他在村道上磨破的双腿，渗出的丝丝缕缕鲜血，血啊血！

坠入饥饿地狱 季羡林由太平庄劳改地返校，又被关进“牛棚”。“牛棚”是劳改的升级版，其功能在于：严刑峻法，应有尽有。例如：规定每天六点起床，一声铃响，统统穿衣出屋，然后，绕着院子给我卖劲跑，直跑得汗流浃背东倒西歪而后已。你以为这是锻炼哪？才不。他们这一帮“牛鬼蛇神”、“乌龟王八”，在监改人员眼里，都是铁案如山，罪该万死——没有人会为他们的健康考虑。那么，居心何在？唯一合理而无情的解释，是季羡林悟出的“折磨论”：让“罪犯”在一天劳动之前，先把体力消耗光。

跑完步，来不及擦汗，赶紧洗脸漱口，用院里自来水管的冷水。然后排队去员工第二食堂吃早饭。根据牛棚法律：只许买窝窝头，外加咸菜。油饼一类属于“奢侈品”，吃了有违改造云云，因此禁止进口。其实，身为“罪犯”，每月的生活费只有十六块五，家属更可怜，十二块五，以这一点区区的钱，即使不禁止，让他们自由选购，他们也买不起油饼啊。此外，餐厅里的桌和凳，是为“人”准备的，他们是“鬼”，无权享用，只能撅着个屁股，蹲在

外边的地面进食。至于中午和晚上，食堂里卖有肉菜，那更是可望而不可即了，等待他们的，只是盐水拌黄瓜，或是清水熬白菜。一方面是繁重无比的劳动，一方面是粗糙难咽的窝头——即使是窝窝头，也不是可以随意吃的啊，它要拿粮票买，在一切票证都限量的情况下，他们又到哪儿去弄足够多的粮票呢？没办法，只好委屈肚子，让它忍饥挨饿，经常饿得头晕眼花，天旋地转。这是季羡林继在德国留学和"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第三次坠入饥饿地狱。不过，其间也大有区别：前两次他只是纯粹的饿，这次却是在饥饿之外，肩头整天还架着重轭，眼梢随时还晃着鞭影，由这山看那山，他不禁觉着前两番的饿乡岁月，恍若是今之人间天堂了。

背诵最高指示　"罪犯"每天劳动之前，必须先到一块黑板前站定，拿着个小本本，把上面的"最高指示"，恭恭敬敬地抄下，然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背之诵之，念得滚瓜烂熟。那"最高指示"天天换，他们也就天天背。监改人员随时随地予以抽查，倘若背错一个字，轻则耳光响亮，重则铁拳威猛。"罪犯"中有受过私塾教育，从小背惯四书五经的，或年轻脑瓜儿灵的，问题不大，怎么着都能对付。可怜有一位老教授，研究地球物理的，脑袋瓜似乎被定了向，只吸纳专业知识，此外一概排斥，包括"最高指示"。因此，监改人员也就动不动拿他杀鸡儆猴，老教授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双眼下肿起怕人的紫包。

背语录有什么用处呢？也许有人认为，"罪犯"都是花岗岩脑袋，寻常的办法改造不了，必须借助耶稣教查经的措施，往脑袋里灌输"天经地义，不二法门"，以求立竿见影，立地成佛。季羡林很惶愧，他实在没有体会出那神妙。他有自己的解释，仍是他悟出的"折磨论"：没事找事，让你不得舒心自在。其实，对于"最高指示"的神奇效应，监改人员自己也未必信，倘若换个位，让他们背，肯定背不出几条。你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有时监改人员叫住季羡林，提一段语录的头，让他往下背。季羡林一紧张，背错了几个字，心想糟了，这下子大祸临头。谁知对方毫无反应——不是仁慈，监改人员不懂得什么叫仁慈——如是乎这般，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季羡林就明白了，你小子根本就不会背。季羡林于是将错就错，装出一副熟烂于心倒背如流的样子。此时也不能坦白，谁要

是事后认错，等于是驳监改人员的面子，苦头有得你吃！

晚间训话 这是监改人员的天才表现得最充分的地方。具体做法：每天吃过晚饭，“罪犯”全体集合，立正垂首，听一个监改人员点评。点评者经常轮换，手法却一成不变：主要是抓小辫子。对于他们，谁的头上没有一把小辫子呢！——即使一根没有，也可以信口胡栽嘛。小辫子的出处，大体有两个：一是劳动过程中的“不顺眼”，一是书面思想汇报中的“毛病”。就劳动态度来说，“罪犯”绝对兢兢业业，不是出于“觉悟”，而是慑于“大棒”。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每天都有“棚友”倒霉，叫监改人员盯上。至于书面思想汇报，不管你怎样绞尽脑汁，悉心推敲，在中国这个文字之国，刀笔师爷之乡，挑点小毛病易如反掌。

抓小辫子的前奏是点名——点名有两种，一是点卯，二是揪出示众。就点卯来说，季羡林一生经历多了，难得留下印象，这里有一件，却使他刻骨铭心，将来见了阎王爷，也不会忘记：有位西语系的教授，归国华侨，年龄过了花甲，兼之重病缠身，卧床不起。革命家就让他在床上接受“改造”。晚间训话的地方，恰恰在他的门外，监改人员点到他的名，他就得答一声“到”，那声音细细的，幽幽的，如怨如诉，如呻如泣，季羡林每次听到，都心弦一颤，忍不住想躲到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

这是常规的点名。跟着训话，这时，“罪犯们”的心内开始打鼓，谁的名字要是被高声提出，那就意味着他成了反面教员，照例是大批斗的全武行：拖出队列，倒剪双臂，上面扇耳光，下面使脚踹。更有甚者，打翻在地，再踏上若干只脚——一千只脚是踏不上的，那是修词学的夸张。果真是犯了什么大罪吗？没那事。用不着推敲，季羡林断定，这也是属于他的“折磨论”之列。

两个不准 “牛棚”规定，走路不许抬头，坐着不许跷二郎腿。季羡林不知道，监改人员是怎样想出这个离奇的规定的。难道说读过什么祖传的秘典？或者得了《水浒传》中说的那种石碣文？抑或是天才火花的自然闪耀？除了牢房，在任何地方，尤其是同牢头禁子对面，绝对不允许抬头看一眼，一旦违规，立刻严惩不贷。因此，逢到这场合，季羡林的眼光总是落在地上，至多是对方的脚上，再往上一寸，都不敢。一次，排队去食堂途中，忘乎所以，稍

稍抬了一下头，时间最多十分之一秒，猛然惊觉，赶紧低下。但是迟了，已经被发现，押送人员立即做狮子吼："季羡林！你老实点！"季羡林唯唯认罪，以后再也不敢"狂妄"了。

至于跷二郎腿，原是人类的本能，但在革命家眼里，也属于特殊待遇，"罪犯"无权享受。季羡林记得什么书上说过，袁世凯一生从不跷二郎腿，坐的时候总是双腿并拢，威仪俨然。他是军人，是上智。"罪犯"是凡夫，非洪宪皇帝，怎么能做得到呢？

还有一件不大不小的事，颇值一提："罪犯"久蹲"牛棚"，居然失去笑。笑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长，几乎与生俱来，怎么会失去呢？声明：这个"失去"，不是来自"劳改宪法"，也不是出自监改人员的金口玉言，而是"自觉自愿"。试问，一个人整天处于提心吊胆、寝食难安的地步，怎么还能笑得起来呢？牢头禁子倒是会笑，敢笑，但在"罪犯"听来，犹如鸱号，只能叫他们浑身起鸡皮疙瘩。

尝受酷刑　一天晚上，熄灯铃响过以后，季羡林以为今天无事了，正准备倒头睡觉，忽然晴空一声霹雳："季羡林！"他一个激灵，旋即用冲刺的速度跑出牢房，劈面看到一位姓张的狱卒，站在两排平房的拐角处，双手叉腰，怒气冲冲：

"喊你为什么不出来？你耳朵聋了吗！"

预感大事不妙，没等细想，一副裹着胶皮的自行车链条，骤雨般砸落头上。他不敢抬手护，更不敢闪，笔直站在那里，起初还有点痛，痛……而后逐渐麻木，麻木……唯觉头顶、眼睛、鼻子、嘴巴、耳朵，被寸磔，被凌迟，一一离身而去……几乎要失去知觉，恐怕已经失去知觉……人的忍耐力真是强悍，他居然又挺了过来。事后，季羡林压根儿不知行刑究竟维持了多久。据"棚友"悄悄告知，挨打的时间相当长，长得他们都心惊胆战，生怕他就此一命归天。

人的异化　"牛棚"呆久了，季羡林感到脑筋越来越糊涂，心情越来越颓唐。不是地狱，胜似地狱。不是饿鬼，胜似饿鬼。非人非鬼，亦人亦鬼。套用一个哲学名词：已经"异化"。

依靠革委会赐给的可怜巴巴的"生活费"，季羡林既难以为"生"，也难以为"活"。纵然天天咽窝窝头、咸菜，也还是无法果

腹。人饿急了，就不讲脸面，他几次跟在牢头禁子身后，想讨一点酱豆腐罐子里的汤，拿来蘸窝窝头。有一回，他被指配到学生宿舍区，打扫两派武斗的战场，在一间狼藉不堪的杂屋，蓦地发现几块霉变的馒头干，如获至宝，心花怒放，迅速掖进衣袋，然后，躲到个没人的地方，三下五除二，狼吞虎咽下肚。什么卫生不卫生，什么细菌不细菌，身为“鬼魅”，这些统统不值一提。

一次，季羡林在路上捡到几张钞票，都是一角两角的，他大喜过望，赶快揣在袋里——哇！低头走路，原来也有其妙处，能够发现那些昂首阔步的“自由民”视而不见的东西。果然，他利用这低头哈腰的“优势”，陆续又捡到几次钢镚儿。季羡林还发现，“牛棚”厕所的地上，钢镚儿落得最多，从此，他就受了那玩艺儿的磁力牵引，得机会就往厕所跑。

黄万里：在另一层地狱

黄万里是1957年的右派，本来就已被打倒在地，文化大革命一来，更是被踩上千万只脚，惨遭蹂躏。

赵诚的《长河孤旅》记录有下列镜头：

一、1966年8月上旬，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抄了黄万里的家。红卫兵让他拿出存折，上面只有二十几元钱。家里人口多，负担重，打成右派后又被减过一次薪，由教授二级降为四级，所以钱根本不够花。红卫兵看了一眼存折，就给扔了回去。

8月24日下午，黄万里夫人丁玉隽女士被清华校医院叫去开会，会散，不让她回家，让在办公室坐着。天黑后，放行，到家一看，黄万里已被打得浑身是血。黄万里告诉她，是被带金属扣的皮带抽的。后背打得最厉害，人不能躺，只能俯卧。

二、“文革”开始后，水利系成立了一个专政队。右派们每天就在这个专政队的监督下打扫卫生，学习政治。有时，几个右派在一起也调侃一下时局。一次，谈起没完没了的“万寿无疆”，黄万里说：“无疆无疆，现在是无姜了，买不到姜了。”这件事后来被



1972年黄万里从三门峡回京探亲，历经磨难却精神矍铄。

人揭发，作为大罪，又遭到反复批判。

三、1969年秋天，在清华大学江西鲤鱼洲农场，黄万里被工宣队怀疑为国民党特务，隔离审查，白天参加劳动，晚间开批斗会，让其交代“特务问题”。由于黄万里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交代不出自己是特务的“罪行”，于是，工宣队就对他展开车轮战，时间久了，黄万里的身体和精神都顶不住了。1970年夏天，他感到精神恍惚，给女儿黄且圆写了封信，让她帮助回忆一下，自己究竟是不是特务。

四、1970年，在精神和体力的双重压力下，黄万里终于不支，6月的一天，在从农田回来的路上昏倒了。倒地后，他头脑昏昏沉沉，浑身燥热难忍。这时他顾不上血吸虫（那是疫区），爬进农田旁的水沟里，泡在水中，许久之后，感到好受了一点，他就在田间小道上往回爬，由于不辨方向，爬到了清华另一个连的驻地。他爬进一个谷仓，躺在水泥地上，感受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清凉。

五、1971年3月，黄万里病骨支离，预感去日无多，遂写下一首《梦吟绝笔》：

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

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

可怜的黄万里，病到这种程度，还在惦记他的水利事业，惦记着自己的学识。

他是杨木扁担——宁折不弯。

这就是黄万里的“文革”履历。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报国苦志。

3. 人生试金石

“文革”锻炼了季羡林，真正的锻炼，一如孙悟空入老君炉，炼出了一身硬骨头，一副火眼金睛。一本《牛棚杂忆》，使他晚年声誉鹊起。

季羡林借《牛棚杂忆》向人性发起挑战，他在“自序”中写道：

此外，我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这一类人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有的官据要津。即使别人不找他们算账，他们自己如果还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你能够睡得安稳吗？如果这一类人——据估算，人数是不老少的——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来与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褒扬，不会受到谴责，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季羡林的期待注定落空，试看《牛棚杂忆》出版十多年来，有哪一个“把人折磨至死的造反派”如响斯应，现身说法？没有，绝对没有。

杨绛为文化革命留下了一本《干校六记》，它不同于季羡林的金刚怒目，杨绛的笔调是婉转的，感情是平静的，一如菩萨低眉。且看下列文字：

> 我们“连”是1970年7月12日动身下干校的。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
>
> 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的时候，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得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的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得一已回校，阿圆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日回家。得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

> 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奇怪的是我还一见就认识。
>
> 我们干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黄大夫。一次默存去看病，她看他在签名簿上写上钱锺书的名字，怒道：“胡说！你什么钱锺书！钱锺书我认识！”默存一口咬定自己是钱锺书。黄大夫说：“我认识钱锺书的爱人。”默存经得起考验，报出了他爱人的名字。黄大夫还待信不信，不过默存是否冒牌也没有关系，就不再争辩。事后我向黄大夫提起这事，她不禁大笑说：“怎么的，全不像了。”

> 有一次，干校开一个什么庆祝会，演出的节目都不离劳动。有一个话剧，演某连学员不怕砖窑倒塌，冒险加紧烧砖，据说真有其事。有一连表演钻井，演员一大群，没一句台词，唯一的动作是推着钻井机团团打转，一面有节奏地齐声哼“嗯唷！嗯唷！嗯唷！嗯唷！”大伙儿转呀、转呀，转个没停——钻机井不能停顿，得日以继夜，一口气钻到底。“嗯唷！嗯唷！嗯唷！嗯唷！”那低沉的音

调始终不变，使人记起曾流行一时的电影歌曲《伏尔加船夫曲》；同时仿佛能看到拉纤的船夫踏在河岸上的一只只脚，带着全身负荷的重量，疲劳地一步步挣扎着向前迈进。戏虽单调，却好像比那个宣扬“不怕苦、不怕死”的烧窑剧更生动现实。散场后大家纷纷议论，都推许这个节目演得好，而且不必排练，搬上台去现成是戏。

有一次，那是1971年1月3日，下午三点左右，忽有人来，指着菜园以外东南隅两个坟堆，问我是否干校的坟墓。随学部干校最初下去的几个拖拉机手，有一个开拖拉机过桥，翻在河里淹死了。他们问我那人是否埋在那边。我说不是；我指向遥远处，告诉了那个坟墓所在。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几个人在胡萝卜地东边的溪岸上挖土，旁边歇着一辆大车，车上盖着苇席。啊！他们是要埋死人吧？旁边站着几个穿军装的，想是军宣队。

我远远望着，刨坑的有三四人，动作都很迅速。有人跳下坑去挖土；后来一个个都跳下坑去。忽有一人向我跑来。我以为他是要喝水；他却是要借一把铁锹，他的铁锹柄断了。我进窝棚去拿了一把给他。

当时没有一个老乡在望，只那几个人在刨坑，忙忙地，急急地。后来，下坑的人只露出脑袋和肩膀了，坑已够深。他们就从苇席下抬出一个穿蓝色制服的尸体。我心里震惊，遥看他们把那死人埋了。

借铁锹的人来还我工具的时候，我问他死者是男是女，什么病死的。他告诉我，他们是某连，死者是自杀的，三十三岁，男。

杨绛这里显示出大超脱，大节制。鞭笞荒唐而残酷的年代，控诉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有力的。杨绛站远一步，她化愤怒为悲悯，变恐怖为蔑笑，如此笔法与功力，在当今文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深渊里也有阳光。当时，那时，凡是被揪出来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的“牛鬼蛇神”，和革命群众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日日生活在天昏地暗、孤独无助之中，彼时彼刻，谁要是能从茫茫人海里得到一朵同情的浪花，慰藉将不亚于还魂草，救心丹。

一天晚上，据侯仁之的长女馥兴回忆：“爸妈都在，在楼下唯一的

房间里（原来独住的小楼楼上已搬进了三户人家、十多个人，都从楼下的大门出入）。几下轻轻地敲打窗子的声音响起，似乎是从南窗传过来的。当时，窗外长着一片小竹林，因为疏于管理，开初的几株幼竹，随意蔓成了不小的一片，恰好遮着楼下房间左右两扇并排的南窗。我们院子的入口在楼的西北，一条砖铺的小路自北而南通进院子，伸到面西的楼门为止。再往前走是草地，绕到了楼南边就是后院了。小竹林遮掩的南窗是后院中最为隐蔽的地方，平时那里是不会有人的。敲打的一刹那，警觉和诧异陡然升起。然而，随着传来一声很轻很柔和的声音：'玮瑛，玮瑛！'压低的声音的确是来自南窗，而不是大门。妈妈从那叫法，从那声调，从那一点点福建口音，立刻辨出来人。马上去开大门，闪进来的是吴蔚然、黄伍琼夫妇。

"吴蔚然、黄伍琼和爸妈相识于三十年代的燕京大学，友谊几十年。吴大夫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待人谦和诚恳，独有的机智和精细。他们来到过燕南园多次，记得有一回，吴大夫带着卷尺来，动手给父亲量尺寸，不久送来一件合身的蓝绸面丝棉袄。吴大夫是外科界的权威，国手，长期担负着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重任在肩，时刻待命。由于工作的需要，吴大夫配备有车子和司机。但是这次来，为了不暴露行踪没有要车，而是坐着公共汽车，当天色渐黑时，避开众人悄悄进了校门，悄悄进了家门。从'文革'一开始，北大的情况、父亲的境遇就让他们惦记。可音信不通，只知道母亲那时还住在她的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宿舍。一天母亲听到院子里有喊声：'玮瑛，玮瑛！'推开宿舍门一看，是伍琼。位于王府大街东厂胡同的近代史所，是一座有好几进的深宅大院，还加上几座跨院。黄姑姑不知道母亲住在哪一间，又不便问，就在贴满了大字报的院子里，一个院接一个院地转着喊。而这次来北大，情势更不同于前。吴大夫和黄姑姑行事机警，以避人耳目。

"吴大夫黄姑姑和父母亲挤坐在一起，意想不到的会面，说不完的话。待到看表，才猛然觉察公共汽车332路的末班车时间已过。当时从海淀、中关村回城里，332路是唯一的一条公共汽车线。怎么办？这时父亲决断地说：'骑车回去。骑我的三枪车。'

"这辆三枪车，是1949年爸爸从英国带回来的。我还记得，爸爸到家后，打开一只放在地上的黑箱子，拿掉最上面一层衣物后，露出两个

在我的眼里是硕大无比的球：一左一右并排地躺着的两个地球仪，它们占据了大半个箱子。箱子里没有自行车。但是爸爸的确带回来一辆车，而且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三枪牌自行车。五六十年代，这辆墨绿色三枪车成了他最好的交通工具，不但骑着去校园各处，去清华，有时进城也是骑它。回到家时，爸爸会一直骑进院子直到楼门前，把车子靠在一棵洋槐树粗粗的树干上。那棵洋槐树又高又直，开花的季节，一串串的白色槐花挂满枝头，香气就从天上飘下来，钻进二楼的窗。爸爸很珍爱这辆自行车。'文革'开始，就再不能骑了。

"吴大夫从父亲手里接过车，就这样悄悄地出门上路了。吴大夫骑，后座上带着黄姑姑。多年后我问起黄姑姑，那一夜怎么到家的。黄姑姑说，从海淀到白石桥，进西直门，一路上，骑一段，推着走一段，走累了再骑，骑不动了再走，回到东四的协和医院宿舍，已是后半夜了。我相信，这天夜里，这辆三枪车完成了它最重要的一次使命。"

是的，在侯仁之记忆的天穹，那一夜的月光特别特别清亮。星星全从天上掉下来，化作一盏盏温柔的路灯。

陈省身说过："一个科学家真正做重要工作的时间不很长。做学问要年轻。"这是绝对真理。仍拿钱学森和陈省身为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钱学森是在与世隔绝的保密状态中赚得了科研的连续，陈省身则由于置身海外而获得了可遇而不可求的发展机会。反观国内其他的科学家，就没有这般幸运了。无休无止、残酷无情的政治运动，埋葬了他们大好的年华。能苟活就算胜利，遑论发展、创造。1972 年，陈省身在赴美二十四年后首次回国访问，其时，头上戴着"牛鬼蛇神"帽子的吴大任参与接待。老友相见，交谈甚欢。吴大任唯一感到尴尬的，是陈省身提出："你为什么不请我到你家看看?"他一时无言以对，因为自己的家已被造反派霸占，他和妻子带着一个孙子，挤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斗室。住房如此，其余的，你就尽可以想象。学生时代，吴大任与陈省身同为翘楚，旗鼓相当，如今，两人在国际数学界的地位、业绩，就不可以道里计了。唉……

至于黄万里，刑余之人，涸辙之鲋，拿下围棋来比喻，纯粹死子一粒。所以，唉，不提也罢。

"文革"期间，有一位美国科学家曾经与钱学森交谈，他叫查里克，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执教时的学生。据张纯如的钱学森传记，查里

克“曾担任过空军助理秘书和副秘书长，而此时是美国通讯人造卫星公司的总裁；在 1972 年初，查里克到中国去是为了架设卫星网路，好让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的情形，传送到美国去。在查里克刚抵中国时，他便询问中国官员，是否能够单独见见钱学森。不久，他的中国接待人员便领着他到一间高级的餐厅，钱学森和几个侍卫也即刻抵达。钱学森一开始即问查里克，会不会介意他以中文发表一个简短的欢迎词，在逐字逐句的英译中，查里克听出致词里提到一位中国官员是如何不受人喜欢（笔者注：估计是林彪）。在致词结束后，钱学森说：‘现在，我们可以坐下来吃了。’之后，钱学森皆以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他对话。‘我一点也不怀疑，’查里克其后表示：‘他是被当局要求而发表那样一份欢迎词的。’整个晚餐的气氛是十分热诚的，钱学森和查里克聊起了许多老友和旧识。但被问及他的工作情形时，钱学森言语空洞，并调转话题；在闲谈中，查里克说他曾听人谣传钱学森病了，钱学森语意隐晦地说，身与心之间的确是十分相关的，而今事情已有转变，他感觉很好。”

文化大革命虽然往矣，以林彪折戟、“四人帮”覆灭、全盘否定告终，但它的梦魇，保守地说，百年内恐怕难以彻底消除。好在时间是伟大的，而且要一路伟大下去，当代人解决不了的，索性留给后世无穷匮的子孙去代劳吧。

第九章　人生七十

1. 泛　论

1981年，六位主人公年晋七秩，“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一句“老话”，唐人窦巩《代邻叟》诗云：“年来七十罢耕桑，就暖支羸强下床。满眼儿孙身外事，闲梳白发对残阳。”“老话”也不是很老，以六位主人公父辈的寿命为例，季羡林的父亲，不足四十，母亲，也只有四十多；钱学森的岳父蒋百里，五十六，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六十七，侯仁之初中没毕业，母亲就去世，也就五十出头。据有关资料，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平均寿命仅为三十五岁。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进步，寿命大大延长，1997年，平均达到六十一岁。而现在，已经突破七十。“七十古来稀”已不适用，但七十仍然是一个标志，就是“老了”。无论东方西方，黄种白种，到了这个年纪，从生理上说，都已划归老年。其视茫茫，其发苍苍，老了就是老了，你不承认不行，现代生活水平再提高，医疗技术再发展，人的平均寿命再延长，也未能做到返老还童，把七十岁的人打发回中年。

让我们看看六位主人公在古稀前后的表现。

2. 象征性的坐标

“壮心未与年俱老”，“老树春深更著花”。

——集古人成句

陈省身：美国数学所所长与沃尔夫数学奖

1960 年，陈省身从芝加哥大学移席伯克利大学，在那里，一直工作到 1979 年。这个时候，陈省身已六十有八，接近欧几里得的七十，高斯的七十八，比黎曼的三十九多了将近一倍。他老了，他累了，该歇歇了，于是决定从伯克利退休。

陈省身是伯克利大学的欧几里得、高斯、黎曼，他的光荣退休，是学校的一件大事，校方为他举行了为时五天的国际微分几何会议，三百多位数学家从世界各地赶来捧场。数学擂台毕竟是年轻人的天下，这一点，只要看看来宾的名单就知道了。比如英国的 M·阿蒂亚（Michael Atlyah 1929～）和美国麻省的 M·辛格（Manuel Singer，1924～），他们两人在三十来岁就完成了指标定理，奠定了一个时期的典范。目前正值壮年。辛格曾是陈省身的追随者，他在为会议论文集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对我们的多数人来说，陈省身教授就是现代微分几何。而我们，作为他的学生，感激他把我们引导到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1981 年，陈省身年届七十，他又以古稀之躯，出任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大家知道，陈省身退休之前拒绝担任行政职务（唯一例外，是代理过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所长。陈省身说，代理而已，临时的）。比方说，六十年代初，美国数学会有意请陈省身做主席，预先征求意见。陈省身以为是一个挂名的差事，一问才知道，每两个月得出一次差，每天 8 点得准时接一些电话。这就太复杂了，陈省身坚辞不就，只答应当一届副主席。而这一回，他觉得横竖已退居二线，时间相对富余，于是决定出任所长。

这个美国国家数学所，是新成立的，目标很大，陈省身并不是想当就能当的，他要参与竞争。结果，他胜出了。陈省身最终为什么能胜出？他有过一番解释：

> 比方说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出缺，要在董事中挑选一位来担任。每位董事都想当总经理，但董事会投票时不准投给自己。于是，大家投票时都把自己的一票投给最不可能当选的人，以保证自己的票

数为最高。结果呢，是最不可能当选的人当选了。实际上，可以说我在数学界跟人的关系很好，大家对我很放心。

这当然是自谦之辞。实际上，正是陈省身个人的学术威望、行政能力，以及天时、地利、人和，促成了这件影响深远的数学盛事。

陈省身不是书呆子，他身边的人清楚，此君兼具能力和魄力。譬如在西南联大，他曾趁清华教授评议会改选之机，联合一帮年轻教授，把一些老教授赶下台，弄得校长梅贻琦找他谈判，以求得某种微妙的平衡。陈省身后来说，这种行政、人事之类的事，自己也能玩，只是不愿多玩而已——玩多了，必然影响数学研究。

陈省身现在正式担任所长，关于如何治所，他又有一番精彩的表述，他说：

> 我办事的一个原则就是少做事。有时候做得太多，也不见得有效……办这个所最要紧的是把有能力的数学家找在一起。找来之后就不管了，就让他们自己搞去。我想研究（尤其是纯粹数学的研究）没法子有计划。现在你要政府拨款或跟机关要经费的话，动不动就要你的计划。可是根据计划里头能够做出来的东西大概不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最好没有计划，不过这没法子跟管钱的人讲清楚。

陈省身的办事原则，就是“无为而治”，把自己能做的，尽力做到，至于如何发展，让专家们各显神通好了，不必再说三道四。

1984 年，陈省身七十三岁，是年 5 月，他和匈牙利数学家爱尔特希（Erdos，1913 ~ 1996）一起，从以色列总统贺索手中接过 1983 ~ 1984 年度的沃尔夫奖。获奖证书的引文说：

> 此奖授予陈省身，因为他在整体微分几何上的卓越成就，其影响遍及整个数学。

沃尔夫奖在世界上的地位，一言以蔽之，相当于诺贝尔数学奖。众所周知，诺贝尔奖设有物理、化学、医药、经济、文学、和平等项目，

但一直没有数学。因此，沃尔夫奖，就成了数学家荣誉的巅峰。陈省身始于数学，归于数学。人生至此，可谓猗欤盛哉！而陈省身本人则认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是一件幸事。数学有很多简单而困难的问题。这些问题使人废寝忘食，多年或经年不决，一旦发现了光明，其快乐是不可形容的。这是一片安静的天地，没有大奖，也是一个平等的世界。"这是智者的话。当然，说这话也要有资格，陈省身的资格，正在于他已经把上述世界数学的最高奖项——沃尔夫奖——搂在了怀中。

钱学森：倡导思维科学

《钱学森实录》记载：

1980年，六十九岁：当选中国科协副主席。成功组织发射了我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世界再次震动。

1981年，七十岁：接连发表重要论文。强调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对科学文化的认识问题。

1982年，七十一岁：钱学森等著《论系统工程》出版。《工程控制论》修订版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当选党的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83年，七十二岁：发表思维科学的奠基性文献《关于思维科学》。

《钱学森实录》以及其他有关传记还记载：

在1980年3月15日召开的全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钱学森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一定要带动文学艺术现代化"的思想，并且提出"科学文学艺术"概念来丰富与发展科普事业的内涵。他说："我们大家所习惯的世界只不过是许许多多世界中最普通的一个，科学技术人员心目中还有十几个二十几个世界可以描述，等待着文学艺术家们用他们那些最富有表达能力的各种手法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文学艺术。这里的文学艺术中，含有的不是幻

想，但像幻想；不是神奇，但很神奇；不是惊险故事，但很惊险。它将把我们引向远处，引向高处，引向深处，使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有所发扬提高。”

1981年，钱学森在一封信中说：“在中国科普作家中我喜欢高士其同志的作品。在外国科学文学家中，我喜欢美国的 Rachel L. Carson，她有三本书：《Under The Sea - wind》、《The Sea Around Us》和《The Silent Spring》，后者有中译本，叫《寂静的春天》。她的作品是把科学与文学中的散文融合在一起。这些中外作品都可称科学文艺中的珍宝。当然，还有再高一级的东西，那就是在科普作品中用科学幻想预见若干年后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这就是奇珍异彩了。例如，E. 薛定谔（Schrodinger）的《生命是什么?》，他预见了20年后的诺贝尔奖金项目遗传密码之所在。我向往的，是这类高级作品，它们代表了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光辉前景。”

这封信，已经透露出钱学森晚年大力倡导的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思想内涵。

1982年，钱学森将现代科学技术的六大部门又增加了两大部门，一是文艺理论，一是军事科学。

1983年，钱学森发表《关于思维科学》。这是一篇关于建立思维科学体系的重要文献。文章对建立思维科学的必要性、可能性、迫切性，以及意义、方法、步骤等方面作了深刻的论述。提出了思维科学的体系结构和研究方向。钱学森认为，“思维也是一种客观现象，是物质运动”，“思维科学是可以成立的”。他还认为，思维科学研究将使人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得到更大的发挥，为创造智能机提供理论依据。因此，思维科学研究十分重要，十分紧迫。他指出，思维科学的突破口是形象思维的研究。

关于思维科学的体系，钱学森把它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三个层次。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研究人的有意识思维的规律，这一部分称为思维学。思维学由抽象思维学、形象思维学、灵感思维学三门基础学科组成。后来，社会思维学也被当做一门基础学科。思维科学的技术科学层次包括科学方法论、情报学、数理语言学、结构语言学、模式识别等。思维科学的应用科学包括人工智能、计算机软件工程、密码技术、情报资料库技术、计算机模拟技

术等。

综上所述，古稀之年，钱学森把研究的目标，从“两弹一星”转向思维科学。有识者指出：“钱老晚年的思想是一个海洋，又是我国当代学术界的巅峰……我预计，二十一世纪肯定要掀起钱老思想研究的高潮，因为他晚年的认识与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是密不可分的。”

季羡林：刚刚转入“途中跑”

有一个简单的统计：从1978～1991，十四年间，季羡林共发表文章四百二十多篇，年均三十篇挂零，出版著译十多部，年均一部有余，折合字数，约在五百五十万左右，年均近四十万字。这个工作量，搁在毛头小伙子身上，也得是个拼命三郎，何况他已越过古稀，直逼耄耋。

季羡林不是纯然的书斋的学者，他肩上担着五十多个职务，是个大忙人。这些职务中，北大副校长和南亚所所长，是实职，每天都要挂牌办公；全国人大常委，每两个月开一次会，每次十天半月，占去的时间也不老少；至于其他的职务，像什么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神州文化集成》丛书主编，等等等等，虽不必日常办公，会总是要开的，来电来函来访总是要应对接待的，凡此种种，加起来，工作量也相当惊人。读者自然会问：季羡林又不是印度神话中的大梵天，拥有四头八臂，更不是《罗摩衍那》中的罗刹王，能变出十个头，二十只臂，那么，他又是怎样在日理百机（当然没有万机）的情况下，作出上述那些成果来的呢？

问得好。这个问题也很好回答，凡是对季羡林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有个与众不同的习惯：每天早晨四点起床。这个习惯，他在1946年进入北大，当上东语系主任之后，就开始了。1985年，他在散文《黎明前的北京》中自述：“多少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晨四点在黎明以前起床工作。我不出去跑步或散步，而是一下床就干

活儿。”

这里说的是居家。偶尔出外呢？他这个习惯也是雷打不动。1984年，他曾说：当翻译《家庭中的泰戈尔》时，“适值有杭州、烟台之行。在杭州，招待所的楼道里每天放彩色电视都放到很晚，声量之大，全楼震动。我当然无法安眠；但是第二天我照样黎明即起，潜思凝虑，翻译《家庭中的泰戈尔》。到了烟台，住在一所豪华的宾馆里，条件比杭州有天渊之别。推窗就能看到大海。我每天起床后，外面仍然是一片黑暗，海上停泊的万吨巨轮上却是灯火辉煌，灿如列星。此外则海天茫茫，引我遐思。此时此刻，我简直是如鱼得水，心情怡悦，翻译工作进行得异常顺利。等我回到北京来时，初译稿已经完成了。”

季羡林之为季羡林，还有第二个与众不同的习惯——毋宁说本领：一边开会，一边写作。这是逼出来的。季羡林的会多，职务的加上非职务的，文山会海，纷至沓来；起先当然不习惯，尤其是听那些长篇大论而又言之无物的报告，状如受刑，浑身不自在。他从前读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读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觉得作者讽刺的对象，实在荒唐滑稽，讵料自己也成了那一路人，岂不大可哀哉！怎么办？会多而又不能不列席，难受而又不能不硬着头皮，久病成医，久会成精，终于变通出应对之道；他的秘诀是：“在这时候，我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在脑海里，构思，写文章。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在步行的时候，我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文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希望开会了。这真叫做没有法子。”

最叫人心折的，还是他的精神状态。季羡林在《罗摩衍那》译后记中写道：“我现在根不能每天有四十八小时，好来进行预期要做的工作。那当然是不可能的，每人每天只能有二十四小时，谁也多不了一分半秒，关键在于如何使用这二十四小时。我现在就不敢放松一分半秒，如果稍有放松，静夜自思，就感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在

慢性自杀。”七十来岁，正是季羡林忙得前颠后仰的时候。如果你那时见到他，整个印象，宛如一个竞技场上的高手，时刻琢磨的，就是如何更快更高更强！他的心理状况，完全是一个小伙子，对于别人嘴里的“季老”，老大反感，心想：我怎么就老了？精神体力，哪一点比你们差?！笔者采访南亚所的一位老人，他说：“那时期季老没有周末，没有星期天，他给别人派任务，也总是忘了这一点。因此，有人在背地里骂他‘季剥皮’。”

杨绛：《堂吉诃德》与《干校六记》

杨绛的创作才能，曾让钱锺书既羡且妒。四十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名声大噪；一度搞得钱锺书很紧张，生怕风头都叫杨绛抢去。

五十年代而后，大家都不怎么讲话了，或都不怎么会讲话了，包括曹禺、巴金，包括夏衍、茅盾。杨绛自诩为边缘人，更是老老实实地管住自己的笔——笔就是口，谨防祸从口出；笔犹胜于口，白纸黑字，证据如山，赖都赖不掉。

慎搞创作，不等于停止笔耕，杨绛供职于文学所，这是她的职业。1956年，杨绛接手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是上边交下来的任务。原著是西班牙文，国内已有数种译本，是从英、日等文种转译的。杨绛不懂西班牙文，她先找国外的译本看，如英文、法文、德文的，看来看去，发现有些地方差别很大，不知道采用哪一家的好。杨绛想到，要想保证原汁原味，只有从西班牙文翻译。可是她不懂西班牙文，怎么办？这时，我指的是1958年，她四十七岁，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学西班牙文。

这有点像开玩笑，临时抱佛脚，来得及吗？当然来得及，杨绛有语言天赋，她懂得英文、法文、德文，再学一种，问题不大。三年过去，她认为差不多了，虽然发音不够地道，用于文字翻译，足以胜任。1961年，杨绛着手翻译。当时属“困难时期”，运动多，会议忙，营养匮乏，精力不济，只能一点一滴凑合翻。到得“文革”初期，已接近完成。谁知天有不测，红卫兵抄家，把她的数年心血全部没收。这时什么

都不能干了，只好听随运动沉浮。接着是下干校。1972 年 3 月，杨绛从干校返回北京，“文革”风暴渐衰，稿子又回到她的手，可以偷偷继续搞了。又觉得一口气已断，接不上，索性从头再翻。就这样，边学，边译，耗时二十二年，终于在 1977 年竣工。

关于翻译的甘苦，杨绛在《堂吉诃德》“台湾版译者前言”中说：“翻译是一项苦差事，我曾比之于‘一仆二主’。译者同时得伺候两个主子。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顺，不容违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个主子是本国译本的读者。他们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文习惯。我作为译者，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我对自己译本的读者，恰如俗语所称‘孝顺的厨子’，主人越吃得多，或者吃的主人越多，我就越发称心惬意，觉得苦差没有白当，辛苦一场也是值得。”

1977 年，杨绛六十六岁，老太太一个了。《堂吉诃德》生正逢辰，交人民文学出版社，次年问世。适逢西班牙国王偕王后访华，时任政协主席的邓小平举行欢迎宴会，杨绛应邀出席。小平主席将《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将杨绛介绍给国王和王后。由此又衍生出一支插曲：西班牙政府因为杨绛的这项译绩，特意给她颁发了文化大奖，并通过该国驻华使馆邀请她前往访问。第一任大使口头邀请，杨绛口头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杨绛正式地以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出高招，请杨绛所在的中国社科院老院长出马，杨绛抹不开情面，才勉强答应。钱锺书戏称：“杨绛的架子真大，要三个大使才请得动！”

古稀之年，杨绛的另一收获，是《干校六记》。前面说过，1972 年 3 月，杨绛从干校回京。在那样一个地方经过那样一番折腾，杨绛心潮起伏，打算写点东西。当时因为忙于翻译，以及顾忌形势，未动笔。八年后，也就是 1980 年，“文革”结束，译本也已出手，她开始考虑。恰好读了古人的《浮生六记》，顿受启发，于是开笔写《干校六记》。写前，把计划告诉钱锺书，钱泼冷水，从鼻孔里哼了一哼，说：“写什么《六记》！”杨绛坚持写了出来，交给钱锺书过目。这回，钱锺书不声不响，立即为书写了一篇“小引”——这是他认可的一种方式。

书写好，没有出版社敢出。杨绛托三联的范用将书稿邮寄香港。范用先看，爱不释手，三联自己又不敢用。香港《广角镜》的李国强听

说了，拍电报向范用索稿，一催再催，最后说："你再不寄，我就专程飞到北京去取。"范用这才恋恋不舍地将稿子寄出。李国强接稿后，十万火急，亲自下印刷厂督战，一个星期就赶印完毕。

香港版的《干校六记》，不知怎么叫胡乔木看到了。胡乔木让邓绍基传话给文学所的许觉民，说这本书大陆上也该出。随后，在一次领导人宴请赵元任的会上，胡乔木又对赴宴的钱锺书如是说，并给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因为胡乔木发了话，《干校六记》得以在大陆出版，在读书界引起热烈的反响，并被译为日文、英文、法文、俄文等外文。但也引起某些人的愤怒，如"右派"改正后重新复出的丁玲，就指责说："《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学级；《干校六记》是大学级。"丁玲还算是有"眼光"的，她看出杨绛的出手比他人要高。

1979 年冬，杨绛还有两篇文章值得一提，那就是《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前文让读者看到一位老辈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艰难曲折之路。后文主要是写三姑母杨荫榆的，在介绍而外，还兼有部分"翻案"的意义。因为在鲁迅《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中，杨荫榆是一个依靠北洋军阀、残酷镇压学生的反面人物，杨绛则用事实揭示了杨荫榆的另外一面：生活不幸，个性鲜明，行为怪僻，不善处世。尤其是杨荫榆的死，杨绛写道："日寇侵占苏州……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据那里的传闻，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关于杨荫榆的生平，杨绛当然是知道的，但直到"文革"后，才原原本本写出——写早了没用，女作家苏雪林在杨荫榆遇害后不久，就写了《杨荫榆之死及其他》，她的话有谁会听？苏雪林是去了台湾，倘若留在大陆，光凭这篇为杨荫榆说话的文章，就要"吃不了兜着走"。在这件事上，杨绛把握的时机恰到好处。人生有命有运，文章自己也有运命。

侯仁之：中国“申遗”第一人

1976年，“四人帮”垮台，侯仁之结束东躲西藏的状态，从外地返回北京。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学家，开始忙碌起来：1977年，撰写《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天安门广场：从宫廷广场到人民广场的演变和改造》；1978年，出席全国科技大会，考察西部沙漠；1979年，主持绘制《北京历史地图集》；1980年，赴加拿大讲学，前往美国波士顿，拜谒恩师洪业，前往华盛顿，看望老友夏仁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六人中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1年，再次赴加拿大、美国讲学；1982年，参与明代勺园遗址挖掘；1983年，主持编辑《中国地理丛书》等等。

侯仁之在“晚晴集自序”写道：“陈寅恪先生曾说，他研究的学问是‘不古不今’之学，而我这么多年搞的这门学问，乃是‘又古又今’之学，既要研究历史上的古籍文献，又要结合现代地理学的知识实地加以考察，是需要‘读书’和‘行路’的，又枯燥又艰辛，是一门偏‘冷’的学科。”的确，侯仁之的学问不为世俗追捧，他要出大名，很难。反而是一项提案，让他成了公众名人。

事情的经过是：1984年，侯仁之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读者记得，这是胡适、茅以升、黄万里的母校。一日，侯仁之与几位城市建设专家聊天，惊讶获悉，国际上有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方说：“中国历史悠久，有无数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址和著名的风景胜地，为什么不加入这个公约，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呢?”是啊，是啊，当然应该加入。可是，这样一个组织，过去从未听说。侯仁之不久去到康奈尔设在华盛顿的一个研究中心访问。在那儿，他又进一步了解了详细情况。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侯仁之回到国内，赶忙起草了一份提案，并征得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三位委员同意，联合签名。

提案说：我国为文明古国，地大物博，无论是在文化遗产或自然遗产中所拥有的具有世界性重大价值的、而且是应该积极予以保存和保护的对象，历历可数，其中为举世所公认并已得到国际友人主动赞助进行维修和保护的，如万里长城和卧龙熊猫自然保护区，即分别属于文化遗

产和自然遗产两大类别，但是我国迄今尚未能参加“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因此也不能享受签约国所应该享受的一切权益，更无助于推动这项有益于全人类的国际文化合作事业……现在我国实行开放政策，除去注意引进有利于我国“四化”建设物质文明的各种技术、设备和资金外，也应该积极参加并推动既有益于我国、也有益于世界人民精神文明的国际文化科学事业。因此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

该提案于1985年4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获采纳。1985年12月12日，中国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1987年，着手世界遗产的申报，同年底，故宫博物院、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长城、秦始皇陵（含兵马俑坑）、敦煌莫高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侯仁之也因此成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黄万里：右派改正，无缘博导

反右运动是压在知识分子心头的一场梦魇。也是共和国的一块心病。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55号文件”，即《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这是一次大解放，使大多数右派超脱苦海。黄万里无缘摘帽，因为他的帽子是毛泽东亲自戴上去的。

新华社记者戴煌记述：

> 有人说：“有些人是毛主席点了名的。”
>
> 胡耀邦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也得平反，不然咋叫实事求是？”

如此东风，仍吹不进清华园。1979年来了。1979年又过去了。清华就剩下两个右派没有改正，一个是钱伟长，一个是黄万里。黄家托人找到教育部的高层，上边传下话：黄万里可以改正，因为他是有话就说，没野心，而钱伟长不能改，他有野心，想在清华搞一套自己的治校方略。

1980年2月26日，黄万里盼来右派改正决定。决定打印在一张白

纸上，全文如下：

关于黄万里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

黄万里同志，于1958年3月被定为右派分子，1978年2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现任水利系泥沙研究室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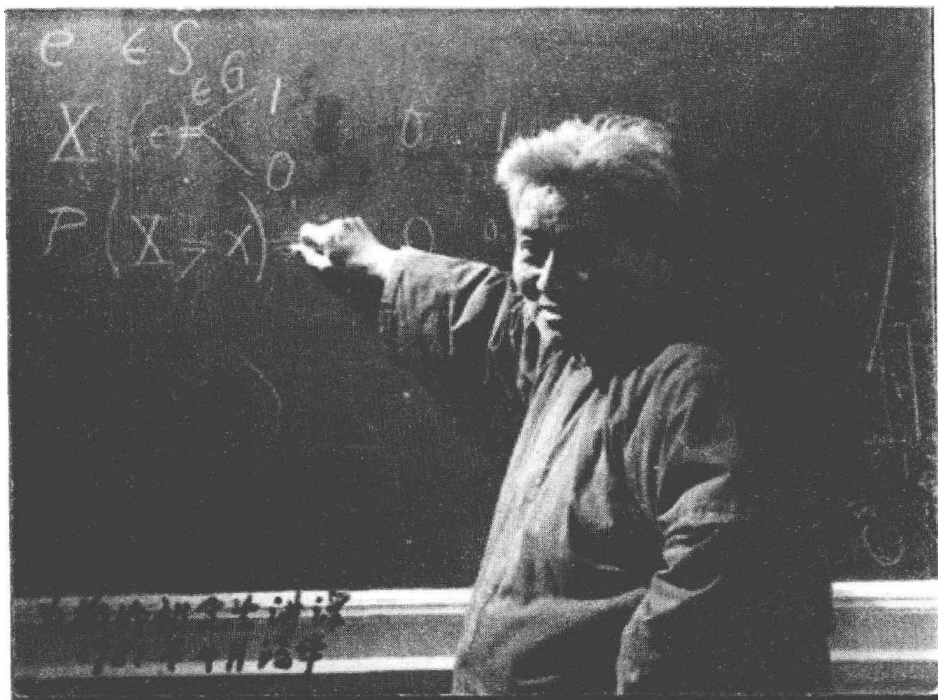
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的精神，我们对黄万里同志的原划右派问题进行了复查，按照1957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规定，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清华大学

1980年2月26日

按此右派改正时间，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排倒数第二。倒数第一是钱



1981年黄万里在清华给教师研究生上课。

伟长，他是由中共中央 1980 年 6 月 11 日在一份文件中直接予以改正的。

这一年，黄万里虚岁七十。古稀之年的黄万里重返讲坛，凭他这副龙钟老态，自然不宜给本科生上课。那就带研究生吧，总共两名。黄万里不能带博士生吗？按照资格，当然可以。系、校两级领导也无异议。但当博导要走个形式：本人申请，上级批准。你猜黄万里怎么做？他说："写申请，多此一举，有资格的人，也就是能带博士的人，还要写申请吗？不够资格的才写申请，我够资格为什么写申请？"黄万里是窑里的泥砖——越烧越硬，他不承认既有的游戏规则，拒绝写那份申请，自然也就与博导无缘。

3. 凭栏感怀

"人生莫遣头如雪，纵得春风亦不消。"一个人活到七十岁，他一生最该做的事情，应该已经做完。

陈省身六十八岁退休，得其时哉！七十岁，出任美国数学所所长，这有点像国内退居二线，发挥余热，也是得其所哉！七十三岁获沃尔夫奖，这是对他毕生努力的一个肯定，也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实话实说，陈省身若想拿第二次，是不可能的了。

有一个人物值得一提，就是和陈省身同获沃尔夫奖的爱尔特希。此君为匈牙利籍犹太人，生于布达佩斯，小陈省身两岁，从来居无定所，习惯在全世界旅行，每到一地，就登门拜访那里的数学家，向对方宣布："我的头脑敞开着。"然后便开始讨论数学问题，一连数日，高谈阔论，直到双方厌倦为止。爱尔特希从不在一个城市里连续呆上一月，他的座右铭是："另一个屋顶，另一个证明。"爱尔特希于 1996 年去世，他一生中同四百八十五位数学家合作，发表过 1475 篇论文，涉及数学的众多领域。——爱尔特希是另一个民族、另一个世界的奇迹，即使在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中国的科学家仍然无法效仿。

由爱尔特希，不禁又想到了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2006 年，四十岁的佩雷尔曼因为破解一则世界难题，而荣获数学界的另一项大奖——菲尔兹奖。正当世人为他欢呼时，他却躲起来了。佩雷尔曼拒绝

领奖。在他来说，研究数学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猎取荣誉。

钱学森在七十岁之前，也已完成了他人生的主要使命。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分析钱学森早年的业绩时说："他绝对是位杰出的一流科学家，但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一再向我强调，他还不够资格跟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提并论，甚至也不及他在加州理工的导师冯·卡门。尽管他在理论方面下的工夫，对美国气体动力学的发展极具价值，但他既不曾带动革命，也未能创造新领域。如果他 1955 年就去世，不曾回到中国，他的一生就不可能成为一流传记的素材。"幸运的是钱学森回到了中国，他最终跃升为"中国火箭之父、导弹之父"。"中国的火箭事业始于钱学森。若没有他，中国的科技还要落后二十年。我们的太空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钱学森既是首席科学家，也是最高权威。"钱学森的助理庄逢甘如是说。

1979 年 12 月，加州理工学院授予钱学森"杰出校友"奖。钱学森在加州理工的知交马柏（Frank Marble）教授，邀他回帕沙迪纳参加颁奖典礼——为此，加州理工校长杜布理吉跟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普雷斯多方协商，促使美国政府撤销了当年对钱学森的驱逐令——钱学森拒绝前往。

一次开科学技术大会，钱学森正好坐在胡耀邦的旁边。胡耀邦对他说："钱老，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一些国家邀请你，我建议你还是接受邀请，出去走走。你出去和别人不一样，对推动中外科技交流会有很大影响。这也是今天改革开放的需要啊！今天，世界在变，中国在变，美国也在变。几十年前的事，过去了就算了，不必老记在心上。"钱学森回答说："总书记，当年我回国的事很复杂，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宜出访美国。"胡只好说："钱老，我这是劝你，不是命令你一定要去。如果你认为不便去，我们尊重你个人的意见。"

后来，美国当局曾派代表和我国有关方面沟通，他的意思可以归纳为："钱是一位著名科学家，他曾在美国工作了很长时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一段时间，钱对美国的科学技术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五十年代初的麦卡锡时代，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许多正直的美国科学家也无端地受到迫害，所以那一段时间美国政府那样对待钱是很不公正的，我查过当时的档案，我这么评价是有根据的。"于是他和中方探讨，美国政府能做些什么，来弥补从前在这个问题上的过

失。他说，他和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讨论过钱在美国的工作，如果钱来美国，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的称号是没有问题的。考虑到钱的老师冯·卡门曾获美国政府颁发的最高科学成就奖，钱是卡门最得意的学生，美国政府也可以授予他这一荣誉。这种授奖仪式一般都在白宫举行。如果钱来美国接受这项荣誉，我不能保证总统一定出席，但我可以保证，至少副总统一定会出席，并亲自给钱颁奖。

钱学森接到这个报告，说："这是美国佬耍滑头，我不会上当，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的，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钱学森又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上面这番叙述，见于坊间多种报道，网络一索可得。《钱学森实录》在1985年栏下，也有相应的记载：

> 3月9日，一位美国朋友针对"钱学森访美"问题向我国国务院一位领导人说："在美国移民局的案件中，钱当初可能算是驱逐（deport）出境。因此，必须经由某种特赦的手续才能入境。这就必须要你和韩大使出面。真的这样做又得向美国政府求请，或是无形中承认他们当初的措施是对的，这一点在钱的心里必不满意。"
>
> 对此，钱学森给国务院一位领导写信，作了十分坦诚的回答。他写道："……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我如果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例如，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通大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做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

四十年代初，季羡林在德国获得博士，那其间发表的论文货真价实，归国以后，依仗它拿下一级教授、学部委员。再以后呢，就是紧跟形势，应付行政事务，接受改造，包括挨整。学术云云，已是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文革"结束，季羡林年近七十，出任北大副校长。季羡林不是行政干才，这个职务，更多的是荣誉，等于是最后一

站，风光风光，然后就彻底下野，“歇菜”。

季羡林不甘心“歇菜”，他年轻时打下的底子起了作用。季羡林天生是一个文人，因为饭碗，才选择了梵文、巴利文，那玩艺儿没人懂，似天书，因此也少惹许多红尘的是非。优点的延长就是缺点，无奈面太窄，施展不开。七十而后，机会来了，年轻时的积累开始发生效用。李敖说过：“上帝公平，把坐牢的时间没有计算在内。”（大意）对于季羡林来说，上帝没有把他被无端耗掉的时间计算在内，七十老翁，犹能重整旗鼓，在翻译、研究、创作诸领域同时出击，全面开花。

杨绛自打与钱锺书结合，就把自己置于附属的地位。除了四十年代偶露头角，其余的日子，都是隐在钱锺书的身后，甘当“灶下婢”。直到年近古稀，才显示出自己充沛的后劲。这大概也是能量守衡的一种证明吧。既有的能量，不在这个时段爆发出来，就会在另一个时段爆发出来。《堂吉诃德》与《干校六记》，是她翻译和创作生涯的里程碑，至此，杨绛已脱离钱锺书，以一种“庾信文章老更成”的姿态，独立存在于文坛。

和钱锺书一样，杨绛也是一颗“读书的种子”。夫妇俩杜门避嚣，专心向学。这样做是不是消极遁世，蔽目塞听？面对外界的诘难，杨绛回答：“壶台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及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真的‘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唯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界’，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以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读书苦乐》）这话实在说得漂亮，笔者虽有同感，却是无论如何说不出，更做不到如此彻底。

天下研究历史的甚多，研究地理的甚多，侯仁之的独特，在于把历

史与地理结合，创造出一门新的学科。试想世界上许多新的门类，不都是这样嫁接出来的么！

说到“申遗”，侯仁之最早获悉信息，他不是听听而已，而是用做学问的精神，立刻付诸提案，推动实施，因此，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黄万里因正确的言论而获罪，一罪就是二十二年。假设他当初的观点被事实证明错了，那么，他或许会早点得到解放。不幸的是，事实偏偏证明他是对的，这就愈加不可原谅。此中的奥妙，读史的人当不难心领神会。黄万里最后拜大局所赐，砸烂“右派”铁枷，虚岁已然七十。太迟了，太迟了！不像某些年轻右派，如王蒙，改正时，才四十出头，年富力强，还能大干一场。也不像年龄相仿的钱伟长，划右前，在体制内已占据高位，复出，有相应的舞台在那儿等着。黄万里已属老朽。人老，思想也老。譬如，已经低了那么多年的头，如今，只要稍微再低一低，硬着头皮写一份申请，就可以当上博士生导师。这是多么轻松的事啊。他讲死理，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黄万里啊黄万里，组织永远大于个人，你不低头，难道还要组织屈从于你？记得乃父黄炎培的家训么：“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这最后一句，分明告诫你要“外圆内方”——你什么时候外表也能学得“圆”一点呢？

中国人行事向来有两套系统，既能顶天立地，又能受胯下之辱。黄万里只有一套系统，不是不知道，是不愿，是不屑。想当初，重压之下，许多人都变了形。笔者认识那么一两位改正“右派”，已经生生变得比“左派”还“左”，比“风派”还滑。也有变成鬼的，如 2009 年春天曝光的，右派分子黄苗子通过密告，把他的挚友、难友，也是右派分子的聂绀弩送进大牢的“立功”表现，以及右派分子冯亦代甘当卧底、卖友求荣的日记。这事固然与政治有关，上头那么布置，罗网那么密撒，老百姓要活命，不得不乖乖执行。当事人骨头软，私欲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黄万里不然，他宁愿在高压下爆炸，也不向私欲低头。在道德层面，他巍然屹立如巨人。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黄万里坚守住了“右派”的良心。

假若他们在七十岁去世（当然是假设），也算是活了完整的一辈

子。但若论事业，除了陈省身、钱学森功成名就，其余四位，都还差一大截。情形有点像王竹溪。王竹溪和他们是同一年生人，也是清华出身，曾留学英国，二十七岁当上清华教授，是杨振宁的导师。建国后，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副校长。王竹溪是一个大科学家，主要著作有《热力学》、《统计物理学导论》，以及与人合著的《特殊函数概论》。可惜，王竹溪只活了七十一岁，给人的感觉，是"千古文章未尽才"。

卒章论定，七十岁之前，陈省身是大数学家；钱学森是火箭专家；季羡林、侯仁之是半个学问家；杨绛是半个作家兼翻译家；黄万里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教授、诗人。七十岁而后，陈省身功成名就，频频回故国观光，所到之处，皆敬为上宾，据统计，陈省身是受到国家领导接见最多的一位，当是之时，那批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回国，而又长期受压制、受冷遇的学人（这里就不一一点名了）又安在哉？七十岁而后，季羡林、侯仁之、杨绛重新披挂上阵，向各自的领域发起猛攻；黄万里再世为人，重执教鞭；钱学森政务歇肩，理论上马，他的想象力开始频频闪电。钱学森决不满足于当一个实干家，他的全能型的知识结构，帮助他向思想大家、哲学大家的高地迈进。

七十之年的另一特征，就是陈省身之外的五位，日益程度不同地去"工具化"，在一个大而无当的理想照耀下，也开始悄悄地为自己活。

第十章　笑傲八十

1. 泛　论

八十岁，这是让人长嘘一口气的年龄。百年已过五分四，活在哪一朝哪一代，都是老寿星。我们爱看寿星佬的萧疏白发，却不爱看他们抹口红。我们爱看寿星佬的满脸皱纹，却不爱看他们扭秧歌。“少年，我爱你的美貌；壮年，我爱你的言谈；老年，我爱你的德行。”这是歌德的描述。刘大白别有妙喻，他说：“少年是艺术的，一件一件地创作；壮年是工程的，一座一座地建筑；老年是历史的，一页一页地翻阅。”我的体味则是：人在少年时，比的是才气；人在中年时，比的是学问；人到了老年，既不比才气，也不比学问——那样违反自然规律，太矫情——老年比的是人品、人格。人在少年无才，可能终生无才；人在中年无学问，可能终生无学问；人在老年无人品、人格，才气种种，学问种种，不足道也。

这是就正常的时代、正常的人生而言。六位主人公生活的时代，是十年百变，百年千革，他们的人生，也因此跌宕起伏，摇曳多姿。

套用一句古人陈言，就是“书生老矣，机会方来”。

2.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衰老的只是物质，而不是精神。

——阿·巴巴耶娃《人和命运》

季羡林：进入一生最为辉煌的冲刺

忽忽就到了八十岁！没有预期，没有先兆。白居易诗云："八十秦翁老不归，南宾太守乞寒衣。再三怜汝非他意，天宝遗民见渐稀。"（《赠康叟》）白居易这里是说：老人家，太守我如此善待您，不为别的，只为像您这样经历过几代先王的寿星，天下没有几个了啊！而今眼睛一眨，季羡林居然也活到了这把年纪；更邪门的，因为摆脱了行政事务，他不仅没显颓相，精神反而比以前更健旺，更抖擞！

季羡林尝谓胸无大志，包括年龄在内。此说并非矫情，有事实摆在那儿：寿命据考是有家族基因遗传的，他的父亲，按季羡林的年龄推算，只活了三十大几，母亲，勉强活个四十来岁，因此，他把上限定在五十岁，已经算是高指标了。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恍如一场春梦，而立过了是不惑，不惑过了是天命，天命过了是花甲，花甲过了是古稀……如是乎迎来了八十岁。过去从未想到，如今成了活生生的事实，无论如何，这是值得庆祝的；"人生七十古来稀"，何况寿登耄耋！"文革"后，季羡林信奉陶渊明，靖节先生不过活了六十二岁；他喜爱的另一位诗人苏轼，也不过活了六十四岁；至于他少年时的文化偶像林逋，只活了六十一岁。古人寿命较短，那么看今人。清华国学院三位导师：王国维五十，梁启超五十六，陈寅恪七十九；北大三位恩公：胡适七十一，傅斯年五十四，汤用彤七十一；同车赴欧留学的友好：乔冠华七十，王竹溪七十一；小学伙伴，凋零已尽；行看中学朋友，也一个个排队走向那不可知的虚无，剩下的，只有他一人，"留得残荷听雨声"了。

白头听雨，这是什么滋味？悲欢离合总无情，年来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追悼的文章分量骤增。先是悼念朱光潜（孟实），继而是许衍梁、曹靖华、姜椿芳、沈从文、冯友兰……这份名单越拉越长，搁笔有时，截止无日。少年听雨清华园，孟实先生授课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壮岁听雨未名湖，在这儿，他有幸和孟实先生成为同事，然后又不幸成为"棚友"。孟实先生毕生致力于美学，即使在蹲"牛棚"的逆境，依然表现出一种生命的大美：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白天找机会偷打太极拳，晚上睡在被窝里，还在蠕蠕而动，行瑜珈吐纳之术。"四人

帮”覆灭，孟实先生迎来了生命的春天，他相继翻译了两部内容艰深而又篇幅博大的巨著：黑格尔的《美学》与维柯的《新科学》；同时完成了晚年的学术结晶：《美学拾穗集》。季羡林感叹，孟实先生的一生，是审美的一生，他实现了上苍赋予他的、万世只此一世的生命的价值。

白头听雨，犹忆千佛山下，大明湖上，云开日现，雁鸣长空。许衍梁是他的高中校友，两人同岁，不同级，因为胡也频、丁玲，因为普罗文艺，相互成为莫逆。许衍梁是一个网点，联系着他在济南的所有新朋旧雨。1980年他去济南开会，承衍梁召集，一中的老同学热烈聚会。还家遇故知，人生一乐也。会上，不由想到了杜甫的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谁知七年来，一中的伙伴相继辞世，衍梁也走了，是去年。人生多欲，天命有穷，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送走了衍梁，又临到送沈从文。“轻阴江上千峰秀，小雨墙边百草生。”沈从文是从湘西走出的作家，也是从社会底层杀出来的独行侠。季羡林说：“我认识沈先生已经五十多年了。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我就喜欢读他的作品。我觉得，在所有的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了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来，决不含糊。”在写作的道路上，沈从文于季羡林是大有帮助的。在人生的舞台上，沈从文于季羡林也是大有启迪。他大雅，他大拙。他执著，他淡泊。他是那种你可以把它磨碎，但永远不改其朱的丹砂。他是那种白发满头而永远不改其赤子之心的老天真。所以，沈从文的逝世，使季羡林感到一种特殊风格的丧失，大地茫茫，顿觉四顾萧然。

沈从文之后，冯友兰（芝生）又走了。而今听雨南窗下，“雨滴空阶如自语，风吹长木更相呼。”本传第三章写道，芝生先生曾代表清华和德国洽谈交换研究生事宜，没有他，就没有季羡林的留学之机；曹孟德《短歌行》说“心念旧恩”，对于芝生先生的栽培，季羡林毕生铭记不忘。鉴于芝生先生复杂的人生经历和更为复杂的学术背景，建国后，他成了大批判的箭垛。芝生先生的女儿宗璞说：“二十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冯友兰。”兹举一小例：1951年，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团长是丁西林，副团长是李一氓、郑振铎，冯友兰和季羡林同为成员。一次，普拉沙德总统接见中国代表团，讲话中，

赞扬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及“贞元六书”。消息传回国内，外交部随即奉命致电代表团，说这个介绍有问题，让冯友兰在适当的时机予以更正。因此，冯友兰便在后面的一次讲演中，离开主题，检讨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此例虽小，对季羡林的冲击必然很大，足证政治的严厉和思想改造的苛刻。前文说到，季羡林访印归来写了一篇散文，秘而不发长达四十年，相信与冯友兰的遭际多少有关。“文革”中，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道：“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三松堂全集》第一卷）冯友兰因此被举为“梁效”写作组顾问，旧波未息，新澜又起。“四人帮”垮台，芝生先生已届八十一岁，到了这种高龄，才终于摆脱干扰，潜心回归他心目中的《中国哲学史》。晚，固然是晚了。但，晚来总比不来的好。上帝仁慈，居然给了他整整十四年的光阴，正是由于这一段难得的岁月，他才得以夙愿以偿，掷笔去世。季羡林说：芝生先生“终于走完了人生长途，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我们可以说他是晚节善终，大节不亏。”

在他那一辈的学人中，季羡林不知不觉成了“后死者”。“后死诸君多努力”，怀旧使人沉重，也使人奋发。1991 年元旦，季羡林写下《八十述怀》，他说：“我面前还有多少路呢？我说不出，也没有仔细想过。冯友兰先生说：‘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是八十八岁，‘茶’是一百零八岁。我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我是‘相期以米’。这算不算是立大志呢？我是没有大志的人，我觉得这已经算是大志了。”同年 5 月 5 日，季羡林又写了一篇随笔《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劈头就说：“多少年来我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曾一度得到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一个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学，‘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实在心有余悸。一个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还要学现在学的这一套。后一个想法最终占了上风，一直到现在。”“我为什么还要上大学而又偏偏要学现在这一套呢？”季羡林自问自答：“没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我只不过觉得，我走过的这一条道路，对己，对人，都还有点好处而已。”

站在八十岁的台阶，季羡林着手一生最重要的规划：其一是自传体写作，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留德十年、牛棚岁月等等；其二是学术攻关，包括对吐火罗文 A 残卷的翻译、考释，以及《糖史》的写作。

正如他在《悼组缃》一文中所说："我计划要做的事，其数量和繁重程度，连一些青年或中年人都会望而却步，借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我是'欲罢不能'，天生是辛劳的命，奈之何哉!"王昌龄有诗："至今八十如四十"，季羡林正是以这种姿态，进入他一生最为辉煌的冲刺。

杨绛：收获与失落

八十前后，杨绛进入了多产与多事之秋。

多产指散文和小说。先谈散文，代表作有《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记钱锺书与〈围城〉》、《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等。杨绛的散文，以记事为主，饱含她对人生、历史的深刻感悟，文字洗炼而隽永，在她那一代的老作家中，堪谓别具一格。

女儿钱瑗有一段评论，她对爸爸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whisky），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

再谈小说。杨绛从前写过短小的，没有经营过大部头，长篇小说《洗澡》，是她第一次尝试。1986 年动笔，1987 年底完成。1988 年 11 月，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12 月，北京三联书店跟进推出。这一年，杨绛七十七岁。

《洗澡》取材于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全书分三个部分，即"采葑采菲"、"如匪浣衣"、"沧浪之水清兮"，标题分别取自于《诗经》和《孟子》，古色古香，且不易理解，要有相当古文水平，才能一窥堂奥。正文却是一清如水，明白如话。

书稿既毕，女儿钱瑗说："妈妈这本书走入禁区了，党从未认为思想改造是错。"杨绛解释："我也并未以为知识分子不需改造思想。人是 an alloy of base metals，人人需洗炼。但这是个人的觉悟，政治运动无补于事。"

胡乔木对这部小说大感兴趣，他和杨绛谈过三次，基本态度是欣赏的。胡乔木对杨绛说："你写的几对夫妻身份都很合适。你是简·奥斯汀派，不是哈代派。"他也提出一个问题："这是写得好的一部小说，怎么书中没有一个好的党员？如傅今这般的领导，太糟了。"杨绛说：

"他是'入党做官'的投机分子，不是老党员。"乔木点头。他说："你是没有明写。"乔木关于书中的地下党组织，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不怪杨绛，因为杨绛不会懂得党内的种种决策。

叙述至此，有必要离开主题，谈几句胡乔木。胡乔木（1912～1992），号称中共党内"一支笔"，自1941年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长达二十余年。1977年后，一度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顾问、名誉院长。钱锺书即是他点名要的副院长。此外，胡乔木和钱锺书、杨绛之间，还有清华老校友的一层渊源。缘是之故，两家走得很近。据杨绛的《我们仨》透露："文革"后期，乔木曾给钱家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并运用手中的权力，给钱氏夫妇分配了一套四居室的房子。关于后者，乔木从不谈起，这就是高。一谈，就要落入言筌。钱氏夫妇也从不当面表示感谢，这也是高。一谢，就未免减损清高。于是，我们在杨绛的笔底看到："乔木同志常来找锺书谈谈说说，很开心。他开始还带个警卫，后来把警卫留在楼下，一个人随随便便地来了。他谈学术问题，谈书，谈掌故，什么都谈。锺书是个有趣的人，乔木同志也有他的趣。到我们家来的乔木同志，不是什么领导，不带任何官职，他只是清华的老同学。虽然同学时期没有相识，经过一个文化大革命，他大概是想起了清华的老同学而要和他相识。他找到同学，好像重又相逢。"

人是有基本欲求的，钱锺书、杨绛夫妇再清高，也难以拂逆乔木的美意。又因为这番美意过于盛大，为"始愿所不及"，必定在心理引起压力，要想不投桃报李，也难。乔木之为人，坊间颇有微辞，认为他偏"左"，甚而有知识太监之讥，这一点，杨绛自然心知肚明，所以她说："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锺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你看懂了吗？杨绛像在说拗口令，她的这番表态，就是存心不让一般人豁然贯通，这又是杨绛的精明之处。

《洗澡》问世，因为有杨绛的大名，又有钱锺书的背景，十分引人注目。兹举施蛰存的一篇述评，略窥读者的反应，施氏说：

> 我已有好几年没有看完一整本创作小说了。常常是，抓起一本小说，看不到二三十页，就碰到了"不辞而别"、"羞羞答答"、

"尽力而为"这一类似通非通的成语或滥调，我就把书丢下了。这本《洗澡》，自始至终，没有迫使我丢下，作者毕竟是钱锺书夫人，自是语文高手。说来也可笑，语文纯洁，本来是读者对作者，或作者自己对他的作品的最低要求。但在近十年来，却已成为最高要求，在一群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中，要找一本像《洗澡》那样语文流利纯洁的作品恐怕很不容易了。

《洗澡》给我的印象是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精神表现在全书的对话中。一部小说中的对话部分，不是为故事展开服务，就是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一部《红楼梦》中的许多对话，绝大部分都是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的。没有这许多对话，就没有一部《红楼梦》了。《洗澡》的作者，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每一个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都在对话中表现出来，一段也不能删掉。我看当今青年作家的小说，一大段一大段的对话，既不补助故事的发展，又不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大多是喋喋不休的日常生活的流水账。整段删去，也不会使故事有所缺损。由于欣赏《洗澡》中的对话，不禁想起我看过的青年作家作品中的那些不起作用的对话，我希望我们的青年作家要更多的注意作品中对话的作用和意义。

《儒林外史》的精神，不用解释，因为《洗澡》中的人物，也都是"儒林"中人。不过最好的一段，许彦成、杜丽琳和姚宓的三角故事，都是吴敬梓写不出来的。这个三角关系，写得非常高雅，对现代青年会有良好的教育作用。不过我又怀疑这是不是作者的理想主义？是不是可以说，还有"发乎情，止于礼义"的儒家伦理观念？

……

那其间，杨绛又陆陆续续写了不少散文，八十之年（1991）把它们汇编成集，起名《杂写与杂忆》，交花城出版社出版。其时，胡乔木已病重，他在病床上还关心杨绛的创作，要了《杂写与杂忆》的草稿本，让人给他读，一口气听了好多篇。胡乔木为什么如此感兴趣？钱锺书猜想，准是与《控诉大会》一类题材有关。"文革"以后，人们对五六十年代的工作进行反思，乔木亦不例外。《控诉大会》反映的是知识分子

第一次思想改造，乔木曾参与领导。

再而后，杨绛就进入了多事之秋。

1994 年，钱锺书八十四岁，从前有人给他算命，说只能活六十八，一晃，现在竟又多“偷生”了十六载。终于还是挡不住自然规律，老而且病，不得不住院治疗。杨绛在丈夫的病房内安了一张行军床，日夜陪伴服侍。杨绛也是八十三的人了，人们劝她回家，由别人替换替换。杨绛回答：“锺书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五十多天后，钱锺书出院，杨绛也累得几乎要散架。

然而好景不长，钱锺书病愈不久，又生病住院，而且病得很重。船漏偏遇顶头风，第二年，女儿钱瑗又患病入院。杨绛一个老太太，既要照顾丈夫，又要照顾女儿，累，已经不在话下，支撑她的，只有信念：无论如何不能垮。钱瑗入院两年，于 1997 年早春，撒手西去。又一年多，1998 年岁末，钱锺书也走了。留下杨绛一个病骨支离的孤老太太，她禁不住叹息：“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陈省身：创建南开数学所

1971 年，“文革”欲振乏力，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率先回国访问，被称作“破冰之行”。在他的带动下，1972 年，陈省身在阔别故国二十四年后，也回乡省亲。嗣后作《回国》一首：

> 飘零纸笔过一生，世誉犹如春梦痕。
> 喜看家园成乐土，廿一世纪国无伦。

虽然去国多年，乡音未改，中华文化的根还没丢，而同期在“文革”中煎熬的数学界同仁，倘若要他们也吟几首小诗，不是没有情绪，就是压根儿不会。

异乡虽好，毕竟有点故土难离。陈省身回忆，建国初期，国内一些老数学家联名给他写信，邀他回来，他是动了心的。尤其是华罗庚回国，对他触动更大。陈省身晚年答记者问，是这么说的：“我是准备要

回国的。例如说那时候一种退休制度，在芝加哥大学的退休制度，我都没有参加，我是预备。我说做几年我就不做了。……不过我觉得那个时候时机不成熟。”另据他 1950 年 1 月致徐利治的信说：“近友人又信电促归。弟本无意在国外久居，但怕回国管行政，以致踌躇观望耳。”总而言之，心情是矛盾的，进退彷徨，拿不定主意。一个游子在那种时刻的思想斗争，往往当事人自己也难以清楚描述。直到七十年代，陈省身多次返国观光，他才下定决心，把“最后的事业”放在中国。

作为一个炎黄子孙，陈省身心头是有缺憾的，现在，他要在有生之年，把这个缺憾补上。说到这里，笔者要再次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陈省身实施回故国定居，是在七十岁之后，一方面，是中国的国情有了改变，允许海外的华人回国效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美国的“年轻机制”，美国是年轻人的天下，白发苍苍则意味着被社会抛弃，甭管你曾经作出多大贡献，拥有多大学问，一到退休就基本无所事事。但是在中国，恰恰相反，七老八十，还是大有可为的年龄。这两个原因一凑合，顺理而成章，陈省身决意回故国“发挥余热”。

陈省身的“最后事业”，就是要帮助中国成为一个数学大国。为此，他打算在国内办一个数学研究所。首先是选址，北京、上海、南京，都是他学习、工作过的地方，各有各的优势，陈省身考虑再三，最后选择天津。理由么：天津是他中学、大学负笈之地，离首都北京不远不近，远了，消息闭塞，近了，干扰大。其次还有人脉，南开大学前后两任副校长吴大任、胡国定，一个是曩昔同窗，一个是 1947 年的老相交。

筹建南开数学所，关键不在金钱，不在主观意愿，在于要上级批准。因为陈省身加入了美国国籍，是外国人了，让一个外国人担任中国研究所的所长，尚无先例。这个上级，不是教育部，部里也做不了主，还得往上，要国家最高领导人拍板。

一等再等，终于等来了邓小平的讲话。1983 年 7 月 8 日，邓公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不足，决心不大。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他们长期来也好，短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题目来也好。请来之后，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过去我们是宴会多，客气多，向人家

请教少，让他们帮助工作少，他们是愿意帮助我们工作的。”

邓小平是就全局而言，并没有单指谁。有关人士心领神会，国务院向各部部长传达讲话精神时，就特别打电话要南开大学副校长胡国定参加——这事不就很清楚了吗！

陈省身担当南开数学所所长的事一经敲定，事情就好办了。规划、设计，盖楼，闻风而动，快速上马。陈省身也解囊相助，他捐款一万美元，捐书七千余册，外加轿车三辆，并立下遗嘱：将自己遗产的分配由一分为二（分给两个子女）改为一分为三，再加上南开数学所这个“新生儿”。1984 年，陈省身又将沃尔夫奖的款额五万美元悉数捐出。

陈省身当所长，不是名誉的，是实职。数学所照例设有书记，是代表党的，陈省身很关心书记和他的关系。得到答复：书记的任务是协助所长，搞好各项工作。他放心了。1985 年，南开数学所正式成立，陈省身表示，誓为南开数学所乃至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后，陈省身每年来南开两次，每次两个月。返美期间，与副所长胡国定频繁通信。往往是发出一封，未等回音，旋即又发出另一封。出于数学家的严谨，他将每封信都编了号，信中罗列的大小事项，也是“1、2、3、4……”，列得清清楚楚。一次，陈省身来信，指出某号信的某一项，胡国定尚未给予答复，迫使胡国定也把信编上号，以便衔接无误。

陈省身此前办过两个数学研究所：民国政府的和美国国家的，现在办的这第三个，也是国家级的，它“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为宗旨，力争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的平台。陈省身把晚年的全副心血，都倾洒在南开。1986 年，在数学所成立一周年之际，他动情地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此时此地怀抱着一个一周岁的婴儿是一种什么心情！”这句大实话，令在座的人无不肠暖血沸。

1988 年，陈省身在南开大学召开的“二十一世纪数学展望研讨会”上，提出建设“二十一世纪数学大国”。这一倡议，被时任国务委员、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的李铁映称为“陈省身猜想”。嗣后，国务院拨款设立数学专项基金（天元数学基金），扶持中国的数学事业。

1985 年～1995 年，在陈省身的领导下，南开数学所走出了一步大棋：他们每年选择一个主题，举行三个月到半年的学习班，对象包括国内所有研究生。先由本国专家从基础讲起，逐步达到研究的前沿，然后

主要由陈省身出面，邀请国际名家演讲，使学员迅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陈省身的努力，带动了整个中国数学界。吴文俊对此心服口服，他说："陈先生有一种可能在世界上都很少见的功力，他能一下子就把学生送到数学研究的最前沿。"

黄万里："发已千茎白，心犹一寸丹"

黄万里因反对三门峡水库上马而获罪，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平反在姗姗来迟的二十二年之后。刚刚抬起头来，日子稍微好过一点，适逢修建三峡大坝的消息传出，他又按捺不住了。黄万里认为，这又是一项"拍脑袋"的政治工程。他说：从自然地理观点看，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泸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床沙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的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的堆积量。故此，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造价低、工期短，经济效益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以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此外，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无法确保不被敌袭，很不安全。

黄万里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

198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无缘列席。他径直给中央决策部门写信，一而再，再而三，反复申述三峡工程的祸患，强调大坝永不可建，并要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当面陈述利害。

无人理睬，只落得一厢情愿。

笔者近来看到一则资料：1986 年 7 月 28 日，黄万里给他的老家《川沙县文化志》编辑部去信，明确指出，据其父黄炎培生前所述，内史第西厢房是宋庆龄的出生地以及宋氏姐弟居住地。然而，这样一件重要的事，竟因为他"人微言轻"，而不为人重视。不久，内史第的第一进、第二进，就在推土机的巨掌下夷为平地，砌成新楼。还是他的弟弟

黄大能聪明，向陈云请了一方“黄炎培故居”的匾额，才把第三进保存了下来。

2009年5月10日，笔者曾专程前往川沙镇探访，此地已归入上海市浦东新区，在一片水泥、玻璃外加广告、霓虹灯的建筑丛林中，古色古香的黄炎培故居十分醒目。暂停开放，未能入内，只在小院内转了转，门厅雕刻着“华堂映日”，左右植有枇杷和桂花，东南角另有一块小石碑，铭有“宋氏家族居住纪念”，落款是2003年6月25日。据说这是内史第的第三进，院外，在曾经被砌为高楼的地方，如今再度成了平地，想来是当地政府做了新的决策，要全面恢复内史第的原貌吧。

言归正传。1992年，人大通过三峡方案。那时，中共十四大刚结束，八十一岁的黄万里又上书新的中央领导，他在信中说：“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建的，不是什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和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经济开发程序的问题或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举办这一工程。黄万里简要地申述了四点：

1. 在长江上游，影响河床演变的造床质是砾卵石，不是泥沙，修坝后将一颗也排不出去，十年内就可堵塞重庆港，并向上游继续延伸，汛期淹没江津、合川一带。现报告假定卵石不动，以泥沙作模型试验，是错误的。

2. 中国水资源丰富，时空分布也合适。中国所缺的是供水足够地区的耕田。水库完成后淹地五十万亩，将来更多，用来换取电力，实不可取。

3. 三峡坝工经济可行性是根本不成立的。它比山区大中型电站每千瓦投资要贵两三倍。报告中的经济核算方法是错误的。

4. 三峡水库对于长江中下游防洪虽有些帮助，但效果不大。蓄清排浑的代价是使排洪工程加大，守堤防汛期加长，而所利用的电能大减，得不偿失。长江防洪迫在眉睫，应速浚治。

黄万里在信中又说：“回忆1957年黄河三门峡会上唯我一人反对建坝，因其造床质为泥沙，故退一步许可改为留洞排沙。今长江上游造床质为卵石，三峡高坝势必毁败大量坝田，又是我一人振臂高呼决不可建。请三思吾言！”

除上书中央外，八十岁前后，黄万里还陆续撰写了关于三峡和其他

水利方面的论文，如：

1986年1月，在《华东交通大学学报》发表《论长江三峡大坝修建的前提》；

1987年，在《群言》第二期发表《怎样决定三峡大坝是否修建?》；

大病之后的1992年，写下《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

1993年，在《水力发电学报》第3期发表《关于长江三峡砾卵石输移量的讨论》；

1995年，在《水力发电学报》第1期发表《关于长江三峡砾卵石输移量的讨论（续)》。

三峡开工后，黄万里又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反映自己的意见，表达一个公民和科学工作者的关切和忧虑。其间，美国总统克林顿曾通过国际咨询局向黄万里咨询三峡大坝对生态环境等问题的影响，黄万里也据实作了答复，并报告了清华水利系泥沙组。

梁实秋有言："世间骇世震俗之事莫过于说老实话。"黄万里是一面说真话的镜子。

侯仁之："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

标题两句诗，是侯仁之在八十五岁那年写的。纵然自喻为一头牛，也已经老了，岁月不饶人啊，虽曰"奋蹄"，仅仅局限于北京城内。

侯仁之一路走来，四十年代，他在英国攻读博士，课题是北京的历史地理，从那以后，不停地研究，不停地写，进入八十、九十年代，仍然是围着北京转。若问，北京城究竟有多大魅力，难道说不完吗?

说不完。今生今世，他已和北京城较上了劲。

有些事，看起来简单，但要落到纸上，化为定论，则很难很难。譬如说，我们都生活在北京，倘若问你一个问题："北京城有多大年纪?"你肯定回答不出。

作为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责无旁贷，他必须回答。侯仁之经过多年艰辛的探索，终于在1990年，报出北京城的诞辰。他说："北京建城的时间可以上溯到三十个世纪以前，故1990年是北京建城3035周年。"

按照侯仁之的考证："武王伐纣后正式建立诸侯国的时候，北京附



侯仁之向来访客人介绍北京的历史地理。

近的‘蓟’、‘燕’，已经初步具备了城市功能，即为北京建城之始。大约在东周初年，日益强盛的燕国已经征服了蓟国，并且迁都到蓟城，遂有燕都蓟城之称。日后北京又称燕京，来源于此。……按西周纪年，唯《史记·鲁世家》所记较详，因此武王伐纣在十一年，当无问题。”

根据专家推算，“周武王十一年”，乃公元前1045年。侯仁之据此得出初步结论：北京最早建城时的名字，为“蓟”，时间，是公元前1045年。

侯仁之的推断，得到学界普遍认可。1995年，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北京市在宣武区广安门外的滨河公园建起一座“蓟城纪念柱”，并特请侯仁之撰写《北京建城记》：

> 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蓟。《礼记·乐记》载，孔子授徒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燕召公世家》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燕在蓟之西南约百里。春秋时期，燕并蓟，移治蓟城。蓟城核心部位在今宣武区，地近华北大平原北端，系中原与塞上来往交通之枢纽。

蓟之得名源于蓟丘。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有记曰："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证以同书所记蓟城之河湖水系，其中心位置适在今宣武区广安门内外。

蓟城四界，初见于《太平寰宇记》所引《郡国志》，其书不晚于唐代，所记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呈长方形。有可资考证者，即其西南两墙外，为今莲花河故道所经；其东墙内有唐代悯忠寺，即今法源寺。

历唐至辽，初设五京，以蓟城为南京，实系陪都。今之天宁寺塔，即当时城中巨构。金朝继起，扩建其东西南三面，改称中都，是为北京正式建都之始。惜其宫阙苑囿湮废已久，残留至今者惟鱼藻池一处，即今宣武区之青年湖。

金元易代之际，于中都东北郊外更建大都。明初缩减大都北部，改称北平；其后展筑南墙，始称北京；及至中叶，加筑外城，乃将古代蓟城之东部纳入城中。历明及清，相沿至今，遂为我人民首都之规划建设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今日北京城起源于蓟，蓟城之中心在宣武区。其地承前启后，源远流长。立石为记，永志不忘。时在纪念北京建城之三千又四十年。

1991年，侯仁之又提出"北京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侯仁之分析，这三个里程碑代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方向，但都围绕着中轴线。北京城的第一个里程碑是紫禁城。想想看，世界上有哪一个封建帝王的首都建筑如此宏伟？没有，绝对没有第二个。这就是无比。而且紫禁城的设计，左祖右社、面南后市，完全符合中国上古的理想。它代表了封建时代的北京走向世界。第二个里程碑是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开辟。新中国成立，宣告封建时代结束，新时代开始。开国大典放在哪儿？就在天安门。天安门广场整修一新，东西长安街成为通衢。西侧建起人民大会堂，东侧建起革命历史博物馆，标志中国进入民主时代。第三个里程碑是奥林匹克中心。申奥之前，考虑选址，斟酌来，斟酌去，还是北边最适合。因为北边空着，任何一个大工程，首先要考虑发展的空间。奥林匹克中心由中轴线向北延伸，象征北京走向国际、走向世界。

三千多年的北京重新焕发青春。三千多年的遗迹有多少得到认真保护？侯仁之为此倾尽心血。这里面的例子太多了，且举其中一个：九十年代初，首都修建西客站，侯仁之听说有人要放弃莲花池。这怎么行？你们知道北京是怎么来的吗？一次，他给北京市的领导做报告，题目就叫《从莲花池到后门桥》。啧，啧，若以故宫为中心，莲花池在大西南，后门桥在正北，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且听侯仁之娓娓道来，他告诉在座的诸位：

北京最初修建的城，名为“蓟”，莲花池的水，是蓟城的生命之源。建城如同造房，一般都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方，莲花池西北方有一处高地，名叫“蓟丘”，蓟城就筑在蓟丘上，并因此而得名。这段经历，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他的《水经注》中，有相应的记载。不过，那时不叫莲花池，叫“西湖”。莲花池的水源，左右了一个古代城市一步步成长，至金朝，扩展为中都城，这就是北京建都的开始。

至于后门桥，侯仁之说，元朝取代金朝之后，基于解决京城供水水系并开辟漕运，兼及皇宫的理想位置，最终确定了大都城的中心点以及皇宫的中心方位。这个中心点，位于如今鼓楼的北侧，后门桥则在鼓楼的正南方、什刹海的东岸。什刹海当时名为“积水潭”，俗称“海子”。后门桥原来就叫“海子桥”，因位于明清时期皇宫的北门——俗称“后门”的地安门之北，故叫“后门桥”，它的正式名称，是“万宁桥”。后门桥介于元大都中轴线的起点与皇宫的中心点之间，因此，大都城规划的起点，严格地讲，就是后门桥。

侯仁之向在座的各位领导呼吁：保护中轴线，是保护古北京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把什刹海的水引过后门桥，恢复这段河道的水上景观，将使全城中轴线最早的起点焕然一新。

侯仁之的话，领导们听懂了，也领悟了。他的建议被正式采纳。尔后，莲花池、后门桥都得到全面的疏浚、整治，再现了一段北京城的古老风貌。

侯仁之的晚年持续辉煌。1999 年 10 月，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同年 11 月，获得美国地理学会“乔治·大卫森勋章”。

钱学森：百尺竿头，更上一尺

钱学森传世的材料极为丰富，令人眼花缭乱，本章仍一如既往，紧紧扣住他的《实录》，毕竟是信史，靠得住。

《实录》在其七十九岁（1990）、八十岁（1991）部分，有以下记载：

一、《自然杂志》1990年第1期，发表了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合著的一篇重要学术论文《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在这篇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论文中，作者们对系统科学的一个很大的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研究方法，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并对其研究的意义，作了精辟的阐述，特别是这种研究及其方法论的建立，为实现马克思关于自然科学把关于人类的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的预言，找到了科学的和现实可行的途径与方法，其意义是极其重大且深远的。

二、1990年6月28日，出席中国人体科学学会首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钱学森发表了题为《对人体科学研究的几点认识》的讲话。讲话高瞻远瞩地指出了人体科学的研究方向和发展方向，强调人体科学的研究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这不但对人体科学工作者有指导意义，而且对其他领域的科学工作者也有普遍意义。

钱学森说，人体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一个大部门，它平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再加上文艺理论等，总共十大部门，构成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每个部门都有一个哲学概括。人体科学的哲学概括是人天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通过人天观来指导人体科学研究的；而人体科学研究的成果，又通过人天观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他指出，人体作为一个系统，与外界是有交往的，因此，首先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次，人体是由亿万个分子组成的，它又是

一个巨系统。既然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我们研究人体科学，就要应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这是一个根本的观点和方法。

三、1991年7月。美国航天学会主办的《AD. Astar》（原名《航天世界》）杂志在1991年7—8月合刊中以特刊形式遴选了一百多年来对世界航天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或具有巨大影响的100位航天明星，其中有航天员、航天专家、政治家和文学艺术家，钱学森名列第二，是唯一的中国人。关于钱学森的介绍是这样写的：

如果不是威斯康星州一位偏执狂参议员的胡作非为，钱学森也许会对美国的航天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但事实上，中国航天事业却是这位才华横溢的工程师的幸运受惠者。……据认为钱学森为发展中国的弹道导弹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被称之为“中国现代火箭之父”。

四、1991年10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授予钱学森同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表彰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科技事业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由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的命令说，钱学森同志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他早年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等技术科学领域做出许多开创性的贡献。1955年9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他冲破重重阻力，离开美国回到社会主义祖国。1959年8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数十年来，他以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忠诚，满腔热忱地投身于我国国防科研事业，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潜心研究的工程控制论，发展成为系统工程理论，并广泛地运用于军事运筹、农业、林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发展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方面，是我国科技界公认的倡导人。他一贯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指导科学活动。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充分体现了新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他是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

五、1991年10月。钱学森受奖后，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赞颂人

品和科学成就的文章。钱学森把秘书涂元季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凡事都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件事也不可能是一个声音吧?"

涂元季回答说："是的，我也听有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头上了?"

钱学森说道："是啊！涉及到知识分子政策，那就不是一个个人问题了。作为钱学森个人，我没什么可顾虑的，他们爱怎么宣传都行。但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不完全属于我个人，所以我得十分谨慎。目前在科技界，有比我年长的，有和我同辈的，还有许多比我年轻的，大家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做出了贡献。不能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影响到别人的积极性，甚至在年轻人中产生逆反心理，那不是适得其反吗? 那就影响到全面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了。我这么说，并不是故作谦虚，表白一下自己，我的意思是要下决心煞住。你给有关的报纸杂志打招呼，要他们把关于我的稿子撤下来，到此为止吧！该画个句号了。"

六、199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科协在北京中关村的一个极普通的学术报告厅内，举行了一个系统工程学术报告会，这是为钱学森八十寿辰而举办的独特的纪念活动。六位专家讲话以后，钱学森走上讲台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钱学森再次号召系统工程的学者与哲学社会工作者携起手来，并肩战斗，为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论而奋斗。

钱学森讲话刚结束，中国科协副主席高镇宁突然走上台来，大声宣布："今天是钱老的八十岁寿辰!"人们这才知道今天这个极平常的会议的不同寻常的重大纪念意义。

高镇宁又说，钱老从不准我们为他祝寿，送的蛋糕、水果也一律退回，还要批评……今天，是他的八十大寿，我们只为他准备了半斤茶叶，可是，还是被他退了回来。

另外，1986 年 6 月，钱学森在屡辞不允、万分无奈的情况下出任中国科协主席，随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他坚持只当一届，1991 年 5 月辞去，改任名誉主席。

3. 斯人美如画

人生到了八十，最好的风光都已被甩在身后，老人的习惯之一，就是爱回忆，沉湎于一路走过的山山水水。

这就是向后看。

季羡林也向后看，他在七十五岁那年写了《我的童年》，八十三岁那年写了《赋得永久的悔》。但这属偶尔为之，更多的时候，他还是精神饱满地向前看。

季羡林晚年以散文行世，检点他众多的散文篇什，又以《清塘荷韵》最为脍炙人口。这是篇名副其实的美文，从中可略窥他晚年的心境：

清塘荷韵

楼前有清塘数亩，记得三十多年前初搬来时，池塘里好像是有荷花的，我的记忆里还残留着一些绿叶红花的碎影。后来时移事迁，岁月流逝，池塘里却变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再也不见什么荷花了。

我脑袋里保留的旧的思想意识颇多，每一次望到空荡荡的池塘，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这不符合我的审美观念。有池塘就应当有点绿的东西，哪怕是芦苇呢，也比什么都没有强。最好的最理想的当然是荷花。中国旧的诗文中，描写荷花的简直是太多太多了。周敦颐的《爱莲说》读书人不知道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他那一句有名的“香远益清”是脍炙人口的。几乎可以说，中国没有人不爱荷花的。可我们楼前池塘中独独缺少荷花。每次看到或想到，总觉得是一块心病。

有人从湖北来，带来了洪湖的几颗莲子，外壳呈黑色，极硬。据说，如果埋在淤泥中，能够千年不烂。因此，我用铁锤在莲子上砸开了一条缝，让莲芽能够破壳而出，不至永远埋在泥中。这都是一些主观的愿望，莲芽能不能够出，都是极大的未知数。反正我总算是尽了人事，把五六颗敲破的莲子投入池塘中，下面就是听天

命了。

这样一来，我每天就多了一件工作：到池塘边上去看上几次。心里总是希望，忽然有一天，“小荷才露尖尖角”，有翠绿的莲叶长出水面。可是，事与愿违，投下去的第一年，一直到秋凉落叶，水面上也没有出现什么东西。经过了寂寞的冬天，到了第二年，春水盈塘、绿柳垂丝，一片旖旎的风光。可是，我翘盼的水面上却仍然没有露出什么荷叶。此时我已经完全灰了心，以为那几颗湖北带来的硬壳莲子，由于人力无法解释的原因，大概不会再有长出荷花的希望了。我的目光无法把荷叶从淤泥中吸出。

但是，到了第三年，却忽然出了奇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在我投莲子的地方长出了几个圆圆的绿叶，虽然颜色极惹人喜爱，但是却细弱单薄，可怜兮兮地平卧在水面上像水浮莲的叶子一样。而且最初只长出了五六个叶片。我总嫌这有点太少，总希望多长出几片来。于是，我盼星星、盼月亮，天天到池塘边上去观望。有校外的农民来捞水草，我总请求他们手下留情，不要碰断叶片。但是经过了漫漫的长夏，凄清的秋天又降临人间，池塘里浮动的仍然只是孤零零的那五六个叶片。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虽微有希望但究竟仍是令人灰心的一年。真正的奇迹出现在第四年上。严冬一过，池塘里又溢满了春水。到了一般荷花长叶的时候，在去年漂浮着五六个叶片的地方，一夜之间，突然长出了一大片绿叶，而且看来荷花在严冬的冰下并没有停止运动，因为在离开原有五六个叶片的那块基地比较远的池塘中心，也长出了叶片。叶片扩张的速度，扩张范围的广大，都是惊人地快。几天之内，池塘内不小一部分，已经全为绿叶所覆盖。而且原来平卧在水面上的像是水浮莲一样的叶片，不知道是从哪里聚集来了力量，有一些竟然跃出了水面，长成了亭亭的荷叶。原来我心中还迟迟疑疑，怕池中长的是水浮莲，而不是真正的荷花。这样一来，我心中的疑云一扫而光：池塘中生长的真正是洪湖莲花的子孙了。我心中狂喜，这几年总算是没有白等。

天地萌生万物，对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等有生命的东西，总是赋予一种极其惊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极其惊人的扩展蔓延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到无法抗御。只要你肯费力来观察一下，就必然会承认这一点。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就是我楼前池塘里的荷花。自从几

个勇敢的叶片跃出水面以后，许多叶片接踵而至。一夜之间，就出来了几十枝，而且迅速地扩散、蔓延。不到十几天的工作，荷叶已经蔓延得遮蔽了整个池塘。从我撒种的地方出发，向东西南北四面扩展。我无法知道，荷花是怎样在深水中淤泥里走动。反正从露出水面的荷叶来看，每天至少要走半尺的距离，才能形成眼前这个局面。

光长荷叶，当然是不能满足的。荷花接踵而至，而且据了解荷花的行家说，我门前池塘里的荷花，同燕园其他池塘里的，都不一样。其他地方的荷花，颜色浅红；而我这里的荷花，不但红色浓，而且花瓣多，每一朵花能开出十六个莲瓣，看上去当然就与众不同了。这些红艳耀目的荷花，高高地凌驾于莲叶之上，迎风弄姿，似乎在睥睨一切。幼时读旧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爱其诗句之美，深恨没有能亲自到杭州西湖去欣赏一番。现在我门前池塘中呈现的就是那一派西湖景象。是我把西湖从杭州搬到燕园里来了。岂不大快人意也哉！前几年才搬到朗润园来的周一良先生赐名为"季荷"。我觉得很有趣，又非常感激。难道我这个人将以荷而传吗？

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塘荷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的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漂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话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惜第二句对仗不工。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晚上，我们一家人也常常坐在塘边石头上纳凉。有一夜，天空中的月亮又明又亮，把一片银光洒在荷花上。我忽听"扑通"一声。是我的小白波斯猫毛毛扑入水中，她大概是认为水中有白玉盘，想扑上去抓住。她一入水，大概就觉得不对头，连忙矫捷地回到岸上，把月亮的倒影打得支离破碎，好久才恢复了原形。

今年夏天，天气异常闷热，而荷花则开得特欢。绿盖擎天，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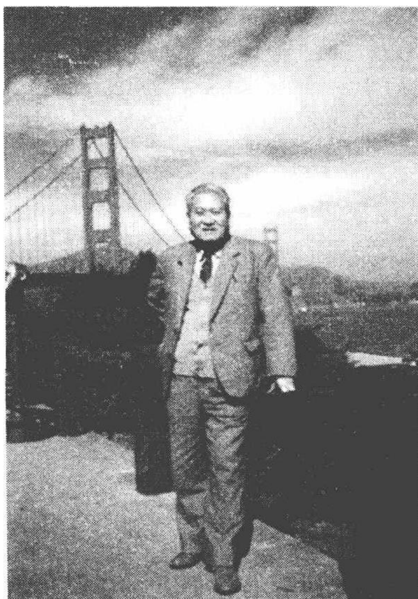
花映日，把一个不算小的池塘塞得满而又满，几乎连水面都看不到了。一个喜爱荷花的邻居，天天兴致勃勃地数荷花的朵数。今天告诉我，有四五百朵；明天又告诉我，有六七百朵。但是，我虽然知道他为人细致，却不相信他真能数出确实的朵数。在荷叶底下，石头缝里，旮旮旯旯，不知还隐藏着多少菁葖儿，都是在岸边难以看到的。粗略估计，今年大概开了将近一千朵。真可以算是洋洋大观了。

连日来，天气突然变寒，好像是一下子从夏天转入秋天。池塘里的荷叶虽然仍然是绿油一片，但是看来变成残荷之日也不会太远了。再过一两个月，池水一结冰，连残荷也将消逝得无影无踪。那时荷花大概会在冰下冬眠，做着春天的梦。它们的梦一定能够圆的。"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我为我的"季荷"祝福。

天赐机缘，这篇散文是由笔者经手编发的，刊登在199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文章见报后，随即博得一片喝彩。而后，又接连获得当代报纸副刊的两项最高奖。可见，这个社会绝不缺少发现美的慧眼。

自从女儿、丈夫相继去世，杨绛一个人呆在家里，深居简出，很少接待来访。笔者曾跟杨先生多次联络，仅限于在电话里问答。有一次，听说老人在搞翻译，问她译的是什么，答曰"无可奉告"。后来消息传出，译的是柏拉图的《斐多》。《斐多》我没见过，不晓得是啥玩艺儿，待得译本出版，才知道是柏拉图的对话录，通篇描述的是苏格拉底，那位古希腊的大哲学家，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刻，如何与门徒辩论灵魂不朽，然后又如何从容饮鸩赴死。这里透出一个信息：耄耋之年的杨绛，已把目光投向天国，她是



1987年黄万里应邀赴美访问讲学摄于旧金山。

在借苏格拉底的思辨，追寻人生的归宿。

陈省身的八十岁生日，是在美国西海岸的伯克利度过的。他的浙江同乡、数学教授项武义为他举行了寿宴，并奉上打油诗一首助兴。寿宴实行 AA 制，参加者每人付三十美元。会上，陈省身致辞，他说，对寿星来讲，参加这种祝寿活动并不太愉快，为什么？因为它让你记起自己越来越老了，真的，很老很老了。当然也有高兴的，这就是有缘人欢聚在一起。数天后，陈省身和夫人在东海饭店回请大家，菜肴之丰盛，令列席者咋舌，一问，才知标准是每人一百美金。

黄万里右派改正之后，有机会到国内外一些高校讲学。其中最难忘的一次，是七十六岁那年（1987），重返美国，在十二所大学演讲水力学（新创的流速垂线分布公式，否定了卡门的万有常数 $k=0.4$）、水文学、水资源增辟途径的新论，兼及中国诗词的音韵与个人诗词朗诵。从他身上，依稀还能看到当年那个豪情如虹的留美博士的影子。

黄万里八十岁时发表《治水吟草》。其自序诗云：

星河回转岁月流，宇内寓形八十秋，
忆昔童蒙犹似昨，悲欢历历思悠悠。
双亲养我多劳劬，勤苦工农亦足讴，
愧恨平生效世少，拼将心力为群谋。
少时气岸凌牛斗，万卷披来空自负，
曾未学为如此文，兴酣摇笔龙蛇走。
文山气节董狐管，念想元元未封口，
总是挚情忧国泪，非关傲世妄归咎。
狂生有道出资封，苦学图成盼晚风，
斯道斯文堪扫地，斯才斯技要纳忠。
阅历江河如指掌，青灯埋首忆艰工，
辄从扬子谋江利，忍对黄河哭禹功。
有策犯鳞何足忌？垂危献璞平生志，
此身哪值五羖皮，倘济苍生秦豫冀。
欲趋彤庭奉拾遗，濒临耄耋仍虚迟，
犹龙老去倦勤未，马角乌头肯创思。

“辄从扬子谋江利，忍对黄河哭禹功。”这一辈子，黄万里是和诗词摽上了。早知如此，他父亲当年还不如听从刘博士的意见，让他从事文科的好。

八十之年，侯仁之依然活跃在国际学术界。1991 年，他前往荷兰，出席国际地理学会的专门会议，随后不久，又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就北京和华盛顿城市设计的主题思想，作比较研究的报告，并应邀赴旧金山，为南海艺术中心连续作了几次介绍北京城的报告。旅美期间，他在郊野散步，飞身跃过一条小水沟的豪举，正好为他人摄入镜头，一时传为佳话。1992 年，侯仁之再赴美国，出席第 27 届国际地理学大会在弗雷德里克举行的地理学思想史专业委员会会议，还分别到美国及加拿大的几所大学作学术报告。

1996 年，侯仁之应邀出席美国克莱尔门特·麦基纳学院召开的《燕京大学的经验与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研讨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国，在美期间，他曾专程前往波士顿，为敬爱的洪业老师扫墓。

1989 年，美国人为钱学森颁布“小罗克维尔奖章”，并授予他“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有人就此写信向钱学森表示祝贺，钱学森不以为然，他回函说：“美国佬给我发奖章，我觉得没有什么。因为对一个中国科学工作者作评价，最有权威的是中国人民，而不是一个美国的什么评审委员会!”

1991 年，八十岁的钱学森在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大会上，讲了一段令人心折的话：“……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到底我怎么样，还有待于将来吧。所以我想，我还要努力。那么我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呢？今天向各位领导，向江总书记，杨主席汇报。我有个打算，我的打算就是：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假设我们把这个科学体系建立起来了，就跟放卫星一样，完全可以用来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一下这件事情。”在以往的岁月中，钱学森已经完成“立功、立德”，他余生重点要解决的，就是如何“立言”。

既然是比较，也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方。1980 年 11 月，六十九岁

的季羡林率团访德，重返当年负笈之地，也是他的第二故乡，哥廷根，并且见到了他的恩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及其夫人。季羡林看到了什么呢？他在《重返哥廷根》一文中写道：

现在我们又会面了。会面的地方不是在我所熟悉的那一所房子里，而是在一所豪华的养老院里。别人告诉我，他已经把房子赠给哥廷根大学印度学和佛教研究所，把汽车卖掉，搬到这一所养老院里来了。院里富丽堂皇，应有尽有，健身房、游泳池，无不齐备。据说，饭食也很好。但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到这里来的人都是七老八十的人，多半行动不便。对他们来说，健身房和游泳池实际上等于聋子的耳朵。他们不是来健身的，而是来等死的。头一天晚上还在一起吃饭、聊天，第二天早晨说不定就有人见了上帝。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情如何，概可想见。话又说了回来，教授夫妇孤苦伶仃，不到这里来，又到哪里去呢？

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教授又见到了自己几十年没有见面的弟子。他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又是多么高兴，我无法加以描绘。我一下汽车就看到在高大明亮的玻璃门里面，教授端端正正地坐在圈椅上。他可能已经等了很久，正望眼欲穿哩。他瞪着慈祥昏花的双目瞧着我，仿佛想用目光把我吞了下去。握手时，他的手有点颤抖。他的夫人更是老态龙钟，耳朵聋，头摇摆不停，同三十多年前完全判若两人了。师母还专为我烹制了当年我在她家常吃的食品。两位老人齐声说："让我们好好地聊一聊老哥廷根的老生活吧！"他们现在大概只能用回忆来填充日常生活了。我问老教授还要不要中国关于佛教的书，他反问我："那些东西对我还有什么用呢？"我又问他正在写什么东西。他说："我想整理一下以前的旧稿；我想，不久就要打住了！"从一些细小的事情上来看，老两口的意见还是有一些矛盾的。看来这相依为命的一双老人的生活是阴沉的、郁闷的。在他们前面，正如鲁迅在《过客》中所写的那样："前面？前面，是坟。"

再看钱学森的老师，大名鼎鼎的冯·卡门，许多资料中都记载着这样一件逸事：

1963年2月18日上午，为了表彰冯·卡门对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无与伦比的杰出贡献，肯尼迪总统授予他美国第一枚科学勋章。按计划，肯尼迪总统要亲自向冯·卡门颁发勋章。当总统及其随从一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就向授勋地点拥去。双脚患关节炎的八十一岁高龄的冯·卡门，摇摇晃晃走到台阶前时，好像由于疼痛难忍，突然停下来。这时，肯尼迪总统迅速赶上去一把将他扶住。冯·卡门抬起头来朝这位年轻的总统看看，然后把扶他的手轻轻推开。“总统先生，”他微微一笑说，“走下坡路是不用扶的，只有向上爬的时候才需要拉一把。”

授勋之后仅仅过了两个多月，1963年5月7日，冯·卡门在亚琛病逝。

比较起季羡林的老师瓦尔德施米特，冯·卡门是幸运的，八十一岁的暮年，还由总统大人亲自颁发勋章。思维也还清楚，一句“走下坡路是不用扶的”，既幽默风趣，又把自己孤独无依的晚境和盘托出（冯·卡门终身未婚，晚年孤身一人），读之令人鼻酸。

下篇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
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
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
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
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
應有恨何事偏向別時圓人有
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
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蘇東坡詞水調歌頭
千古名作
庚寅夏于 耿勇書



第十一章　巍巍九十

1. 泛　论

九十岁，是一个令人仰望的高度。噫吁嚱！危乎高哉！九十之难，难于上青天！芸芸众生，绝大多数在这处“凌虚绝顶”前败下阵来。试看二十世纪那些一等一的政治家：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年纪最长的，蒋介石，不过活了八十八，年纪最短的，孙中山，只活了五十九。至于学界，声名最显赫的，莫若鲁迅，五十五，胡适，七十一。六位主人公命大，都幸运地攀上了九十高峰。时间的手，悄悄擦亮他们智慧的银丝，放大他们卓越的才智，从而有了众星拱月，从而有了锦上添花……九十岁的资本，足以使他们的学术股票看涨，人气飙升。

2. 天若有情天亦老

> 一个超过九十岁的人，对他的那些年过古稀的邻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这些六七十岁的人认为他是一个最前线的卫兵，敌人在向他们逼近之前，首先要进攻的是他。
>
> ——文德尔·霍姆斯

季羡林："不是闻鸡起舞，是鸡闻我起舞。"

晚岁，季羡林喜欢在元旦那天写点感怀文字，这是文人的雅兴，谓之新年试笔。如：1987 年的《元旦试笔》，1991 年的《八十述怀》，1994 年的《新年抒怀》，1995 年的《元旦抒怀——求仁得仁，又何怨!》2000 年的《迎新怀旧》等等。但是，2001 年的《九十述怀》，他却打破常规，写于 2000 年 12 月 20 日——估计是有新闻单位瞄上了这道大菜，早早约稿，预留版面，故不得不提前自我贺寿。

年这玩艺儿，是人为的。时间本无所谓终始，也无痕迹变化，但是经人一刻录，就大有魔力，无形中支配着你我他的生命。季羡林说，小时候，总希望时光快快流逝，盼过节，盼过年，盼一阵风儿就长大成人。然而，时光却总跟小孩儿作对，楞是停滞不前，小小的心里溢满了忿忿之气。人过中年，情形就不一样了，时光之车好像是从高坡往下滑，它不饶人，不解人，一路狂奔不已。"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一转眼，就滑过了花甲，滑过了古稀，少数幸运者或什么者，滑到了耄耋之年。人生到了这个境界，对时光的流逝更加惊心动魄，年轻的时候考虑问题是以年计，以月计，到了此时，则是以日计，以小时计，以分秒计。李白诗云："高堂明镜悲白发"，季羡林很少揽镜自照，但不等于白发不存在，老了就是老了，白发也是一种重量，它沉甸甸地压在头皮。时常，在友朋欢笑之中，在家庭聚乐之际，在灯红酒绿之乡，在奖誉纷至沓来之时，他满面含春，心旷神怡，却蓦地在心头一闪念："这一出戏快结束了!"



1992 年春，季老在颐和园玉兰树下的留影。

悲哀吗？不，人的寿命是有限的，"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螣蛇乘

雾，终为土灰。”“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这是自然规律，季羡林于此很坦然。当生命进入倒计时，他时常想起的，是俞平伯先生的一句话，那是写在散文《重过西园码头》里的，是他在大学时读到的，俞先生说：“从现在起，我们要仔仔细细地过日子了。”一句，就这一句，其他的内容都忘了，这一句刻骨铭心。生命是以日子组成的，日子过得马虎，生命就马虎，日子浪费了，生命也就没有了。俞先生是精细人，一句朴朴实实的俚语，道出了上乘生活的谛旨。道出了是道出了，季羡林真正理解，是在眼前，在晚年。在日子问题上，他决定了，他要像守财奴，把一个铜钱劈成八瓣花，换句话说，把每一时每一刻都过出品位，过出光彩。

季羡林属于老来红。人到晚年，求全之毁，根本没有，不虞之誉，却不邀自来，声望扶摇直上。这里面有多少是实至名归，又有多少是逢场作戏？社会这舞台，尤其是咱中国社会的这个大舞台，总喜欢把荣誉堆到老人头上，甚至是死人头上，这里面有多少玄机，又有多少无奈。季羡林老而不昏，时刻保持清醒。反正人生至此，名缰利锁已不起作用，起码已不起大作用。试问给你泼天的财富，你又如何花？说到消费，季羡林更是所求无几。衣，蔽体而已，食，果腹而已，住，容身而已，行，随缘，有车乘车，没车就迈开双腿。行年九十，三里五里，还是抬脚就到。这也是锻炼。晚年他自创“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旨在强调一种坦荡平和的心态，并不是把锻炼之类都一棍子打死。他曾说“养生无术是有术”，也就是一切顺其自然，不刻意去追求这追求那。

人到九十，季羡林仍然每天四点起床。王岳川先生说：“你这是闻鸡起舞。”“不，”他答，“是鸡闻我起舞。”（天啊！这么多年来，季府周围的鸡们祖祖辈辈岂不都患上了睡眠不足症？）比较起笔者当初书写的“北大三老”中的另二位：张中行和金克木，他的后劲明显要足，在苍茫的暮色里挽起裤脚急急赶路。季羡林自称：“写篇一两千字的文章，倚椅可待”。我们的一些编辑不懂趣，想当然地把它改成“倚马可待”。这一改，季老爷子的特色就丧失过半。八十到九十，季老爷子的威风不是在马鞍，而是在椅背。为了写作《糖史》，曾经有两年，他每天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无碍。燕园风光旖旎，四时景物变幻，春天姹紫嫣红，夏天荷香盈塘，秋天红染霜叶，冬天六出蔽空，

这一切，他都视而不见，甚至不视不见。《糖史》告竣，又把阵地从图书馆移到家里，运筹于斗室之中，决战于几张桌子之上。研究的对象，变成吐火罗文A方言的《弥勒会见记》剧本。这里有个背景：1996年初，季羡林接到德、法两国友人的来鸿，请他在一年内，对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进行修补和完善，并将其译成英文，交德国方面出版。季羡林的第一反应，是拒绝。自己年事已高，且患有眼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是无论如何完不成的。季羡林写好复信，找人打字付邮。当日是礼拜，工作人员都不在。到了礼拜一，大家上班了，他的主意却又改变：这事干不干，不是我季羡林一个人的事，它关系吐火罗文的存活，乃至中华民族的尊严。季羡林于是重新复函，答应干！这也是一场大仗，困难在于缺乏资料，国内没有人研究吐火罗文，你得向国外求援。现在虽号称信息时代，可他需要的资料却刁钻古怪，难以成流，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你查不到，非得到专家的脑库里去搜求。你得等、等、等。有时写作正在兴头，忽然碰到一个难题，就此卡壳，你急得火烧火燎，捶胸顿足，都没用。只好眼睁睁地搁下，尝受等待的煎熬。如是乎这般，熬了一年多，《弥勒会见记》剧本英译稿按期告竣，圆满交付德方出版。——而他的双目，也正是在这番攻坚战中丧失了大部分功能，濒然近盲！

两战告捷，平生大愿告一段落。季羡林并没有止步，他停不下来，一方面是惯性，一方面是使命。“使命”这词儿太大，太硬，那就，那就——改“工作”吧。他的工作，主要是爬格子。迄今为止，他已爬出了上千万的字。绝大部分，是完成于七十至九十之间。这些东西都那么值得爬吗？他认为值。他爬出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让人白日飞升，但他敢打保票，内中绝没有毒药，或假冒伪劣，读后至少能让人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总之一句话，能让人精神境界有所提升。

“爬格不知老已至，名利于我如浮云。”他说。向晚之年，“不求有惊人之举，但求无愧于心。”他又说。但老来不合时宜，或老不晓事，老来作怪，时不时地仍要惊人一下，那是性格使然，时势使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他有好多话成了舆论的焦点，比如关于东方文化复兴的论断：“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但取代不是消灭。全面一点的观点是：西方形而上

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文化寻求综合的思维方式必将取而代之。这种代之而起，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争论好。争论总可以打破一潭死水。但世界上有些事情，并不是越争越明，最终还是要让事实说话。——对未来的事实，即前景，他充满了信心。

高寿，也有高寿之悲。就内来说，老祖、妻子、女儿、女婿，都先他而去了。就外来说，几十年呼吸相通、生命相寄的老友，大多遽归道山了。季羡林虽说还有一个家，这个家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他说：“在一般人心目中，家是停泊休息的最好的港湾。我的家怎样呢？直白地说，我的家就我一个孤家寡人，我就是家，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害饿。”这样一来，他应该感觉很孤独了吧？然而并不，他说：“我的家庭‘成员’实际上并不止我一个‘人’。我还有四只极为活泼可爱的，一转眼就偷吃东西的，从我家乡山东临清带来的白色波斯猫。”还有山大小校友张衡送的“两只乌龟”，以及忘了是何人送来的“五只大甲鱼”，组成了一个热闹的群体。——这番话，貌似旷达，实则苦辛，悲酸。读到这儿，人们有理由发问：

“不对，他们家应该还有其他人的呀？”

“前面曾经提到他的孙子、孙女、外孙陆续出国，出国了也得有安排呀，总不能把老爷子一个人扔在家里不管？何况还有没出国的亲人呢？”

是的，人们的发问是有道理的。将来的研究者，势必要涉及这一话题。关于这，季羡林在《1995 年元旦抒怀——求仁得仁，又何怨!》中，其实已经作了回答。不过，除了当事者，以及周围的少数亲密者，我相信天下没有几人能看懂。他说：“我幻想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然而我却于最近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岂不快哉！这里面当然也有遗弃之类的问题。但并不是自己被遗弃，而是自己遗弃了别人。自己怎么会遗弃别人呢？不说也罢。总之，在我家庭中，老祖走了，德华走了，我的女儿婉如也走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我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条件都已具备，只待东风了。”

这上面所说的遗弃，是指他与独子关系的决裂。究其缘由，可以追

溯到他不理想的婚姻。就是这样一个孤家寡人，社会并不肯放过他。学校领导因为他年事已高，不能再招待那么多的来访者，在门上贴出通告，想制约一下，但用处不大，许多客人都视而不见，照样敲门不误。有少数竟在门外苦等上几个钟头。除了来访者和打电话者，还有扛着沉重的摄像机而来的电视台的导演和记者，以及每天都收到的大量信件和报刊。有一些年青的男女，把他看成了有求必应的土地爷，或者能预言先知的季铁嘴，向他请求这请求那。季羡林感叹："我明明是一头瘦骨嶙峋的老牛，却有时被认成是日产鲜奶千磅的硕大的肥牛。已经挤出了奶水五百磅，还求索不止，认为我打了埋伏。其中情味，实难以为外人道也。"

季羡林觉得活得太久，太累。歌德暮年在一首诗中提到休息，他也真想休息一下。但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就像鲁迅笔下的那一位"过客"，任务只是向前走，向前走。前方是什么地方呢？老翁看到的是坟墓，小女孩看到的是野百合花。他写《八十述怀》时，看到的是野百合花多于坟墓，今天则倒了一个过儿，坟墓多而野百合花少了。不管怎样，反正他是非走上前去不行的，不管是坟墓，还是野百合花，都不能阻挡他的步伐。冯友兰先生的"何止于米"（八十八岁），他已经越过了。下一步就是"相期以茶"（一百零八岁）。季羡林觉得，他目前的选择只有眼前这一条路，这一条路并不遥远，等到他十年后再写《百岁述怀》，茶寿就遥遥在望了。

杨绛：《我们仨》感动中国

女儿走了，丈夫走了，昔日春阳熙熙、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如今只剩下杨绛孤零零的一个。

这个三口之家，是从英国牛津启程。1937 年 5 月，阿圆呱呱坠地，加入父母两人的航船。钱锺书致"欢迎辞"，他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阿圆！阿圆！这可是圆满的"圆"！中秋月圆的"圆"！钱锺书满足于一个孩子，他曾很认真地对杨绛说："我们如再生一个孩子比阿圆好，而喜欢那个孩子，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有钱锺书这样的爸爸，阿圆自是无限感激。他们父女俩，一生一世，其实更像"哥们

儿”，啊不，阿圆说：“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而妈妈呢，阿圆说，“我和爸爸是妈妈的两个顽童。”这是多么幸福祥和的一家人呀！现在，阿圆和钱锺书都中途下船了，撇下杨绛一个，独自面对人海茫茫。

杨绛没有落下风帆，她只是感到寂寞，无人言说的悲哀，生命需要对话，没有了阿圆，没有了钱锺书，她满腹的衷情、郁闷、疑虑，向谁吐呢？向谁诉呢？她的目光越过波涛，越过海平面，穿梭在古往今来，落在了苏格拉底，不，柏拉图。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前文说过，他有一本对话录，叫《斐多》，记叙的是苏格拉底在就义的当天，与门徒们展开的关于正义和不朽的争论。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又说：“真正的哲学家一直在练习死。在一切世人中间，唯独他们最不怕死。”柏拉图的这本《斐多》，杨绛是在钱锺书的遗物中发现的。“千古艰难唯一死”！苏格拉底的超脱，让杨绛领悟了哲人的智慧。既然谁也摆脱不了死亡，那么，就索性直面死亡好了——她决定把《斐多》翻译成中文。

翻译的过程，就是与生命对话的过程，杨绛把全身心都投了进去，一字一句，一行一节，反复推敲，斟酌，结果，书翻完了，她的郁闷和疑虑也消失了，仿佛从死人堆里爬起的战士，她着手“打扫战场”。

杨绛做的第一件事，是整理钱锺书的手稿。锺书是善读书者，他从前在牛津留学，即养成做笔记的习惯。手勤笔勤，笔记愈做愈多。一本本，一册册，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在铁箱、木箱、纸箱，乃至麻袋里、枕套里出出进进。光阴磨人，何况是书！如今，那许多本笔记，业已册页散落，纸张破损，字迹模糊，形象地注释“人生如寄”。杨绛出面收拾残局，她把散落的，重新装订，破损的，加以弥补，模糊不清的字迹，一一仔细辨认。然后，按其内容，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是外文笔记（文种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和拉丁）。钱锺书偶尔打字，是用两个指头在打字机上笨拙地按来按去，他做不来十指如飞，更不会盲打，因此，效率奇低，用这种方法打出的笔记，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其余的，全部依赖手抄。钱锺书做事严谨，举凡书目、重要版本、原文的页数，以及学术刊物的年、月、日，都记得清清楚楚。自从在牛津放弃攻读硕、博学位，他的读书就变成了率性而为。

英国文学，在清华读书期间已打下坚实的基础。他野心很大，转而攻读法国文学、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钱锺书有个“烂笔头”，往往读一本书，要花几倍于阅读的时间记笔记。杨绛不懂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整理起来，十分困难，加之钱锺书喜欢前后互引，额外增加了编排的难度。这时候，恰逢翻译《围城》的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博士来京，杨绛请她帮忙编排。最终结算，外文笔记为一百七十八册，加上打字稿，共三万四千余页。

第二类是中文笔记。钱锺书起初是把笔记和日记混杂在一起，交叉写作。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来了，听说日记要受到检查，这怎么办呢？日记纯属私人心语，岂容他人窥探！钱锺书就拿把小剪子，将日记部分一一剪去，毁踪灭迹。如此一来，这部分笔记就变得支离破碎，零乱不堪。钱锺书写笔记之余，还喜欢就内容发表识见，并常常跨页参考，互相征引。整理也非常吃力。大致来说，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的数量不相上下。

第三类是“日札”。也就是读书心得。这一形式，始于“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最初的本子上，明显有涂抹和剪裁的痕迹。往后，变得正宗起来，日札被题上各种名称，如“容安馆日札”、“容安室日札”、“容安斋日札”；署名也多种多样，如“容安馆主”、“容安斋居士”、“槐聚居士”等等；还郑重其事，盖上各式图章。峨冠博带，煞有介事。杨绛在整理过程中逐渐闹明白，所谓“馆”呀“斋”呀“室”呀，听起来高雅馨香无比，其实呢，只是借陶渊明“审容膝之易安”的成句，喻指他们家在1953年“院系调整”后，居住在中关园的那处小平房而已。而后虽屡次搬迁，但“容膝易安”性质未变，所以日札的名称也就一以贯之。

日札凡二十三册、两千多页，分八百零二则。基本用中文书写，杂有大量外文。不论古今中外，从博雅精深的历代经典名著，到通俗的小说院本，以至村谣俚语，他都互相参考引证，融会贯通。札记是心有所得，但这些“心得”，尚属零散的珍珠，有待用一根丝线穿成项链。一部《管锥编》，随处可见日札的影子。

哲人其萎，钱锺书驾鹤西去，这些手稿对于他，都是不折不扣的“身外之物”了。对于后来人，却是大有借鉴之处。杨绛悉心尽力，把钱锺书的手稿汇编成四十卷，交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事告一段落，杨绛着手干第二件事。2001年9月7日，她将上半年获得的72万稿酬（含她自己和钱锺书的），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杨绛不以钱锺书的名义，更不以自己的名义，奖学金名曰“好读书”，用她的话来说：“宗旨是扶贫。有钱人家的子女上学很容易，贫苦人家的孩子往往好读书而且有能力，但是他们上中学都困难，就更不用说上大学了。希望奖学金能帮助贫寒人家的子弟如其所愿。”在捐赠仪式上，杨绛并且表示，将她和钱锺书未来所有著作的版税都交付清华，作为这个奖金的基金。

杨绛做的第三件事，是写作《我们仨》。这是她老早就想动手的书，女儿病中，跟她说：妈，把这个题目让给我吧。杨绛答应了。女儿真的动笔开写，但是她只写了五篇，生命就被无常拐走了。女儿未尽的心愿，仍得由杨绛承当。

2003年，杨绛完成了《我们仨》。是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杨绛把一家人的生离死别，写成了浮生一梦，若魂若魄，若幽若明，而又真实清醒，刻骨铭心。第二部分，杨绛从头叙起，诉说了她怎样和钱锺书结合，踏上留英长途，喜得爱女钱瑗（也许谐音“前缘”吧），又是怎样返国，老老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向学，青灯黄卷，粗茶淡饭，不求闻达，但求无愧我心，直至被老病相催，被无常拆散……在书的末尾，杨绛禁不住仰天叹息：

>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该书于2003年7月出版。同年年底，杨绛与巴金一起，分别当选为2003年的“文学女士”和“文学先生”。《新闻晚报》在《谁是2003年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人物?》的标题下，斩钉截铁地回答：“杨绛——她用《我们仨》感动中国!”在接下来的正文中具体阐释说：“杨绛瘦小的身躯里蕴藏着感动中国的力量。2003年，杨绛的《我们仨》出版，使人们在字里行间看到了一个知识女性的操守和深情。还有她对待媒体的态度也始终如一，不肯出现在镜头前，既是一种坚持，也是一种智慧。人们很早就尊称她为杨先生，原因在于，在她的身上，人们看到了更多的智慧。她在三年前译柏拉图时，自称‘力不能及’，只

为‘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没想到，钱氏父女走后，她靠着生来的坚倔，靠着哲学的救助，将钱锺书先生留下的大量读书笔记补上。人类进入新的世纪，她再一次进入了新的人生境界。”

侯仁之：荣膺美国地理学会大奖

“等到有那么一天，我能坐在最后一排位置上听你讲课，该是多么高兴啊！”这是侯仁之读初中时，母亲对他的殷切期望。母亲没能等到侯仁之走上讲台的那一天，她老人家很早就过世了，但是在侯仁之的潜意识中，母亲，永远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对他微笑。

一路走来，侯仁之守住了历史地理，守住了课堂。他自我定位，就是一个教书先生。不同的是，他的课堂，不仅在室内，常常还要移到室外、野外。这是很苦很苦的，也是很累很累的。六十余年如一日，侯仁之坚持下来了。九十之年，他被公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巨擘、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侯仁之关于中国西北地区土地沙漠化的研究，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在这一研究领域处于世界前列。而他对位于北京海淀区、建于公元1600年左右的明朝皇帝行宫进行的历史地理研究，更使其声名大振。

为此，2001年10月26日，侯仁之荣膺美国地理学会“研究与探险委员会主席奖”。报道说，该奖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授予那些为世界带来新知识、拥有杰出贡献的国家地理学会基金获得者的年度大奖。侯仁之博士于1989年获得该项基金，用于“从找寻历史遗迹、选址和考古价值方面入手，对位于中国北方的两座清朝花园在园林历史和地理方面的重要性进行评价”的研究。

在中国，历史地理不是显学，侯仁之不是明星，人们对他的了解，通常只限于零星的新闻。侯仁之究竟生活在哪里？晚近过得怎么样？九十岁的人了，我们不指望他依旧大步流星，健步如飞，也不指望他依旧伏案劳形，兀兀穷年。按照古人的说法，“九十不衰真地仙”！如果你有兴趣，那么，就让我们随《中关村》杂志的一位记者，对老人作一次直观的采访。

那是春节前的一天，时值积雪初融，青松红楼掩映的北大校园，宁

静而飘逸。侯仁之教授居住的燕南园61号，位于一个幽僻的去处。几棵很好地保持原生姿态的巨树，伸展着枯干的枝条，遮护在小楼的四周。老式的洋房，以及旁边随意摆放的几件过时的家具，与外面的世界拉开一段明显的距离。通往屋门的青砖小道，扫得干干净净，透出一种古典诗词里才有的清爽。

恰好这个时候，侯仁之和夫人开门送客。侯先生拄着拐棍，由夫人搀扶着，艰难地走下台阶，不管客人如何劝阻，坚持送到青砖小道的尽头。然后，侯老原地站定，恭恭敬敬，夫人则将客人送到车旁，连连弯腰，鞠躬如仪。

待到记者入室，与两位老人品茗交谈，讶然发现，侯先生只是腿有点不得劲，其他一如常人，不，思维迅捷若电光石火，远胜常人。记者的话题是天马行空的，老人不管你点到哪儿，讲着讲着，总能绕回来，像写文章一样，紧扣主题，能放能收。其间，老人谈得最多的，是早年生活的花絮。他说起当年从山东到通州，进潞河中学，是坐火车来的，先到北京，然后去通州。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黄土的大平原一望无际，临近北京，一眼瞥见黛青的西山，激动得不得了。在前门下车，仰视巍峨的门楼，有人告诉他，那叫正阳门。侯先生谈到这儿，眼神充满了追忆和回味。也许，古都北京给予他的最初刺激，正是他锲入历史地理研究的精神基础。

记者事先翻阅过侯老的著作，在《故都胜迹辑略》一书中，侯老在前言里写道："尝读英国史家吉本自传，方其壮年，只身作罗马古城之游。一日傍晚，独步踟蹰于坛庙废墟间，见虔庆跣足之修道士，歌颂晚祷于罗马神堂前。一念所中，不禁有华屋丘山之感。自是乃淬砺心志，卒成《罗马帝国衰亡史》。文笔绚烂，史法谨严，为近代西方史学一大巨著，一百五十年来无能过之者。史迹感人之深，有如斯者。"这番话，更多的是表达侯仁之自己的学术激情。难怪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在给他颁发乔治·戴维森勋章时，评价说："侯博士是中国学术成果最丰厚、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之一。他坚持出版研究著作，并积极培养年轻的地理学者。他的著作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领域，这使他成为当代地理学的世界级领导人物。"侯仁之是全世界获得此项荣誉的第六位科学家，也是第一个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人。

得知记者来自《中关村》杂志，侯先生说："我的大半辈子都在海

淀中关村生活，这是个好地方，我一辈子非常知足！”嗨，同是生活在中关村，有几个人像他这样，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和紧迫的现代感呢？

在侯仁之的著作中，他谈到自己如何从圆明园追溯水流，直探香山的樱桃沟深处。侯仁之对这些源自西山的多条泉水溪流，以及清代海淀的皇家园林，进行过一一考证，在他的笔下，如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海淀”，原为一带水草丛生之浅湖，且有南北之分，现今“南海淀街”的所在，处于高地西北一侧的边缘。这片高地海拔在50米—52米，可以称之为“海淀台地”，上面以旱作为主，是华北平原向北方的延伸。转而向西，地形陡然下降至海拔46米—47米，自南而北逐渐倾斜，泉流水田散布其间，俨然一带江南景色，可称之为“巴沟低地”。这一带低地原是7000年—5000年前永定河北去的故道。由此再向西去，地形又逐渐升高，一直延伸到西北一带的丘陵和山麓地带。年来，在侯仁之的考证和倡导下，在中关村发祥地，竖起了一块别致的“中关村纪念碑”。

记者体会到，在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的精神世界中，古老的北京与现代的北京是合而为一的，水波荡漾、藕花飘香的中关村与中国知识经济龙头的中关村是合而为一的。正是以这样精深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的非凡理念，铸就了侯仁之教授的成功之路。而侯仁之夫妇六十多年坚贞不渝、相濡以沫的爱情，又为他们的精神世界写下了浓重的个性化的一笔。

在记者采访的整个过程中，极具旧时代大家闺秀气质的侯老夫人，静静地坐在侧后方的小桌旁，不轻发一言。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学术研究中，夫妇俩坚守着某种信念，从青年到老年，正如坚守着他们那种特有的待客礼节一样。

钱学森：展望新世纪

在中国，钱学森的名字意味着科学、权威、神秘。他是高高在上的，一是他的学术，体系博大，理论宏深；二是他的境界，光风霁月，超逸绝尘；三、还有他的特殊地位。

那么，九十之年的钱学森在干什么？最简单的办法，还是让我们掀开《钱学森实录》的扉页。《实录》记载：

2001年3月中旬，钱学森接受了《文汇报》记者的专访。他对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的发展发表了如下看法：

记者：从整个社会看，在新世纪中，无论是科学技术领域，还是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都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肯定也会越来越需要系统科学提供新的理论和新的技术手段。

钱学森：对二十一世纪，有各种各样的讲法，譬如说是生物科学的世纪、脑科学的世纪等。但不管怎样，概括起来说，人们一方面要深入到微观层次，揭示物质的本质；另一方面又要上升到系统的层次，研究事物的整体功能。所以不管哪一门学科，都离不开对系统的研究。系统工程与系统科学在整个二十一世纪应用的价值及其意义可能会越来越大，而其本身，也将不断发展，如现在的系统科学已经上升到研究复杂系统，甚至是复杂巨系统了。像人的大脑、因特网等，就是复杂巨系统。这在国外也是一个热门，叫复杂性科学研究。

记者：因特网的发展，在带来了全球网络化、信息化的同时，也暴露了许多问题，如信息安全、信息堵塞等等，现在，人们从技术层面上去研究、讨论这些问题比较多，而从复杂巨系统的角度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个新的思路。在这方面，系统科学将大有作为。

钱学森：现在与因特网有关的问题，国际上都在加紧研究。中国至少已经有1000万台计算机和它联接了，全世界更是有几亿人在上网。因特网的单元和子系统的数量巨大，各子系统之间或者单元之间的交互作用非常复杂，而且还有人与因特网的联系，以及以因特网为基础的经济所引发的种种问题等。所以，因特网正好生动地体现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有现实意义。

社会经济系统也是复杂巨系统的重要研究对象。这是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领域。我想在新的世纪里，系统科学的思想会在社会经济系统得到更多的应用。

记者：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您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科学思想家。您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科学思想，而且相应

有一套可操作的方法，一直到技术上的实施。譬如您提出的“大成智慧”和“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就既有很深邃的内涵，又有很具体的可操作性。

钱学森：我是从搞工程技术走向科学论的，技术科学的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因而我思考问题，一方面在理论上要站得住，另一方面在工程上还要有可操作性。二十三年来，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已经有了很大发展，我们已经从工程系统走到了社会系统，进而提炼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理论和处理这种系统的方法论，即以人为主、人机结合，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并在工程上逐步实现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将来我们要从系统工程、系统科学发展到大成智慧工程，要集信息和知识之大成，以此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复杂问题。

记者：目前的全球网络化，确实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譬如在网络带来的海量信息面前，如何发挥人的独立思维能力和智慧的作用，不至于使人湮没在信息海洋之中，成为一种“信息奴隶”？因此，您提出的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观点，以及“大成智慧工程”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钱学森：系统科学的这一发展，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我们将能集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知识、经验之大成，大大推动我国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实现古人所说“集大成，得智慧”的梦想。智慧是比知识更高一个层次的东西了。如果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真的把人的智慧都激发出来，那我们的决策就相当高明了。

我相信，我们中国科学家从系统工程、系统科学出发，进而开创的大成智慧工程和大成智慧学在二十一世纪一定会成功，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

2001 年 4 月下旬，我国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九十周年校庆期间，从清华造就的众多学术巨匠和科学巨人中，列出二十位知名学者，钱学森以 1934 年清华留美学生，两弹一星元勋名列其中。

2001 年 4 月 12 日，钱学森沙产业奖学金在北京宣布设立，这是钱学森首次同意以他的名字设立奖项。

今年是钱学森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七年前，钱学森将获得的何

梁何利100万港元设立了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钱学森非常重视沙产业的发展，并将其称为第六次产业革命，即以生物技术为基础的大农业革命的内容之一。沙产业理论是一种新思维，一个新概念。沙产业是个新词汇，其英文（Deserticulture）是钱学森亲自拟定的。这个词在中文和英文字典中都查不到。钱学森在十五年前首次提出了“沙业产业”的概念，指出“要看到二十一世纪，在我国大地上将要出现的知识密集型农业，它将导致整个国家生产体系和生产组织的变革。——最后一门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是利用沙漠和戈壁的沙业。”设立沙产业奖学金，就是要为沙化地区留下一支不走的专家队伍。

中国沙产业基金会在北京科技会堂召开钱学森沙产业奖学金会议。中国科协副主席、促进沙产业基金理事长刘恕、副理事长涂元季、田裕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代表，甘肃省科协、宁夏自治区科协、内蒙古自治区科协、甘肃农业大学、宁夏农学院、内蒙古农业大学的代表等有关人士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为培养沙产业及相关产业人才，在甘肃省农业大学和内蒙古农业大学设立“钱学森沙产业奖学金班”，在宁夏农学院设立“钱学森沙产业奖学金”，并分别签署了相关协议。协议规定奖学金班今年暑假开始招生，每班三十人；奖学金每年评出五十名学生，每人1000元。

据悉，为纪念钱学森九十诞辰，推动中国沙产业的发展，中国沙产业基金决定在西北地区的相关农业院校设立钱学森沙产业奖学金，资助贫困地区的学子从事沙产业相关专业的学习，并将继续与西北地区其他有关农业院校联系设立钱学森沙产业奖学金。

……

又据《中国青年报》在2003年10月中旬进行的电话抽样调查，在“谁是中国首席科学家”的题下，钱学森、华罗庚和袁隆平分列前三位。

由新闻中透露的信息，八十五岁之后，钱学森已经不良于行，活动全仗轮椅代步。但他仍然坚持研究，兴致来了，还喜欢哼上几嗓子。这种时候，夫人蒋英总会随声附和。

黄万里：“马寅初、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

自打1957年落难，黄万里就没过过好日子，任是铁打的金刚，也经不起这般反复、无情的摧残。唐人徐夤的诗意“层冰照日犹能暖，病骨逢春却未苏”，正是他的写照。黄万里尽管老来“逢春”，但是迟了，太迟了，多年的“病骨”已经积重难返。从1979年开始，黄万里大病四次，做了五次手术。每次大病，都在生死线上走了一遭。就这样，坚持到2001年夏天，终于沉疴不起。8月8日，黄万里的学生沈英、赖敏儿夫妇前来探视。他自知来日无多，遂在病榻上向两位反复交代治理长江之事。客人走后，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下了最后的遗言：

万里老朽手书

敏儿、沈英弟妹：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

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年8月8日

8月20日，是黄万里的九十岁生日。在此之前，弟子们凑钱为他印了五百册《黄万里文集》。生日当天，大家聚在一起为老人暖寿。咫尺之外，黄万里病卧清华校医院，未能出席庆祝活动。

8月27日，黄万里逝世。弥留之际，仍喃喃呼吁：“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

黄万里逝世后，李锐先生撰文悼念，说：“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是中国水利界一个非常伟大的马寅初式、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而一位网络作者说：“黄万里先生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是二十世纪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道亮光，是20世纪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明珠联璧合的最后几

颗仅存的硕果。先生一去，大树凋零。先生为天下苍生，不避斧钺，言其所知，先生之头可悬于国门之上矣！”

时人有诗咏黄万里：

上善莫若水，而能为大灾。
禹功钦饱学，不只是诗才。

——赵朴初

昔有南冠今右冠，书生报国从来难。
大堤蚁穴谁先见，叹息泥沙塞巨川。

——金克木

情系江河早献身，不求依附但求真。
审题拒绝一边倒，治学追求万里巡；
为有良知吞豹胆，全凭正气犯龙鳞。
谁知贬谪崎岖路，多少提头直谏人。

——张承甫、鲍慧荪

鸣呼！黄万里去世，在当今中国，意味着一种磅礴大气的丧失！

陈省身：叶落归根，魂返希腊

陈省身的晚境是臻于理想的。他落脚在南开大学，校方为他盖了一幢别致的二层楼，题名“宁园”。这个“宁”，既含有“宁静致远”的古意，又契合他夫人的名字：士宁。陈省身说过：“一个人一生中的时间是个常数，能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已属不易。”他一向唯求宁静。

1995年，陈省身获天津“荣誉市民”称号；2000年1月18日，获在华永久居留资格。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在故土长久落户了。遗憾的是夫人郑士宁没有等到这一天，她在六天前猝然去世。

相伴相随六十多年的夫人突然弃世，陈省身陷入极度痛苦。他几经思考，决定将士宁的骨灰安葬在南开数学所，并在旁边为自己留下一个

墓穴，准备百年后与爱妻合葬。

许多人都记得郑士宁六十诞辰时，陈省身为她赋的诗：

> 三十六年共欢愁，无情光阴逼人来。
> 摩天蹈海岂素志，养儿育女赖汝才。
> 幸有文章慰晚景，愧遗井臼倍劳辛。
> 小山白首人生福，不觉壶中日月长。

而今郑士宁撒手西去，宁园就只剩下陈省身一个主人。让我们跟随《微分几何大师——陈省身传》的作者付婷婷，到他的家里看一看吧：陈省身喜欢热闹，时至晚年，他不但坚持给学生上课，还在自己的家里开设了讨论班。他的居所有一个很大的客厅，其中一边是巨大的落地玻璃窗，采光极好。与别人家不同的是，他的家里摆放的不是沙发和安乐椅，而是一些餐椅。如果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这些餐椅“暗藏玄机”。它们不像普通椅子一样只固定在一处，而是可以四处随便移动。而通常这些餐椅子都会面对着一面墙，墙上的装饰品不是别的，而是一块很大的黑板，任何人如果突然产生了一个数学灵感，都可以立即走到黑板前开始演算。当这个想法足够明确时，他就可以及时解释给在座的人听了。

由此，每周五下午，这些餐椅都会被排成整齐的几行，这是陈省身定下的给系里老师和研究生举行讨论班的时间。讨论班会邀请一些学者作报告，不过在讨论中最活跃的还是陈省身本人。

讨论时，如果有些学生羞于表达自己的想法，陈省身总会笑着说：“没关系，年轻人，大胆说出你的想法，在这里我们都是主宰者。”

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自然是容易激发大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

陈省身家中的客厅里还有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一台传真机和一张堆放着许多书籍的书桌，这些都是他为讨论班准备的。有时晚饭之后，他会约上三五好友下下棋，或看些电影录像。但是大多数时候，他是在餐厅而不是在客厅里招待客人，大家常一起围坐在大大的餐桌旁聊天，因为这样气氛就会显得随意和轻松一些。

除了数学外，陈省身还喜欢文学和书画。他曾经同金庸讨论武侠小说，与中国古典诗词专家叶嘉莹谈诗词，和画家范曾说绘画……陈省身

还喜欢老庄哲学，爱好陶（渊明）李（商隐）的诗。在那些诗中，有着他复杂而深沉的情感寄托：对故土的思恋，对数学的执著，对人生的思考……

一次，金庸到南开大学作讲座，陈省身就像一个普通的“金庸迷”一样，坐着轮椅去听讲座。他谈到自己之所以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新的春秋时代，因此，数学家不能只和数字、符号、枯燥的公式打交道，应该关注社会，体验生活，注重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一个中国数学家不可以没有中华文化的涵养。”

对于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早已该安享天年。想一想吧，他的同辈华罗庚已去世十多年，吴大任也已去世了五六年，陈省身似乎把这些朋友未竟的事业都搁到自己肩上了，他常常早晨四五点就起床看书，研究。陈省身对人说：“我已经老了，数学本是年轻人的事业，像我这个年龄还在前沿做数学的，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在有生之年再为中国做一些事情。”

九十岁的陈省身，依然活跃在数学研究的前沿。

2001 年，陈省身因在几何学方面的贡献获得汉堡大学的布莱希克奖章，同时获得柏林工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此外，在台北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人数学家会议上，他被授予“晨兴数学终身成就奖”。

2002 年 11 月 2 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下属的小天体命名委员会讨论通过，国际小行星中心正式发布第 52733 号《小行星公报》，将一颗永久编号为 1998CS2 号的小行星命名为“陈省身星”，以表彰他对全人类的贡献。《小行星公报》称，陈省身“在整体微分几何等领域上的卓越贡献，影响了整个数学学科的发展”。

陈省身说：“把我的名字跟天上的星星联系在一起，我非常荣幸。我是研究数学的，数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家是高斯，他最早的工作就是小行星的研究。现在我有机会跟小行星有联系，觉得非常快乐。”

2004 年 5 月 27 日，陈省身荣获首届邵逸夫数学奖。邵逸夫奖设有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数学科学三项（诺贝尔奖不包括数学和天文学科）。每年颁发一次，每项奖金 100 万美元。由于邵逸夫奖的巨额奖金，且不论得奖人种族国籍和宗教信仰，因而具有国际性，人称“东方诺贝尔奖”。

2004 年 10 月 28 日，陈省身在宁园平静地度过了他的九十三岁寿

辰。第二天，他来到南开数学研究所讲学厅，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京津几何工作营，并作了题为《六维球面上的复结构问题》的学术报告。在报告中，陈省身与听众分享了他最新的研究发现：六维球面上不存在复结构。有关六维球面的课题是一项百年来无人能够解决的世纪难题。陈省身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钻研这一课题，找出了一个新方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终于在九十三岁高龄，攻破了困扰数学界半个世纪、也是他自己想了几十年的难题，对这一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座的数学家无不惊叹："九十多岁了，还能做这样的工作，千古一人而已！""陈先生真是为数学而生！"

一个多月后，陈省身病重住院。2004年12月3日，陈省身与世长辞。他在弥留之际的留言是："我要走了，我要去数学的圣地——希腊报到了。"

3. 临风听暮蝉

季羡林是太公钓渭水——走老运，他八十之年，真正出名，九十之年，出大名。检点九十之年的新闻报道，触目都是"国宝"、"文化宗师"、"学术泰斗"之类的称呼。

季羡林生活在北大，北大多的是年长于他的老寿星。所以他能幽年龄一默，说："如果在往八宝山去的路上按年龄顺序排一个队的话，我决不会在这个队伍中抢先加塞儿，轮到我的时候，我说不定还会溜号躲开，从后面挤进比我年轻的队伍中。"

2001年8月，季羡林回山东老家临清祭祖，这是他1917年离开之后，仅有的几次乡行之一。乡人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祝寿活动。顺便说一说，为季羡林祝寿，已升格为社会一大时髦。光2001年，就陆陆续续庆祝了十六次。

2001年，季羡林还在继续爬格子，写文章。他自认为精神状态，仍在冲刺阶段，至少是还想冲刺。季羡林总是忙，忙，忙，忙得无暇生病，也不敢生病。但病可不管你有暇无暇，有畏无畏，到底不请自来。2001年11月12日，季羡林尿血，入301医院急诊。平时，季羡林最不爱去的就是医院，想到他的诸多好友：赵朴初、周培源、胡乔木、吴组

细，一个个都是从医院“走”的，心头就溢满伤感。谢天谢地，这次只住了半个来月，就打道回衙。然而，季羡林终归耄矣，耋矣，白发萧疏，老迈龙钟——不病谁病？2002年7月，他又因皮肤疾患，第二次入住301。9月25日，笔者去医院探望。病房在一楼，单间，室内有写字台，上面摊着刚开了头的文稿。其助手说：“医院有规矩，不准过多地看书写作，先生就和医生捉迷藏，他每天仍是四点起床，伏案工作，待到日上三竿，医生来查房，他已干了几个小时的活，佯装休息了。”季羡林先生在一旁撇嘴说：“不让我工作，活着干什么？”

九十之年的杨绛，在丧女失夫的大哀痛中，她一个孤老太太，坚守文学阵地，惨淡经营，既搞翻译，又搞创作。一次，有记者在电话里采访：“您最近身体怎么样？”杨绛答：“还凑合，身体毛病很多，九十出头的人了，哪儿能没病呢？”（笑）记者问：“每天的饮食起居如何？”杨绛答：“我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时间，我知道自己也来日无多，时间是最宝贵的，想尽量多些时间来写作，我一天多数时间都是在写作。”记者又问：“您现在最大的生活困扰是什么？”杨绛答：“最大的问题就是打扰特别多，尤其是电话太多，我真担心自己的时间是不是就这样会被消耗掉。我谢谢他们的关心，但千万不要过来看我。还是请大家给我留些时间吧，那样我写些文章出来，大家看到后就权当成我写给大家的一封信吧。”

杨绛这里说得坦白，说得真诚，一个有创造力的老人，一个还在为创造而孜孜奋斗的老人，不能没有孤独，不能没有寂寞，甚至不能没有苦痛。

2004年初春，台湾的宋迎秋先生访问杨绛，文章里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一、“在大书桌对面的墙上，悬挂着一副对联，正对着杨先生平时工作的大书桌。上书‘一双同梦生花笔；九万培风齐斗楂’，看到我们在研究墙上的对联，杨先生高兴地为我们读了一遍，那是她和钱锺书先生在新婚燕尔之时，石遗老人（陈衍）为他们题写的贺联。”二、“书房兼会客室的一侧，放着一个书柜，架里摆着钱锺书和杨绛的所有出版作品，包括中文版和外文版。一套《钱锺书集》显然受到主人特别的关爱，它放在一个特制的木质书架内，摆在大书柜的上面。旁边靠着一套《钱锺书手稿集》。杨先生轻轻地拿下其中的一本，铺在书桌上给我们看，‘他习惯将想法以及考据都记录在书页上。’书上的空

白处几乎都写满了这样的小字。杨先生的指尖在手稿上缓缓地抚摸着，眼神流连着越来越慢。过了很久，她才缓缓地合上手中的书。书架里面还有各种《围城》的中文版和外文版，还有国内刚出的中英文对照版，杨先生给我们看，告诉我们她对于字体和封面的意见，并且和国外的英文版比较。于是很自然地聊起了电视剧《围城》。杨绛说，黄蜀芹是个认真的导演，还有那些很优秀的演员，李媛媛、陈道明、英达、吕丽萍等等，‘李媛媛已经去了’，杨先生颇为惋惜地说道，她的苏文纨演得很好。‘您最喜欢谁的表演呢?’有人问。杨先生笑着说，‘他们都很好，都非常认真’。‘你们觉得是《围城》的电视剧好，还是书好呢?’杨先生忽然转头问我。我告诉她，书中的精妙细微之处，电视剧其实是无法全然传达的。杨先生点头称是。她还特别提到了电视剧中，女人穿的旗袍，为什么都是在腿部的位置有开衩呢？杨先生笑着表示不解：我们那时候穿的旗袍，是绝对没有开衩的，结果现在的电视剧，演到过去的事情，女人的旗袍都是开衩的，而且越来越高，杨先生一边说，一边用手在自己的身上比划着，从膝盖一直到腰上，我们都笑了起来。”

九十之年的侯仁之，将一本自选集命名为“晚晴”，他在序言中说：“少年飘零，青年动荡，中年跌宕，老而弥坚。‘平生最爱夕阳晚，坐听涛声到黄昏。’”

1997年，著名法籍华人艺术家，原清华大学数学教授熊庆来的公子熊秉明，赠给侯仁之小诗一首：

黑板映在孩子们眼睛里
我在孩子们眼睛里写字
写了又擦去
擦去了又写
有些字是擦不去的
我在孩子们眼睛里写字。

是啊，认真说来，岂但是在课堂？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上，在北京城千秋万代的记忆中，侯仁之写下的字迹，也是永远擦不去的！

九十之年的钱学森，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接受了人们的祝寿，方式别具一格，不是大开筵席，觥筹交错，而是同道们聚在一起，召开一次

“钱学森科学贡献暨学术思想研讨会”。这是钱学森所能接受的方式，也是一次别开生面的精神会餐。当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科技工作者代表六百余人齐聚一堂。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在会上发言，题为《科学技术的巨擘，中国人民的骄傲》。若干曾与钱学森共事多年的学者，分别作了专题学术报告。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钱学森的老朋友法兰克.E. 马伯尔（FrankE. Marble）也特意赶来，并以《钱学森在理工学院——他对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影响》为题，向人们介绍了钱学森在大洋彼岸的动人事迹。

2001 年，同样性质的精神会餐，在各地举办过多场。

九十之年，黄万里抱恨而逝。但是黄河没有逝，长江没有逝，黄河的话题无尽，长江的话题无尽，黄万里，鉴于他把自己的热血与黄河、长江融汇在一起，他的名字，在未来大浪淘沙的岁月，必定还要反复被提起。

2004 年 7 月，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赵诚的《长河孤旅》，这是黄万里的第一本传记。

同年 8 月，书海出版社推出赵诚编著的《追寻黄万里》，收集了世人对他的怀念，以及他本人的诗作。

丁东为《长河孤旅》撰文说：“生前，黄万里的正确意见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历史终将擦亮他的名字。在绝大多数人习惯于随波逐流的年代，黄万里成为中国几百万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凤毛麟角。”

黄万里的女儿黄且圆为《追寻黄万里》撰写《江河无情人有情》一文，在篇末写道：“2001 年 8 月 27 日，黄万里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路程，离开了他魂萦梦绕的祖国江河大地。他走过了辛亥革命后的整个二十世纪，他远非淡泊名利、更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完人。但是，他和他那一代中国所有的知识菁英一样，永远背负着民族危难的沉重的十字架；他们不会忘记战火中苦难的人民，也不会忘记洪水肆虐下苦难的人民。正如黄万里诗中所说‘临危献璞平生志’，临危献璞是他们的宿命。他们从西方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学到了科学、理性的精神。他们懂得，科学的真理是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外的，因此，他们决不会为权势或偏见而放弃科学的真理。这就是黄万里在任何打击和挫折下，总是坦然无忌的原因。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他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他们活得太艰难了，可也活得堂堂正正、活得有声有色。”

黄万里生前不能见容于社会，死后反而常常为人提起。足证他的眼光太超前，生命价值落在了后世。在一个商潮滚滚、物欲泛滥、道德化为飞沫的今天，黄万里的事迹和大名，是精神世界最后的“定海神针”。

笔者注意到，当年，一位积极主张三门峡水库上马，因而步步高升，红极一时的“水利泰斗”，近年来改口说，他一开始也是反对三门峡工程的。这是一个信号，说明黄万里当年的意见是正确的，某些人已经在预为“身后事”作图谋。本来嘛，萎缩的人格谋求坚挺，这是好事，但不应采取隐瞒和欺骗。公开站出来，说一两句真话，世人会谅解你，历史会赞赏你，这种行动的代价将小于前者。可惜，中国目前多的是犬儒主义，少的是响当当、当当响的大丈夫。

陈省身病逝于2004年12月3日，是六人中第二个谢幕的。陈省身的一生，超尘拔俗，华丽圆满。让我们在叹凤伤麟的同时，也记住他的一番谆谆教导：

“不久前曾有人问我：您和您的学生丘成桐分别获得了沃尔夫奖和菲尔兹奖，中国本土的数学家很多，却从未获得这两项大奖，中国本土什么时候也能培养出这样获大奖的数学家？我认为，头一个是工作的人要多，中国人的数学能力是不容怀疑的，中国的数学发展必须普遍化。第二个是要有空气。例如，不要把数学家看成‘怪人’。中国没有出牛顿、高斯这样伟大的数学家是社会的、经济的现象。中国的大数学家，如刘徽、祖冲之、李冶等都生逢乱世。要提倡数学，必须给数学家适当的社会地位和待遇。中国的中小学数学教育不低于欧美，愿中国的青年和未来的数学家放大眼光，展开壮志，把中国建为数学大国！”

第十二章　九五之尊

1. 泛　论

历史的车轮疾驶到公元2006，六位从公元1911出发的主人公，这一年只剩下四位，分别是杨绛、季羡林、侯仁之、钱学森。若以生日计，杨绛是大姐姐，季羡林是二弟，侯仁之是三弟，钱学森最小，四弟。岁月无情也有情，一方面把他们的精力衰减，皱纹增多，活动范围缩小在病房和居室，一方面，又把他们的尊严放大，智慧镀金，知名度、影响力大幅度提升。

公元2006年，四位都已到了九十五岁。语曰“九五之尊”，“九五”云云，典出《易经》“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泛指帝王的尊位，本章取其字面的含义，用以形容四位老寿星的才学并茂，德齿俱尊。

2. “相看俱衰年，出处各努力。”

一位九十岁的老妇人对九十五岁的德·冯特内尔先生说：“死神把我们给忘了。”“嘘！”冯特内尔先生一边说，一边把手指头放在嘴唇上，示意她不要出声。

——摘自《岁序赠言》

杨绛：室雅不在大

2006年，杨绛安居家中。杨绛不接待来访，拒绝上报纸、荧屏。杨绛愈是低调，愈发引起世人的好奇。她仍旧住在三里河南沙沟的寓所吗？日常和谁一起生活？还在继续“打扫战场”吗？还在侍弄翻译和创作吗？

2006年岁初，台湾的季季拨通了杨绛的电话，于是有了跨海的问答。事后，季季把它整理成短文，刊发在《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题为《九五杨绛》，文中透露：

> 新旧交替年间，照例给深居简出的前辈文友打电话，闲谈近况，兼贺新年。岁月一年年为他们添寿，却也一年年减损他们的健康。有的前辈往事模糊，言语困难；有的则衰弱多病，时常卧床。九十五岁的杨绛，年龄最长，思路却最灵敏，谈起一些我们共知的往事，以及一些我所不知道的新事，一件件不疾不徐，层次分明。后来说到生活，问她是否仍吃得不多，她答：但也不少。迂回、含蓄，标准的杨绛语法。问她是否仍每天在大院里散步，她答：耳朵有点背，怕人家同我招呼没听到失礼，不出去了，但是每天在家里走七千步。思虑周密，毅力坚韧，典型的杨绛性格。

瞧，杨绛的这种风格，和她的童年、少年一脉相承。敏捷与坚毅都从骨髓中来，杨绛身上有一股贵族气，我怀疑，她不去大院散步，除了怕“失礼”，也和“自古英雄如美女，不许人间见白头”有关。

杨绛自我封闭，并不是任何人都不见，2005年12月16日，她就接待了柳袁照。柳袁照来自苏州，是杨绛母校振华女中的现任校长（今改名苏州十中），陪同的，还有振华女校在京的老校友。杨绛抹不开情面，“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柳袁照事后撰文，披露：

> 拜访杨绛是我们的一个愿望。已经很多年了，杨绛不见媒体、不见外人，无论是官是商，是名人还是其他有关无关的人，一概不

见。这是她的性格，也是她的心境。但2005年12月16日下午，我们终于叩开了杨绛的大门，老人像亲人与朋友一样接待了我们。

刚坐下，杨绛就向我们回忆起当年她唱的"振华校歌"。她对我们用吴语普通话轻轻吟唱道：

三吴女校多复多
学术相观摩
吾校继起
德知体三育是务
况古今中外
学业日新月异
愿及时奋勉精进
壮志莫蹉跎

杨绛对母校一往情深。说好当天下午我们去拜访，早晨她就坐在书桌前，回忆当年振华的校歌，把歌词端正地默写在纸上。还问我们对不对。娟秀的字体，饱含对母校的依恋。

拜访中，杨绛回顾了她在母校的生活，以及抗战期间出任上海振华分校校长的经过。母校在杨绛的心里是一幅永久美丽的画面。……2005年10月，振华北京校友会成立。在京的校友有何泽慧、杨绛等大师名人。会长、秘书长们把振华校友会简报，以及其他会议材料寄给了杨绛。校友的情意像一丝丝春雨，滋润了老人的心，也触动了老人的心。杨绛风趣地说，你们不断的电话问候"像本·拉登的轰炸"，我再不出来也要被炸出来了。其实振华是孕育杨绛青春梦想的地方，那是无论任何风雨与岁月无法抹去的情结。拜访中杨绛告诉我们：她现在正在做"打扫战场"的事情——理钱锺书、钱瑗父女两人的文稿，用不多的有生之年为"我们仨"再做些事情。听了杨绛的话语，当时我的心头就产生了一种苍凉与悲壮的感觉。

在《我们仨》中，杨绛说，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剩下我一个，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能不感叹"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杨绛又说：尽管这样，我却

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坐在杨绛身边，听着杨绛的述说，我的心头很沉重。爱女钱瑗离她而去了，钱锺书离他而去了。钱锺书、钱瑗是杨绛的希望，如今希望没有了，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悲凉之情景。我们理解杨绛闭门独处的心境，我们只有充分尊重她晚年的生活方式与处世习惯，别无选择。杨绛在《我们仨》书中说：“我们免得犯错误、惹是非，就离群索居”，其实不尽然。

杨绛说她与钱锺书：“往往是两个人从一个地方出来，他一晃不见了。我到处问讯，无人理我，我或是来回寻找，走入一连串的死胡同，或在昏黄的车站等车，等那末班车，车也总不来。梦中凄凄惶惶，好像只要能找到他，就能一同回家。锺书大概是记着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听之让人潸然泪下，自在平实的语句，惊天惊地。

上午杨绛出鼻血，保姆劝她下午是不是不见我们了，杨绛坚持要见，她说她已这么大年纪了，见一次少一次，要与振华的校友叙叙往事。多善良的老人啊！探访杨绛一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为使老人不要太累，我们将告辞。在我们即将离开之时，应我们之邀，杨绛先生欣然为母校题词。她回忆道：那时季玉校长每天晨会要向同学训话，开首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振华要实事求是。”杨绛在向我们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还一句一顿地学着季玉校长讲话时的苏州方言。时隔将近八十个春秋，还是如此清晰。题词是为母校百年校庆而作，写什么呢？杨绛略加思索，恭敬地进入自己内卧的书房，挥毫书下了“实事求是”的季玉先生训话，题款“杨绛敬录”。

在这个罅隙里，我才有时间认真环视杨绛的家，特别是接待我们的这个客厅。简朴的家居，极普通的水泥地面，简陋的大书桌，我猜想可能为钱锺书生前所用。壁上满是书，桌上安放着钱锺书与钱瑗的两张照片。杨绛的家，我们视作振华校友的精神家园，当杨绛入书房为母校题词的时候，我们前来探望杨绛的两代校友，抓紧在杨绛客厅合影留念，为的是记住这个时刻；而我们与杨绛的那一张张合影更是心底的珍藏。

告别杨绛老人，我们心中荡漾着美好而凄丽的情感。杨绛执意

把我们一行六人送到门口，握着我们的手，对我们说："把我对母校的思念带回去。"寸草含情的话语，令我们动情。如今孤身一人的大名人，避门谢客多少年，但对我们老少校友，开了例，倾泻深情。拜访杨绛，是母校多年的夙愿，对我们自己来说，更是一次难忘的人生情感的深刻体验。

看完这两则报道，我们应该感到欣慰。九十五岁的杨绛，依然住在家里（不是医院），有保姆为伴（不是猫和狗），能唱（好心情），能写娟秀的小字（眼不花），能写墨笔大字（手不抖），坚持"打扫战场"（整理书稿与写作），坚持每天在房间里走七千步（令人肃然起敬）。杨绛就是杨绛，她的"这一个"，在九十五岁的老学者中独一无二。

季羡林：病室放歌

九五之年，季羡林成了"国宝"，也没有谁刻意敕封，反正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九五之年，季羡林已离不开301医院，也没有什么大病，人老了，身体个别零件失灵，怠工、罢工的事时有发生。既然是国宝，那就在医院呆着吧。北京是一国之都，301又是北京医院之首选，条件是没的说的。至于费用，据说是三三制：国家出三分之一，北大出三分之一，个人拿三分之一。

季羡林人在病房，心还惦着做事。在医生的建议下，他把作息时间做了调整：每天六点起床，上午、下午各拿出两个小时，用于写作、阅读或会客。如此一来，病房，就成了他的卧室、书斋兼办公地点。病房摆有书案、书架，养有金鱼、花草，气氛一如居室之温馨；遗憾的是季羡林钟爱的猫咪不能进入——这毕竟是公众空间，不是私人园地！细心的客人，就给季羡林带来了布制的小狗、小猫、小松鼠，装饰起来，也是饶有生趣。

季羡林视写作为命根子，为串联生命本体的红线，一天的大多数时间，包括吃饭、输氧、输液，他都在酝酿，思考，然后坐到桌前，摊开稿纸，一挥而就。季羡林思维清晰，两个小时，写千把字没问题。住院以来，已陆续完成了十多万字，统称"病榻杂忆"。消息传出，数十家

出版社前来联系，成了抢手货。季羡林不为所动，仍本着一贯的习惯，写了改，改了写，苟有不满意，就推倒重来。

2006年5月14日，北大举行“东方学学科建立六十周年、季羡林教授执教六十周年暨九十五华诞”庆祝大会，笔者也列席了。不用说，会开得隆重而热烈，许多日理万机的要人名人济济一堂。会上，宣读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委员陈至立的贺信，对于老人，这是相当高的礼遇了。当日，老人缺席，只播放了他的讲话录音。第二天，我同季先生见面，说起这番热闹，季先生呢，完全出乎意料，一点儿也不领情。他老大不快地说：“昨天就有人来讲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教授，搞这么大的场合干什么？还惊动了中央领导，小题大做，不值得。”说到住院生活，季先生不改往日的风趣，自称“四半老人”：半聋、半瞎、半瘸、半拐。这是无奈的事实，也是积极的自嘲。能拿自己的弱点开涮，说明他的睿智、幽默、乐观。

季羡林和王大珩，两位清华老校友，一个是1930级的，外文系，一个是1932级的，物理系，年龄相差四岁，年级相差两班，当日在校园就熟识，毕业后七十多年，在各种场合也经常见面。这次不同，2006年春天，王大珩入301检查身体，听说季羡林住在三楼，抽空移步探望，入门，两位老友相见，相互嘿嘿一笑：“老伙计，你气色不错嘛！”“你哪，看上去更好！”振臂欢呼是肯定的，有没有拥抱？笔者没在场，不敢妄猜。反正是喜出望外，反正是大大咧咧，清华派嘛。老校友见面讲什么？八九不离母校。谈清华，谈那遥远而迷人的青春时代。季羡林曾说：“没有清华，就没有我的今天，清华园毕竟是我的学术生涯起步之处。我虽然身不在清华，但心却从未离开那里。”（《〈名家绘清华〉序》）王大珩的感受想必也如是。两位老清华谈着谈着，忽然就激动起来，忽然又引吭高歌起来。歌儿是由王大珩起头的，他有副好嗓子，当年，青春时代，从苏州城一直唱到清华园，从清华园又一直唱到英伦三岛……唱的是什么？——清华校歌。

歌声中，两位老人返老还童；歌声中，人间天上浑为一体；歌声中，往事如潮复如烟。这支歌不属于他人，它专为老清华而存在。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怎能忘，实难忘，国学院，工字厅，图书馆，运动场……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爰跻，祖国以光……那时年少，那时血沸，谁个不是生龙活虎！谁个不是自强不

息！……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铸辉煌于灾难之丘墟……器识其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水木清华众秀钟，赫赫吾校名无穷，名无穷……无论是走南闯北，身在僻壤或异域，无论是七老八十，寿越耄耋，直奔期颐，歌声中有缩地术、阿拉伯飞毯、航天器，歌声中有虎骨酒、青春丹、大力神丸……歌者是忘情客，不老翁，歌者为往事留影，为历史驻颜，歌者是……神。

一曲既罢，两位老神仙又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那也是烙满青春魂梦的歌，是寒冬腊月使北风止吼、雪花迸作火花的歌。用心跳作节拍，用奔血作旋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当然，是从歌声的背景中起来，不是从现实中起来。现实是：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站起来了！站起来了！于是，也是必然，歌声暂歇，一个气喘吁吁，说：“这歌好是好，就是用它作国歌，内容已显得遥远。”另一个立马跟上：“我想重谱一首，歌名不妨叫《复兴进行曲》。”一个接茬：“我也谱一首，就叫《和谐进行曲》。”



卞毓方到301医院拜访季老。

2006年8月2号，是季羡林九十五岁的生日。季先生事先说过，今年生日，谁也不让来。我偏偏要去。我知道，热闹是挡不住的，哪怕医院管理再严；我又知道，人们都会选择8月6号——那是季羡林公开的生日。我则有意选择8月2号，选择在季先生真正的出生日，和老人家欢度片刻良辰。我之前往，没有得到季先生或其助手的允许，是“突然袭击”。因为有一位熟人，恰好也住在301医院，我去看他，顺便探视季先生。——这也是个绝好的理由，比特意去，更容易为季先生接受。且说这天上午，大约十点，上得三楼，出了电梯，向右一拐，再右拐，眼前就是季先生的病室。正要抬脚迈进，一眼看到季先生端坐于案前，凝神运笔，驰骋在他心中的灵境；一幅大写意的侧影，看上去，是那么的庄严，那么的神圣；对，绝对就是神圣！借用我在《蔼蔼绿荫》中的描绘：“此时此刻，先生伏案挥毫，任何台风都吹不乱他头上的一茎霜发，刮不散他胸中的一缕芗泽！”我愣住了，本能地，后撤一步，继而，又后撤一步，站远了仔细打量，生怕——扰了季先生的文思。工作着的老人是不宜打搅的，神圣着的老人，尤其不得，不能。寂静中，一句熟悉的话语在耳边炸响，那是季先生在新世纪第一个元旦吐露的心声——为什么选择那一日？不选择那一日又选择哪一日?！——季先生面对稿纸就像耶稣面对宇宙乾坤，朗声说：“我是我自己的上帝！”

侯仁之：厮守燕园

燕园是侯仁之早年成名的地方。燕园是侯仁之一生学问的酵母。燕园是侯仁之晚年的归宿。九五之年，侯仁之已不复在大野作业，在跑道奔驰，在讲坛布道，可堪自慰的，他仍日日守着燕园——别小看了这一点，301医院虽好，季羡林还不是经常想回家，回到他在燕园的家？

燕园有情。人亦多情。2006年6月，一位年轻的记者前往拜访侯仁之，他在燕园的深处迷了路：

> 幽深静谧的北大燕南园，一时寻不到侯仁之先生所在的61号。拦下一位骑车的中年人问路，刚一报出门牌号，那人便问，“您是到侯仁之先生家去吧?”随即指了指不远处的二层小楼，又补充一

句，“侯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大家，我入学时听的第一个讲座就是他讲北京城的历史。”

步芳斋是侯仁之住所的雅称，今年九十六岁（虚岁）的老先生端坐在简朴的客厅里。由于帕金森症的困扰，他无法行走，一见到记者就双手合十，为不能亲自迎接而不住地道歉。

“约好早上九点采访，您瞧，老先生七点就穿好衣服坐在这儿了，可认真了。”大儿子侯方兴提供的“背景”，更让记者暖意在心。

把刚才中年人称他为“大家”的话转述给侯仁之，他费力地抬起手，摇了摇，一字一顿：“我算不上‘大家’，千万不要这样说。”

侯仁之生长在一个教徒家庭，从小至大，进的也都是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是侯仁之一生的宗旨。英雄迟暮，他的行动受到了局限，没关系，老寿星的生命本身，就是予人浓碧予人荫凉的一株参天大树。

侯仁之爱燕园，日日都要和燕园对话，出行靠的是轮椅，轮椅是由女儿馥兴掌控，她有一篇散文记载：“清晨，是我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尤其是在这个五月。父亲已经坐在轮椅上，等着我推他出去散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是父亲自幼养成的习惯。即使如今不能扫路了，父亲还是早早起床，在燕园作四五十分钟的散步，将令他神清气爽，精神愉悦。我推着他走到西校门的草坪边上，父亲的目光追随几只悠闲翩飞的喜鹊，思绪似乎又回到了从前……走近临湖轩前的矮树丛，父亲要我停车，他怕惊动蹲在路沿啃果子的一只小松鼠。路边有几棵亭亭而立的小白桦，当我指给父亲，他说：‘你能欣赏，我很高兴。’经过办公楼的西侧，路旁几丛幼竹，纤纤细竿倾斜到路面。我特意让轮椅擦着竹叶而过，父亲脱口而出：‘翠拂行人手。’

“每天散步的路线不尽相同，一天天走下来，轮椅的印迹不仅遍及未名湖区，而且留在了镜春园、朗润园里每一条可通行的路径。父亲选择路线，每到岔道口，他总是提前打出手势，指示我继续直行，或是左转，或是右拐。尽管每天变换着路线，不变的是，我们总会去未名湖边停一停。‘多少时光过去了，它依然是这样。’父亲感慨地说。

未名湖南岸慈济寺庙门前那一块小平台，是父亲最常停留的地方。我总是把轮椅靠得尽可能接近水面。父亲坐在那里，伴着天光云影，视野开阔，心旷神怡。盈盈的湖水近在脚下，有时波平如镜，有时涟漪荡漾。父亲的目光掠过湖面上片片浮萍，望着北岸上跑步的人影，又微微侧过身去看那逆光中的水塔。父亲有时也会顺从地跟着我做操，但是他的最爱，是眺望湖水四周生机勃勃的浓绿、碧绿、翠绿。父亲喜欢枫岛上那层层叠叠的苍翠，硕大浑圆的树冠杂以超拔出群的劲枝。有时，父亲会情不自禁抬起右手，在空中勾画它起伏的轮廓，手掌移动得平稳而柔和，像是在轻轻抚摸绿荫的梢头，父亲这么做时，是那样地全神贯注，他的眼里没有距离，只有爱，只有柔情。

"燕园，父亲和这块土地相望相守七十多年。七十年的时间沉积了厚重的爱：一个学子对母校的爱；一位教师对耕耘的土地的爱；还要加上一名历史地理学者对这片文化沃土独特的爱。当我们的轮椅行进着，父亲也在往事的回忆中穿行。我们走过的一条条路径，犹如一根根穿起了点滴回忆的珠链。

"每次轮椅经过适楼（现在的俄文楼），父亲总是用手指着一层南头的几扇花格窗说，这就是当年洪业讲授'史学方法'的课室。洪先生身材修长，举止文雅。'我们看他从窗外走过来，就赶快坐好，安静下来。'父亲有一次补充。

"燕南园 54 号，从 1930 年到 1946 年，洪业教授在这里居住了十六年。父亲每次经过，必定停下来注视着这栋承载了久远的回忆和深切感激之情的恩师旧居。'洪业老师，我永远忘不了！'父亲不止一次地感叹。

"一个明媚的早晨，校园散步归来的路上，父亲忽然说：'去看看魏士毅墓。'魏士毅是燕京大学二年级的女生，1926 年 3 月 18 日，在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中，为段祺瑞反动政府杀害。燕大校长司徒雷登设法运回魏士毅的遗体，举行了全校师生参加的追悼大会。1927 年，燕大学生为魏士毅女士敬立了这座墓碑。铭文刻在墓的基座上：'国有巨蠹政不纲/城狐社鼠争跳梁/公门喋血歼我良/牺牲小我终取偿/北斗无酒南箕扬/民心向背关兴亡/愿后死者长毋忘'我推着轮椅绕到化学南楼的东侧，看见近年修的一条碎石路向南伸到墓前。但碎石铺成的只是一块块的长砖，两砖之间有尺余间隔，露出泥土和丛丛杂草，轮椅

通行不易。我踌躇着，父亲说要走过去。我扶他下了轮椅，在碎石路上缓缓前行。在墓碑前站定之后，像以往一样，父亲将碑文一字不漏地朗声诵读了一遍。念完最后一句‘愿后死者长毋忘’，父亲用手中的拐杖在碎石路面上重重地连敲三下“咚，咚，咚”，像是三个惊叹号震荡在空中。

“一次，逛完季羡林先生居住的朗润园，父亲感慨地说：‘从朗润园回燕南园的家，你有几条路可选。但是无论走哪条路，从水塔下，从临湖轩畔，从钟亭边，还是绕到办公楼，你都得上坡。到燕南园，还得再上一次坡。一路上坡。’

“清晨的宁静是短暂的。校园里行人渐多的时候，父亲明智地打道回府。告别未名湖的归程中，我推着轮椅，切切实实地体验着‘一路上坡’。对这几米的高度差，没有谁比坐在轮椅上的父亲体会更深的了，每一次上坡，他总是关爱地问我‘你累了吧？’

“就这样，我们提着一根根贯穿着回忆的珠链返回，又开始期待明天清晨的再出发。”

侯仁之是幸福的，曾经，他把火热的生命融进了燕园，如今，他在燕园的抚慰下安度晚年。“昔如埋剑常思出，今作闲云不计程。”“花如解语迎人笑，草不知名随意生。”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人生的那一半”完好无缺，儿女随侍在侧，比起杨绛、季羡林，自然更胜一筹。这叫什么？这就是天伦之乐。

钱学森：精骛八极，神游万仞

钱学森是比较难写的，因为他高高在上，因为他深居简出，因为他回避报道，拒绝写传记。还因为，他自九十岁而后，就卧病在床，除了身边的秘书和家人之外，很少与外界直接联系。钱学森的紧邻王毅丹曾透露，这些年每每经过钱家的时候，“窗户多是半掩着的，窗帘紧闭，看不到里面。”楼外站着两名警卫日夜守护着，“这也让我们很多邻居只能远望，而不敢登门拜访。”遛弯的时候，王毅丹偶尔会听到从屋内传出的钢琴声，还时不时有爽朗的笑声，这些都像一串符号，能让邻居们联想，里面是怎样一个暖烘烘的幸福家庭。

当然有新闻，而且多是重大新闻。且看新华社的一则报道：2005年7月2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301医院探望季羡林，紧接着，又探望了在同一医院疗养的钱学森，在病房里，温总理与钱学森有如下的对话——

温总理说："现在，我们也像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样正在组织制定新一轮科技发展规划，确定了重点领域、关键技术，还确定了十几项重大专项。"

钱学森专心倾听。温家宝继续说："这些专项分布领域比较广，涉及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先进制造业、空间科学等。像航天飞行、绕月探测，都要继续进行下去。我们还确定了未来15年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就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这个规划正在全国论证，我们将像过去一样集中力量、发挥优势，攻克这些重大的课题。其中，就有很多您关心的航天项目。"

钱老说："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可能就是艺术方面的修养，使您的思想更开阔。"温家宝说，"而现在学理工的往往只钻研理工，对文学艺术懂得很少，这不利于全面发展。"

"我们的教育还有些缺陷。"温家宝坦率承认，"全面培养人才，这个意见我将带回去和有关部门研究。"

果然，2006年11月20日，国务院第四会议室，面对六位并肩而坐的大学校长、教育专家，温总理把钱学森的意见摊到桌面，他说："有几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今天向大家求教。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校长、专家们自然各抒己见，本文从略。倒是网上有一位叫柴静的

博客令人拍案，他说：钱学森的话是很含蓄的，所谓“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实际就是说，不要工具型人格。

我相信，这句话，我们的校长、专家们是很难说出来的。

另外，据相关报道，钱学森还对温总理说，他最大的遗憾是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培养大师的制度。什么是大师？大师就是有大的原创性。什么是培养大师的制度？第一步就要以原创性为学术研究的指挥棒、指明灯，因为原创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全球范围内的原创性恰恰是诺贝尔奖的核心。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是深谙人才成长的玄机的，所以他从1994年起，就与黄胄、吴冠中、常沙娜等艺术家组织了“艺术与科学”研讨会。据笔者有限的见闻，目前似乎仅调动了艺术家的科学情趣，而对于最根本的一点，即理工青年及科学工作者的艺术灵魂之塑造，还远远不够。毕竟，那里隔着体制的屏障，不是谁谁谁可以一厢情愿、一锤定音的。

2006年，以研讨会的形式为钱学森祝寿已形成惯例。钱学森的智慧散发在北京、上海、杭州、厦门、昆明等城市的会场，氤氲不散，蔚为新风。一系列图书，如《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研究》、《钱学森学术思想研究》、《集大成得智慧——钱学森谈教育》、《社会智能科学》等，也同时配合发行。

附录

九五之年的钱学森，收到一封异国来信。这封信发自菲律宾，写信的是七十五岁的林孙美玉。信中回顾：

五十年前，钱学森正在由美返国途中，船泊马尼拉，钱学森到码头上散步，与林孙美玉不期而遇。那时，钱学森冲破美国阻挠返回新中国的故事，已经被电波传遍了世界。林孙美玉见了钱学森，忍不住问：

“钱先生，您为什么想回到中国？”

“我想为仍然困苦贫穷的中国人民服务，我想帮助在战争中被破坏的祖国重建，我相信我能帮助我的祖国。”钱学森笑着回答。

交谈中，钱学森顺便问了一句：“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高中老师。”林孙美玉有点羞怯地回答。

钱学森高兴地说："非常好，中小学的老师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青年是社会的未来，他们必须受到好的教育，以培养他们的潜能和创造力。"

林孙美玉显得有点难为情，她说："但是，我只能教低层次的东西。不像您是杰出伟大的科学家，能够创造伟大的事业。"

"不，不，你不能这样说。"钱学森一听，连连摆手，说，"我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老实说，你和我的工作就好比是在做一款精美的糕点，我只是蛋糕表面的糖衣，你做的是蛋糕用料的基础工作。其实，蛋糕要想味道好，里面的用料必须好。基础非常重要，培养年轻人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基础。不要瞧不起你的工作，你是在塑造年轻人的灵魂。还有比塑造灵魂更重要、更伟大的工作吗？你要以此为荣、引以自傲啊！"

就这么一次萍水相逢，一番偶然的交谈，点燃了林孙美玉心头的火焰。五十年来，她牢记着钱学森的话，在教师岗位上干得十分出色，成为当地一位颇有名气的教育专家。林孙美玉在信中说：

"现在，我已经七十五岁了，而您已是九十五岁高龄。我听说您生病住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但同时我也非常高兴地知道您还在人世，并且仍然用您那永不枯竭的灵感热爱着中国。

"我在菲律宾向主祈祷，保佑您幸福，并且在您不适的时候让您得到安慰。我感谢主，他把您这个最好的礼物给了中国，您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我们为您而骄傲。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殷切的祝愿。"

3. 夕阳山外山

让我们把政治忘却，把功名抛弃，把诸多利害关系统统斩断，单纯地把他们看做一个个耄耋老人，好不好？

答案是：行不通。

钱学森在当今，几乎是政治和学术的化身。他是共和国至高无上的英雄。在钱学森获得的众多荣誉中，他最自豪的，是自己的名字被和"雷锋、王进喜、焦裕禄"放在了一起。《人民日报》有一位记者感叹："如果我为钱老写传记的话，我宁愿把他看做一棵参天大树。纪伯伦有

言：如果给一棵树立传的话，那么它的历史犹如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世情缘，根深叶茂，它的名字便意味着一连串阳光灿烂的日子。”

季羡林本来和主流保持一定距离，比如他的《牛棚杂忆》，就犯了“不得反映‘文革’”的大忌。但是，当他丧失了蓬勃的创造力之后，尤其是蛰居301医院之后，他被政治的绣球抛中了，成了继巴金之后文化人的代表。一旦成了代表，就得恪守规范。巴金最后几年是什么也不讲——事实上，他已丧失了语言功能。季羡林呢，大家都听到了的，他讲得很得体，很悦耳。写《牛棚杂忆》的季羡林没有了。写《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的季羡林也没有了。时乎，势乎，形势总是比人强！

同时要指出的，九五之年，季羡林的生活再度发生变数：此前，1995年，他因家务和独子季承分手，日常生活和工作，改由多年老同事李玉洁照管；2006年，李玉洁中风病倒，她的职责又由另一位秘书杨锐代替。

侯仁之生性疏淡，迹近平民，不过他的学术，离不开北京市政府的官方后盾，也离不开北京大学的半官方背景。2006年12月，侯仁之和季羡林、徐光宪、曲绵域、王夔、韩济生、厉以宁、王阳元、袁行霈、林毅夫一起，获得了北大教师的最高荣誉“蔡元培奖”。

垂暮老病之年，侯仁之并不回避和年轻的、陌生的目光接触，这是他感知生命的一种方式。我的一位北大的晚辈校友说，侯仁之坐在轮椅上巡视校园，已成了燕园的某种象征。他每天清晨都要到未名湖一带散步，为的就是接受老人目光的抚摩。而当他回望老人，心头就会想起聂鲁达的诗：“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是的，他从侯仁之的身上看到了生命的华美脉络。

杨绛是在二十世纪的翰林院——中国社科院——告退的，她的身上，闪耀的却更多是民间色彩。杨绛远离政治，这是大学者的特征。政治是适时性的，普世性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而学问之大道，是要超越当今，洞彻过去，启迪未来。

第十三章　公元2007

1. 泛　论

公元2007，硕果仅存的四位主人公迎来了九十六岁。季羡林持续扮演着泰斗级的明星，一本《病榻杂记》，虽然没有多少真知识，真学问，但却行销天下，轰动朝野。杨绛继《我们仨》之后，又推出《走到人生边上》，实话实说，表现相当另类，让媒体在赞叹她的创造力的同时，也多少有些茫然失措。钱学森依然保持着一贯的高贵和尊严，因为健康的缘故，他已从公众场合消失，媒体不时爆出一些高调的消息。侯仁之比较平民化，尽管长期住在北大校医院，他的轮椅，仍旧日复一日地驶过燕园。

2. 光荣与梦想

人如随年老而成熟，那就美如醇醪。

——英国谚语

季羡林的长镜头

温家宝第四次到医院看望　围绕着季羡林，2007年度的头条政治新闻，依然是温家宝总理前往301医院探望。且看新华网对此事的报道：

8月6日是季羡林先生的九十六岁寿辰。下午4时30分左右，温家宝来到解放军总医院康复楼，为他祝寿。这已是温家宝2003年以来第四次看望这位精通多种语言的翻译家、文学家和教育家。

干净整洁的病房里，摆放着温家宝赠送的君子兰，绿意盎然。“您送给我的手写的《牛棚杂忆》很宝贵，字工工整整，非常认真，一丝不苟。”温家宝告诉身着红色中式绸装的季羡林，“我每次来都深得教益，去年咱们谈的‘和谐’，您提出人要自身和谐，我向中央作了反映，中央全会决定里就吸收了您的意见。”

看到季羡林精神不错，听说他每天坚持写东西、听人读报纸，而且乐观坚信自己能活到茶寿一百零八岁，温家宝十分高兴。他说：“最近，我看您讲良知、良能。我认为，这是知和行的统一观，也是人的品德和能力的统一，这个思想很深刻。”

温家宝说：“我喜欢看您的散文，讲的都是真心话。您说自己一生有两个优点：一是出身贫寒，一生刻苦；二是讲真话。对吧?”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我们做得不够，还要多努力，把工作做好。您也要把身体保重得更好，多看些年。”

温家宝谈起季老送给他的一篇文章《泰山颂》。温家宝说：“写得很好。文章感人，而且有气势。您大概从小就对泰山很喜欢?”

“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对，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民族颂。”温家宝表示赞同。

“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季老饶有兴致地说。

“对，季先生讲的就是民族精神。”

病房里，宾主相谈甚欢。临走时，温家宝真诚地嘱托季老保重身体。

（作者李斌）

还家之行与去莫斯科餐厅　2007 年，季羡林最具温情而浪漫的一笔，是怀旧之行。是年夏秋之际，在九六华诞的喜庆声中，季羡林两次“走”出久困的病房，先是回了一趟北大朗润园，而后又去了一趟“老莫”——位于西直门外的莫斯科餐厅。

这两次行动，高度保密，媒体未见任何报道。笔者事后偶然得知，询问有关人，也是支吾其词，不作正面回答。但是，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据笔者了解，大致情况是：

生日过后，季先生动了怀旧之念，一日（大约是公历 9 月，农历中秋节之前），借助于轮椅、轿车，悄然返回北大，回到朗润园。2003 年以来，季先生住院期间，曾多次跟笔者说过，要回家，季先生指的家，就是位于朗润园十三公寓一楼的寓所。当日，陪伴在季先生身边的，除了工作人员，还有北大方面的代表，以及 301 医院的护士长等，在朗润园恭候的，有季先生的老邻居兼老朋友汤一介夫妇，还有那只绰号“大强盗”，自主人入院之后就染上“相思病”的大白猫。

后来，北大学者王岳川撰文谈到了这次回家。2007 年 8 月，王岳川去医院看望季先生，老人含笑告诉他：“前不久刚刚回过一次北大朗润



季老与爱猫咪咪。

园老家。”童心慧眼的先生喜欢养波斯猫，当离家三年多的先生回家时，猫猫一眼就认出了阔别的老友，纵身跳入“老伙计”怀中。当时季老感动得热泪盈眶，跟随的人面对此久别重逢的感人场景也唏嘘不已。季老擦着眼泪对我说：“谁说猫猫是白眼不认人，应该平反啊。”说得我也感动莫名。(《我与季老在北大的日子》)人猫相拥，这场面的确足以感人。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猫给予老人的乃抽象的亲情。猫啊猫，焉知一次相见之后，又将是望穿秋水的期待。

过了几日，便是中秋节，季先生又去了趟莫斯科餐厅。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苏友好的大背景下，莫斯科餐厅以她华贵的气派，浓郁的俄罗斯风情，给当时的北京上流人士，留下了如痴如醉的回味。季先生曾是这儿的常客，据他自述，建国之初，作为北大屈指可数的一级教授，工资为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每月一百元的津贴，收入是很丰厚的。当时物价奇低，吃一次“老莫”，汤菜俱全，还有黄油面包，外加啤酒一杯，才花一块五至两块。如果吃烤鸭，挑个头大的，也不过六七块钱。如今时过境迁，盛名不再，物价也早“与时俱进”。季先生此去，不过是像一首歌词所唱，“回到往日好时光”。据说，季先生在“老莫”享受了一杯啤酒，外加一份冰淇淋。消息传到任继愈先生耳里，他赶忙给季先生打电话，敦劝他以后别随便吃冰淇淋之类，当心弄坏了肚子。季先生风趣地回答：放心，我是属猪的，吃什么都没问题。

会晤金庸　2007年，季羡林稳坐301，照例要接待许多海内外贵客。我特别注意到的，有金庸。综合互联网消息，6月18日下午，金庸在北大演讲，有学生提问：侠之大者，要有为国为民的侠风义骨。请问在当今社会，侠义还有什么发展的空间，如果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

金庸回答：今天上午我去探望季羡林老先生，他跟我谈到了侠，季先生认为，中外关于“侠”的理解是有很大不同的，“侠”下面是两撇，是两个人在打架。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在打架，小孩打不过大人，外国老太太站在旁边看到了也不会管，一直打下去好了，可以打两个小时。但是中国老太太就不会不管了。她会拿一盆水泼过去，把两个孩子泼开。季先生还说，在日本侵略我们中国的时候，我们还去日本告状，请世界主持正义。当时他在欧洲，就觉得这个想法行不通。人家会想你有本事打回去。武侠精神，在中国，还有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

亚、越南这些亚洲国家，人们非常接受，认为很有道理，但是西方人就不大接受，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侠者就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西方人觉得强的可以欺负弱的。

金庸像是回答了，实际上没有回答，起码是没有说清楚。他低估了学生的水平，虽然抬出季羡林的大名，也无济于事。

我与金庸先生，从未晤面。读过他的武侠小说，感觉还不赖。这些年他总上“镜头”，作风有点“海派”——本来，金庸生于浙江海宁，近海，长期生活在香港，又被大海包围，染上“海派”作风，是再正常不过的。金老先生明显不甘寂寞，时不时闹出一点新闻。譬如，他与北大互动，这边厢捐款，那边厢赠与名誉学位；他与一帮文坛豪杰华山论剑，意气风发，不知老之将至；他以八十高龄，赴英国剑桥读博士，等等。金庸身上有股调皮劲，是名副其实的老顽童。

林青霞的造访　2007 年，季羡林的生理状况，变化不大。当然，客观上是又老了一岁，从九十五变成九十六，这是上帝的恩赐，令人油然而生敬意。季老曾以他一贯的幽默对来访者说：“我的身体还可以，变化就是头发没有了，真是无法（发）无天。”头发并非完全脱尽，而是越来越稀，除此而外，过去的一年似乎没有在老人身上留下多少明显痕迹。硬说有，就是稍微胖了点，面色也比过去红润。一次见面，我偶然注意到老人的左额有一处隆起，按民间说法，这是长寿的象征。我问，这是什么时候有的？老人回答，很早就有了，很早。至于生活，略有变动，因为医院扩建，病室从老楼换到了新楼，格局还同以前一样，摆设略有精简。

2007 年，关于季羡林的文章，依然是连篇累牍，铺天盖地。这里只引一篇，就是林青霞的访问记。林青霞是香港著名艺术家，她的出场，总带有音乐与灯光。据她的友人金圣华在《有缘一线牵》一文中介绍，2007 年 10 月上旬，白先勇监制的《青春版牡丹亭》要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为了这桩盛事，昆曲“义工团”的团员都在各尽其能，倾力相助。一天，金圣华给林青霞打电话说：“喂！《青春版牡丹亭》要在北京上演了，你要不要去看？”电话那头略为沉吟，未予即答。于是又说：“这次是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号称‘巨蛋’的剧院，还是首次对外开放呢！”对方仍然犹疑未决。“到了北京，我们晚上看戏，白天一起去拜访季羡林、杨绛两老好吗？”话说到这儿，林青霞立刻响应：

"好呀！我去我去。"这就是赴京前，金圣华跟林青霞之间的谈话实录。对青霞来说，昆曲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她极想观赏及进一步了解，白先勇更是认识多年的朋友，当然乐意去支持及打气。尽管如此，青霞前不久刚从山东还乡之旅归来，行装甫卸，倦意未消，原来拿不定主意，可是一听到季羡林、杨绛两老的名字，就如魔术一般，马上变得精神奕奕，随即又兴冲冲踏上赴京之途了。

因为杨绛外出，未能见成。（毓方按：不出所料，杨绛不是供人朝拜的）季羡林坐定301医院，哪儿也去不成，一番联络，终于如愿以偿。见了，不能白见，林青霞这几年正潜心写作，于是，一篇《完美的手》就这样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地诞生了。林青霞的文章不长，兹转录于下：

完美的手

走进北京三〇一医院的病房，第一个映入我眼帘的，是双平摆在一张小矮桌子上洁白细致的手。再往上移，见到的是仁慈、亲切的脸孔，他腰杆笔直地坐在木椅上，虽然已届九六高龄，但你感觉到他的灵魂是年轻的，他的思想是丰富的。

北京天气开始转凉了，我知道老人家特别怕冷，所以为他挑选了一条开司米围巾，我把围巾交到他手上，他笑着用手抚摸说："眼睛看不清楚，用手感觉一下。"他曾经说过，他活到九十几岁，洞悉世情，他认为最珍贵的就是真学问和真性情。我觉得——他——季羡林教授，就是这样的人。

和我一起探望他的朋友，问他知不知道我是谁，他瞧了那位朋友一眼，一副你们真把我当老人家呀，还幽了他一默说："全世界都知道。"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朋友谈到他书中所说的"和谐"，他说那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更重要的是人与自身的和谐。又说人与自身的和谐，要做到良知、良能。他解释良知就是人要有自知之明。记得书上说过，苏格拉底去求神，求的就是让他有自知之明。我不懂什么是良能，他解释良能就是不要自不量力，不要好高骛远去做超越自己能力的事情。我频频点头称是，这正是我要学习的功课。就是不要老是要求完美，以致无法达到而自找苦吃。

我们聊了好一会儿，发觉他那双文人之手仍然保持在原来的位置上，感觉上很寂寞，我忍不住抓着他的双手，我最喜欢见到老人家开心。我想带给他温暖，我想抚摸那写过无数好字、好文章的手。

我握着他的手，除了想讨讨文气，更希望把我内心的温暖传给他。这双手，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浩劫，历过近百年岁月的洗礼，写过上千万字的好文章，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烙印，不但手上没有疤痕，我们还发现它竟然没有老人斑，相信此手正如其人，有如他赤子之心的年轻和纯净。他在《牛棚杂忆》书上写道："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我想上帝创造了这样伟大的学问家，再创造这双完美的手，必定是要降予它重任。让它把季教授的所见所想和所学传给世人。

冯友兰先生说得好："何止于米？相期以茶。"以季教授灵活的脑筋，加上一双完美的手，何止写到八十八岁，即使写到九十八甚至一百零八岁都不是问题。而他留给后代最佳的礼品，岂止如他自己所说的《牛棚杂忆》，我相信将会有更多、更多、更好的礼品留给世人，同时也将会带给社会许多许多的和谐。

临走的时候，听见他的助手叫了声"爷爷，他们回去了"。我心里流着一股暖流。从没见过爷爷的我，一边往回家的路上走，一边想象着，我的爷爷必定也会是这个模样。

季羡林与杨绛之比较

与季羡林值得一比的，是杨绛。2007 年 1 月，季羡林出版了《病榻杂记》，同年 8 月，杨绛也出版了一本《走到人生边上》，这是两位望百老人病中思绪的结晶，比较一下他俩共同关注的话题，比如灵魂、命运、死亡等等，也是饶有意味。

季羡林的《病榻杂记·序》后载有《小引》，初稿写于 2001 年 12 月，九十初度，五稿完成于 2003 年 6 月，九二华诞前夕，他在《小引》中自叙创作心态：

半年以前，我已经运交华盖。一进羊年，对别人是三羊开泰，对我则是三羊开灾，三羊开病。没有能够看到池塘生春草。没有能看到楼旁小土山上露出一丝绿意。更谈不到什么“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了。我就病倒，被送进了301医院。到今天已经一百多天，不但春天已过，夏天也好像早已开始了。

……

我有一个优（缺）点，就是永远不让脑海停止活动。在初进医院的时候，忙于同病魔作斗争，没有想多少东西。病势一稍缓，脑海又活动起来了。全身让人感到舒服的地方，几乎没有，独独思维偏不糊涂。除了有时还遗憾春天的逝去以外，脑袋里想了好多好多的东西。特别是在输液时，有六七大瓶药水高高地挂在自己头顶上，这有极大威慑力，自己心里想：这够你吃四五个小时的了。我还想到许许多多别的事情，包括古代的诗词。我于是想写一些文章，不是记录自己的医疗过程，而是记录自己想到的东西。结果文章确实写了不少。现在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编成了一个集子，名之曰《病榻杂记》送给读者。

我知道，人世间大概还有一些关心我的朋友，他们有的会想到：“季羡林哪里去了？”现在这一本小册子就可以告诉他们：季羡林还活着，不过是经过了一段颇长的疾病的炼狱。现在正从炼狱里走出来，想重振雄风了。

杨绛的《走到人生边上》亦有《自序》，写于2007年8月15日，她在序中说：

2005年1月6日，我由医院出院，回三里河寓所。我是从医院前门出来的。如果由后门太平间出来，我就是“回家”了。躺在医院病床上，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题目：《走到人生边上》。一回家，我立即动笔为这篇文章开了一个头。从此我好像着了魔，给这个题目缠住了，想不通又甩不开。……经常的是失眠、高血压、右手腱鞘炎不能写字等等。不能写字可以用脑筋，可是血压高了，失眠加剧，头晕晕地，就不能用脑筋，也不敢用脑筋，怕中风，再加外来的干扰，都得对付，还得劳心。……这篇短短的小文章，竟耗费了

我整整两年半的时光。废稿写了一大叠，才写成了四万多字的《自问自答》。在思索的过程中，发现几个可写散文的题目。我写下了本文的草稿，就把这几篇散文写成《注释》，因为都是注释本文的。费心的是本文，是我和自己的老、病、忙斗争中挣扎着写成的。

两位望百老人的勤奋、执著实在感人。人老了，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死亡，以及与之相关的灵魂之有无、命运之虚实等等。季羡林在《九十五岁初度》中说："对像死亡这样的谁也违背不了的灾难，最有用的办法是先承认它，不去同它对着干，然后整理自己的思想感情。我多年以来就有一个座右铭：'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是陶渊明的一首诗。'该死就去死，不必多嘀咕。'多么干脆利落！我目前的思想感情也还没有超过这个阶段。江文通《恨赋》最后一句话是：'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我相信，在我上面说的那些话的指引下，我一不饮恨，二不吞声。我只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我也不信什么轮回转世。我不相信，人们肉体中还有一个灵魂。在人们的躯体还没有解体的时候灵魂起什么作用，自古以来，就没有人说得清楚。我想相信，也不可能。"这是他老人家一贯的态度。

季羡林不相信灵魂，但是关于机遇、缘分、运气，他说得十分肯定，而且强调了又强调。比如，在《天赐良机》中，他说："我生为山东一个穷乡僻壤的贫苦农民的孩子，能够获得一点成功，全靠偶然的机会。倘若叔父有儿子，我决不会到了济南。如果清华不同德国签订交换留学生协定，我决不会到了德国。这些都是极其偶然的事件。'世间多少偶然事？不料偶然又偶然。'"又，在《追忆哈隆教授》开头，季先生说："我十分强调机遇。我是从机遇缝里钻出来的，从山东穷乡僻壤钻到今天。"再又，在《石榴花》中，季先生说："我决不迷信，但是我相信缘分，因为它确实存在，不相信是不行的。""我对张铁嘴、王半仙之流的讲运气的话，一向不信。但是，运气，同缘分一样，却是不能不信的。说白了是运气，说文了就是机遇。你能不相信机遇吗？"

季羡林前面说"对张铁嘴、王半仙之流的讲运气的话，一向不信。"然而，他也不否认下列事实：

我于2002年8月15日入院，9月30日出院回家，带着捡回来

的一条命，也可以说是301送给我的一条命，这四十五天并不长，却在我生命历程上划上了一个深深的痕迹。

现在回家来了，怎么办？

记得去年一位泰国哲学家预言我今年将有一场大灾。对这种预言我从来不相信，现在也不相信。但是却不能不承认，他说准了。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还能有什么后福呢？

——《对未来的悬思》

走者，离开这个世界之谓也。赵朴初老先生，在他生前曾对我说过一些预言式的话。比如，1986年，朴老和我奉命陪班禅大师乘空军专机赴尼泊尔公干。专机机场在大机场的后面。当我同李玉洁女士走进专机候机大厅时，朴老对他的夫人说："这两个人是一股气。"后来又听说，朴老说：别人都是哭着走，独独季羡林是笑着走。这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认为，他是十分了解我的。

在这里，我想，我必须讲几句关于朴老的话。……很多人都知道，朴老一生吃素，不近女色，他有特异功能，是理所当然的。他是虔诚的佛教徒，一生不妄言。他说我会笑着走，我是深信不疑的。

——《笑着走》

这使我想到季羡林望九之年写的另一篇随笔《缘分与命运》，他说："缘分与命运本来是两个词儿，都是我们口中常说，文中常写的。但是，仔细琢磨起来，这两个词儿涵义极为接近，有时达到了难解难分的程度。缘分和命运可信不可信呢？我认为，不能全信，又不可不信。""信缘分与不信缘分，对人的心情影响是不一样的。信者胜可以做到不骄，败可以做到不馁，决不至胜则忘乎所以，败则怨天尤人。中国古话说：'尽人事而听天命。'首先必须'尽人事'，否则馅儿饼决不会自己从天上落到你嘴里来。但又必须'听天命'。人世间，波诡云谲，因果错综。只有能做到'尽人事而听天命'，一个人才能永远保持心情的平衡。"

杨绛的《走到人生边上》，采取自问自答，通篇探讨的都是神和鬼、灵魂与命运。杨绛在《前言》说："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

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了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

关于神仙和鬼魅，杨绛直言：

> 科学愈昌明，自然界的定律也发现得愈多，愈精密。一切定律(指经过考验，全世界科学家都已承认的定律)，不论是有关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等，每一学科的定律，都融会贯通，互相补充，放之四海而皆准。我相信这个秩序井然的大自然，不可能是偶然，该是有规划，有主宰的吧？不然的话，怎能有这么多又普通又永恒的定律呢？
>
> 有人说，物质在突发的运动中，动出了定律。但科学的定律是多么精确，多么一丝不苟，多么普遍一致呀！如果物质自己能动出这么精密的定律来，这物质就不是物质而有灵性了，该是成了精了。但精怪各行其道，不会动出普遍一致的定律来。大自然想必有神明的主宰，物质按它的规定运动。所以相信大自然的神明，是由累积的知识，进而成为信念，而这个信念，又经过合理的反证，好像不能推翻，只能肯定。相信大自然的神明，或神明的大自然，我觉得合乎理性，能说是迷信吗？
>
> 我相信看不见的东西未必不存在。……有人不信鬼（我爸爸就不信鬼），有人不怕鬼（锺书和钱瑗从来不怕鬼），但是谁也不能证实人世间没有鬼。因为“没有”无从证实；证实“有”，倒好说。我本人只是怕鬼，并不敢断言自己害怕的是否存在，也许我只是迷信。但是我相信，我们不能因为看不见而断为不存在。这话该不属迷信吧？
>
> ——《神和鬼的问题》

关于命理，杨绛说：

“生死有命”是老话。人生的穷通寿夭确是有命。……西方人有句老话：“命中该受绞刑的人，决不会淹死。”我国的人不但算命，还信相面，例如《麻衣相法》就是讲相面的法则。相信相面的，认为面相更能表达性格。吉卜赛人看手纹，预言一生命运。……西方人只说“性格即命运”或“性格决定命运”。反正一般人都知道人生有命，命运是不容否定的。

——《人生有命》

关于灵魂，杨绛断言其有。她说：

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能有成绩，就不是虚生此世了。向前看呢，再往前去就离开人世了。灵魂既然不死，就和灵魂自称的“我”，还在一处呢。

——《人生的价值》

看得出，季羡林的思考是一以贯之，偶有变数，也属蜻蜓点水，欲说还休。杨绛从七十年前在《大公报》发表《收脚印》起，她在文章中时常流露对灵魂、命运的追问。但那多是片言只语，这本书不一样，通篇都是同上帝对话。在这个自诩为科学昌明、唯物是问的世界，杨绛不仅看物质，看现世，更看重精神，看重灵魂，她力图透过今生今世，看到神明指引的“未来”。上述种种问题，杨绛并没能得出完全答案，许多只是追问、存疑；然而她的清醒，她的睿智，她对世俗恶浊的悲悯和对天国净土的向往，也正弥漫在通篇苦苦的求证中。

现在还有谁作灵魂的拷问？甚而，现在还有谁葆有白璧无瑕的灵魂？笔者从杨绛苦苦的追问中，依稀看到了她神龙一现的风骨。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杨绛的一生，是从大活泼大热闹逐步走向大宁静大寂寞，即所谓“由绚烂归于平淡”；季羡林的一生，是从大寂寞大孤独逐步走向大热闹大喧嚣，即由平淡升华为绚烂。

这难道就是宿命？

侯仁之：守望大地的学者

侯仁之是历史地理学家，他的学问，比较偏僻，难以成为公众话题，不为世俗瞩目。2007 年，关于侯仁之的消息，多属零零星星，只有《羊城晚报》的一篇，用了整个版面，文章是该报记者樊克宁采写的，樊女士在京期间，因为季先生的事，曾找过我，所以我对于她的报道，特别关注。

樊女士的报道说："侯仁之，有人称他为'活北京'，有人称他为'沙漠王'，有人称他为'历史地理学泰斗'，也有人称他为'中国申遗第一人'，这些都不能概括他的全部，他是一个守望大地的人。"此话颇有见地。

樊女士在文章中谈道："2007 年冬季，侯仁之先生九十六岁生日前夕，北京大学校医院。对于这位一生都在大地上奔跑的老人来说，寒冷天气阻隔了他与土地接触的机会，本来他每天都要乘轮椅去未名湖畔散步三次的。温暖病房中，他端坐椅子上，腿上盖着毛毯，微笑着欢迎我，红润的脸庞和细腻的皮肤令人想到一个词汇：'鹤发童颜'。

"老先生正在康复中，说话还很吃力。他说：'我愿意说，说不出来。'我说：'洪业先生您还记得吗?''永远忘不了！永远忘不了！当时他已经很有名了，我不过是普通学生而已。''还有顾颉刚先生。''是的！两位都是我的恩师，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还有梁思成先生，你们一起保护北京城。''师友之交！'为方便表达，他用的都是短句，每句中间要停顿一下，句句言简意赅。

"'季先生，'这回他主动说话了，他说的是与他同岁的季羡林先生，他说：'他还在写，我不能写了。'我说：'您保养身体，先别急着写。''光是休息，没有贡献了。'他脸上闪过一丝遗憾，又说：'见到季羡林，特别替我问候他，好久没有同他联系了，好想他。'

"'您还想念谁呢?'我问。他脱口而出：'女儿，她在美国。她在帮我工作，出版社要出我的书，都由她来安排。''您女儿名字怎么称呼?'他一下愣住了，说：'你把我问住了。'马上他又笑了：'侯馥兴。'侯先生让护工小宁从抽屉中取出两张纸，上面记录着女儿近期为

他张罗出版六本书的事情。”

另外，据侯先生的女儿馥兴提供，侯仁之住院以来，仍旧坚持锻炼，校医院的走廊有六十米长，他就从这头到那头来回走，有时变换花样，双手扶着椅子，不断地站起来，坐下去。

医院的护士请侯先生题词，他老人家有求必应。

钱学森：三次当选年度科学人物

钱学森在2007年的重磅新闻，和季羡林一样，也是温家宝总理的探视。据新华社消息，8月3日下午4时许，温家宝来到钱学森的家。2005年，温总理看望钱学森的时候，他当面向总理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二是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

“您上次说的两条意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同。”温家宝告诉半坐在病床上的钱学森：“我每到一个学校，都和老师、同学们讲，搞科学的要学点文学艺术，对启发思路有好处。学校和科研院所都很重视这个观点，都朝这个方向努力。”

“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钱学森很有信心地说。

“您讲的话我都记住了。您这次讲的比上次又要深一些。我们要超过发达国家，就要在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上下工夫；就要重视教学的综合性，培养复合型人才和领军人物。只要坚持下去，一年看不出效果，几年后总会有效果。”温家宝的话语，坦率而坚定。

当天下午，温家宝还同时看望了朱光亚、何泽慧和季羡林。

在此之前的7月5日，科学中国人2007年度人物在北京揭晓，陈创天等三十五位科技界杰出人士获此殊荣。两院院士、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获得“终身成就奖”。

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对外界说：钱老身体还好。过去的一年，虽然伤风感冒过，但一直待在家里没有住院，每天还能看点东西，过着非常平静的生活。对于一个九十六岁高龄的人来说，这样的身体是可以的了。钱老目前“成天思考的”、“念念不忘的大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缺

乏拔尖的领军人才。

钱学森在2007年终的最大新闻，是当选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评选出的2007年年度人物。《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在长篇评述中说，2007年航空领域最重大的事件是中国加入了顶尖俱乐部，世界格局由此改变。

另外，据新华网2008年2月17日电：由中央电视台评选的2007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揭晓，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与国家科学技术大奖获得者闵恩泽入围。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钱学森的颁奖词是：

> 钱学森对科学技术的重大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以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计算机、质量控制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组织领导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的研究发展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迅速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
>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3. 白首回望童年

季羡林的《病榻杂记·在病中》一文写道：“我现在一闭眼就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夏天里浑身上下一丝不挂，滚在黄土地里，然后跳入浑浊的小河里去冲洗。再滚，再冲；再冲，再滚。

‘难道这就是我吗？’

‘不错，这就是你！’”

季羡林的童年，一言以蔽之：穷。

季羡林是在鲁西北的黄土地里滚大的，终生不改土包子本色——这已成了他的招牌形象。

家贫，无力栽培，不得已把他送给叔叔。寄食篱下，看人脸色，由此养成隐忍、内敛，牙齿打落往肚里咽，又养成坚毅，倔强。

既倔强，就难免孤独。既孤独，又难免喜欢热闹。季羡林的晚年生

活岂仅是热闹，简直近于喧嚣。

季羡林在《回忆一师附小》中写道："我做过一次生意。我住在南关佛山街，走到西头，过马路就是正觉寺街。街东头有一个地方，叫新桥。这里有一所炒卖五香花生米的小铺子。铺子虽小，名气却极大。这里的五香花生米（济南俗称长果仁）又咸又香，远近驰名。我经常到这里来买。我上一师附小，一出佛山街就是新桥，可以称为顺路。有一天，不知为什么，我忽发奇想，用自己从早点费中积攒起来的一些小制钱（中间有四方孔的铜币）买了半斤五香长果仁，再用纸分包成若干包，带到学校里向小同学兜售，他们都震于新桥花生米的大名，纷纷抢购，结果我赚了一些小制钱，尝到做买卖的甜头，偷偷向我家的阿姨王妈报告。这样大概做了几次。我可真没有想到，自己在七八岁时竟显露出来了做生意的'天才'。可惜我以后'误'入'歧途'，'天才'没有得到发展。否则，如果我投笔从贾，说不定我早已成为一个大款，挥金如土，不像现在这样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斤斤计算了。我是一个被埋没了的'天才'。"

幽默，这是季羡林性格的又一特征。季羡林是不是做生意的天才？他的这一才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殊难定论。有一点是肯定的：从季羡林一生的角度看，他叔父的多项投资，他本人的多数付出，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杨绛生活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从小就学会闹中取静，最经典的案例是：父亲午睡，她守在一旁默默地看书，大气都不出一声——由是深得父亲的欢心。

父亲是留学东洋、西洋的大知识分子，公正廉洁，疾恶如仇，但在军阀混战的民初时代，他不愿沆瀣一气，同流合污，所以无法在官场立足，只好辞职南归。杨绛小小年纪，就经历了生活落差，世态炎凉。先是，她随父亲南下，由贵族级别的京都师大附小，落到野班子的无锡大王庙小学；继而，父亲罹患伤寒，险险乎送了性命。杨绛不由得感叹：

"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厂。"

是啊，命运是诡谲的，一个微小因素的变化，足以使人生改向；何况父亲是一家之主，是顶梁柱。

父亲病愈，辗转在上海、苏州谋业。杨绛转到上海启明女校读书。这是一所教会小学。杨绛在那儿受到了中西文化的启蒙。她学习英文，也学习国文，两方面，都打下了很好的底子。既是教会学校，自然就要接触上帝、神鬼和灵魂。杨绛很早就意识到心灵感应，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晚年，杨绛孤身一人坚守在她位于京城三里河南沙沟的公寓，“躲进小楼成一统”，远离尘嚣，拥抱宁静。

侯仁之 1918 年入小学，那年七岁。这个年纪，仅仅比杨绛、钱学森、季羡林、黄万里晚一年，比陈省身还早。但是由于体弱多病，数番休学，到得上初中，已落后诸人一大截。侯仁之要想赶上别人，只有奋起直追。这个“追”，由他的长跑象征性地体现出来了。天地造人不为一格而拘，侯仁之通过长跑锻炼了体魄，成了六人中唯一的运动健将。这正是他日后从事野外考察的本钱。笔者看过他在野外活动的一组照片，八十多岁的老翁，犹能和年轻人一道跋山涉水，健步如飞。

侯仁之出身于教会之家，读的是教会学校。这个因素，必定在他的生活中有所体现。侯仁之在燕园当了大半辈子教授，对待同事、学生，以及工友，他都捧出一颗火热的心。想当年，他和打钟的老周，看校门的老刘，情如兄弟，终身不渝。晚年过生日，举杯祝酒，他会突然想起自己毕业多年的学生。九六之年的侯仁之，虽然体衰足损，长期以医院为家，但他依旧怀着一颗虔敬的心，无限热爱自然、热爱工作、热爱他人，热爱人生。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在老人们的记忆中，长得活泼而漂亮。她娴熟绘画、书法、历史和文学，在同辈妇女中极为少见。在母亲的影响下，钱学森幼年就背诵唐诗宋词，接触音乐美术——这就是投资，长期的熏陶，赋予他高尚的艺术修养。

艺术和科学是大师的双翼，所以钱学森的想像力比他人丰富，视野比他人开阔。

还记得吗？钱学森小时候对父亲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如今，钱学森不仅成了共和国的英雄，他的名字，也成了天上的一颗星星——那是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的，2001 年，一颗由我国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钱学森星”。

第十四章　公元2008

1. 泛　论

四位从公元1911年出发的同龄大师：杨绛、季羡林、侯仁之和钱学森，携手跑进了公元2008。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四位仍然在奋勇坚持。他们都是上帝的宠儿。上帝在天堂微笑地注视自己的杰作，看他们如何跑出人的尊严，如何展示生命的华丽。

2.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谁也不会像老年人那样热爱生活。
——索福克勒斯《残篇》

季羡林：你想忘掉都不可能

公元2008，季羡林一如既往地扮演着媒体明星，说句调皮话，你想忘都忘不掉！

从年初开始，季羡林就被各种新闻包围，诸如荣获印度“莲花奖”、弟子下跪风波、央视采访、奥运话题、赈灾捐款、《季羡林全集》编纂、温家宝总理第五次探视等等。正当笔者以为这一年高潮已过，将逐渐趋于平静时，10月30日，《中国青年报》突然爆料：《谁盗卖了国学大师季羡林的藏品?》这是第一道闪电，由此揭开了季羡林风波的序幕。

这是一出大戏，想像不出的传奇，精彩。导火索在于：季先生的藏品是否被倒卖？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事情本身，对季先生并没有多么重要，但是深层次的东西，远比这丰富、复杂万分。

这就叫“牵一发动全身”。

《谁盗卖了国学大师季羡林的藏品?》全文如下：

10月24日，正在哈尔滨的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收到一封邮件：“季羡林先生处在危险中，藏画被盗卖，你是先生的朋友，你必须救救他!”

唐师曾与季羡林相识十多年，而且知道季羡林先生住在301医院。但并不认识发信人张衡。他回复：“我不认识你，凭什么相信你?”

发信人显然很急，立即发来了季羡林五份手迹的扫描件：“季先生的字你总会认识吧?”

“季先生被称为国宝，国宝的宝竟然被偷着拍卖了!”唐师曾深感震惊。

10月28日，唐师曾赶回北京，见到了举报人张衡，张衡提供的情况再次让他震惊。

“这种流散方式很不正常”

张衡是季羡林的朋友，也是一名收藏爱好者，在北京开设了一家美术馆。

2007年4月27日，张衡参加了“北京金兆艺术品拍卖会中国书画专场拍卖会”。拍卖会上，他发现了季羡林收藏的16幅书画作品，包括费孝通、吴祖光、臧克家等名人的书画作品。北京金兆艺术品拍卖公司印发的拍卖图录册标明：“季羡林上款，同一藏家友情提供”。

张衡解释说：“‘季羡林上款’的意思是，这些作品的受赠人是季羡林，‘同一藏家友情提供’，说明这些书画的卖主是同一个人。”

“按照季羡林的性格，他不会把这些藏品扔出来换钱花。”张衡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张衡说，根据常识和自己的鉴定能力，他认为这些拍卖品是真的，于是拍下了14件，成交价共6.1万元。

此后，张衡陆续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几次小型拍卖会，又发现了十多件季羡林的藏品。出于多种原因，他又拍下了十件，成交价共计一万多元。

张衡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季羡林的藏品这样流散出来都是很不正常的。"

张衡说，他很想向季羡林当面求证这批书画作品是不是季老授权拍卖的，但季老住在301医院，见面须经北大和301医院批准，以他的身份，见面非常困难。

张衡认为，不管季羡林的藏品是否属于被偷卖，自己都应该和北大打招呼，提醒学校加强管理。

张衡给北大校办通了电话。"校办很客气，表示要通知有关方面，还留下了我的电话。"

张衡说，十多天过去了，北大校办没有给他回话。但他却意外地接到了季羡林秘书杨锐的电话。张衡说："她很不客气，质问我，你是山东大学的人，凭什么管我们北大的事？"

张衡说："我越来越感觉季羡林先生处境危险。"

季羡林：从没委托别人卖画

10月28日晚，唐师曾和张衡等人设法在301医院见到了季羡林。

唐师曾说，季老神志清晰，说话很有条理。

唐师曾向《中国青年报》记者播放了他采访季羡林的DV录像。

录像中，唐师曾问："您家里的藏画是怎么流出去的？"

季羡林答："过程不知道，但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

问："多长时间了？"

季羡林答："丢画两三年了。"

问："为什么不报案？"

季羡林答："小事一桩，不知道怎么传出去的，以为就是（别人）偷几幅画卖，看来（现在）认识是不够了。"

采访中，季羡林还表示，他不缺钱，没必要去卖画，他也从来没有委托别人去卖画。

10月20日，季羡林手书了一份证明：我从来没有委托任何人拍卖我收藏的字画和其他物品。因为我并不需要钱，上述流言，别有用心，请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采访临近结束时，季羡林多次表示，他不愿意住在301医院，住院的费用也由自己承担。他说：“我希望回北大去。”

多次反映没有结果

张衡对本报记者说：“收藏季老书画藏品时，我考虑了很多，唯一没有考虑的是举报。”

但现在，张衡只能向媒体求助，因为北大至今没有给他任何回复。

10月16日，张衡再次给北大校办打电话，反映季羡林藏品被盗卖一事。

第二天，北大校办督察室工作人员乔淑芝等两人会见了张衡夫妇。会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乔淑芝等做了书面记录。

10月20日，张衡带着季羡林的五封亲笔信直报北大领导。

10月22日，张衡给北京301医院领导写信请求立即加强防范措施，确保季老的安全；立即询问季老的个人意见，了解相关情况；尽快与北大党委取得联系，核实相关情况。

10月23日，张衡再次给北大领导写信称：“未得到北大领导的回应，实在是出乎意料和不可思议。”他希望，立即派人到301医院看望季老，了解他本人的意思；立即派人接替杨锐的工作。

藏品被谁盗卖？

2001年7月6日，九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将珍贵的图书、手稿、字画等藏品亲手捐献给北大图书馆。此次捐献的一百多幅字画珍品中，年代最远的是宋朝的，近代的有齐白石的作品。

张衡说，此次被盗卖的书画藏品和季羡林捐赠给北大的不是一回事，而是季老家中的藏品。

张衡说，季老在北大有一套两居室，大门钥匙由“小方”保管。小方曾长期照顾季羡林，五十岁左右，季羡林称呼他为“小方”。房间钥匙先由季羡林秘书李玉洁保管，李玉洁生病后交现任秘书杨锐保管。

今年9月30日，季羡林书面通知小方：没有我的签字，任何人都不许进入我的房间。

10月23日，李玉洁提供了书面证言：金兆公司图中编号为526的书法作品是吴祖光、新凤霞来贺老先生九十大寿时带来的礼

品。字画534号（臧克家书法立轴）是我亲眼所见。521号是我扛过去的。以上作品我在2001年秋交给杨锐保管。

此前的10月1日，季羡林给温家宝总理写信说："我现在需要一位助手。山东大学某同志是我多年的老友，他最适合担任这个工作。"

10月16日，季羡林给闵维方写信说："经过仔细的考虑，我认为，像我这样什么实际工作都没有的人，有一个所谓秘书是多此一举。建议取消。"

同一天，他再次写信说："杨锐女士太辛苦。她有一个家庭需要管理，还有自己的社会活动，我实在不忍心看她每天还要到医院来。"

10月29日晚，记者拨打杨锐的手机，电话已关机。

当晚，季羡林弟子、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在博客上撰文说，季羡林先生的女儿、女婿去世多年。孙子、孙女、外孙都和各自的配偶、孩子生活在北美。先生的儿子也已年过古稀，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先生的后代都没有依赖先生"。

他认为，要查清楚这件事情其实并不难，拍卖公司是有严格手续的，只要到拍卖公司去查一下，看看是什么人将这些字画送去拍卖的；或者顺着这条线查下去，事情不就水落石出了吗？

张衡说，他已经就此向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报案。（记者刘万永）

接踵而来的11月和12月，围绕季羡林的字画、秘书、家事，媒体见猎心喜，长驱直入，朝野上下闹得沸沸扬扬。笔者认为，这件事，如果要追根溯源，可以一直追究到当年的婚姻，根基不牢，难免要一再发生情感地震、家事纠纷，以取得新的微妙平衡。

兹事内幕重重，外间人无法窥视。作为当事一方，北京大学一口咬定：季羡林的藏品字画没有流失。

钱学森："没有时间考虑过去，只考虑未来。"

公元2008，钱学森也是媒体的热门人物。本章仅摘取四个片段，

聊窥一斑。

胡锦涛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新华网北京1月19日电（记者孙承斌、李斌）：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钱学森家中，看望这位享誉世界的杰出科学家、我国航天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胡锦涛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钱学森家中。一进卧室，总书记就走到床前，俯下身子，握住钱学森的手说："钱老，您好。春节就要到了，我今天特意来看看您，给您和全家拜个早年！"

"谢谢！"钱学森笑容满面地握着总书记的手说。

总书记给钱学森送上一只花篮。朵朵鲜花姹紫嫣红，满屋生意盎然。

胡锦涛坐在床边，同钱学森亲切交谈起来。

胡锦涛满怀深情地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您满怀爱国热情，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回国后，您作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精心组织攻关会战，为'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倾注了大量心血，建立了卓越功勋。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您仍然关心国家现代化建设，关注科技事业发展。钱老为我国经济、科技、国防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我只是碰到机会了。"钱学森谦虚地说。

交谈中，胡锦涛又对钱学森说："您一直热心培养和提携年轻人，以自己的渊博学识和高尚品格，带出了一批优秀科学家，其中有的已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才。"

钱学森再次露出谦逊的笑容。

在特制的活动工作台上，摆放着一副眼镜、一份材料，尽管年事已高、行动不便，钱学森仍每天坚持看报、学习。

"钱老，您在科学生涯中建树很多，我学了以后深受教益。"胡锦涛谈起钱学森提出的系统工程理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就读过您的有关报告。您这个理论强调，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一定要注意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这很有创见。现在我们强调科学发展，就是注重统筹兼顾，注

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钱学森微笑着点点头。

上世纪八十年代，钱学森曾倡议利用沙漠地带独特的自然条件发展沙产业，并把自己获得的奖金捐献出来，用于支持沙产业发展。

总书记告诉钱学森：“前不久，我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考察，看到那里沙产业发展得很好，沙生植物加工搞起来了，生态正在得到恢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钱老，您的设想正在变成现实。”

听了总书记的话，钱学森十分高兴，接着说：“现在，我们国家变化很大，西藏也发展很快，青藏铁路都修起来了。”

“我们修建青藏铁路，突破了许多技术难题，特别是解决了在冻土层上铺设铁路的问题。青藏铁路通车后，运行效果很好。这条铁路为西藏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总书记接过钱学森的话头。

“好极了！”钱学森高兴地说。谈起祖国的变化，这位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了全部心血的老科学家，心情十分激动。

总书记对钱学森说：“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引下，满怀信心地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钱老，请您放心，您毕生追求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理想一定会实现。”

随后，胡锦涛又特意来到钱学森的书房。书柜里摆满古今中外各种图书，显示出书房主人博览群书的钻研精神。

去年5月，《钱学森书信》一书出版后，钱学森把这部书送给了总书记。这部书汇集了钱学森三千多封书信，洋溢着炽热的爱国情怀，体现着严谨的科学精神，包含着丰富的学术思想，给总书记留下深刻印象。

胡锦涛对钱学森家人说：“这部书中的许多真知灼见，比如科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发展科技必须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国家建设必须注重改善人居环境等，都很有战略眼光，也很有现实意义。”

离开钱学森家时，胡锦涛叮嘱他的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一定要精心照顾好钱老。

温家宝亲切看望钱学森 8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比季羡林小四个月的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学的奠基人、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

“钱老，我来看您。好久不见，整整一年了。”走进房间，温家宝就向斜靠在床上的钱学森说。

“你们忙。”虽已高龄，钱学森反应仍然很敏捷。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钱学森担任中国科协主席时，温家宝在中央分管科技工作。他曾经亲自到钱学森办公室一起研究工作，并多次通过书信往来，探讨沙产业、数学科学等方面的问题。在1993年的一次书信来往中，钱学森就自己提出的“大化工”和“地下化工”设想和曾长期从事地质矿产工作的温家宝探讨。温家宝在回信中不仅完全同意这一设想，认为“这样一些大的战略问题应当引起重视”，而且组织专家为钱老搜集提供材料，并叮嘱钱老“为国珍重”。

最近几年，温家宝更是多次登门看望钱老，对他的卓越贡献和爱国情怀表达了由衷的赞许和敬佩。钱学森曾当面向温家宝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二是学校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学理工的要学点文学艺术，学文科的要学点自然科学。温家宝对此不仅深表赞同，而且在学校、座谈会等多个场合多次介绍钱老的意见，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

“国家还好吗?”虽然吐词不是很清楚，钱学森仍然关切地问落座后的总理。

“国家挺好，就是今年灾害比较大，前不久还发生了大地震，现在我们把受灾群众基本都安置好了。”

“现在中国也开始发展起来了。”

“国家强盛，和您这样的老一辈科学家所做的贡献分不开，今年‘神七’就要上天了，绕月二期工程和您关心的‘大飞机’也立项了，您高兴吧?”

“你们干得好。”

“这是老一辈科学家奋斗几十年的成果。”

“我们的科技和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差距。”

“您讲得对。我们在一些关键科技领域还落后，还得努力。”温家宝坦诚地说。

年轻人才培养一直是钱学森关心的问题。温家宝轻轻抚着钱老的手，对他说：“您嘱咐的几件事我们都记住了，一是要把中国的科技搞上去；二是要重视培养人才，尤其是年轻人才和拔尖人才。”

“现在已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年轻人才。”钱学森欣慰地说。

温家宝侧过身去，亲切地向钱学森的夫人蒋英询问钱老的饮食起居情况。

“都行。能吃能睡，他是一个很听话的病人。”房间里顿时响起一阵会意的笑声……

袁隆平、钱学森等当选08年十大科技传播人物 中国科协11月16日在北京发布“五个十”系列评选活动的最终结果，袁隆平、钱学森、华罗庚、茅以升、叶至善、邓稼先、钱三强、竺可桢、李四光、王选入选“十大科技传播人物”。

钱学森院士迎来九十七岁生日 法制晚报报道：昨天（12月



卞毓方与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合影。

11 日），“中国导弹之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迎来了九十七岁生日。记者获邀前往钱老家中，为钱老送去生日的祝福，希望他的晚年生活能够幸福安康。

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身为“国宝级”的人物，除了门口的警卫外，钱学森的家和普通老百姓的家几乎没什么两样。室内陈设朴素大方，家具、地板因为年代久远，甚至显得有些陈旧。

在钱家客厅里，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接待了记者并表达了谢意。钱永刚介绍，钱老现在在家中静养，基本不见任何客人。9 时左右，记者从钱老家中出来，看到陆续有军车及社会牌照的车辆开到钱学森家门前，至上午 10 时，已经有六七辆车到达。前来祝贺的人为钱老带来了花篮等生日礼物。

12 月 6 日，记者专访了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他向记者介绍，钱学森近来一切安好。在钱永刚眼中，父亲因为始终持有一颗超乎常人的“平常心”，才得以享受现在这份难得的安宁。

记者：钱老近来身体可好？

钱永刚（以下简称“钱”）：谢谢大家的关心！爸爸的身体近来不错，精神状态很好。

记者：为钱老准备了什么样的生日礼物？

钱：全家人都在，就是最好的礼物了！对于九十七岁寿辰，他还颇有些期待呢！

记者：怎么期待的？

钱：比如日子还没到，他就几次主动提道：“我生日是不是快到啦？”有时还半开玩笑地问身边的人：“我今年多大岁数了？”把大家都逗乐了。

记者：钱老每天的生活是如何安排的？

钱：现在他在家颐养天年，每天还要浏览《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传统大报大刊，但他从来不看电视。是早年在美国任教的时候养成的习惯。那里的教授们为了专心工作，多少年来从来不看电视，甚至以看电视为耻。

记者：除了看报纸，钱老平常还有什么爱好？

钱：他的爱好很多，退休后喜欢听听广播。

记者：今年“神七”发射成功，钱老是不是很关注？

钱：当然啦！这是他今年最关心的事儿了！“神七”发射成功后那几天，爸爸每天都在听广播里的报道，还让秘书将报纸送到床边，关注报纸上的新闻。

记者：众所周知，钱老被众人称为“中国导弹之父”。面对曾经的辉煌，钱老退休后有没有感觉失落？

钱：据我了解，他不喜欢别人用“中国导弹之父”这个词来形容他，因为他不止一次提出，航天事业不是一个人的事，需要千千万万人的共同努力。

记者：在您的印象中，钱老工作起来是个什么状态？

钱：我想应该是严谨吧。这种习惯不仅影响我们小辈儿，还影响着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我记得，刚开始秘书们向老爸汇报工作的时候，只是口头上简单说说，有时说乱了，“战线”拉得长，老爸就会有些生气，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几次磨合下来，秘书们吸取教训，每次见他前，都要提前打好书稿，理顺逻辑关系。这种严谨带来的成果是很明显的。据我所知，早在2002年，老爸的研究工作目标就定到了2049年，那时正好是共和国建国一百周年。他常说，我没有时间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杨绛：静悄悄地前行

杨绛也是媒体喜欢的话题。2008年，杨绛没有新作问世，但是她的助手、吴宓的女儿吴学昭，帮她整理了一本传记，题为《听杨绛谈往事》。因为谈的是杨绛，作者又取得杨绛特许，说是“唯一授权写作”，因此颇为轰动，十分畅销。

书前，有杨绛亲自作的序：

> 我不值得传记作者为我立传，但我也不能阻止别人写我的传记。不相识、不相知的人如有意写我的传，尽管对我的生平一无所知，只要凑足资料，能找到出版社，就能出书。不过，并没有几个人为我写传。这本用“听杨绛谈往事”命题的传记，是征得我同意而写的。

作者吴学昭是我的好友。她笃实忠厚，聪明正直，又待人真挚，常为了过于老实而吃亏。她富有阅历，干练有才，但她不自私，满肚子舍己为人的侠义精神，颇有堂吉诃德的傻气。不过她究竟不是疯子，非但不荒谬，还富有理智，凡事务求踏实而且确凿有据，所以她只是傻得可敬可爱而已。

她要求为我写传，我觉得十分荣幸。有她为我写传，胡说乱道之辈就有所避忌了，所以我一口答应。她因此要知道我的往事。我乐于和一个知心好友一起重温往事，体味旧情，所以有问必答。我的生平十分平常，如果她的传读来淡而无味，只怪我这人是芸芸众生之一，没有任何奇异伟大的事迹可记。我感激她愿为一个平常人写一篇平常的传。

不过我还活着呢。我身后的事，她没法儿问我了，怎么办？我想不要紧，写到九十八岁还忠实，以后的事也不会走样。为我写的传并没有几篇，我去世后也许会增加几篇，但征得我同意而写的传记，只此一篇，是为序。

杨绛的序作原稿，印在书的扉页，用的是工整清晰的小楷，每一个字都规规矩矩地植入方格。光这一点，就足以使吾辈产生震撼。

九十七岁的杨绛，据吴学昭说："近年闭门谢客，自称'龟蛰泥中'，很少外出，也不上网，每天只在家读书写字；但对外界一点儿不隔膜。我们偶谈一些新发生的事件，她都情况了然、判断准确。她的信息丰富、料事如神，往往使我感到吃惊。她有一颗博大的心，世事全在胸中，与大众同悲喜。"又说："过了生日就九十八岁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已走到人生边缘上，但她依然心明眼亮，精神饱满，敏锐勇敢，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读了《走到人生边上》的'结束语'，就知道她'远没结束'，因为她每个自答，都带着个问号呢！她带着失去亲人的悲痛，独自一人，在人生的边上，徘徊寻思，她自称还是一个在逃的人。'逃——逃——逃——'她还没有安息，没有回家。"

同年，杨绛创作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的两部喜剧《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在"纪念中国话剧百年"的大背景下，分别在北京、上海重新公演。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杨绛的生命力。

2008 年，杨绛基本闭门谢客，当然也有例外，7 月 19 日，在她九

十七岁生日过后两天，有相熟的晚辈来看她。因为保姆小吴外出，耳背的杨绛得知消息后，早早搬了椅子坐在门口，等待门铃。客人进门，杨绛端出了无锡水蜜桃和一杯白开水，随手又打开了电扇。

侯仁之：北大校史上的一个镜头

与以上三位相比，侯仁之是相对寂寞的。本年只查到一篇有关他的新闻，而且是夹在季羡林的消息中的。据北大校刊7月5日报道：

> 7月4日，已在医院度过五个春秋、年届九十七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再次回到位于北大朗润园的家中。看到屋里熟悉的一切，他说："回到家里心情非常好，在这里毕竟住过好多年。"季先生的孙女和两个重孙女也前来探望，他向她们分别赠送了孔子画像、福娃等纪念品。在秘书杨锐老师的陪同下，季先生来到原来工作的书房，查看了自己珍存的书籍和资料，并嘱咐杨锐一定替他寻找一份手稿，他要在医院里看看。
>
> 随后，在原北大副校长郝斌、原北大图书馆馆长林被甸、北大副秘书长赵为民以及著名学者汤一介和乐黛云教授的陪同下，季先生在未名湖东岸与侯仁之先生及夫人张玮瑛先生会面。两位先生的会面被乐黛云称作"北大校史上的一个镜头"。这次见面，两位老人都十分激动，季先生刚见到侯先生时就说："今天就想来看你！我们是多年的、几十年的老友。"侯先生虽无法用语言表达，但他一直紧握着季先生的手，眼睛一刻也不曾离开季先生的脸，就那么一直望着。
>
> 同为九十七岁的两位老友的会面，吸引了学生们的关注，大家争先恐后与两位老先生合影留念，未名湖畔一时热闹非凡。

因为事先得到季先生要回北大的消息，所以7月4日那天，我一早就来到了燕园。侯先生和季先生会见的时候，我也在场，只是远远地看着，没有走上前。这里要纠正一句，侯先生并不是无法用言语表达，他话还是能说的，不过忘了说，侯先生是太高兴了。事后回校医院的路上，

他才跟陪伴的人讲："好久没有见到季先生了，我真的很想很想他。"

3. 老了，就当老的风景看

若以助手或秘书划分，五十多年来，季羡林身边变换了四个时代，即李铮时代、李玉洁时代、杨锐时代、季承时代。其中，李铮任期最长，他从1950年，十七岁起，进入北大东语系，作为行政工作人员，实质上，主要是为系主任，也就是为季羡林服务，1978年，正式被任命为季羡林的助手，1996年退休，长近半个世纪。李玉洁若从1996年算起，到2006年8月，正好十年。杨锐是2006年8月，到2008年10月，两年又两个月。再以后，改为季羡林的儿子季承。季承的任期能有多长，这就要看老人的寿缘了。不论怎么说，老人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生存质量大不如前。上帝造人，幼时交给父母，老来交给子女，这是最符合人道的；季羡林最后的日子回到亲人中间，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程，也值得庆幸。

九十七岁的季羡林，一句最雷人的口头禅，就是"他还活着吗"？久住301医院，与许多老朋友、老老朋友失去联系，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如臧克家，如林庚，如石景宜，就在不知不觉中走了。岁月如流，时不我待，因是之故，近年，每当周围的人提起一个老熟人的名字，季羡林总要习惯地作出上述反问。

九十七岁的钱学森，居然"从不看电视"，"早在2002年，研究工作目标就定到了2049年"，听起来犹如神话。在我又犹如惊雷震顶。试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天下又有几位学者敢与之媲美？

一路写来，笔者对杨绛颇为赞赏。她聪明、博学、坚忍，心细如发，文笔简约而凝重，自成一格。在社会的大舞台上，她扮演的是隐士，一如钱锺书之自况："独行其是，不顾人非，自娱其老，不期同好。"——她拒绝进入任何既定角色，她不和你玩。

九十七岁的侯仁之，长期以医院为家。老人的心里，最恋的还是自己的家。有几个月，他在北京友谊医院治疗，病房在三楼，窗口可以俯视医院的大门，因此，每当有亲人来探望，他就早早地站在窗口，凝视进入医院的车辆，而当亲人离去，他又默默地站在窗口，目送车辆缓缓远行。那一份期待，以及那一份深情，端的令人感动。

第十五章　公元2009

1. 泛　论

新年伊始，笔者着手撰写这本酝酿已久的《千手拂云　千眼观虹》。在1911年出生的大学者中，最终敲定了上述六人。六人中，我熟识多年，并且经常保持联系的，只有季羡林先生一位。与杨绛，有过电话联络，而无当面访谈。不过，杨绛是热门人物，资料丰盈，又有钱锺书衬托，写起来不困难。钱学森八十年代初见过一面，他是共和国的英雄，资料汗牛充栋，可惜多是宣传性、学术性的，缺少细节，活生生的细节。钱学森内敛，不喜张扬，加上其工作的高度保密，一般人只是瞻之仰之，难得亲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有位华裔女作家，就是那个写《南京大屠杀》的张纯如，写了一本英文的钱学森传记（在这个意义上，钱学森也是真正具有国际影响的一位），取名《蚕丝》。书中关于钱学森在美国期间的学习、工作，描写甚详。也许格于意识形态，大陆没有引进，倒是台湾出了汉译本，取名《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2009年元月中旬，笔者作美国之游，顺便寻找英文原著，未果，退而求其次，辗转托高雄的陈碧铃女士购得台湾译本。侯仁之呢，市场仅有一本陈光中的《侯仁之传》，其他材料，包括侯仁之本人的一些著作，都很难买到。好在侯先生家在北大，联系方便，笔者径直登门，承他的夫人张玮瑛和女儿馥兴帮忙，取得了若干第一手素材。至于陈省身和黄万里，两位大师已经仙逝，我只能是找到多少算多少的了。

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个人的资料多半已化作“公开的秘密”。2009年5月11日，笔者启动百度搜索，瞬间所得的相关网页，季羡林名下约为1，190,000篇，钱学森名下约为808,000篇，杨绛约352,000

篇，陈省身约182,000篇，侯仁之约50,900篇，黄万里约36,800篇。从中可以看出，季羡林、钱学森的人气远远领先。

顺便说一说，电脑这玩艺儿，陈省身应该没问题，钱学森呢，报道上没说，存疑，季羡林、杨绛、侯仁之肯定不会，黄万里呢，我问过他的女儿黄且圆，说是买过一台电脑，也发狠学过，最终没能入门。

六位主人公，如今只有四位健在，让我们看看，在九十八岁的暮年，他们还能干些什么，以及又是怎样在影响周围的空气。

2. 百年树人

不正的思虑是长寿的最大敌人。要用温和、慈良、宽宏、厚重、缄默来克服自己心中的猛厉、残忍、褊狭、轻薄、浮躁，才可能做到心直虑正。

——活了九十八岁的何应钦如是说

季羡林：大幕徐徐落下来了

新华网北京1月29日电：九十八岁的国学大师季羡林教授，春节期间同儿子季承及家人，在医院过了个团圆年。季承的朋友、“中国烹饪大师”张春生得讯后，亲自做了几道拿手年菜，为季氏父子的团圆饭增香添味。

1月25日下午5时，301医院季羡林老人的病房里就年味浓浓，喜气洋洋。病房已宛如家庭的厅堂，东侧墙的腰际横挂起一条长长的红色“福”字剪纸串连。季老的床头也挂着一只憨态可掬的红色绒布小牛。对侧墙边放着一只方形的大鱼缸，一尾全身通红的大金鱼在水中悠闲游动。

房间中央，已经支起两张方桌，休班的病区护士长、护工，季老的家人、友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围在桌边包饺子。

季老当天格外高兴。他端坐在床侧的椅子上，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他看着大家忙干年活，不时同季承夫妇、家人、友人、医护人员、身边工作人员说话、逗趣，融融亲情、友情，使房间气氛更显温馨可人。

17时30分，季老开始进餐，医院营养科特地送来了美食，季老向医护人员拱手致谢。季承见是甜品，示意缓缓再吃。张春生技师首先奉上一道名曰："全家福"的菜肴，并对季老说，里面的蛋是鸽蛋。季老用勺舀起鸽蛋品尝，并对张春生说，很好。吃完鸽蛋，季老对大家风趣地说，刘姥姥吃鸽蛋，一两银子一个。大家一时弄不明白。季承解释说，老爷子说的是《红楼梦》中的事，刘姥姥进到大观园，贾母设宴款待，刘姥姥使的是大观园里的镶金象牙筷，既沉又滑溜，她夹盘中的鸽蛋怎么也夹不住，后来总算夹住一个，快送到嘴边又滑落在地上。这时王熙凤对刘姥姥说，鸽子蛋贵着呢，一两银子一个。刘姥姥欲弯腰拾起来吃，旁边的丫头早已把鸽蛋扫走了。刘姥姥悔怨不已地说，一两银子连响都没响就没了。

大家听了季承的解释恍然大悟，对百龄季老的超人记忆力和联想力，惊讶不已。

少顷，张春生又送上一盘菜点，对季老说，这款菜叫"团团圆圆"，祝贺您老人家和家人一起喜过团圆年。季老听了频频点头，并向张春生致谢。季老品尝完"团团圆圆"又吟出了两句诗：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季承又向大家解释，老爷子吟的是唐代诗人戴叔伦写的《除夜宿石头驿》诗中的两句，主要表达在除夕夜盼离人而不归的孤寂、惆怅心情。老爷子此时此刻吟诵这两句诗，可能有感而发，很可能是用古人离人不归的幽怨惆怅衬托他此时此刻能过上阖家团圆年的欣慰心情。

按照北方习俗，大年除夕要吃饺子，大家包的饺子煮好了，端了上来。季老连吃了四五个饺子。

团圆年夜饭接近结束。有人问季老：今天您老人家吃得怎样？季老动情地说：我许多年没有吃这么好的年夜饭了！季承解读说，老爷子这么说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张技师做的菜表示赞赏，吃得可口；二是好多年没有这样全家在一起吃团圆饭了，这次全家能聚在一起吃年夜饭心情特别好！

季承问父亲：自己说得对不对啊？

季老笑着点点头。

房间里响起了一阵掌声和笑声。

3月初，原北大校长许智宏做客中新网，谈到季羡林字画被盗事件时，认为外界的一些报道，缺乏基本的责任，只当做炒作。北大对这个事情一直是比较低调的，每个家庭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学校尊重季老自己的意见，相信会很好地处理。

《人民日报》3月30日刊登怀谦的访问文章：《气和心暖》。其中写道："原以为九八高龄的季先生会插着各种各样的管子等待我们的来访，然而并不，先生像前两次见面一样，抄着手，规规矩矩地坐在一张小桌后面，静静地打量我们。不像是望之俨然的先生，倒像是乖巧、听话的学生。与朗润园不同的是，此时的先生穿的是病号服，人清瘦了一圈，然而精神却出奇的好。

"季先生的助手在一旁提醒我们有什么学术问题赶紧问，我想，与季先生谈学术，那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么，就装着没听见，拉拉杂杂地扯闲篇，无奈地耗费着先生宝贵的时间。先生倒好脾气，有问必答，说医生、护士对他照顾得好，吃得也好。睡得如何呢？先生说，睡眠一直好，'我吃安眠药，都吃了有八十年了。'不禁惊奇。接下来就幽默起自己的眼睛来，说：'其他零件还好，就是眼睛，用了一百年了，坏了，半瞎。'

"我们提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希望先生写几个字，先生爽快地取来笔，写下'祝祖国繁荣昌盛，季羡林，时年九十有九。'一边写，还一边说：'夸张了一点，稍微夸张了一点'，他指的自然是年龄，不过夸张一岁而已。先生写字的时候，我就在一旁端详他的手，林青霞称这双写过无数好字、好文章的手是'完美的手'，修长、白皙，上面没有瑕疵，没有老年斑，其实更让我们惊奇的是，这双手一点都不颤抖。"

《京华时报》6月9日消息：昨天下午，季羡林之子季承，著名学者、《季羡林全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柴剑虹，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副

社长王芳等人共同在印刷机上启动按钮，由外研社推出的《季羡林全集》正式开机印刷。该全集囊括了季羡林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今的全部作品。

季承在开机仪式上称，近年来，图书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署名为季羡林的图书，质量参差不齐，有的甚至任意更换文章题目或改动原作文字，这些未经季老授权的书影响了季老的声誉。据外研社介绍，两年前，时任北外校长的郝平和外研社社长李朋义专程拜访季老并征得他的同意，将《季羡林全集》独家授权外研社出版，并在季老本人指导下组织了该全集的专家委员会。

据会主任柴剑虹教授介绍，即将推出的《季羡林全集》拟定为30卷，包括近千万字的散文、杂文、序跋、学术论著、译著等。全集将成为收录季老作品最全的一套文集。因为规模宏大，卷次较多，外研社计划于2010年在季老生日时，作为贺礼全部推出。本次开机印刷的为前六卷，主要是季老的文学创作，如散文、回忆录、日记（《清华园日记》《留德十年》《牛棚杂忆》）等，其中有些作品是首次面世。10月份，外研社将携这套文集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向世界展示季老作品的魅力。

《北京晚报》7月8日讯：今天上午，孔庙大成门下、孔子像前，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首届“成人传统礼仪”在这里隆重举行，包括2009年北京高考文理科状元刘庭梅、宁少阳在内的一百六十多名学生参加活动。成人礼仪式过程当中，两位状元不仅得到现场媒体的高度关注，还意外收到一份珍贵的贺礼：九十九岁高龄的国学大师季羡林以“高考状元”为抬头，亲笔题词的两块牌匾“天道酬勤”和“至德要道”。

7月11日，星期六，天气湿闷而燥热。上午，笔者正在电脑前敲敲打打，例行作业，噩耗突然传来：任继愈先生逝世！任先生是1916年生人，屈指算来，今年值九十三岁，也算是高寿了。我与任先生向无交往，因此也没放在心上。过了不多一会儿，噩耗再度袭来：季羡林先生逝世！什么时候？上午9点。千真万确？千真万确。怎么可能呢？我说，前两天还为北京高考状元题匾，昨天下午还为臧克家故居题词，为汶川广济学校题写了“抗震救灾，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此外还为孔子

卫视写了一幅“弘扬国学，世界和谐”，而我，受画师乔德龙和书家卞兴龙之托，正准备日内与季先生联系赠送书画的事宜……但这是事实，是北大官方传出来的消息。赶紧与季承联系，手机线路拥挤，已经拨不进去了。

这是迟早要出现的一幕，没想到来得这样快。春节后探视过两次季老，发现消瘦异常，预感不祥，以后再没去，因为外面蔓延甲型流感，怕不小心把病菌带进医院，又因为筹划给老人家过九十八岁大寿——再过三个礼拜就到了，老人的真正生日是 8 月 2 号，而我们一帮弟子商量，安排在 7 月底，赶在官方活动之前。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先生没有等到，我们也没有等到。

等到的是，网上铺天盖地的噩耗，我随便浏览了一下标题，一个也没有打开。还用得着打开吗？不祥的消息，一个已经嫌多，种种细节，不需要再触目，再惊心。媒体又开始新一轮的爆炒！这是互联网时代。这是信息爆炸时代。果然，消息传得飞快，天南地北的询问电话纷纷打来。凤凰卫视抢先报道。各路媒体争相上阵。熟悉的记者径直登门。季羡林的孙女季清也从美国洛杉矶发来了悼文：

> 震惊。无语。星期五的晚上，美国，家里。2009 年 7 月 10 日。刚刚吃好饭，稍稍休息了一下，看了看美国新闻。就坐在电脑前继续编辑我们去年回国的相册。是啊，差几天就一年了，可相册还没有完成。正在欣赏去年几次回国和爷爷的合影，却看到新浪网站首页“国学大师季羡林逝世”的消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想一定是打印错误。正在发愣之际，朋友江姐从北京发来短信，向我表示慰问。还在蒙眬中。又回到新浪网站，一篇一篇地再重读过……越读脑子越糊涂，越读越不相信这是真的。昨天还和爸爸有邮件来往，我们还在商量安排今年和明年庆祝爷爷生日的事。怎么会？这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
>
> 否认。不理解现实。不承认现实。心痛。泪在眼眶里转。已经是深夜了……

洛杉矶和北京相差 16 个小时，当晚，送走最后一个来访的记者，北京也已进入深夜。窗外雷雨大作，是北京城罕见的狂风暴雨。“泪飞

顿作倾盆雨”，是谁在流泪？默默间，我踅回书房，坐到电脑前，打开作业中的《天意从来高难问——晚年季羡林》。这本书，我是从2006年8月动笔，断断续续，一直写到今天，连头带尾，正好三年。因为标明了是写晚年，所以只要季羡林先生活着，我的笔就不能搁下——在这个意义上，我是真心祝愿他老人家长寿，我的书也好无限制地延长。

霹雳一声，季羡林先生的生命戛然而止。我这本书，也不由自主地画上了句号。我本来还有很多话要说，此时此刻，我不想再说；不仅不想再说，连已经写好的某些章节也要删去。为什么？因为那些章节是属于未来的，现在抛出，为时过早。姑且遵从天意，当机立断，就此结尾。

钱学森：世界因他而美丽

3月28日晚，“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举行颁奖仪式，钱学森获“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

钱学森夫人蒋英出席颁奖仪式并代丈夫领奖，她说：“钱学森因年迈体弱，不能前来领奖，深感歉意，能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是学森一生的追求，能得到这么多炎黄子孙的支持和认同，他感到十分欣慰，他让我转告他的愿望：祝愿这个活动鞭策更多的中华儿女，为祖国贡献出力量，使我们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4月中旬，清华大学发布今年招生计划，基于清华强大的力学基础，2009年将开设“钱学森力学班”。实验班配备最优秀的国际化师资力量，小班授课，每个学生都配有导师。学生在高年级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志愿在工科院系中分流，相当比例的学生可以硕博连读，并将选送部分优秀学生赴国外名校交换学习。

8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看望钱学森，新华社的消息说：

98岁的钱学森是我国航天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上午近11

时，温家宝来到钱学森家中。钱老坐在床上，微笑着打招呼。温总理趋步向前，走到床边紧紧握住钱学森的手："钱老，我又来看您了。"

这是温家宝近年来第四次看望钱学森。对这位"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温家宝始终心存敬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温家宝经常和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钱学森一起研究工作，并多次书信往来。近年来，总理每次登门看望钱老，两人都亲切交谈。

"希望您健康长寿。您是科学家的榜样，也是全国人民的榜样。""我要活到一百岁。"钱学森微笑着双手合十表示感谢。

钱学森在深情地回忆自己留学归国的经历后说："在中国，比在国外更有发展和成就。"总理点头赞许地说："您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钱学森忽然伸出右手大拇指说："中国要走在世界前列。"温家宝接过话头："我们要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

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为推动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深入开展，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十一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评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活动。钱学森荣登100位感动中国人物榜。

1991年，中央组织部曾把钱学森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并列为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钱学森得知后彻夜难眠，他说："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这一次入选100位感动中国人物的，同时也有雷锋、焦裕禄和王进喜。

10月11日，新华社播发了温家宝总理最近的一次谈话，其中涉及钱学森，温总理说："我多次看望钱学森先生，给他汇报科技工作，他对科技没谈什么意见，他说：'你们做得都很好，我都赞成。'然后，他转过话题就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

"最近这次我看他，我认为是他头脑最清楚的一次，他还在讲这一点。我理解，他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

除了钱学森、温总理，共和国还有谁能为此作出反思？在教育问题上，钱学森的确是头脑非常清楚，但是他少说了一句：这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整个社会都要为此作出反思。

2009 年 10 月 31 日，笔者正在辽宁鲅鱼圈地区采风，午后得知，钱学森上午 8 时 6 分在北京逝世。

又一位大师离开我们而去了。

媒体报道：钱老长子钱永刚告诉记者，"父亲走得很安详，事先一点儿征兆都没有。""他看书看到最后一天，一直到入院前几个小时都在看报纸，看文件。""所以也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遗嘱。"

11 月 1 日，笔者结束鲅鱼圈之行，匆匆返京。3 日上午，前往设在钱老位于航天大院家中的灵堂吊唁。那是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三层红砖小楼，钱老住在一楼，当年算是比较精致的，如今则显得异常狭小。钱老的一位秘书用"窝"来形容这处公寓，他说："因为那实在是一座太旧的公寓单元房，墙上还有 1976 年唐山大地震后留下的裂纹和加固筋。他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后，组织上曾不止一次想给他按标准盖一座小楼。我们工作人员也希望钱老的住宿条件得到改善。若有一栋小楼和一个小院，他可以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有利于身体健康。当我劝他同意建房时，钱老总是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到后来我劝他说：'钱老，现在都九十年代了，一般科技人员的住房条件都有很大改善，和您同船回国的许多人都评上院士，住进了新盖的院士楼，您说的那是老黄历了。'钱老摇摇头说：'你别再提这个问题了。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习惯了，感觉很好，你们别折腾我，把我折腾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心情不好，能有利于身体健康吗？'从此，我理解了他老人家的思想境界，再也不向他提房子问题了。"

这样的大科学家，这样的境界，在全国，不，在全世界，纵然不是唯一，也绝对是寥寥无几。

又据媒体报道：

> 钱学森一辈子都不看电视。去年年底，他因为耳背的原因，突然对儿子提出要看电视，还问永刚：（买电视）多少钱？贵不贵啊？永刚说：孝敬您了，买汽车，钱可能紧一点，买电视的钱还是有的。听这父子对话很有意思，可知钱老姓钱真不爱钱，而且钱家的钱也真不太多。
>
> 钱老看上电视后也有故事。据儿子永刚回忆说："汽车广告，一看，都是外国汽车，他就说，泄气泄气。我说中国汽车也是'外国心'。他说这些人怎么了……听到这，他就不高兴了，说，人都干什么去了？现在生活水平高了，更有条件出成果，为什么还弄不成？"

看到电视上的外国汽车广告，钱老连说"泄气泄气"，正和我们很多人相反。我们很多人看见外国汽车广告"激动激动"，开上外国汽车"带劲带劲"。钱老这样的爱国科学家，就是和一般人想的不一样。钱老大概不知道今年中国汽车产销已经突破一千万辆，知道的话不知是笑了，还是对那些装上"外国心"的汽车感到"泄气"。

钱老问：这些人怎么了？……人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还弄不成？这三个问题也正是我们都十分关心的问题，同时，又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钱老在晚年的最后岁月，始终关心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中国的汽车、大飞机买外国发动机的问题，成为钱老生前关注的问题之一，其实是创新人才这个大问题下面的子问题。

……

——这些人怎么了？

——人都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还弄不成？

钱老走了，留下三问。我们应当替钱老去追问，大家都去问，同时也要自问。（苏文洋《钱学森的三问该谁回答》）

杨绛：万人如海一身藏

2008 年 11 月 24 日，人民网文化频道推出“文化寿星”报名征集活动，截至 2009 年 1 月 4 日，根据网友投票和专家意见，共有十位文化人物当选：文怀沙、季羡林、杨绛、黄苗子、王世襄、华君武、丁聪、周汝昌、方成、吴冠中（排名按年龄大小排序）。其中，排位第一的文怀沙，年龄未久受到李辉的质疑，说虚报了十一二岁。就此，笔者曾通过季承向季羡林求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两人交往密切），答说：“其他的不敢担保，年龄应该不会有大错，他和我肩上肩下，哪能相差十多岁？”我不踏实，又让季承问了一次，他说，回答同上次一样，认为文怀沙的年龄不会有大错。（笔者注：林非先生也持是论。我同时还问过多位老人，也有支持季羡林先生的观点的，因为此事后来闹成轩然大波，在下不想把更多的先生拉扯进来，仅此聊备一说，供读者参考。）至于排位第二的季羡林和排位第三的杨绛，若以生日算，应予倒过来，杨绛比季羡林大半个多月。

2009 年 4 月，网上搜出苏州十中（原振华中学）的报道：《初春的探望——北京老校友探访纪实》，其中写到了杨绛。文章说：春寒料峭的三月，我们一行二十人到北京参访名校，特意提前一天到京，留出一个星期天去探望时时惦记着的老校友和校董们。行程很紧，就决定去看望何泽慧、陆璀、杨绛、贝时璋四位。看完前三位之后，我们陷入了矛盾。想去见的是杨绛先生，可刚听说她最近身体不好不见客。我们生怕打扰她，但又非常想见见她，给她带去学校师生的祝福。很少见客是杨绛先生的特点，何况又是身体不好，怎么办？要不，把带来的东西送上就走吧。犹豫之中，我们来到杨先生家门前，反复按门铃却没人应。正在失望之时，杨家阿姨买菜回来了，认出我们，将我们让进了屋。不见客的杨先生听说是振华来人，赶忙从里屋出来迎客。笑着给我们让座，询问学校的情况。她告诉我们，最近查出心衰问题，医生不让她见客。还记得，2007 年先生出了新书《走到人生边上》，我们来看望她时，她兴奋地给我们一个一个地签名题字。今天见她，精神确实不如去年，但

还是思维敏捷，言语流畅幽默。我们告诉她，读到了吴学昭先生的书《听杨绛谈往事》，她笑了，抱歉地说，家里的书都送完了，否则该送你们。于是，又谈起了振华。我们怕打扰她，赶紧告辞，老人却还在抱歉，她拉着我的手说，真不好意思，医生不让我见客，你们突然来，我没准备。我们急忙要她别在意，心中却感动着，今天让先生破例的，是振华！就像她说的，振华，我是很有感情，很怀念的。

笔者也有好久未与杨绛联系了，4 月 28 日，我打电话问候，是保姆接的，她自称姓吴，中原人，听说我在写杨绛，便说，关于版税的事，你去找吴学昭。我说非关版税，只是问候问候杨绛先生。保姆说，杨绛先生耳朵有点背，其他一切都好，每天坚持在房里走路，能看书，当然能看，文章，不写了，要来看望，不要来，杨先生不见客，谢谢你的关心，杨先生生活完全能自理。这是福音，在本书尚健在的四位主人公中，杨绛的健康状况是最佳的。转而与吴学昭女士联系，她是我的人民日报前辈同事，曾在国际部供职。电话打过去，说明意思，无非是想了解一些杨绛的近况。吴女士说，你不知道的，就不写算了。对于我这个陌生客，她回答得十分干脆。

对此，笔者表示充分理解，并尊重。钱锺书当年对外国记者说："如果你吃了一个鸡蛋，感觉味道还不错，何必一定要去了解下蛋的那只母鸡呢?"在杨绛身上得到很好的坚持。雨果说过："生活就是知道自己的价值，自己所能做到的与自己所应该做到的。"对于杨绛，拥抱宁静，拥抱知识，远离浮嚣及权势，是她晚年最好的选择。

杨绛一生在边缘行走，她自述很长的时间里只是"一个零"。我们不必为此惋惜，或许还要为此庆幸。有人曾拿她和丁玲相比（我的天，这如何能相比呢），如果她的早年也和丁玲一样"蹿红"，如果她的境界也和丁玲一样"政治"，料想很难活到今天，更甭谈她晚年的创作成就。

7 月 17 日，杨绛生日，笔者在电话里发去祝贺。问起日常起居，保姆说，能看书，坚持在房里走路。对于九十八岁的老人，有这两条，可以称得上奇迹。

侯仁之：夫妇喜迎“白金婚”

侯仁之依然在做功课：病房的墙上挂着一方匾额，是他的学生送的，内容是关于他一生的事迹。每天，侯仁之都要念几遍，一是检测视力，二是锻炼脑筋。

如果你在北大校园行走，偶尔能看到侯先生坐在轮椅上的身影。推车的，有时是护工，有时是他的子女。指路的，永远是侯先生自己。他说往哪儿去，就往哪儿去。途中，不断有熟人跟侯先生打招呼——很遗憾，对于其中一些人的姓名，他已反应不出来了，为此，常常陷入自责。还有相识、不相识的学生给他深深鞠上一躬，啥也不说，然后掉头就走。这也成了燕园一景。经过燕南园附近，侯先生有时也会径直驶向自己的家，那里是他永远的牵挂。

初春的一天，夫人张玮瑛到医院探望侯先生，侯先生握住夫人的手，惊呼道：“太凉了！”然后就把两只手合起来，紧紧捂住夫人的手，什么也不说，就那样一直捂着，他要用自己的体温把夫人的手焐热。

生命熟透了，侯仁之偶尔会出现恍惚状态，他会当着一个不相干的人的面，把自己的某一篇论文复述一遍。你想打断都不行，侯仁之滔滔不绝，旁若无人。其实你稍微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老人根本就没有看你，早已沉湎既往，神游他乡。

2009 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三卷本的侯仁之文集，分别是：《北京城的生命印记》、《历史地理学的视野》、《我从燕京大学来》。

2009 年 8 月 13 日上午，北京大学临湖轩东厅，一帮人热热闹闹地庆祝侯仁之与张玮瑛结婚七十周年。笔者在第五章曾经写道，1939 年 8 月 7 日，侯仁之与张玮瑛在此喜结良缘。鉴于国难当头，一切从简，证婚人是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嘉宾为导师洪业夫妇和李荣芳夫妇。今天，到场的客人稍多，但也严格控制在十人左右，分别是燕大校友会、北大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北大图书馆以及台湾大学图书馆的代表，笔者有幸列席。



卞毓方与侯仁之夫妇合影。

在等待侯老夫妇的间隙，我在临湖轩的前院徘徊，四周植满了绿竹，中间生长着两棵玉兰，我曾在一本书中看到，这是金岳霖先生留给北大的纪念——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金先生任北大哲学系主任，他在燕东园居住期间，在房前栽了两棵玉兰，后来金先生调离北大，就把玉兰移种到这里。

上午十点，张玮瑛女士先到，九十四岁了，依然步伐轻盈，面容姣好。几分钟后，侯仁之先生也到了，是坐着轮椅来的，从气色上看，健康相当不错，算得上面色红润，神采奕奕。

这是难得的机缘。北大的老教授中也有活到望百高龄的，但是夫妇双双迎来结婚七十周年的，数不出还有谁。侯先生当年结婚时已经二十八岁，算是晚婚了，考虑到这个因素，今天的喜庆更加难得。据护士介绍，8 月 7 号那天，老夫妇俩在医院里已经有过小型的庆祝，侯先生满怀感激地说："亲爱的玮瑛，帮我成家，助我事业，七十年如一日。"此时此刻，大家让侯先生再表一次态，侯先生随即朗声道："亲爱的玮瑛……"

台湾来的客人致词，她是台大图书馆的馆长林光美。林女士说，两位老人的"白金婚"纪念活动本来安排在 8 月 7 号，因为要等她来，才

延迟到8月13号。她为老人送上最最诚挚的祝福。原北大副校长郝斌送上自己书写的一方匾，集的是古人的诗句："接天荷叶无穷碧，卧看牵牛织女星。"是的，对于这样高龄而美满的婚姻，世人是要手搭凉棚遥望，仰起头来惊叹的呢。

3. 生命的长度与温度

季羡林、钱学森、杨绛和侯仁之，从年初一路走来，走着走着，7月7日，突然少掉了一位，而且是人气最旺、长寿呼声最高的季羡林；走着走着，到了10月31日，突然又少掉了一位，是六位中年龄最小、功勋最显赫的钱学森。

季羡林仙逝，举世哀悼，各种美誉、桂冠蜂拥而至，这也是人之常情，事之常理。在此时刻，我突然想到：季羡林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呢？

翻检季羡林的旧作，其中有一篇《我写我》，算得是最直接的回答。他说："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地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又说："我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也是兴趣不老少的人。然而事实上生活了八十年以后，到头来自己都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好像是一棵枯树，只有树干和树枝，而没有一朵鲜花、一片绿叶。自己搞的所谓学问，别人称之为'天书'；自己写的一些专门的学术著作，别人视之为神秘。年届耄耋，过去也曾有过一些幻想，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粗干上开出一点鲜花，长上一点绿叶；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碌，有时候整天连轴转，'为他人作嫁衣裳'，而且退休无日，路穷有期，可叹亦复可笑！"

季羡林这儿说出了两层意思：一、自己是一个敢于讲真话的好人；二、一辈子只晓得埋头做枯燥的学问。

如果季羡林只晓得埋头做学问，固然会有成就，但是难得有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季羡林完美的人格，还在于关键时刻敢于讲真话。譬如，他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也有人称为"中国牌知识分子"。他们的最大特征，就是"位卑不敢忘忧国"。

这是严酷的生存环境造成的。中华自有历史以来，无一日无敌国外患。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

季羡林进一步分析，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种特征：首先是讲“面子”。“士可杀不可辱”，你可以砍他的头，不可以驳他的面子。知识分子多半人在江湖，心存魏阙。但是他们嘴上不说，这也和面子有关。与面子相对应，还有一个骨气。“文章”总是“憎命达”，“才如江海命如丝”，才华愈高，命运就愈不济，到头来，只剩一把嶙峋瘦骨。瘦尽管瘦，这把骨头，知识分子仍看得十分重。这是他们仅存的“财产”，最后的“赌注”，轻易不肯押上。但不要以为他们怕死，不，节骨眼上，关键时刻，他们却又喜欢拼命。“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就是骨气。

以此为标准，在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中，季羡林最佩服的，有两个。一个是马寅初，一个是梁漱溟。在季羡林身上，也明显有两位大贤的风骨。譬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当举世批判胡适、陈寅恪，他能以沉默对抗，一言不发。稍后，在一次批判冯定“为了生活而实干”的个人主义哲学的会上，主持人最后点名要季羡林表态，他居然说：我同意冯定同志的观点，所以我没有什么话说。这在当时，是需要大无畏的精神的。

季羡林的一位老老朋友（也是望百高龄），曾在闲谈中对笔者说：“建国初期，季羡林、李长之，还有我，三个人常常在一起玩，论学问，季羡林并不是最出色，论活动能力，他也不如长之和我，论婚姻，他就更加不理想，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但他的命好，晚年大红大紫，名动朝野……”言下，颇流露出几分歆羡。笔者坦言：“性格即命运。季先生的出生、环境、条件、经历，造就了他特殊的生命曲线，他对社会的感悟力、适应力、反弹力，是您这样的富家子弟、风流才子所不能比拟的。”季羡林先生曾对笔者作过自我剖析，他说：“我这一生，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关键时刻，又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完全不计个人得失。”笔者认为，“谨小慎微，胆小怕事”加“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正是他内在气质最为准确的概括。

俱往矣！“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选择季羡林作为二十、

二十一世纪交替之际文化领域的一座丰碑，自有它深邃的背景。同样深邃的背景，我们在齐白石的画室里见过，在巴金的书斋里见过，而另外一些也许是更为出色的文化巨子，如胡适，如陈寅恪，却因生不逢辰而无缘享此殊荣。季羡林是幸运的，他长寿，他的能量装置呈多级火箭推进，当生命的航船行将返归渺渺银河（天堂）之际，又获得了最后一程的大力助推；他活着时，就已清晰地看到自己在历史上的坐标。季羡林晚年虽有落寞、孤独，虽有风波、曲折，那也是人生应有之义。世间万事本无圆满，正如宋代词人辛稼轩所书："肘后俄生柳，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这不如意事，便是上帝设下的路障，你要领略完整的人生，就得学会从跨越中求爆发，求高翔。季羡林最后的生命是光芒万丈的，经一波三折而终于达至和谐，这是天理，是公道，是百折不挠的生命的奇迹。

钱学森仙逝，引发又一次举国哀悼。网上有人建议为他举行国葬，反映了他在世人心目中的位置。钱永刚说，父亲走得匆忙，所以也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遗嘱。但从舆论看，钱学森生前对温家宝总理所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被放大、强调成了最后的遗嘱。钱学森生前还说过"今天的大学，大家见面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钱学森逝世后的第二天，媒体公布了教育部长易人，时间上的巧合，激起了各界人士的热议。钱学森的忧虑，无疑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特别遗嘱。

回过头来看，在六位主人公中，钱学森是命运的宠儿。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他受到了最好的教育，在东西方对峙的大背景下，他得到共和国的授命，才能得以极大地发挥。钱学森退休后即使什么也不做，也在历史上占定了位置（如钱三强)。钱学森的思维，或曰知识，是系统性的，爆炸性的，他不甘于吃老本，古稀之年，又大力提倡"大成智慧学"。钱学森认为：人的智慧分两部分：量智和性智。缺一不成智慧！此为"大成智慧学"。钱氏的学说，在急功近利的当代，显得曲高和寡。没关系，钱学森着眼的是未来，他的学问是预为五十年后、一百年后的人准备的。

至此，六位从1911年出发的主人公，只剩下两位，即杨绛和侯仁之。这两人中，我和侯仁之及其家人有所接触；杨绛那里，偶尔打个电

话，保姆接，杨绛不接，谈不上沟通，我只能远远感受。

感受空气中依稀的温馨……俄而想到杨绛洗尽铅华、明净如霜的文字，是用怎样的沧桑炼成的！年轻人没经过千劫百劫，绝对学不来；老年人没修炼到那个份上，也是无从下笔。杨绛的出手，含有犀利的批判锋芒，但又怨而不怒，不落痕迹。转而又想到杨绛的命运，正是用她的文字一路铺筑的。假设杨绛只是翻译《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斐多》，而没有写作《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她的存在，就不会像如今这般枫叶如丹，而又凛凛如霜！前文提到，有人曾经拿杨绛和这个比，和那个比，比来比去，都有点不伦不类，因为缺少一个前提。什么前提？那就是，你得有杨绛父母那样一个大家庭，有大学本科政治专业，有钱锺书那样一个丈夫，还得有一腔雪后青松的高洁和冷傲。

侯仁之也是一代大家，风范更像平民。晚年住院期间，他与女儿馥兴、儿子方兴回忆往事，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他给两个孩子讲故事，他讲的故事，多是以燕园景物为依托，编织出各色各样的童话，并且让孩子们成为故事的主人公。侯仁之的这种做法，也许是从他自己的母亲那儿学来的，想当年，母亲给他和弟弟讲故事，给了他俩童年极大的享受。如今，侯仁之又把这方法用到自己的儿女身上。不同的是，侯仁之讲的故事，背景都是孩子们熟悉的，一山一石一水一树，历历可考，内容也都契合童心，亦真亦幻，引人入胜。事过几十年，侯仁之和儿女回忆起来，还不时为故事陶醉，爆发出爽朗的大笑。

侯仁之住的是北大校医院，离家很近。散步，自然也是在燕园。侯仁之在校园转悠，成了北大一景。2009 年 8 月 13 日，笔者在北大临湖轩见了老人一面，九十八岁的侯先生，目尚能视，腿尚能行（在他人的搀扶下），拿上月去世的季羡林相比，唯反应不够敏捷，不像季先生那样，在临终的前一天，犹能谈笑风生，应答如流。

据侯先生的长女馥兴介绍，有天，她把奶奶的照片拿去医院给爸爸看，侯先生一见，就激动地高叫“妈妈！”并且让馥兴把照片放在他枕头旁，以便随时观看。联想到季羡林九十五岁写作的那篇《元旦思母》，人子的孺慕之情，愈到老年，往往愈炽烈。

2009 年的最后一天，我与馥兴女士通电话，知道北大校医院在整修，侯先生已转至北京三院，健康状态良好。在此，我衷心祝他老人家欢情永在，福寿绵长！

第十六章　公元2010

大幕且闭且启，故事远未结束，无论是对于健在者，还是对于已逝者……

——笔者如是认为

2010年呼啸而至，在五十年一遇的大雪中。雪带来了遮蔽，雪也带来了孕育。“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高骈诗）我的书斋面对柳荫公园，我常常停止敲击电脑，抬起头来，久久地，久久地眺望窗外，眼底闪过六位主人公渐行渐远的背影……

1. 家庭扫描

2003年以来，季羡林长期住在301医院。换过两次病房，起先是在东区，普通级别，而后调到西区，高干待遇，单人独住，外带卫生间。季羡林是以院为家，病室被布置成卧室加书房，床铺之外，另有书案、书架、沙发、鱼缸、花草、轮椅等物。入门，挂着范曾的画，画面是一个总角戏耍的儿童，寓意季羡林的童年云云。书案左后侧，挂的是冯其庸的条幅，上书：“学贯中西一寿翁，道德文章警顽聋；昆仑北海漫相拟，毕竟何如此真龙。”

晚年，季羡林是名副其实的国宝，名动九州，朝野敬仰。季羡林力倡和谐，也很得社会的欢心。但是他自己的家庭，却不和谐，这真是一个悖谬。1994 年底，季羡林因为家务纠纷，与独子闹僵，形同陌路。孙儿、孙女、外孙，又都远在国外，有名无实。医院生活，由助手李玉洁一手照料。2006 年 8 月，七十八岁的李玉洁中风病倒，她的角色改为另一位助手杨锐代替。杨锐与季羡林合作两年，结局不甚愉快，2008 年 10 月，媒体爆出“季羡林藏品字画被盗卖”的风波，杨锐退出医院，季羡林与儿子季承重归于好。从此，内事外事都由季承全盘负责，护工为小岳。

季承是 1935 年生人，大学为北京俄语学院，工作单位为中国科学院。晚年婚姻破裂，与马姓女子重新结合，2008 年 7 月得一子，取名宏德。笔者尝戏言，宏德命大福大，出生不到半岁，就让一个分崩了多年的大家庭重新团圆。季承的长子季泓，女儿季清，上世纪八十年代走出国门，如今俱入了美籍，分别住在芝加哥和洛杉矶。季承有个姐姐，名婉如，病逝多年，她的儿子何巍，也远适异邦，目前生活在加拿大多伦多。

入院以来，季羡林说过多次“我要回家”，这是基于对健康的自信，和对自由的渴望。可是他想过家里的条件吗，那绝对不能和医院相比，尤其是天下第一流的 301 医院！此事，即使季羡林不予考虑，他人岂能掉以轻心。季羡林不是想着要活一百零八、一百二十的吗？最佳方案，只能是以院为家的了。唉，自由与待遇难得两全。

入院前，季羡林住在北大朗润园十三公寓，有两套相邻的小三居，大概是在 2002 年，那两套房子的主权为校方收回，作为置换，在蓝旗营“院士楼”给分了一套四居室，不过，房主是别人的名字。2009 年 6 月 11 日，笔者在季承的陪同下，去蓝旗营新居看了看，因为十三公寓房子要腾空，此处又无人居住，纯粹变成了仓库，那个乱！简直无从插脚。

钱学森有个超稳定的家庭，他首先是“家宝”，然后才是“国宝”。依笔者之见，钱学森对共和国的贡献与影响，远远超过其他五人。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钱学森为共和国的强盛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钱学森个人的生活一直封闭，从前在美国读书和工作，他就喜欢独往独来，在他人的印象中，和冯·卡门愈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思

路愈加泉涌的情形相反，钱学森只有在独处时才有灵感敲门。回到国内，因为国防科研的特殊性质，他几乎和所有的朋友失去联系；甚至，连在他家人眼中，也快成为一个陌生人。张纯如描述说："钱学森过着一种斯巴达式的生活：早上六点起床，晚间十点就寝；他喜欢静静地吃饭，他的子女在吃饭时聊起天来的话，就会遭他打断：'吃饭就是吃饭！'几年之后，儿子钱永刚回忆，他唯一有机会和父亲说话的时间，只有在拿成绩单给他签名时；他的父亲常常不告而别，一去就是几个星期，尤其是1950年代晚期，中国要研发短程飞弹时，更是经常如此。钱学森去视察发射台时，有时会离家数个月，甚至长达半年之久，而他也从不打电话或写信回家报平安。有一次，因为出门甚久，他妻子在向那些三缄其口的官员询问钱学森的行踪时，不禁歇斯底里地说：'他不要我了吗？''他不要孩子了吗？他不要这个家了吗？好，那么，我会点个火，把这个家烧个精光！'钱学森最后终于又出现了，不过，仍没说他究竟人在哪儿，在做什么事，而生活也一如往常地神秘难解。"晚年，钱学森基本住在家里，拒绝一切采访，很少跟人见面，只是在身体不适时，进301医院治疗。九十而后的钱学森，长期卧病在床，国家领导前往探望，宾主只能在卧室对话，好在耳聪目明，思维依然敏捷。夫人蒋英，小他八岁，健康良好，行动自如。晚年钱学森不能出席的一些公众活动，常由蒋英代劳。顺便说一说，蒋家在浙江是渊源很深的，近年频出风头的武侠小说家金庸，就是蒋英的表弟。

钱学森有一子一女，都是出生在美国，儿子钱永刚，生于1948年，女儿钱永真，生于1950年，1955年随父母回到祖国。钱永刚1969年入伍，1978年考取国防科技大学，四年后毕业，获计算机学士学位。钱学森决意终生不再赴美，这是他个人的事。他并没有以此为家庭的戒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新一轮的留学高潮中，钱永刚赴美，进入父亲就读过的加州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归国，从事计算机应用软件系统的研发。钱永真也曾经是解放军的一员，有消息显示，她近年长期生活在美国。

钱永刚曾被人问及他的家教，永刚的回答大大出人意料，他说："如果说我们家有什么教育秘诀的话，那就是'不教育'。我们家要说'言传'，几乎没有，主要靠'身教'。回想从小到大，我主要是看父母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他们从来不会跟我说你要这样或者不要那样，而是

用他们做人做事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影响我们。”

钱学森的家，是名副其实的书城，蒋英的学生、中央音乐学院的赵登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第一次走进钱学森、蒋英的家，愕然发现：房子又老又暗。还是五十年代建的那种红砖老楼，跟普通的单位宿舍没什么两样，家具也很一般。尽管有关部门几次动员他们“乔迁”，但老人一直没搬，他们不愿意给国家增加麻烦。蒋英曾说：“我不羡慕人家装修这、装修那的。教授的家就应该是这样的：都是书。”除了四周的书和一架当年从国外带来的、相伴多年的名贵钢琴外，这真是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家了，但就是在这书的包围中，让人感受到一种向上的力量。

蒋英不愧是大家庭出身，又是长期从事音乐教育。她的一个学生说：“千万人中一回头，你一眼就能看出她。”因为她的谈吐、举止与别人不一样，在她的身上，洋溢着一种特殊的气质与吸引力。

侯仁之住在北大燕南园61号，这是一栋老式的小洋楼，与别人合居。侯府的门朝北开，入内，是一小客厅，正壁挂有饶宗颐赠送的条幅：“图史芬芳闲领味，云烟供养静怡神。”侧壁是郝斌的手笔：“大德必寿”，以及一幅“福寿图”。九十五岁之后，侯仁之老病相催，入住北大校医院，以后便很少回来。夫人张玮瑛，小侯仁之四岁，2008年，也已九十晋三——眼不花，耳不聋，读书写字，都不用戴老花镜。长女馥兴，1942年生，毕业于北大物理系，退休之后，是父亲的得力助手。长子方兴，1946年生，专业为生物学，也已退休，随侍在侧。次子凡兴，1956年生，小学期间遭遇文化大革命，学习受到严重耽误，改革开放后赴美留学，研究地理，长期居住在西雅图。

杨绛的寓所，在三里河南沙沟。这在二十年前，是高档住宅区。譬如，前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就住在她的对门。现在，房子是不时髦了，但身份犹在，网络上有该小区二手房出售的信息，每平方米都在两三万元之间。

杨绛一个人生活，与保姆做伴。她在《走到人生边上·自序》里说：“年纪不饶人。我又老又病又忙。我应该是最清闲的人，既不管家事，又没人需我照顾。可是老人小辈多，小辈又生小辈，好朋友的儿女又都成了小一辈的朋友。承他们经常关心，近在北京、远在国外的，过年过节，总来看望我。我虽然闭门谢客，亲近的戚友和许许多多小辈

们，随时可以冲进门来。他们来，我当然高兴，但是我的清闲就保不住了。”

杨绛和钱锺书只有一个女儿，女儿结婚没几年，丈夫就去世了，她没有子嗣。唉，杨绛和钱锺书这么大的学问，可惜没有传人。难怪杨绛要苦苦地追索命运——你说老天对她究竟是公，还是不公？

六位主人公中，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声名最显，在家族中，始终占据主角地位。但他的名声地位，并没有给子女带来好运。“一门五右派”，宁知不是盛名之累。

黄万里晚年回忆，他一生最大的安慰，是有个美满的婚姻。夫人丁玉隽，在黄万里被划为右派后，不离不弃，甘苦与共，相濡以沫。1982年，夫妇同游四川乐山大佛，黄万里有诗记之：“大佛身前活佛联，红颜白发映江天。狂夫有妇常相伴，印证三生石上缘。”

丁玉隽生于1917年，及至笔者写作这章附录的2009年秋季，老人已经九十晋二，依然健在，一如既往地荫泽着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

丁玉隽和黄万里共同育有三女二子，有意思的是，名字起得都很有特色：长女且圆，长子观鸿，二女无满，次子二陶，三女肖路。据且圆



1997年黄万里与夫人钻石婚留影。

对笔者说，前四个名字，都是祖父起的，最后一个，是爸爸命名。且圆出生的那天，恰逢祖父母的结婚纪念日，所以才给起了这么一个名字。“且”，这里用古意，表示“祖”，“圆”，就是圆满。且圆 1956 年入北大数学系，毕业后任教于北工大，后转入科学院软件所。长子观鸿，这里的“鸿”，与鸿雁无关，是纪念祖父当日参观的一个叫什么“鸿”的水利工程。观鸿侥幸未受父亲的右派株连，1957 年也考取了北大数学系，毕业后去天津大学当老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赴美攻读博士，然后就留在了马里兰州。次女无满，“无满”，自然就是永不满足的意思。无满 1958 年参加高考，成绩虽然优秀，但在政治的筛选下，只能勉强进北京机械学院，毕业后在北京仪表机床厂当技术员。上世纪末，无满随丈夫移居法国。次子二陶，暗寓陶朱公第二，寄托了祖父的一腔宏愿。1960 年，二陶落榜高考，改年，在清华有关领导照顾下，进了清华冶金系，后来去了美国，现定居在洛杉矶。三女肖路，“肖”，是酷肖，“路”，指姑姑黄路。1965 年，肖路高中毕业，她是兄弟姐妹中资质最好的，却无缘于大学，黄万里为此，一夜愁白了头发。国内没有发展，只好仰赖异邦——肖路后来也去了美国，现也落户在马里兰州。

黄万里晚年，喜欢在客厅挂一幅张謇的书法，那是父亲黄炎培传给他的，内容是黄庭坚的《题崇德君所画雀竹蜩螗图赞》：“蒿下蹄间，斥鷃饮啄。争雄穹枝，竿网将作。蝉嘒竹间，自谓得已。螳螂从之，鸡鸣不已。”张謇乃清末状元，与黄炎培有交往，这幅字也正是为黄炎培而写的。黄万里去世后，书法又传给了长女且圆。

陈省身有一子一女，儿子伯龙，女儿陈璞，都是在美国长大。伯龙毕业于加州大学，是一名保险业精算师。陈璞小时候就表现出天赋才能，十几岁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毕业，然后到圣地亚哥分校读研究生，在那里结识台湾籍学子朱经武，组成美满家庭。朱经武如今是世界驰名的物理学家，曾获美国科学家最高荣誉的国家科学奖与马蒂亚士奖，以及工程界最崇高的约翰弗里茨大奖，2001 年出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当年，陈省身一再告诫朱经武，从事研究不要走热门，因为跳进去时已经有很多人在那里打破头了，应该开创自己的路，而且要坚持，别一下子不行了就跳出来。朱经武对此深有体会，他转而教导学生说：“你要做新的东西，要‘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做事要执著。”还说：“科学的乐趣在于走在别人前面，看别人没有看到的风景，

呼吸别人没有呼吸到的新鲜空气。”

六位大师都曾与“亲美”的清华有缘，也都远赴欧美留学，这是他们成才的基础；如今他们的后人也有相当一部分在欧美生活（杨绛的女儿钱瑗曾留英，壮年早逝，且没有亲生子女，例外），但真正能成为大师者，尚未听说。

六位大师倘若论及身后的传人，陈省身的女婿朱经武当之无愧。此外还有杨乐，他是黄万里的大女婿，也是属于“半子”。笔者曾与杨乐联系，他是著名的基础数学家，现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2. 大师侧影

钱学森

经典形象

一次乘火车去济南，我手捧一册《钱学森学术思想》打发时光，这是一册难啃的大部头，且不说学识宏富，包罗万象，光那六百多页密密麻麻的文字，翻起来就令人头晕。这时，不，那时，我的邻座，一位四十来岁的汉子，似乎也对这书满怀兴致。我拿眼瞄他，他拿眼瞄书。我停止阅读，问：“你知道钱学森吗?”他答：“知道一些。”“说说看，你都知道些什么?”我立刻进入即兴调查。汉子清清嗓子，说：“我也是从报上看到的，钱学森地位高，家里用着炊事员。一天，炊事员对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讲，你爸爸是个有学问有文化的人。他儿子听了，觉得好笑，心想，这事还用你说？炊事员不慌不忙，接着讲，你爸爸每次下楼吃饭，都穿得整整齐齐，像出席正式场合，从来不穿拖鞋、背心。明白不，这是他看得起咱，尊重咱。钱学森的儿子听罢一愣，懂得炊事员是在敲打自己。报道没说这事发生在哪一年，钱学森的儿子当时是几岁，反正，他儿子听了炊事员的话，从此就向父亲学习，每逢去餐厅吃饭，必穿戴得整整齐齐。”

还有一次，是在中科院一位朋友的办公室。我去时，朋友在欣赏一

卷《钱学森手稿》。我说是欣赏，他眼中流露的正是这样的目光。这一套手稿，分两卷，五百多页，是从钱学森早期的手稿中遴选出来的。朋友说，这里面还有个故事。1935～1955，钱学森在美国呆了二十年，留下大量的科研手稿。钱学森有个美国朋友，也是他的同事，就把那些手稿收集起来，然后，到了九十年代又把它完璧归赵，送还给钱学森。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笔者拿过来翻了翻，与其说是手稿，莫如说是艺术品。无论中文、英文，大字、小字，计算，图表，都工工整整，一丝不苟，连一个小小的等号，也长短有度，中规中矩。钱学森的手稿令我想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进而想到他唯美的人格。如是我闻，在美国期间，钱学森仅仅为了解决一道薄壳变形的难题，研究的手稿就累积了厚厚一大摞，在工作进展到五百多页部分，他仍觉“不满意!!!”，直到八百多页，才长舒一口气。他把手稿装进牛皮纸信封，在外面标明“最后定稿”，继而觉得不妥，又在旁边添上一句：“在科学上没有最后!”

若问笔者本人的感想，我首先要向读者推荐的，是他如下的几句老实话。回顾学生时代，钱学森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我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算是好学生，但每次考试也就八十多分；我考取上海交大，并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三名；在美国的博士口试成绩也不是第一等，而是第二等。”八十多分，第三名，第二等，这哪里像公众心目中的天才学子？然而，事实就是事实，钱学森没有避讳，倒是轮到世人惊讶，因为他们已习惯了把大师的从前和卓越、优异画等号。钱学森的这份自供，同时也纠正一个误区：一个人的成才与否，跟考试成绩并不成绝对正比。不信你去查查当年那些成绩排在钱学森前面的同学，又有几人成了名闻世界的大师!

钱学森的天才是不容置疑的。根据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采访，麻省理工的学子曾对他佩服不已。譬如说，有一回，钱学森正在黑板上解一道十分冗长的算式，有个学生问了另一个与此题目无关、但也十分困难的问题，钱学森起初不予理会，继续在四个十英尺长、四英尺宽的黑板上，写满了算式，“光是能在脑袋中装进那么多东西，就已经够惊人了，”一位叫做哈维格的学生回忆：“但是更令我们惊叹的是，他转过身来，把另一个复杂问题的答案同时也解答出来！他怎么能够一边在黑板上计算一个冗长算式，而同时又解决另一同样繁复的问题，真是令

我大惑不解！”

天才绝对来于勤奋。钱学森在加州理工的一位犹太籍的校友回忆：“有天一大早——是个假日，感恩节或圣誕节——我在学校赶功课，以为全幢建筑物里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把留声机开得特别响，还记得我听的是有个特别响亮的高潮的‘时辰之舞’。乐曲高潮到一半时，有人猛力敲我的墙壁。原来我打扰到钱学森了。我这才知道中国学生比犹太学生更用功。后来他送我几份他写的关于近音速可压缩流体压力校正公式的最新论文，算是对于曾经向我大吼大叫聊表歉意。”钱学森在麻省理工的一位学生麦克则回忆：钱学森教学很认真，全心全意放在课程上。他希望学生也付出相同的热忱学习，如果他们表现不如预期，他就会大发雷霆。有一次，他要求麦克做一些有关扇业涡论引擎的计算，麦克说：“我算了好一阵子，但到了午餐时间，我就吃饭去了。回来的时候，他就在发脾气。他说：‘你这是什么样的科学家，算到一半竟敢跑去吃中饭！’”

关于钱学森归国后的表现，这里补充两个细节。一、你注意过钱学森的履历表吗？他是先担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然后改任副院长。这事不合常规，怎么官越做越小，难道犯了什么错误？不是的。原来，钱学森出任院长时，只有四十五岁，年富力强，正是干事业的好时光。但是院长这职务，按照现行体制，是一把手，什么都得管，包括生老病死，柴米油盐。举例说，底下要办一个幼儿园，也得让他拨冗批复。钱学森不想把精力耗费在这些琐事上，他主动打报告，辞去院长职务，降为副院长。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集中精力，专门抓业务。二、钱学森晚年与不同领域的后辈有过多次学术合作，在发表文章时，他总是坚持把年轻人的名字署在前面。大师终究是大师，仅就这种胸怀与情操而言，在当代就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

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同样也很可爱的哦

在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笔下，钱学森有着十分粗犷而任性的硬汉形象。譬如说，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为一批攻读硕士学位的军官上课，他当年的学生们回忆，钱学森上课总要迟到几分钟，正当大家猜测他今天会否缺席，但见他快速冲进教室，二话不说，抓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开了，直到用细小而工整的字迹，填满所有

的黑板为止。有次，一个学生举手说："第二面黑板上的第三个方程式，我看不懂。"钱学森不予理睬。另一个学生忍不住发问："怎么样，你不回答他的问题吗？"钱学森硬邦邦地说："他只是在叙述一个事实，不是提出问题。"又有一次，一个学生问钱学森："你刚提出的问题是否万无一失？"钱学森冷冷地瞪了他一眼，说："只有笨蛋才需要万无一失的方法。"钱学森教学，没有小考、大考，也不布置家庭作业。课后，学生们只能绞尽脑汁地温习课堂笔记，那都是纯数学，一个方程式接一个方程式。期末考试，钱学森出的题目极难极难，全班差不多都吃了零蛋。学生有意见，找上级的教授告状。钱学森对此回答："我又不是教幼儿园！这是研究所！"

数年后，钱学森转到麻省理工学院，为航空系的研究生开课。在那儿，学生们的回忆同样充满恐怖色彩。诸如："人人知道他是个自我中心的独行客。""他在社交场合总显得惴惴不安，学生觉得他冷漠高傲。""他总是独来独往——不搭理人，学生都不喜欢他。""他非常冷淡，没有感情。""他是我见过的最难以亲近而惹人讨厌的教授。他好像刻意要把课程教得索然无味，让学生提不起兴趣似的。他是个谜。我既不了解他，也没兴趣去了解。""钱教授作为一个老师，是个暴君。""大多数学生不了解他，甚至怕他。我知道起码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学生，是被他整得流着眼泪离校的。"

还有更加不近人情的描述：钱学森在校园中是个神秘人物。除了上课，教师和学生都只偶尔在古根海姆大楼跟他擦身而过。他总是把自己关在研究室里，学生跑去请教问题，他随便一句"看来没问题嘛"，就把他们打发走。有时他完全封闭自己，不论谁去敲门，哪怕是事先约好的，他也会大吼一声："滚开！"

以上细节，无疑是真实的，因为张纯如写的是传记，不是小说，她经过扎扎实实的采访，所举的事例，都出于当事者的回忆。但这样的细节，很难出自我们记者的笔下，不信你去翻看钱学森的报道，类似的描述，保证一句也没有。多年来，我们的思维已形成了一种定势，表现科学家、出类拔萃的大师，照例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循循善诱等等。千人一面，千篇一律，苍白得可怕，也枯燥得可怕。

大师就是大师，无一例外充满个性色彩。因此我说，张纯如笔下的钱学森，其实更加有血有肉，生气充盈，因而也更加惹人喜爱。

季羡林

我写过三本关于季羡林的书，分别是《季羡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天意从来高难问——晚年季羡林》，以及《季羡林图传》，加起来，将近八十万字，倘若要把它们浓缩成千字文，我想，不妨就挑两则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说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天高气爽的秋日，适逢大学开学，北京大学的校园内，人来人往，一片繁忙。一名新生守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站在道旁发愁。他应该先去系里报到，但是他找不到地方。再说，带着这么多的行李，也不方便寻找。正在这当口，他看到迎面走来一位清清瘦瘦的老头儿，光着脑袋瓜，上身穿一件半旧的中山装，领口露出洗得泛黄的白衬衣，足蹬一双黑布鞋，显得比他村里的人还要乡气，眉目却很舒朗，清亮，老远就笑眯眯地望着自己，似乎在问：你有什么事儿要我帮忙吗？新生暗想：老头儿瞧着怪熟悉怪亲切的，仿佛自家人一样。这年头儿谁有这份好脾气？莫不是——老校工？他壮着胆儿问了一句："老师傅，您能帮我提点行李吗？我一人拿不动。"老头儿愉快地答应了。他先帮新生找到报到处，然后又帮他把行李送到宿舍，这才挥手再见。数天后，在全校迎新大会上，这名新生却傻了眼。他发现那天帮自己提行李的老头儿，此刻正坐在主席台上，原来他不是什么工友，而是著名的东方学教授、北大副校长季羡林。

第二个故事是：1995 年 5 月，某日凌晨四点，季羡林准时起床，到对面单元的书房写作。数十年如一日，这是他雷打不动的作息制度。从前上班时，是为了抓紧清晨这段黄金时间；如今退休了，则完全凭惯性，凭本能。笔耕到六点来钟，他肚子饿了，想吃早点，奇怪，书房的门，不知怎么从里面锁死了，拧来拧去，愣是打不开。这时节，季羡林叔母、老伴已经相继去世，儿子早已分居，家里只有一个保姆。季羡林考虑年轻人起得晚，不想吵醒她。怎么办？身困斗室，他灵机一动，想到了通往外界的窗子。季羡林住的是一楼，朝南有一扇大窗，探头看了看，离地面不足两米。嗨，就这么点高！季羡林雄心犹在，他毫不犹豫

地爬上窗子，纵身就往外一跃。这一跃非同小可，要知道季羡林已经八十四岁，过路的人惊讶地停住脚步，问长问短，邻居闻声也过来打探原委。季羡林说明情况，并讲："从上面看并不高，跳下来往上看真不矮。没有伤着，就是脚跟有点疼。"当时没觉着什么大碍，过一会儿脚跟就肿了。隔天在郊区有一个会议，旁人劝季羡林取消，他说："和人定好的事，哪能随便爽约。"坚持着一瘸一拐地赴会。如是又过了几天，脚疼仍未好转，在别人的坚持下，他到医院照X光检查，你猜怎么着？乖乖，脚跟的骨头摔裂了一条缝！

第一个故事彰显出季羡林的朴实、平易，如今，已成了他的招牌形象。第二个故事点出了季羡林的勤奋和霸蛮，正是凭着这样一股冲劲，他才能在八十之年老树著花，跃为一代学术宗师。

侯仁之

世人多知道侯仁之和北京城的渊源，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和西北沙漠的情愫。说的是1958年10月，侯仁之作为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主任，应邀出席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青海和新疆六省区的治理沙漠规划会议，地点是在呼和浩特。这是侯仁之第一次正式接触沙漠课题，会上，会后，他不断问自己：要不要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展到沙漠？若说没犹豫，那是假的，在沙漠中进行历史地理学的考察，整个中国前无古人，作为一个成名学者，不能不考虑它的风险。最终，侯仁之下决心参与，支撑他的是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责任。

从1960年开始，侯仁之利用假期，带领北大地质地理系的部分师生深入西北，就宁夏盐池、灵武一带的沙漠化和土壤侵蚀状况展开调查。侯仁之的高足李宝田回忆："学生都是定点的，按划片完成任务。每次都是侯先生只身进入河东沙漠选点，他沿着长城沿线跑，经常迷路。一次，我们到一个县城考察，侯先生为了考察现场，进入了一个沟里，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可以爬上来的地方。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从表面放眼看，一片平坦，而下面却沟壁陡峭，纵横相连。他在沟里摸索了很久，终于看见了远方有一丝亮光，奔过去，才走出沟，正好有一个我们的学生住在那里。要不然，奔波了一天的侯先生恐怕无处可住了。"

说得轻巧，当时确实是惊险。孤身一人，摸索很久，估计是到了夜晚，幸亏见到一丝亮光，那简直是命运的指引。一个多月后，当考察队返程，在去银川的途中，侯仁之险些遭遇不测。车在暗夜中疾驶，没有路灯，没有星月，一不留神，闯进干沟，司机当场撞晕，侯仁之坐在前排，也被撞得三魂出窍，七魄升天，半天才悠悠苏醒过来，低头看插在上衣口袋里的两支钢笔，全部折断。你想想，那是多么巨大的冲击力！

沙漠考察，危险无处不在。又一年，侯仁之率队经过红柳河。说是河，并没有水，河床裸露，结了一层硬壳，那只是表象，下面隐藏着沼泽。汽车无法过，侯仁之决定涉险步行，他不是一个人走，还牵着驮运资料的毛驴。侯仁之指挥大家分散行动，彼此保持距离，一旦发现脚底松动，赶紧卧倒，以免陷入灭顶之灾。此情此景，颇似当年红军过草地。还有一次，在乌兰布和沙漠，队伍遭遇了沙尘暴。老天一挥手，风沙顷刻而起，遮天蔽日，跟着又下起了冰雹。野外无处藏身，侯仁之迅速指挥大家在沙丘挖洞，然后像地拨鼠一样钻进去，终于躲过一劫。

还有一则逸闻，可入现代版的《世说新语》。1990 年夏，侯仁之虚岁八十，他带队到围场县考察，途中在隆化转车，因为是过路列车，买的是站票。研究生邓辉心想：侯先生这么大岁数了，说什么也要给他抢个座位。于是，待火车进站，刚刚停稳，邓辉就扒着窗口，纵身往里爬。侯仁之恰巧站在身后，他怕邓辉摔下来，便伸手一托。这样，邓辉就顺利爬进去了。检票上车，列车员却拦住侯仁之不放，说刚才那个年轻人扒窗而入，是不轨行为，要受处罚，侯仁之是协谋，予以没收车票，不准登车。任凭侯仁之怎么解释，列车员坚持原则，不予放行。随队的老师王北辰见状，赶忙上前，给列车员一个劲地鞠躬，猛赔不是，末了又亮出侯仁之的身份证明，说“这是我的老师、北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列车员至此才高抬贵手，准许他登车。

侯仁之比较具有诗意的一笔，还要回到燕园。1999 年冬日的某个夜晚，狮子座流星雨大爆发。在北大未名湖南岸的慈济寺遗址旁，人们看到一位拄杖的老人，静静地仰望星空——他就是侯仁之。

深夜一点多，八十八岁的侯仁之依然豪兴不减，为阵阵划过天幕的流星叫好。流星划过的间隙，侯仁之兴许想起了他的弟弟侯硕之，1935 年，侯硕之翻译的一本关于天文学的书，取名《宇宙之大》，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侯仁之曾对人说：“我弟弟有能力；有才华，有人格，想

为国家做事情。我的弟弟比我强。太可惜了!”1942 年，侯硕之从四川北上，在陕西境内惨遭土匪杀害。有一阵子，侯仁之又想到了学潮，他指着面前的空地，对同游者说：“1935 年，一二·九运动前的一个晚上，我们燕京大学的学生就在这里集会。”啊，那一年，侯仁之二十四岁。

屈指算来，侯仁之在燕园度过了六十多个春秋。无数个夜晚，无数颗流星划过，而在燕园的学术星空，侯仁之更像一颗恒星，热烈地招展着光帜。

陈省身

陈省身最早引起我的注意，是他和记者们的一次斗智。那是 2002 年夏天，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陈省身担任名誉主席，大会为避免新闻记者的干扰，特意安排他在远离会场的希尔顿饭店下榻。记者们找不到陈省身，当然不乐意，纷纷给组委会提意见。组委会不得已，只好安排一个专场采访。那天下午，在希尔顿饭店的一间大厅，挤满了无冕之王。陈省身满面春风，有问必答。时间很快过去了一个多小时，记者们轮番询问，没有一点停止的迹象。主持人束手无策，莫可奈何。这时，陈省身感觉累了，他于是提出一个建议：“这样吧，我提一个历史上的问题，如果你们回答出来，我就继续回答问题，如果你们回答不出，采访就到此为止。”众位无冕之王觉得一个数学家能提出什么历史难题呢，遂表示同意。陈省身扫视大家，慢条斯理地问：“司马迁是怎么死的?”

大家面面相觑。司马迁虽然贵为“史圣”，《史记》虽然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关于司马迁的死，历史向来没有明确交代，因此，谁也说不出所以然。陈省身胜利了，他含笑离座，欣然而去。

事后，有人向陈省身打听正确答案，他说：“我猜想司马迁是被汉武帝杀死的。但是没有人能够确认。其实，你看《报任安书》，如果落在汉武帝手里，岂不是死罪?”

陈省身的推论是有道理的，汉武帝能阉司马迁，自然也能杀司马迁。你对一个封建帝王，还能抱什么幻想?

颇遗憾我未能出席那次采访，失去一次与陈省身对话的机会。随后我开始涉猎陈省身的资料，把他与我熟悉的大家作比较。陈省身不喜欢体育运动，可他偏偏又长寿，这事，有点像季羡林。不过，他比季羡林更彻底。举个例说，季羡林到了黄山，还勉力攀登了三日，领略了奇松、怪石、云海、日出，兴尽而返。陈省身呢，有一年，他和朋友一起游黄山。是日天朗气清，朋友结伴登山。陈省身却说："懒得爬那么多的石阶，上那些陡坡，还是在山下算了。"结果，他就留在山下招待所，看了一场有关黄山的风景电影。陈省身自嘲："一个人到了黄山，只看一场电影就回头，也算是一个纪录。"在陈省身看来，攀登科学高峰，其乐无穷，而攀登黄山呢，却需要劳筋累骨，且气喘吁吁，大不愉快。既然如此，干脆免登。

在我的资料剪贴簿里，搜集有两则名人遗嘱，足证大师的胸怀。一是爱因斯坦的。临终前，爱因斯坦说："我死后……不要墓地，不立碑，不举行宗教仪式，也不举行任何官方仪式。骨灰撒在空中，和人类、宇宙融为一体。"二是陈省身的。2000年，陈省身的夫人郑士宁去世，骨灰寄放在天津。陈省身表示，自己将来去世，夫妇俩的骨灰都埋在南开校园，上面盖一个亭子，不立墓碑，不砌坟头，但要竖一块黑板，干什么用呢？供后人在上面演算数学。

杨　绛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的。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保护自己，就不得不时刻防御。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处吃亏。你总有知心的人，友好的人。一旦看到他们受欺侮，吃亏受气，你能不同情气愤，而要尽力相帮相助吗？如果看到善良的人受苦受害，能无动于衷吗？如果看到公家受损害，奸人在私肥，能视而不见吗？"

以上这段话，录自杨绛的《走到人生边上》。显然，杨绛活得是不

轻松的，因此她感叹："人生实苦。"

杨绛也有自己的道，这是她超脱苦海的法宝。譬如说，某君与杨绛同一个单位，他出身于贫下中农，成长于边远山区，生活习惯、文化素养自然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杨绛格格不入。"文革"初期，某君"奋起千钧棒"，以革命小将的姿态狠批杨绛。谁知风云变幻，祸起不测，忽然有一天，他一个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竟然被指控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与某君同时罹难的一些乖巧人，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纷纷按照领导要求的口径，胡乱招供，给自己安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顺利过关。某君是个"死心眼"，不肯胡编乱造，欺骗组织、诬陷他人、贬抑自己。这样一来，他就陷自己于"从严惩处"的险境。某君别的不担心，唯独怕身在农村的老父、妻儿，一旦失去他这个生活来源，势必无法生存。杨绛听说了某君的心思，不计前嫌，私下悄悄找到他，让他写下家庭地址，并庄重承诺：一旦某君入狱，她将按月给他的家里寄去生活费。某君后来没有入狱，这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但这事对某君教育很深，令他终生难忘。某君从此在自己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上一个大大的"人"字；用他自己的话解释，他是从杨绛的身上学到了做人的道理。

又譬如说，湖南的出版家钟叔河，与钱锺书、杨绛时有书信往来。2004 年 10 月下旬，钟叔河的夫人朱纯例行体检，发现患了乳腺癌，马上住进医院。杨绛不知怎么听说了，她给钟叔河去信，说："我还留有许多无用的钱，能帮助朱纯保持较好的生活质量……"信交给朱纯，她读到这里，赶忙下床，给杨绛写了一封回函，感谢她的盛情，说明自己是"离休老干"，医药费全部报销，谢绝她的好意，叮嘱家人赶快寄出。出院回家，朱纯又用电脑打印了一封信给杨绛，简要报告了自己恢复的情况，请予放心。杨绛很快复信说：

"亲爱的朱纯：我常记挂着你，很感谢你病中给我写信报平安，也很佩服你能使用电脑。我眼睛不好，土埋不止半截而已埋到脖子上，只好死心塌地做网盲了。文化革命中，有个贫农儿子（当时是最纯、最革命的小将，我身为牛鬼还未出牛棚）对我说，'我嫂子要死了，长嫂为母，我是她抚养大的。'我问知其嫂患子宫癌，嘱他赶紧借了钱把嫂子送进县城动手术。县城医院的医道未必高明，这位嫂子至今健在。你和她相形之下，想必更无问题，顺便告诉你助兴，让你更能安心补养。女

人是一家的主心骨，你心安，叔河先生就也心安了……”

读罢杨绛的来信，朱纯非常感动，非常感激。但是，为了不过多打扰杨绛，她没有再答复，只是让钟叔河给杨绛写信时，代为问一句好。谁知杨绛而后给钟叔河来信，最后一页开头竟注明：“以下是给朱纯写的”，内容是：

“我家比邻的喜鹊，自从去年小鹊冻死，常来柏树上悲啼，以后便只在邻树或对楼屋上守望，再也不登树了。有一天，乌鸦来踞窝上，想是闻到尸体的臭气，院内鹊鸦大战，群鸟乱飞。

“昨天出去投信，见院内迎春花怒放，碧桃已开花，紫白二色的玉兰树都在开花。特告爱花的朱纯：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但勿忽略服药。”

这是多么真挚的关心，又是多么醇厚的美文啊！朱纯有幸得到如此的关爱，读到如此的美文，又怎能忍得住不发一声？于是她动笔写了一篇随感，发表在2005年第七期的《文学界》，题目叫《杨绛的来信》。

黄万里

黄万里的一个学生描述说，黄先生“身材高大，宽肩厚背，西装笔挺，两眼放着真诚、睿智、和善、单纯的光。他不是一位口若悬河的授业之师，更缺少伶牙俐齿。但他一句句讲来，却又都那么实在，实在得甚至有些笨拙。他的头脸是方的，身材也是方的，给我留下方正严谨，一丝不苟的印象”

这是史笔，寥寥数语，把黄万里刻画得惟妙惟肖。

黄万里因三门峡大坝而倒霉，好不容易恢复自由之身，又把目光盯上了三峡大坝。黄万里生前断言：“三峡大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

黄万里曾对好友掏心：“我们受之于民的太多了，要竭尽自己的知能报效国家。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三十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七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后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2001 年 8 月 27 日，黄万里怅然而逝。生前，他留给子女一份上书中共中央的信件拷贝，嘱咐他们在将来的某一天把这些信件拿出来，证明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

呜呼！黄万里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他有生之年，从未能把命运掌控在自己的手里！

然而黄万里的大名，却不会被时光之海淹没。海明威说得好："人不是生来被击败的。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击败。"荒谬、暴戾尽可吞噬黄万里的肉体，但是无法碾碎他的信念。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

3. 语录拾遗

钱学森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正确的结果，是从大量错误中得出来的；没有大量错误作台阶，也就登不上最后正确结果的高座。

△常常是最后一把钥匙打开了门。

△我近三十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少数大人物的存在，首先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不显眼的小人物的衬托而存在的。时常是小人物成就那些大人物。小人物就像是肥沃的泥土，大人物就如同泥土上结出的硕果。我们只求做泥土，只求培植硕果。

△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盗火大王，他从天国盗来火种供给人类，从而给人类带来了光和热。为此，他触怒了天神宙斯。于是，普罗米修斯被捆绑在高加索山上，任凭秃鹫啄食他的内脏……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取火而牺牲了自己。我们搞火箭、导弹事业的，同样是为了人类的和平，为了祖国人民的安定幸福而献身。因此，也应该具备普罗米修斯的牺牲精神。

△西西弗斯也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被天神判处服劳役，命令他将一块巨大的石头由山脚推到山顶。当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就要将这块巨石推到山顶时，由于体力不支，那块巨石又滚落到山脚。但是，西西弗斯并不灰心，他又重新把石头向山顶推去，经过多次反复，终于将它矗立在山顶。西西弗斯的命运，仿佛就是人类命运的先验结构。人类之所以能够进化，事业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有西西弗斯这种坚忍不拔，同命运抗争的精神。

△我觉得美妙的音乐可以比作天堂的声音。每当我沉浸于这美妙的音乐之中时，就仿佛走进了天堂。我觉得音乐会把我们的灵魂带到神奇的世界中去。那里有旖旎的风光，有斑斓的色彩……总之，那美妙的境界，任你怎样夸张都不过分。

△一次，有人问爱因斯坦，死亡意味着什么？你猜，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回答是什么？他的回答出乎人们的意料。他说："死亡，就是意味着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乐曲啦！"其实，爱因斯坦这个物理学家，对于莫扎特音乐这种生生死死的酷爱与眷恋之情，我是很理解的。因为，莫扎特这位伟大的音乐天才努力揭示的自然界中那万事万物相和谐的神秘性，也正是近代理论物理所追求的最高层次的审美境界。

△贝多芬的最大成就，就是让音符述说哲学，解释哲学，使音乐成为最富于哲学性质的艺术。贝多芬总是用音符寓意托情，启迪人类灵性，感发人类道德和良心。

△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人在临终前最好不要写传，免得活着时就开始后悔。

季羡林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迷信，只迷信缘分二字，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我有一个公式：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翘尾巴的高度与人类前途的危

险性成正比。尾巴翘得越高，危险性越大。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很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

△我认为，只替自己着想，只考虑个人利益，就是坏。反之能替别人着想，考虑别人的利益，就是好。为自己着想和为别人着想，后者能超过一半，他就是好人；低于一半，则是不好的人；低得过多，则是坏人。

△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时光流逝，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些，让我的心黑一点儿，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儿，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儿。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可是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

△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

看法。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陈省身

△世界上两个重要的元素是自然与人。五百年的伟大的科学进展，开启了我们对自然的了解，也因此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我们同五百年以前的人已不是同一种动物了。

△我的读数学系的路线，实在是早就确定的，比之多才多艺的人，我的选择问题比较简单，一生受益不浅。

△一个数学家应当了解什么是好的数学，什么是不好的或不太好的数学。有些数学是有开创性的，有发展前途的，这就是好的数学。还有一些数学也蛮有意思，却渐渐地变成一种游戏了。

△德国数学家韦尔曾开玩笑地说，21 世纪的数学家都要学中文了。我想，到时候数学家并不见得都要学中文，但至少要学中国名字。外国人历来只注意中国人的姓，但是中国数学家多了，光从姓看就搞不清谁是谁了。韦尔说数学家们都要学中文，这话我们不敢说，但外国人要学中国名字是肯定的。

△人的成功受许多因素制约，其中自然包括机遇。机遇与知识很有关系。假如有个外国人住在这里，他很可能就会研究这里有什么虫，小虫子有多少种，有怎样的性质，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利用。但中国人往往不做这个。中国人很实际，对于能吃的就有兴趣，至于其他的往往就没有兴趣。人住在地球上，地球上东西的性质与人的幸福最终是有关系的，所以你拥有关于它的知识总是有意思的。

△我们国内现在对当院士、得奖很注重，这种现象都是媒体炒起来的。而一个数学家真正有建树的工作，媒体是没法讲出来的。另一位伟大的数学家黎曼，他的一生就没有得过任何奖。数学家主要看重的应该是数学上的工作，对社会上的评价不要太关心。

△一个研究员最重要的成分是伟大的学问家，其他的都不重要。

△我只是想读懂数学。如果一个人的目的是名利，数学不是一条

捷径。

△我的一生很平淡，没有什么花边新闻，婚姻家庭美满，却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事情可资谈论。

△快乐是人生第一要素。一种快乐的人生，要把不断寻找和发现乐趣作为生活的动力。快乐就是爱，就是使一切平常的东西变得有意义。生命有无意义，包括事业，家庭生活，健康长寿等等，都和快乐有关。

△成功者的内心必定简单。把奥妙变为常识，复杂变为简单。人生中，你越是一个单纯的人，就越容易成功。

△选择有时几乎就能决定一个人整个的命运，当然，这种选择是指关键时刻的那几步。也很难。中间有许多是靠机会。

△世界上最要紧的是自由。一个人事业成功最重要的是获取成长和心灵的自由。

△最好的科学是发现出来的，不是计划出来的。

△真正的天才是自己蹦出来的。一个人的创见是自己努力和灵感的结晶，很少是和一群人讨论的结果。

△真正好的工作，第一流的工作，是一个人做出来的。一个人的创见是自己努力和灵感的结晶。

黄万里

△必先立志——可自负但虚心校正自己。

△有秩序地生活：看重时间——活泼我精神。

△深于一行，仍应广通。遍访名师，勿泥于一校。

△不断地实地工作，在工作中求进步。

△随时学习，跟民众学习。

△生平服膺一“义”字，故有大批人相从工作。

△只说真话，不说假话——从不留恋舒适生活——心地善良，古道热肠——热爱生活，热爱孩子。

△在科技领域里要从最基础最平凡的工作做起，不怕艰苦，甘于寂寞。

△知识要广博，基础要深厚，思路要开阔，要想人之所未想，不人

云亦云。

△我既是科技工作者，又是诗人。我是用诗人的感情来搞水利的。

△我一辈子念书想治黄（河），可他们没有听我的一个字，我白学一场，我真痛心！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侯仁之

△在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出路，似乎不成问题，但是人生的究竟，当不尽在衣食起居，而一个身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尤不应以个人的丰衣美食为满足。他应该抓住一件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这件工作就是他的事业，就是他生活的重心。为这件工作，他可以忍饥，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而忍饥耐寒吃苦和受折磨的结果，却愈发使他觉得自己工作之可贵，可爱，可以寄托生命，这就是所谓的“献身”，这就是中国读书人所最重视的坚忍不拔的“士节”。一个青年能在三十岁以前抓住了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笔者注：此乃侯仁之为天津工商学院 1944 年毕业生所写的赠言）

△我们今天生活的地理环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有自然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是人为的因素——要发展必须了解过去。一个人如果忘记了过去，就等于没有了记忆。没有记忆的人是不完整的，他的发展方向更无从谈起。

△时代的不同，社会性质的变化，必将在城市设计的主题思想上表现出来……特别是在国家的首都——也就是全国政治中心的规划设计上，更应该从长远考虑这些问题。

杨　绛

△我只是一杯清水，不是肥皂水，我不会吹泡泡。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各自做所能及的事。

△默存和我住在清华的时候养一只猫，皮毛不如大白，智力远在大白之上。那是我亲戚从城里抱来的一只小郎猫，才满月，刚断奶。它妈妈是白色长毛的纯波斯种，这儿子却是黑白杂色：背上三个黑圆，一条黑尾巴，四只黑爪子，脸上有匀匀的两个黑半圆，像时髦人戴的大黑眼镜，大得遮去半个脸，不过它连耳朵也是黑的。它是圆脸，灰蓝眼珠，眼神之美不输大白。它忽被人抱出城来，一声声直叫唤。我不忍，把小猫抱在怀里一整天，所以它和我最亲。

△做女人肯定比做男人苦。我一直抱歉的是没有做好一个妈妈，妻子做得也不够好，女儿也做得不够好。一个女人有好几个领域，每个领域我只能拿60分。

△能和锺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锺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锺书和我就以此自解。

△“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锺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己，不求有名有声。

△我相信看不见的东西未必不存在。

△我认为命运最不讲理。傻蛋、笨蛋、浑蛋安享富贵尊荣，不学无术的可以一辈子欺世盗名。有才华、有品德的人多灾多难，恶人当权得势，好人吃苦受害。所以司命者称“造化小儿”。

△天生万物，人为万物之灵。天地生人的目的，该是堪称万物之灵的人。人虽然渺小，人生虽然短促，但是人能学，人能修身，人能自我完善。人的可贵在人自身。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也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

不是尾声的尾声

如序所言，本书构思于2007年，当时六位主人公中活着的四位业已九十晋六，我设想，毋宁说我祝愿四位都能活到一百整岁，所以计划从1911写到2011，题目拟为《百年长卷》。

序言中说得明白，本书是因季羡林先生引发的，所以，他的分量相对多一些。季先生仙逝，他已看不到这本书了。老人家身后留下诸多麻烦，诸多疑云，孤立地看，或许奇怪，综合其一生考虑，便会觉得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季先生逝世后，我最关心的不是他物质财产的去向，而是精神财富的着落。说真的，世间尽管炒得热闹，但是季先生的学问，究竟有几人能懂？季先生的人格高度，究竟有几人在虔诚仰望？在此，我顺便说一件小事。2009年8月，我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一篇文章，内容涉及《季羡林全集》的编纂，作者是全集编委会主任柴剑虹先生。柴先生说："季老还有一部《北大日记》，但是我们已经决定不出了。季老是一个凡人，他也有喜怒哀乐，有七情六欲，他受到传统的教育，后来又留洋十年，很多东西也受到西方的一些影响。不可讳言，在一个人很长的经历中，每个人都有各种想法，有对的，有不对的，季老不例外，你们看看《清华园日记》就知道。季老的《清华园日记》几年前被辽宁出版了，我是不知道的。我要知道，一定劝季老不要出这个日记，因为季老的日记并没有想到要发表。我曾问季老：《北大日记》怎么办？季老当时跟我说，不出了，至少现在不出。当然，希望出的人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说为了研究季老，季老这个人、季老的思想，那么日记当然是思想很好的表露。但这个东西是有条件的，对不

对？”柴先生的话自有其道理，尤其处在他这个位置上，考虑不能不谨慎。何况柴先生并没有把门关上，他没有说《北大日记》不出或删节，只是要我们耐心等待。不过，在《清华园日记》问题上，我和柴先生还有点分歧，依我看，《清华园日记》幸亏没有删节，让读者看到了完全的真实，以及真实背后的真诚、纯粹、伟大。对，就是伟大！一个文化人的历史定位，我相信，未来绝对是立于真言，败于虚饰。

本书的题目，也由最初的《百年长卷》改为现在的《千手拂云》，这正是从“季羡林之谜”得到的启示。季羡林的一生有无数个谜；扩而观之，其他五位大师也莫不如此，譬如，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用英文写作的《钱学森传》，翻译成中文（台湾版），译名即为《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但若把“千手拂云”仅仅理解为拨开浓雾，寻求真相，那就未免太平面，太机械。“千手拂云”获得于灵机一现，是在从夏威夷到东京的航班上，凭窗俯视茫茫云海，突然有一注斜阳从高天射来，直探万米下的太平洋，顿时令我浑身一震，有若神启——思绪就从那儿飞走了，飞到远在北京的书斋，飞到六位主人公的过往今来；连带想到的还有“千眼观虹”——它状喻的是一段长达百年的缤纷历史，七彩人生。我于是把这两个词并列，题目定为《千手拂云　千眼观虹》。我感到它有一种弹性，一种张力，一千个读者尽可有一千种理解，既提升、丰富了内涵，也拓宽了读者的视野与胸襟。

进入2010年，杨绛依然呈现出不可思议的精力，笔者屡屡在报端见到她的题词，如为上海世博特刊所题“百年梦圆，近在百日”，为《文艺报》副刊所题“新作品”等。在3月10日的《文汇报·笔会》，又见到杨绛的一篇短文《俭为共德》。文章写道：

余辑先君遗文，有《说俭》一篇，有言曰“昔孟德斯鸠论共和国民之道德，三致意于俭，非故作老生常谈也，诚以共和国之精神在平等，有不可以示奢者。奢则力求超越于众，乃君主政体、贵族政体之精神，非共和之精神也。”（见《申报》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近偶阅清王应奎撰《柳南随笔·续笔》，有《俭为共德》一文。有感于当世奢侈成风，昔日“老生常谈”今则为新鲜论调矣。故不惜蒙不通世故之讥，摘录《俭为共德》之说，以飨世之有同

感者：

“俭，德之共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司马公传家集训俭篇》云……‘俭，德之共也’；顾仲恭《炳烛斋随笔》有言云，‘共之为义，盖言诸德共出于俭。俭一失，则诸德皆失矣……’凡人生百行未有不须俭以成者，谓曰‘德之共’，不亦信乎！”

2010年7月17日，杨绛在悄无声息中度过了百岁华诞（吾国习俗庆九不庆十），据一位跟她接近的老先生讲，杨绛没有举行任何公开活动，亲戚有要为她过生日的，杨绛嘱咐他们各自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另外，杨绛健康状况良好，思维敏捷，步履轻快，弯腰还能手碰到地面。

即将迎来百岁华诞的（12月6日），还有侯仁之，2010年10月18日，我与他女儿馥兴联系，得知老人仍然住院，11月6日，将为他举办一个学术讨论会。

本书2009年春节期间动笔，辛勤伏案，历时一年，2010年春节前截稿，由于出版方面的程序问题，迨至2010年11月，才最终敲定，也就是说，又给了我大半年的时间咀嚼、反刍，在这段日子里，我曾数度发心修改，又皆放弃，原因是新的工作（下一部是《寻找大师》）已上手，拿不出足够的热情和精力，只是，有些思绪还是有参考价值的，譬如，2010年9月27日，我乘“歌诗达·经典号”邮轮去台湾，途中忆及此稿，作了一些信马由缰、散漫无际的思考，整理如下：

*有童年的人，是幸福的，高龄而兼具童心者，则是伟大的。

*掩卷遐想，陈省身是一首诗，天马行空而又不失赤子纯情，钱学森是一支交响乐，季羡林是一株著花的老树，黄万里是一蓬直刺虚空的仙人掌。

*陈省身在一生关键时刻的选择，不是聪明的头脑能孕育的，那是俯瞰尘世的上帝的恩赐。

*季羡林的晚年有太多的谜，我相信其中有一部分将很难解开，他成了这段辉煌生涯的人质。

*钱学森的世纪之问，常人是难以回答的，要等到另一个与他

同等级别的大师出来，才能阐述清楚。

*黄万里有生之年，一定反复考虑过自己的人生使命，他就像一颗未能及时引爆的炸弹，但药性并未消失，说不定在哪一天，又会轰然一声，引发举世的大震撼。

*杨绛自立于人群之外，她不需要活在他人的眼中，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存在，就是独立苍茫（尤其是晚年）。

*侯仁之的一生是幸福的，他一仰头，总能看到满天星斗，不像我们现在的城里人，常常数了半天，只能瞧见一两粒星子。

*六位主人公，有四位，第一生命已经结束了，第二生命业已展开，在未来的第二生命中，他们的名字，将会被时间放大，或者缩小，乃至变形，能够经受住时间的潮流冲刷的，才是真正的大师。

2010－11－29 于京城柳清居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千手拂云　千眼观虹　　季羡林、钱学森、杨绛、侯仁之、陈省身、黄万里的人生比较
作者=卞毓方著
页数=340
SS号=12744913
出版日期=2011.03

前言
目录
序言：文道独行必大侠＆何建明
自序：一代同龄大师的“比”与“兴”
上篇
第一章　童年梦幻
第二章　少年青春
第三章　相交在清华园
第四章　仗剑天涯
第五章　人生的那一半
中篇
第六章　建国分水岭
第七章　反右之劫
第八章　“文革”悲欢
第九章　人生七十
第十章　笑傲八十
下篇
第十一章　巍巍九十
第十二章　九五之尊
第十三章　公元２００７
第十四章　公元２００８
第十五章　公元２００９
第十六章　公元２０１０
不是尾声的尾声